

ALBERT CAMUS

诺贝尔文学经典

局外人

鼠疫

【法】加缪 著

杨广利 尉天强 陈佩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经典

局外人 鼠疫

【法】加缪 著

杨川科 赵大宽 陈禹千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局外人；鼠疫 / (法) 加缪 (Camus,A.) 著；杨广科，赵天霓，陈属玉译.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506-0259-5

I. ①局… ②鼠… II. ①加… ②杨… ③赵… ④陈…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②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5278 号

书 名 局外人 鼠疫

著 者 (法)加缪

译 者 杨广科 赵天霓 陈属玉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59-5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10-68657290)

目录

CONTENTS

局外人	001
鼠疫	081

局外人

序言

这是一本“荒诞”的小说，一个扭曲、充满了黑色幽默和哲学的故事。

第一遍看的时候有些愕然，主人公的母亲去世了，然而他竟然用一种极其平淡的口吻来述说这个令人悲伤的事——“今天妈妈死了，或许也可能是昨天”，这是因为他搞不清楚电报中写的去世的具体时间。

在为母亲守灵的过程中他不想开棺看一眼母亲，因为那样很麻烦；他在棺材面前抽烟，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观察形形色色的来守灵的人，并且不乏幽默地在心中评论他们。在葬礼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哭的意思，更“荒诞”的是，葬礼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女友去海滨游泳、看滑稽电影、带回住处过夜。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冷漠、无情、扭曲的主人公，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当女友提出要结婚的时候，他竟然觉得“自己大概是不爱她的”，可是结婚并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他答应了。

“没有什么不妥”的想法还在整个小说里出现了很多次，帮助邻居写信教训邻居的情妇没有什么不妥，所以答应了；老板安排去巴黎开办办事处，没有什么不妥，所以答应了……

主人公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地理性地而又非理性地存在着。

就在我们好奇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的时候，故事走到了最后，主人公因为杀了人被判处死刑，而检察官指控他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流泪。

看完整个故事，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违背世俗的事情就是错误的吗？小说在告诉我们：母亲去世，就应该痛哭，这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一旦有人违背

了这个“习惯”，他就是有罪的。

看到这里就明白了“局外人”的含义——处于社会法则之外的人。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凡是违背它反抗它的人，就必须受到惩罚。

可是回头又想，对于主人公来说，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局外人”呢？世间万物总是相对的，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抛弃了他，对于他来说他又抛弃了社会。对于世界来说他是荒诞的，对于他来说世界又何尝不荒诞呢？

于是我们豁然，原来他的所有冷漠，不过是对这个“荒诞”社会、“荒诞”生活的反抗。

我们再次回到荒诞上，荒诞艺术源起于西方，是一种用离奇的故事来讽刺现实的手法，是西方存在主义的一个分支，曾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想。

为何这种流派会流行起来？我们还要谈谈当时西方的大背景——二战结束。二战爆发后，西方国家因为深陷战争，大多数人普遍感到一种不安和绝望，这种心理的蔓延逐渐使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就使得荒诞主义鼎盛起来。

或许对于一些中国读者来说，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这位法国的优秀作家于1957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包括剧本《误会》、《卡利古拉》，中篇小说《局外人》，长篇小说《鼠疫》，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等。

加缪的成名作就是这部《局外人》，作为存在主义荒诞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优美的句子，笔调十分简单、明快，多采用白描的手法，甚至初读会给人一种有些“枯燥”的感觉。但是正是这种笔调，给整个故事都笼罩上了“荒诞”的色彩，带给了读者无限的思考空间。

主人公到最后临死前，依然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并对死亡毫不在乎，这种执着，其实是源于他的真实。母亲死了，他是真的哭不出来；扣动扳机，也是真的因为太阳晃眼。可是他违背了“常理”，所以他只能是一个“杀人恶魔”，是处于整个世俗之外的“局外人”！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演绎“荒诞”？

杨广科

二零一零年九月于成都眷诚斋

局外人 上部



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收到养老院寄来的电报写着：“母死，明日葬。深表哀悼。”电报没说具体时间，妈妈也可能是昨天走的。

养老院在距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马朗戈。我乘下午两点钟的公共汽车过去，傍晚之前应该能赶到。我将在那里待一晚为妈妈守灵，明天晚上再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很显然，这样的情况他是不能拒绝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他有些气恼，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道：“先生你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错。”

他没答话，我想我本不该这么对他说。不过，我没有什么好抱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一下哀悼。大概后天他看见我穿着丧服的时候会这么做吧。现在的感觉好像是我的妈妈还没有死。不过一旦下葬，那就可以说是正式盖棺论定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那天天气很热，我照常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午饭。人们都来安慰我，赛莱斯特还对我说：“我们都只有一个母亲。”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烦，想急着离开，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去艾玛努埃尔那里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死了叔叔。

我是跑着去赶的汽车。走得匆忙加上一路的疾跑，明晃晃的太阳照射在地上，再反射到我脸上，颠簸的汽车，一股子的汽油味，弄得我一上车就昏昏欲睡。一路上我几乎都在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的身上；他冲我笑了笑，然后

问我是不是打别处来的，我只点了点头，不想说话。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的路。于是我赶路过去。我急着想见到妈妈，但是守门人说我得先去见院长。他那时正忙着，我还得等一会儿。守门人就利用这时间喋喋不休地和我说起话来；然后他才将我带去办公室。院长是一个小老头，肩上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随后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让我感到有些窘迫。他看了看桌子上的档案，然后对我说：

“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这里的。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你就是她的唯一了。”

我感觉到他是在责备我什么，于是我马上试图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

“没有必要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很显然您没有办法负担和照顾她。她需要有人一直在她身边照料，而您的薪水又无法承担看护费。综合考虑，她在这里会更安逸。”

“是的，先生，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不错，她在这里有很好的朋友，您知道的，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喜欢回忆过去，有相同爱好的朋友。而您太年轻了，和您待在一起或许她还会觉得闷呢。”

这话倒不假，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总是一天到晚地看着我，但是我们却很少交流。她刚进养老院的几个礼拜哭得很厉害，可那是因为她还没习惯。一两个月后如果让她回家，她也会哭，那也是因为她不习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一年来我很少来看望她。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来看她就必须利用星期天，而买票、赶车、颠簸两个小时也确实费精力。

院长还在说着什么，但我也没心思听，最后他说：

“我想您应该很想见见您母亲吧？”

我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他带着我走出了门。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解释说：

“我把她的遗体放在了一个小停尸间里——因为担心惊扰到其他老人，您可以理解的吧。

这里每逢有人死了，他们总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安定下来，当然，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

我们穿过了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些老人，他们正三五成群地闲聊着。当我们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不作声了；而当我们走过去，他们就又开始聊了起来。他们说话的声音让我想起笼子里叽叽喳喳乱叫的鹦鹉，一刻也不得安宁。走到一座小房子的时候，院长停在了门口。

“我就送您到这，默而索先生。如果有任何事情，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计划的葬礼在明天早上。所以我想您有一整夜的时间守在您母亲的棺材边，如果您愿意的话。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从您母亲的朋友那里听说她曾表示希望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一声。”

尽管我知道母亲并不是无神论者，但在她有生之年也从未有过什么宗教信仰，不过我还是谢了他。

我走进了房间。这是一件明亮、干净的房间，有一个大型的玻璃天花板，四面墙都刷着白灰。家具有一些椅子和几个X型的架子。中间的架子上放着一具盖着盖子的棺材。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清晰可见一些发亮的螺丝钉的钉帽，是刚钉进去的。旁边站着一个阿拉伯女人，我想大概是护士吧，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上围着一方颜色鲜艳的头巾。

正在这个时候守门人来到了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着进来的，因为他说话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把它盖上了，我来帮您打开它，让您看看母亲。”

他走近了棺材，但是我对他说不麻烦了。

“哎？为什么？”他大声说道，“您不想让……”

“不想。”

他把螺丝刀放回了口袋，然后看着我。我认识到我不该说不想，这让我感到有些尴尬。他看了我一会，然后问道：

“为什么？”但是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看起来只是想问问而已。

“呃，说真的我不知道。”

他开始捋着他发白的胡子，也不看我，用温和的语气说道：

“我能理解。”

他看上去挺友善，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微微发红的脸颊。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的身后。那名女护士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守门人在我耳边窃窃私语地说道：

“真可怜，她长的是恶疮。”

于是我小心地、悄悄地看了她一眼，我注意到她的头上，眼睛以下的部位都缠着绷带，而她鼻子的那个位置却是平的，脸上除了白色的绷带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当她走出去，守门人又对我说：

“我想该让您一个人待会。”

我不知道是否是我做了什么手势，他说完话后并没有走，反而是站在了我椅子背后。他这一举动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现在太阳就要下山了，但是整个屋子依然很亮。两只大黄蜂“嗡嗡”地贴着天花板乱飞。我困得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我转过身子，问守门人在这里干了多久了。

“五年了。”他快速地回答着，就像是在等着我问他一样。

接着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还将在马朗戈养老院干上十年直到老死在这里，他一定不会相信。他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是巴黎人。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打断了他，“这么说你不是本地人？”

问完我才想起来，就在他带我去见院长之前，他和我聊到我妈妈。他说过要赶紧下葬，因为平原地带天气很热，尤其是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巴黎居住过，并且还对那里记忆犹新。他说在巴黎，遗体可以在家里停放三或者四天，但是这里不行。

“在这里时间实在太仓促了，你还没来得及想，人就该下葬了。”

当时他老婆打断了他，“够了，这种事不该对这位年轻的先生讲。”

守门人脸一下子红了，连连向我道歉。我说没事，我倒觉得他讲的很对也很有趣。

现在他继续说到，他当初来养老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但是他的身体还很强壮结实，于是就自荐当了守门人。

我指出他和其他被收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是一个“管理者”。之前我就觉得奇怪，当他说到养老院里其他人的时候，他总是说“他们”或者“那些老家伙”，甚至其中有些人并不比他年龄大。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作为一个看门人，在某种程度来说他的确是管着他们的。

这时护士又进来了。天黑得很快，眨眼间，夜幕笼罩了天花板的上空。守门人打开了灯，突然的光线让我感到有些目眩。

他提出带我去餐厅吃饭，但是我并不饿。于是他又建议给我送一杯牛奶咖啡来。我非常喜欢牛奶咖啡，于是我同意了并说了谢谢。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口咖啡，烟瘾上来了。但是我有些犹豫，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妈妈遗体面前，抽烟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认为并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递给守门人一支烟，同他一起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您知道的，您母亲的朋友一会儿也要来，和您一起为她守灵，这是一种习惯。我得去找一些椅子，再端些黑咖啡来。”

灯光照在雪白的墙上格外刺眼，于是我询问守门人能否关掉一盏。他说不行，这种灯就是这样全关全开的设计。后来我也没再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搬进来几把椅子，将它们围着棺材摆好，又在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了十多个杯子。然后他隔着棺材坐在了我的对面。女护士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我觉得像是在织毛线。咖啡令我有些发热，我感觉很舒服，从敞开的门外飘进来一股清爽的夜的味道和一阵阵花香。我想我是打了一会儿盹。

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弄醒。当我睁开眼睛后，我感觉到房间里比之前更加明亮了。在我面前，所有东西都是那么一览无遗，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每一根线条，都清清楚楚，轮廓分明，没有丝毫的遮掩。那些老人——我母亲的朋友，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我估摸着有十来个人，他们悄无声息地在这晃眼的灯光下挪动。当他们坐下时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响动。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过人。他们衣服、毛孔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法逃过我的眼睛。但是我没有听见

他们发出任何声音，这真让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于这里。

几乎每一个女性都围着围裙，系在腰间的带子让她们肚子显得更大了。我之前还从来没有注意到上了年纪的妇女会有这么大的肚子。而男人们大多都很瘦，他们都拄着拐杖。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眼睛，唯有从一堆皱纹中闪烁着的一缕混浊的亮光。

他们坐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看了我一眼，略带些不自然地点点头，嘴唇陷入了没有牙齿的嘴里。我不能够肯定他们点头是向我打招呼还是由于他们的年龄而不自主地抽动。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是在给我打招呼。点过头后，我发现他们都摇晃着脑袋坐到了守门人的附近，也就是面对着我坐下。这一刻，我有种可笑的、模糊的感觉，我感到他们是来审判我的。

过了不一会儿，一位女士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我没有办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前面还坐着一个女人。她低声呜咽着，我感觉她短时间内是不会停止了。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注意到似的。他们神色凝重悲伤，沉默不语。一会看看棺材，一会看看手杖，一会又东张西望，注意力就只在这些东西上来回走动，完全不去看那个哭泣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好奇，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很想过去对她说别哭了，但是我不敢。过了一会儿守门人弯下腰对她说了句话，可是她摇了摇头，嘴里小声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然后她依旧继续哭着。

接着守门人起身向我走来，坐在我的身边。一开始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才看着别处对我说道：“她是您母亲的好朋友。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您母亲的去世让她变得一无所有了。”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就这样沉默着。那个女人呜咽的声音渐渐减弱了，但依然在抽泣，又过了好一会儿，总算是停了下来。

我的睡意已经退去，但是我感到有些疲惫，腰酸背痛。此刻，这些人的沉默让我感到难受，我只能偶尔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起初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但是过了一会我就猜到了声音的来源，那是一些老头吸自己腮帮子而发出的声音，不过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冥思中，浑然不觉。我曾经甚至认为他们毫不在意躺在中间的死者。但是现在我发现那是一个错误的猜测。

我们都喝了守门人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知道了。就这样过了一夜。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偶尔睁开眼睛，可以看见那些老头们一个个蜷成一团睡觉，唯独有一位，下巴放在杵着手杖的手背上，盯着我看，就像他在等我睡醒一样。

随后，我又睡着了。但是因为腰痛不断，我还是从睡梦中醒来了。初升的太阳之光悄悄地爬上了玻璃窗。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头醒了，拼命地咳嗽。他掏出一块方格子的大手帕，往里面吐痰，每吐一口痰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其他人也被吵醒，守门人说他们该离开了。

于是他们站了起来。这样别扭地睡了一夜，使他们一个个都面如死灰。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出去时竟然都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这么一个相对无言的夜晚，我们的亲切感就增加了似的。

我有些累了。守门人把我带到他那里，我洗了脸，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感觉很好。当我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泛出了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中带着一股盐的味道。看来应该是个好天气。我很久没有来乡下了，如果不是妈妈的事，现在出去散散步该多好啊。

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闻着湿润的泥土气息，顿时有了些精神。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起床准备去上班了，而对于我来说，这是每天最难熬的时刻。我的思绪被房间里传来的铃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传来一阵喧闹声，随后又安静了下来。太阳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的双脚有些发热了。

这时，守门人穿过院子过来说院长想见我。于是我去了院长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字。我打量了一下，院长今天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拿起电话，问我：

“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了，您想最后再看看您母亲吗？”

我说不用了。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着，“费雅克，通知那些人，他们可以过去了。”

放下电话，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表示了感谢。随后他在写字台后面叉起两条小腿坐了下来。他告诉我送葬的人只有我、他还有执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

老人是不被允许去送葬的，只能参与守灵。他表示这是个人道问题。不过他又说这一次他破例允许我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参加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对我解释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些孩子气。他和您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爱拿他们开玩笑，他们总是对贝莱兹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只是笑笑。他们觉得有趣。然而这次默而索太太的死令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该拒绝他。但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昨晚没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来往窗外观望。过了一会儿他说：

“马朗戈的神甫来了，他倒是提前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四十五分钟才能到教堂，因为教堂在村子里。随后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唱诗的小童等在门口。他们其中一个的手上拿着香炉，神甫弯下腰，调好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的时候，神甫已经站了起来。他管我叫“儿子”，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跟着他走进了屋里。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被旋进去了，屋子里站了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说车子已经等在路上，神甫开始了祈祷。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在上面盖了一条毯子。神甫、唱诗的小童、院长和我，一起走了出去。

门口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这位是默而索先生，”院长向太太介绍我。我没听清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的代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嶙的长脸表示打招呼。我们站成一排，让抬棺材的四人先过去，然后我们跟在棺材的后面，走出了养老院。

送葬的车就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让人联想起铅笔盒。旁边站着葬礼的司仪，身材矮小，衣着有些滑稽，还有一个看上去举止不安的老人，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表示敬意），裤脚堆在鞋子上，白领衬衫太大了，而黑色的领花又太小。鼻头上布满了黑点儿，嘴唇在不住地抖动。满头的白发看上去有些柔软，两只耷拉耳，耳轮显得有些皱，血红的耳朵加上苍白的脸，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司仪安排了我们的位置。神甫走在最前面，然后是车子。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再后面是院长

和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则走在最后。

外面的太阳光很亮，直射到大地，地面温度迅速上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出发。身上的深色衣服使我感到闷热。小老头把帽子戴上了又重新摘下来。院长跟我谈到他时，我转向他那边一点，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傍晚的时候经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散步，有时候会一直走到村子里去。我望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通向天边小山岗的柏树林，红绿相接，周围的房子不多，却错落有致。我能理解母亲的心理，在这样的地方，傍晚该是一段令人感伤的时刻。今天，火辣辣的太阳使这片景致在人眼前晃动，显得无情而又令人疲惫。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贝莱兹有点瘸。车子渐渐走快了，老人落在了后面。车子旁边也有一个人跟不上速度，落到后面和我并排走着。我感到有些奇怪，太阳怎么升得那么快。我发现田野里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沙沙的风吹草动的声音。我脸上开始流汗。我没有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个伙计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他用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左手拿手帕擦着额头的汗。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空，连声说道：

“晒得够呛。”

“是啊。”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里边是您的母亲？”

“是的。”

“她年纪大吗？”

“还好。”我回答着，其实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了。

他不再说话了。我回头看了看，老贝莱兹已经落下了五十多米远。他一个人急忙忙地往前赶，手里摇晃着帽子扇风。我又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也顾不得去擦。

我感到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有些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都裂开了，脚一踩就陷进去，留下一道明晃晃的烈日。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油泥里浸过似的。我有点迷迷糊糊的，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尽是些单调的颜

色，开裂的柏油是一种粘乎乎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一种毫无生气的黑，车子又是黑得发亮。这一切，阳光、皮革味、马粪味、漆味、香炉味，加上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让我两眼有些模糊，神志不清。我又回头看了看，贝莱兹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消失在一片热空气之中，到后来就根本看不见了。我仔细地寻找，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大路，从田野地里斜着转过来。我注意到前面大路有个弯，原来贝莱兹熟悉路径，正抄近道追赶我们呢。在大路的拐弯处，他追上了我们。可是后来我们再次将他落下了。他就又斜穿田野追上来。如此这样重复了好几次。此时的我感到血直往太阳穴上涌。

以后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迅速、准确和自然，我现在什么也想不起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村口的时候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怪，和她看上去的样子很不协调，那是一种抑扬而又颤抖的声音：

“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快，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

她说得对。进退两难，没有出路。

我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印象，比如说贝莱兹最后在村子追上我们时的那种神情，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水划过他的脸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然流不下去，如此一来，那张脸上就铺上了一层水。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上红色的天竺葵，昏厥的贝莱兹（真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插入土中的雪白的树根，人群，说话声，村子，在一个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当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的情景，以及我想到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喜悦。

2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当我向老板请两天假的时候他的脸色会十分不快乐，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完全没有想起这事，直到今天起床才想到。老板自然是想到了的，这样一来加上周日我就有了四天的假期，而这当然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但是，第一，安葬妈妈是在昨天而不是在今天，这并不是我的错；第二，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我休周末。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

昨天一天让我筋疲力尽，早上简直起不了床。在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怎么打发这个上午，最后我决定去游泳。于是我乘电车去了海滨浴场。

一到那里，我就扎进了水里；很多年轻人在这游泳，在那里我遇到了玛丽·卡多娜，我们曾经共事过，当时她是打字员。那时候我就想把她弄到手，并且我认为她也喜欢我。但是很快她就离开了那里，我们没来得及发展。

我帮她爬上浮台。扶她的时候，我轻轻地碰着了她的乳房。她躺在浮台上，而我在水里。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脸来看着我。她笑着，头发遮住了眼睛。我也上了浮台，挨着她坐下。天气中弥漫着令人愉快的气息，我半开玩笑地将头枕在她身上。她看起来似乎没有介意。于是我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我抬头仰望着天空，碧蓝的天空中夹杂着一丝金色，我感觉到头下玛丽的腹部在轻轻地起伏。我们就这样半睡半醒地待在浮台上。过了一会儿太阳变得强烈了起来。我跟着她下了水，追上她后伸出手臂抱着了她的腰，我们一起游着。她总是在笑。

当我们上岸晒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愿不愿意一起去看电影。她又笑了，说可以，她正好想看一部费南代尔片子。

我们穿好衣服，她看见我系了一条黑色的领带，于是好奇地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告诉她妈妈死了。她问是在什么时候，我说是昨天。她迟疑了一下，但没表示什么。我想告诉她这不是我的错，但还是咽了回去，因为我想起了我就是这么对老板说的。那毫无意义。反正人总要犯点错。

不过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玛丽就把这些都忘了。片子有的地方很滑稽，不过显得很蠢。她的腿和我的腿挨在一起，我抚摸着她的乳房。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是动作有些笨拙。从电影院出来，她跟着我去了我的住处。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离开了。她跟我说过她要去她婶婶家。我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这让我有些心烦，因为我向来就不喜欢星期天。于是我翻了个身，在枕头上寻找玛丽的头发留下的盐味。我一直睡到了十点。醒来后我依然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我不想像平时那样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因为他们肯定要问我很多问题，我可不喜欢这样。于是我煮了几个鸡蛋，从盘子里拿出来吃了。我没吃面包，因为家里没有了，我也懒得下楼去买。

吃过午饭，我感觉到有点闷得慌，就在屋子里瞎转悠。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挺合适，而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大了，我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住这一间，所用到的家具就是几把已经有点塌陷的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一张铜床。其余的都被我丢在一边。

过了会儿我实在是闲着无聊，就拿起一张旧报，读了起来。我把克鲁申盐业公司的广告剪下来，贴在一本旧簿子里。凡是报上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都会剪下贴在一本旧簿子上。然后我洗了洗手，上了阳台。

我的卧室临着通往郊区的主干道。午后天气晴朗。但是马路有些脏乱，行人稀少，但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忙碌。首先是出来散步的一家子，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超过了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身材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小矮子，我见过这个人。他戴着一顶平顶窄

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拿着一根手杖。看到他和老婆走在一起，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仪态不凡。过了一会儿，过来一群乡下的年轻人，头发油得发亮，系着红领带，衣服腰身收得很紧，衣袋上还绣着花，穿着方头皮鞋。我猜他们是准备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才这么早进城，他们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

当他们走过去之后，路上就没有什么人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演出都开始了。街道上只剩下店主和一些流浪猫。从街道两旁的无花果树上空望去，天是晴的，但是不亮。对面人行道上，卖烟的小贩搬出一把椅子，倒放在门前，双腿骑上去，又把两只胳膊搭在椅背上。刚才还是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是空荡荡的了。烟草店旁边那家叫“彼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也已经空无一人，侍应生正在扫地。这的确是星期天的景象。

我也把椅子倒了过来，像卖烟的人那样坐着，那样确实很舒适。我抽了两支烟之后回到房间拿了一块巧克力，靠着窗嚼起来。不一会儿，天阴沉了下来，我以为是要下暴雨了。但是过了不多久，天又渐渐放晴。不过，刚才飘过的一片乌云，像是要下雨，这样一来街上显得更加阴沉了。我待在那儿望着天空，望了很久。

五点钟的时候电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车里挤满了从郊外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的就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几辆车里面坐着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看出来的。他们扯着嗓子大声喊叫、唱歌，嚷嚷着他们的俱乐部万岁之类的。他们中的一个注意到了我并对外喊道，“我们赢了！”我挥了挥手，然后大声地对他们表示祝贺。从这时候开始路上的小汽车就多了起来。

天空开始逐渐变暗了，屋顶的上空出现了红色的晚霞。一旦进入了黄昏，街上也就热闹了起来。人们开始出来散步，我注意到了人群中那位仪态不凡的先生。大人拖着哭闹的孩子。这一带的电影院这个时候差不多都散场了，大批的看客被抛向了街头。我注意到年轻人们迈着大步，比平时更活跃更精力充沛，我想他们刚才看的一定是一部冒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们则稍微晚一些出现。他们显得更加庄重，尽管他们脸上挂着笑容，但看上去非常疲倦，常常出神。他们中的一些就走在我的窗子下面的街道上。这时候一群姑娘挽着胳膊走了过来。那些在我的窗子下面的

年轻小伙们想方设法地靠近她们，向她们讲笑话，弄得那些姑娘们一边笑一边回头来看。我认出她们是我们镇上的，其中两三个我认识，她们向我挥手打招呼。

正在这个时候，街上的灯亮了，夜空中出现的星星陡然失去了颜色。我望着满是行人和灯光的街道，感到眼睛有些累。灯光把潮湿的路面照得闪闪发亮，间隔均匀的电车反射出的灯光，又照到闪光的头发上、人们的笑容里或者她们的银手镯上。

不一会儿，电车少了，树木和电灯的上空变得一片漆黑，路上的行人在不知不觉中也散了，直到第一只猫悠闲自得地穿过再次变得空无一人的马路。

我想是时候吃晚饭了。我在椅背上趴得太久，以至于现在脖子有点儿酸痛。我下了楼，买了些面包和意大利面，回来自己做好，站着吃了晚饭。我想在窗前抽支烟，但是入夜后天气变得有些凉，我只能关了窗户。当我返身回到房间，在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摆着酒精灯和面包块。一瞬间我想到星期天总是忙碌的，妈妈已经安葬了，明天我又该像往常一样上班了。总之，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3

整个上午我都很忙。老板挺和气。他还关心地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接着他又问到了我妈妈的年龄。为了不出什么漏子，我说了个“六十岁左右”。不知为何他好像松了一口气，看上去像是在想终于了结了一件事。

我桌上堆了一大堆的单子，都等着我处理。我洗了手之后就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了。中午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我不太喜欢晚上，因为公司里公用的滚动毛巾被很多人用过之后都湿透了。我曾经向老板提过这事。他说他感到遗憾，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一桩小事。我比平时下班晚了些，直到十二点半我才和艾玛努埃尔一起走了出来，他是发货部的。我们公司外面就是海，我们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停在港口里的船。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带着哐哐的铁链声和噼里啪啦的爆炸声。艾玛努埃尔说跳上去试试看。我就跑了起来。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追赶了上去。我被一片嘈杂声和灰尘包围，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有些晕眩。我感到绞车、机器和半空中的桅杆在和我们身边的轮船之间拼命晃动。我第一个抓住了车，跳了上去。随后我帮着艾玛努埃尔坐好。我们大口喘着气，汽车被包裹在尘土和阳光之中，在码头上高低不平的路面颠簸。艾玛努埃尔咯咯笑个不停，在我耳边说，“我们做到了啊。”

后来浑身是汗的我们来到赛莱斯特的饭馆。他还是老样子，挺着大肚子，系着围裙，留着雪白的小胡子。他看见了我，问我是否还好，我说是的，但是我现在感

到有些饿。我吃得很快，喝了一些咖啡。然后我回家倒在床上就睡了一会儿，因为喝了不少酒。

醒来后我躺在床上抽了一支烟。我有点迟到了，于是我跑着去赶电车。办公室里很热，我又忙活了一个下午。晚上下班后，我沿着码头漫步走回去，感到很惬意。天空有些发绿，这让我在忙碌的工作后感到一丝满足。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了家，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楼梯很黑，当我上楼的时候我差点碰到了老萨拉玛诺的身上，他是我同层居住的邻居。像平常一样，他牵着他的狗。这八年来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他的狗是西班牙种猎犬，但是似乎得了皮肤病，我猜是丹毒，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痂。他们俩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长得像它了。他的脸上长了些发红的硬痂，头发是一些稀疏的黄毛。而那只狗，也跟着它的主人养成一种弯腰驼背的走相，撅着嘴，伸着脖子。他们是如此相似，却又相互憎恨。每天的十一点和六点，老头儿都带着狗出来散步。这八年来，他们从未改变过路线，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个趔趄，他就又打又骂。然后狗又吓得趴在地上，让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儿拽了。要是狗忘了，又拖起主人来，就会挨打挨骂。于是，他们两个一起待在人行道上，你瞅着我，我瞪着你，狗的眼中充满的是怕，而人则是恨。他们天天如此。要是碰到狗要撒尿，老头儿偏不给它时间，使劲拽它，狗就沥沥拉拉尿一道儿。如果偶尔狗将尿拉在了屋子里，则会遭到一顿毒打。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赛莱斯特总是说“这真不幸”，但事实上我们谁都无法说这到底是不是不幸。我在楼梯上碰见萨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骂它是混蛋，是垃圾，而狗则一直在哼唧。我向他问晚上好，但是他仍然在骂完全没注意。于是我询问他狗哪里惹怒了他，他也不回答，只是叫喊着“你简直脏死了！”我隐约看见他正弯着腰在狗的颈圈上摆弄什么。于是我提高了嗓门。他头也不回，憋着火气回答我：“它总是这样。”说完，便拖着那条哼哼唧唧、不愿意痛痛快快地往前走的狗出去了。

正在这时，我那层的第二个邻居走进了楼道。这一带的人都说他是吃软饭的。

但是，别人要问起他的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显而易见，他在我们这楼里不是很受欢迎。但是他常跟我聊，有时还到我那儿坐坐，因为我会听他说。再说，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叫莱蒙。长得相当矮，肩膀却很宽，长着一个拳击手的鼻子。他总是衣着光鲜。他曾经同我谈到萨拉玛诺，他也说：“真是不幸！”然后问我对此是否感到讨厌，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就在我要转身走进门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一块儿吃点怎么样？”

我想了想，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做饭了，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他也只有一间房子，以及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我看见他的床上方摆着一个白色和粉红色相间的仿大理石做的天使像，以及几张体育冠军的相片和两 three 张裸体女人画片。房间很杂乱，床上也乱七八糟。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肮脏的纱布，把右手缠了起来。我问他发生什么了，他说是和一个找他碴儿的家伙打了一架。

“您知道，默而索先生，”他对我说，“我并不坏，就是脾气有点火爆。而那家伙，他说：‘你要是有种，就从电车上下来。’我对他说：‘滚，别找不自在。’他就说我不是男人。于是，我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别再嚷嚷了，否则我就教训你。’他说：‘你敢怎么样？’我就揍了他一顿。他倒在地上。我呢，我正要把他扶起来，他却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给了他一脚，又打了他两耳光。他满脸流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他一边说一边已经缠好了纱布，我坐到了床上。

“您看，不是我的错，是他找事。”

我点了点头，他继而又说道：

“事实上，我正想询问您对此事的看法；您是一个男人，又有主意，我猜想您一定能帮助我。我希望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不会忘记您给予的帮助的。”

接着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没有表示反对，他显得很高兴。他拿出香肠，在锅里煮熟，又拿出酒杯、盘子、刀叉、两瓶酒。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一言不发。

我们坐下吃晚饭，他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一开始他还是有点迟疑。

“这事和一个女人有关，当然通常来说都是这个原因。她是我的情妇，我们经常睡觉。我养着她，事实上她花了我大部分的收入。今天和我打架的就是她的兄弟。”

我没有发表评论，他又补充说他知道周围的人怎么说他，但是他问心无愧。他说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有正当的工作——仓库管理员。

“好吧，回到我的事情上来。是这么回事，后来我发现她在骗我。”他说他给了她足够的钱维持生活，为她付房租，每天还给她二十法郎的饭钱。“房租三百法郎，饭钱六百法郎，不时地送双袜子，一共一千法郎。她并不工作，可却说那是合理的，而我给的钱还不够她生活，我就叫她去找一份半天的工作，这样我就不用为她那些零碎的花销而操心了。我还对她说‘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替你付房租，可你呢，下午和你的女友们喝咖啡。你拿咖啡和糖请她们，而这些钱理所当然都是我付的。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可是你却丝毫没有回报。’但是她就是不愿去工作，仍然说钱不够。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她是在骗我。”

接着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而她无法解释是用哪儿的钱买的。还有一次他在她那里发现了一张当票，证明她当了两个镯子，而他根本不知道她有镯子。

“于是我就知道我受骗了，我决定把她甩了。不过我首先把她揍了一顿，才掀了她老底。我说她就是拿我寻开心的，并告诉她说：‘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你的所作所为，渴求我回到你身边。这条街上的所有女人都在羡慕你有这么好的运气被我养着。’”

他一直把她打得出了血才罢手。他说他以前并不打她。“好吧，也要打，只不过是轻轻碰一下。她一叫唤，我就关上窗子。接着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一次我可是来真的，在我看来我惩罚得还不够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解释说这就是他需要询问我意见的地方。这时灯有些冒烟，他打住了话头，起来调了调灯芯。我一直一言不发地听他说话。我喝了将近一升的酒，觉得太阳穴

发烫。由于我的烟没了，我抽的是莱蒙的。末班电车开过，带走了遥远的郊区的嘈杂声。莱蒙继续说起来。现在让他烦恼的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对跟他睡觉的女人“还有感情”。但是他想惩罚她。

他说他最初的想法是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叫来扫黄的警察。让他们把她当妓女抓起来备案。后来，他又找过几个混社会的流氓朋友。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正如莱蒙所指出的，当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女人的时候，参加流氓团伙还是有好处的。他把这事告诉了他们，他们的建议是把她“毁容”。但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需要再考虑考虑。不过在此之前他想询问下我对这事有什么意见。在他问这个问题之前他又想知道我对他的故事有什么看法。

我说没有什么看法，不过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

他问我她是不是在骗他。

我说应该是。他又问我是不是也认为该惩罚下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我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但是我理解他想惩罚她的心情。

我又喝了一点酒，而他点了一支烟，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给她写一封信，“一封羞辱她的信”，但是同时又要给她一些甜头让她后悔。然后等她回来，他就和她上床，就在要完事的时候，他就往她脸上吐口水，再把她赶出去。我同意这是个不错的办法，这确实能够惩罚她。

但是莱蒙说他写不好这封信，想请我帮他写。由于我什么都没说，他问我是不是不方便马上写，我说不是的。

他喝了一杯酒，站了起来。他把盘子和我们吃剩的冷香肠推开。然后又仔细地擦了擦铺在桌上的漆布。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钢笔和一小方瓶紫墨水。接着他告诉我那个女人的名字，看得出来是个摩尔人(非洲西北部伊斯兰教民族)。

我开始写信。信写得还算漂亮，不过我还是尽量让莱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然后我把写好的信大声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着，不住地点头，又要求我再念一遍。他看上去非常满意。“这封信写得很好，”他咯咯地笑着，“我就知道老兄你有经验。”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开始用“老兄”来称呼我了。直到他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是吧？”我才感到有些惊讶。我保持沉默，他就又重复说了一遍。我对于不做朋友倒是无所谓，可是他看上去似乎是真有这个意思，于是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他封好信，我们把剩下的酒喝完。然后默默地抽起了烟。外面的街上非常安静，除了偶尔听到的汽车开过去的声音。我说时间不早了，莱蒙也表示同意。“今晚的时间过得真快。”他点了点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我很想睡觉，但是有些站不起来。我看上去一定很疲倦，因为莱蒙对我说，“你要放轻松些。”一开始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接着他解释说 he 听说我妈妈死了，但是这是早晚的事。我也这样认为。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莱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男人之间总是彼此理解的。从他那里出来，背后的门关上后我又在漆黑的楼道里待了一会儿。楼道里鸦雀无声，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模糊的、潮湿的气息。我除了能听见耳朵里血液一阵阵的流动声外什么也听不见，我静静地呆着，倾听这种声音。这时从老萨拉玛诺的屋子里传来的那只狗低声哼哼的声音，穿透这沉睡中的大楼，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悲伤气息，就像是一朵鲜花绽放在无边的寂静和黑暗之中。



这一周我的工作都很忙。莱蒙曾经来过一次告诉我说他把信寄了。我跟艾玛努埃尔去了两次电影院，电影演的什么他不是总能看懂，需要我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按照我们约好的时间过来了。她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上面是红白条纹的图案，脚下穿着凉皮鞋，我的视线简直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她那结实的乳房隐约可见，太阳把她的脸晒成了棕色，就像一朵怒放的花。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我知道的离阿尔及尔几公里外的一处海滩。那儿两面夹山，岸上有一溜芦苇。四点钟的太阳不算大，但水还很温暖，层层细浪懒洋洋的。

玛丽教给我一种新游戏。就是游水的时候，迎着浪峰，含一口水在嘴里，然后翻过身来，把水朝天上吐出去。这样一来，水就像一条泡沫的花边散在空中，或像一阵温雨落回到脸上。可是玩了不一会儿我的嘴就被盐水烧得发烫，这时玛丽游到我身边，贴到我身上，把她的嘴对着我的嘴。她伸出舌头舔我的嘴唇，我们就在水里缠绵了一两分钟。

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玛丽用灼热的眼神看着我。她的眼睛在发光。我吻了她，从这一刻起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都急忙找到公共汽车坐上去，然后回到我的住处就跳上了床。我没有关窗户，我感到夜晚凉爽的空气在我们棕色的皮肤上流动。

玛丽告诉我说她第二天早上可以不用走，于是我叫她留下来一起吃午饭。她同

意了，我下楼去买肉。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听到莱蒙的屋子里传来女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传来老萨拉玛诺骂狗的声音，我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了鞋底和爪子的声音，接着就听见老萨拉玛诺吼着“混蛋，垃圾！”然后他们就下楼上街去了。我把这老头的事告诉了玛丽，引得她大笑起来。她穿着我的睡衣，挽起袖子。她笑的时候我心里又痒痒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说这种问题毫无意义，但确实我好像不爱她。她看上去有些难过，不过当我们做午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每当她笑的时候我就总想吻她。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莱蒙屋子里传来打架的声音。

先是听见女人尖着嗓子叫嚷了什么，然后是莱蒙对她大叫：“你这个臭女人，你不尊重我！我来教你怎么尊重我！”接着就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听得出来是用尽全力的——这个时候楼梯口已经是挤满了人。玛丽和我也出去看。那个女人一直在叫，而莱蒙一直在打。玛丽说这真可怕。而我没有搭腔。她要我去找警察，我说我不想招惹警察。但是住在三楼的一个管子工叫来了一个警察。他先是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他又用力敲了敲，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女人的哭泣声，莱蒙打开了门。他嘴里叼着一根烟，脸上挂着笑容。

“你的名字？”警察问道。

莱蒙回答了。

“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你的嘴上拿掉。”

莱蒙有些犹豫，他看了我一眼，又放在嘴里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扬手照着莱蒙的脸就来了一记狠狠的、结实的耳光。香烟从他的嘴唇边飞出好几米远。莱蒙的脸色都变了，但是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能不能拾回他的烟。

警察说可以，但是警告他说，“下一次别忘了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个女人一直在哭，不停地说，“他打我，他是懦夫，是垃圾。”

“不好意思，警官，”莱蒙插嘴道，“说一个男人是垃圾是合法的吗？”

警察叫他闭嘴。

于是莱蒙又转向那个女人，“等着吧，小娘们儿，咱们走着瞧！”

“够了。”警察打断了他，并叫那个女人走，叫莱蒙待在屋里等着局里传讯。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害臊，”警察又补充说，“看你东倒西歪的。好吧，你一定喝了很多酒，喝醉了。”

“不，我没醉，”莱蒙解释，“我只是看着你就有些打哆嗦，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很自然的事。”

接着他关上了门，大伙也就散了。玛丽和我接着做好午饭。但是她没有什么胃口，东西几乎都让我吃了。她是一点钟的时候离开的，我又上床睡了一会儿。

快到三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莱蒙。我依然躺在床上，他坐到床沿边不说话。我就问他事情是怎么样的。他说一开始他如愿以偿，但是后来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打了她。剩下就是我后来看到的。

我说这下好了吧，她已经受到了惩罚，你也该满足了。

他表示同意，他还指出警察来了也无所谓，反正他已经打了她了。他说他很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还问我当时是不是等着他回敬警察一下子，我说我什么也不等，再说我不爱招惹警察。莱蒙好像很得意。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出去走走。我下了床，梳好头发。接着莱蒙说他需要我做他的证人。我没有表示反对，但是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非常简单，你只要告诉他们那个女人不尊重我就行了。”

于是我答应了为他作证。

我们出去了，莱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想打一局台球，我差点赢了。他还想去妓院，但是我拒绝了；我说我不喜欢那玩意儿。于是我们慢慢悠悠地走了回去，他告诉我因为惩罚了情妇，所以他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他待人不错，我很喜欢这次散步。

当我们走近房子，我看见老萨拉玛诺站在门口，他看上去很不安。我注意到他的狗今天没有跟着他。他就像个陀螺四处乱转，到处张望，用他那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拼命往黑洞洞的走廊里看。他嘴里嘟囔着只言片语，仔细地在街上寻找着什么。

莱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并没有立刻回答。我隐约听到他嘀咕着，“杂种！”

野狗！””。仍然带着一种不安。当我问他，狗去哪里去了，他有些生硬地回答我说走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我像平常一样，带它去练兵场。那里围着一群人，很热闹，很挤。我停下来看《流放的国王》。等我回过身的时候，狗就不见了。其实我早想给它买一个小点儿的颈圈了。可是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畜生能这样就走了。”

莱蒙说他的狗可能是迷路了，过段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跑几十公里找到主人。但是老头儿的神色看起来似乎更加不安了。

“你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弄走的。我的意思是警察。没有人会收养它，因为它长了一身的恶疮，他们会抓住它的。”

我告诉他可以去宠物收容所看看，丢失的狗都在那里。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领回来了。他追问我是不是要很多钱，具体多少我就不清楚了。接着他就发起火来：

“让我为这个畜生花钱？该死的！它还是死了吧。”接着他又开始骂起狗来。

莱蒙笑了笑，转身上楼了。我跟着他上去，我们在楼梯口分手。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我听见了老萨拉玛诺的脚步声，接着他敲了敲我的门。

当我打开门，他已经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了，嘴里说着，“抱歉，我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我请他进来，但是他摇了摇头。他一直盯着自己的鞋尖儿以及长满硬痂的手，没有看我：

“默而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真的把它抓走了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是吗。否则我该怎么活啊。”

我告诉他，送到收容所的狗会保留三天，等待主人去领，三天后无人认领的狗就随意处置了。

他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道了晚安。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关了门，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接着他的床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透过墙壁，我听见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原来他在哭。不知道为何，这时我想起了妈妈。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因为头天晚上我没有胃口，没有吃晚饭就睡了。

5

莱蒙往办公室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他跟他说起过我）请我到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滨木屋去过周末。我说我很想去，但是我已答应和女友一块儿过周末了。莱蒙立刻说叫玛丽一块过去。他朋友的妻子一定会因为在一堆男人中间有了作伴的而感到高兴。

我本想立刻就挂上电话，因为我的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挂电话到办公室。但是莱蒙让我等一等，他还有其他事要跟我说，那也是他给我挂电话的主要目的，因为邀请完全可以晚上再转达。

他说有一帮阿拉伯人盯了他一天了，其中就有他情妇的兄弟，他希望我回家的时候如果看到他们在房子附近转悠就告诉他一声。我说没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老板派人来找我过去。我顿时感到有些不安，我以为他又要说少打电话多干活之类的话。结果根本不是。他说他要跟我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因为这只是他初步的一个构想。他说想听听我对这个计划的看法。他打算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直接在当地与一些大公司做买卖，他想知道我能否去那儿工作。

“你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说，“我认为你会很喜欢留在巴黎生活。当然，这样一来你每年还有时间在法国旅游旅游。”

我告诉他我会尽快准备出发的，事实上我根本就无所谓。

于是他问我是不是不愿意改变生活，我回答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任何一种生

活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的生活也没有让我不高兴。他好像不是很满意，说我总是在答非所问，没有雄心壮志，这对于做生意来说是很糟糕的。

他说完我就回去继续工作了。我并不想让他不快，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并非不幸。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过不少所谓的雄心壮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的时候玛丽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如果她想结就结好了。她接着又问我爱不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我回答的话，我想大概是不爱。她又问那为什么要答应娶她呢。我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就结婚好了。再说了，是她提出的，我只要同意就好了。她说可是结婚是件大事。我说我并不这么认为。她沉默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她说她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建议出自另外一个女人，而她和我的关系跟我和玛丽的关系一样，我会不会同意。我回答当然会。

然后她说她是爱我的。而我对于她却不是很清楚。她又沉默了一阵，小声说：

“你真是个怪人。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上你的。不过，或许以后我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讨厌你吧。”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

接着她又笑了起来，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和我结婚。我说怎么都好，她愿意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吧。

接着我告诉她老板的建议，她说她很乐意去巴黎。我告诉她我要在那里住一阵子，她又问我巴黎怎么样。

“在我看来，很脏，到处都是鸽子和阴森森的院子。人的肤色都是白的。”

后来我们出去散步，穿过了镇里的几条大街。路上的女人们都很漂亮，我问玛丽是否注意到了，她说是的，还说她了解我的意思。此后我们有几分钟都没有说话。但是，我还是很想和她在一起，我提议一块儿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她说她很想与我共进晚餐，但是她还有事。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我家的附近，于是我对她说了再见。

她用眼睛注视着我，说：

“你不想知道我今晚要做什么吗？”

其实我想知道，但是我没有打算问她，我猜她对此有些不满。那时我看上去一定很尴尬，而玛丽突然笑了并挺起身子将嘴唇凑了上来。

于是我独自来到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当我开始吃的时候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问我是否可以坐在我这张桌子。她当然有这个权利。她长着一张苹果脸，双眼明亮，就是动作有一些僵硬。她脱下外套坐下，匆匆地看了看菜谱。她叫来赛莱斯特，很迅速地就点完了她要的菜，语气准确而急迫。在等凉菜的时候，她打开提包，取出一小片纸和一支铅笔，算好钱，再从小包里把钱拿出来，加上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放在面前。

这时凉菜上来了，她迅速地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上来的时间，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本星期的广播节目杂志。她非常认真地把上面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一一勾出来。由于那本杂志有十几页，所以她整整一顿饭的时间都在仔细地做这件事。我吃完饭的时候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勾着节目。她吃完后用刚才那僵硬机械的动作穿好外套，离开了。我闲着没事，跟着她出去走了一阵。她走在人行道的边上，步子非常快但很平稳，她一直往前走，也不回头，到最后我看不到她了也就回去了。这时我想她一定是个“怪人”，但是很快我也就把她忘了。

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老萨拉玛诺。我邀请他进屋坐，他说他的狗丢了，因为它不在动物收容站。那里的人告诉他说它可能是被碾死了。他问他们这种事去警察局问有没有用，他们告诉他说这不可能，因为这类事每天都会发生，警察局是不会一一记录的。于是我建议他可以再养一条，但是他指出他已经习惯了它，他说得也确实不错。

我蹲在我的床上，萨拉玛诺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放在膝盖上。他依然戴着他那顶旧毡帽。在发黄的小胡子下面，他嘴里嘀嘀咕咕地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感到有些厌烦，但是我也确实无事可做，又没有一丝的睡意。于是我没话找话地和他聊起来，问到了他的狗。他说他是在老婆死后养的它。他很晚才结婚。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演戏，所以当兵那会儿，他在军队的歌舞剧团里演过

戏。但最后，他进了铁路部门，不过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现在得到了一小笔退休金。他和他老婆的婚姻并不算幸福，但是他也习惯了。在她死后，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他就向一个工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必须拿奶瓶喂它。因为狗比人的寿命短，所以他们就一块儿变老了。

“它是一条脾气糟糕的狗，”他说着，“我们俩经常吵架，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一条好狗。”

我说它看上去像是一条良种狗，这似乎让老人感到很高兴。

“你没有看到它生病前的样子！它有一身非常漂亮的毛；事实上这是它最突出的优点。自从它生病后我就开始照顾它，每天早晚要给它涂两次药。但是它真正的病因是衰老，而衰老是没法治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儿说他要离开了。我跟他说他可以再待一会儿，对狗的事我感到很难过，他对我表示了感谢，并告诉我说我母亲也非常喜欢他的狗。提到我母亲时他称呼她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猜想母亲死后我该是非常痛苦的。看我没有说话，他很快地又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这一带的有些人对我的看法不太好，因为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但是他说他理解我的做法，他也知道我很爱母亲。

我问他为什么——我还一直不知道他们有这种看法——但是在我看来我认为把母亲送去养老院没有什么错。因为很显然她需要人照顾，而我付不起这笔钱。“再说了，”我又补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就和我无话可说了，她一个人待着也闷得慌。”

他说：“是啊，在养老院里，她至少还有伴儿。”

他站了起来，说是时候睡觉了，现在他的生活变了，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这是自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皮。这时他微微一笑，在走出去之前又说：

“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再叫了。我老以为那是我的狗。”

6

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很难醒来，玛丽又是推又是喊才把我弄醒。我们没有吃早饭，因为我们想一大早去游泳。我腹内空空，头有点痛，烟抽起来也有股苦味。玛丽笑我是“愁眉苦脸”。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披散着长发。我称赞她很漂亮，她高兴得直笑。

下楼的时候，我敲了敲莱蒙的门，他说他一会儿就下来。我们下楼来到街上，因为我很疲惫，在家的時候也没有开窗户，所以并不知道外面已经是大太阳天了，强烈的光线像一记耳光突然打在我的脸上。

但玛丽却兴高采烈，不停地說天气好。过了几分钟，我感觉才稍微好了些，肚子开始有点饿了。我告诉了玛丽，但是她并不在意。她给我看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无聊地等着，一会过后听到了莱蒙关门的声音。他穿了一条蓝色裤子，短袖白衬衫，头上却戴了一顶划船手的帽子，玛丽看了大笑起来。他露在袖子外的胳膊很白，上面长着浓毛。我感到一阵恶心。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下楼，看样子心情很愉快，他向我打招呼，“嗨，老兄。”称呼玛丽则是“小姐”。

前一天我们去了警察局，我为莱蒙作证——证明那个女人有对莱蒙“不敬”。他们只是警告了他一下，也没有怀疑我的证词。

我与莱蒙在门口交谈了一番，然后我们决定乘公交车过去。海滩离这并不远，

但是乘车会快些，因为莱蒙考虑到他的朋友乐意我们早点到。我们正要动身去公交站台的时候，莱蒙突然示意我看看街对面。我看见一帮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就像在看一些石头或枯树一样。莱蒙告诉我左边第二个阿拉伯人就是他所说的那家伙，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不安，不过，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了。玛丽不太明白，询问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解释说那些阿拉伯人想找莱蒙的麻烦。她于是叫我们赶快离开。莱蒙笑着，挺了挺肩膀说确实该快点赶路了。我们朝汽车站走去，汽车站还挺远。莱蒙对我说阿拉伯人没有跟着我们。我也回头看了看。他们还是在老地方，还是那样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刚才离开的地方。

当我们上车后莱蒙看上去轻松多了，不断地和玛丽开着玩笑。我可以看出他对玛丽有好感，但是玛丽几乎不愿意搭理他，只是时不时给他个笑脸。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的车。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算远，但是要走过一个俯临大海的小高地，然后就可以下坡直接到达海滩。蓝天白云之下，高地上到处都是发黄的石头和雪白的百合花。玛丽一边走一边抡起她的漆布手提包打着花瓣玩儿。我们从一排排的别墅中走过，这些别墅的栅栏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其中几栋还有阳台，隐没在一簇低矮的怪柳之中，还有几栋附近都是石头，光秃秃的。当我们走到高地的边上就看见了大海，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个突出的海角，清澈的水面倒映出它慵懒而巨大的影子。宁静的空气中响起一阵微弱的马达声，一直传到我们这边。远远地，我们看见一艘捕鱼的小船在闪光的海面上缓缓地前行。

玛丽在岩石上采了几朵蝴蝶花。从通往海滩的斜坡上，我们看见一些人已经在游泳了。

莱蒙的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房子背靠着峭壁，前面的木桩泡在水里。莱蒙给我们介绍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马松，身材高大魁梧，肩膀很宽，而他的妻子长得又矮又胖，人很和蔼可亲，说一口巴黎腔。

我们一到屋子马松就立刻告诉我们不要客气，他做了炸鱼，鱼是他早上才捕上来的。我称赞他的房子很漂亮，他告诉我说他周末和平时的节假日都会来这里度

过。他还叫我们不要拘束，和他太太也一定能谈得来。我瞥了她一眼，果然，她已经和玛丽有说有笑了。也许是第一次，我感到我真的想结婚了。

马松想去游泳，但是他的妻子和莱蒙都说不想动。于是只有我、玛丽还有马松三个人去了海滩。一到那里玛丽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水里，而我和马松稍微等了一会儿。他说话总是慢悠悠地，我注意到他不管说什么，总要加一句“照我说”，即使他根本没给他的话补充什么内容。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照我说，很可爱。”

不过很快我就不再注意他这个口头禅，而是一心去享受阳光晒在肌肤上的舒服劲儿了。渐渐地，沙子开始烫脚，我想下水，不过我又拖了一两分钟。最后我问马松，“一起下去游游？”说着就扎进水里。马松慢慢地走进水里，直到站不住了才钻进水中。他游的是蛙泳，但是游得非常差，我只好撇下他去追玛丽。水很清凉，我感到很舒服。我们慢慢游远了，我感到我和玛丽无论是动作上还是愉快的心情上，都是那么地一致。

游到远处，我们改成了仰泳，我的脸朝着天，阳光从我的脸颊和嘴唇上带走了最后一层薄薄的带着盐味的水雾。我看见马松游回了岸边，躺在海滩晒太阳。远远看过去，他就像一个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一起游。我游到她的身后，抱住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膊划水，而我则在后面用脚拍水。

“哗哗”的打水声一直在我们耳边回荡，直到我感到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开始往回游。我回复了正常姿势，呼吸也自如了。回到海滩上，我趴在马松身边，把脸贴在沙子上。我告诉他这样很舒服，他表示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回来了。我侧过头看着她走过来。她浑身都是水，头发披在后面。接着她挨着我躺了下来，太阳的热气加上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烤得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玛丽推了推我，说马松已经回去了，该吃午饭了。我立马站了起来，因为我饿了，但是玛丽对我说我一个上午都没有吻过她。确实是——而我也想这么做。“我们再到水里去吧。”她说，于是我们跑了起来，迎着一排细浪扑进水里。我们游了几下，玛丽贴在我身上，我感到她的腿紧紧夹着我的腿，我有些冲动。

当我们回去的时候，马松已经站在他小屋子的台阶上喊我们了。我告诉他我很饿，他立刻对他妻子说他很喜欢我。面包很好，我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我那份鱼。接着上来的还有肉和炸土豆。我们都在吃，没有人说话。马松一直在喝酒，还不停地给我倒。当咖啡上来的时候我的头已经是昏沉沉的了，我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马松、莱蒙和我，我们三个决定八月份就在海滩过，所需费用大家一起出。

这时玛丽突然叫起来，“嗨！你们知道现在才几点吗？才十一点半呢！”

我们都有些惊讶，马松说我们吃饭吃得早，才十一点半也是很自然的，午饭时间没有规定是几点，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竟让玛丽笑了起来。我猜她是喝多了。

过了一会马松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海滩走走。

“我老婆午饭后总要午睡，可是我呢，我就不大喜欢，我需要散会儿步。我总是对她说吃了饭散步比睡觉来得好。但是，当然了，她也有权利选择她所喜欢的。”

玛丽说她要留下来帮马松太太洗碗。那个巴黎小女人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得把男人赶出去。于是我们三个出去了。

阳光几乎是直直地射在沙滩上，海面上泛着光，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木屋坐落在高地边上，俯瞰着大海，这时里面传来餐具和刀叉相碰的声音。海滩上的石头上散发着逼人的热气，让人喘不过气来。

起初，莱蒙和马松在聊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事。我这才知道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甚至曾经还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我们沿着海边向海水走去。偶尔漫上来的潮水浸湿了我的布鞋。我大脑一片空白，因为我忘记了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正在这个时候，莱蒙和马松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是在海滩的尽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阿拉伯人正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看了一眼莱蒙，他说：“就是他。”我们继续往前走。马松问他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我猜是他们看见我们拿着去海滩的行李上了公共汽车，不过我没有说出来。

虽然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是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变步伐，但是

莱蒙说：“听着！如果一会儿打起来，你，马松，对付旁边一个。我来对付那个家伙。至于你，默而索，如果还有人来，就是你对付了。”

我说没问题，而马松把手放进了口袋。

我觉得地上的沙子被晒得通红，就像是着了火一样。我们迈着均匀的步伐向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当我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停住了脚步。马松和我放慢了步子，而莱蒙直奔向他所说的那个家伙。我没听清莱蒙对他说了什么，但是那个人一副并不买账的神情。莱蒙上去就是一拳，还一边喊马松也上。马松冲向莱蒙给他指定的那个人，上去就用力两拳，把那人直接打到了水里，脸朝下，好几秒钟都没有动弹，脑袋周围咕噜咕噜地冒出一串水泡，又噼里啪啦地破掉。同一时间莱蒙也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他转身对我喊道：

“注意看他要掏什么！我顾不过来。”

“小心！”我叫出来，“他有刀。”

我说晚了，莱蒙的胳膊已经被划伤了，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纵身向前一跳。那个阿拉伯人已经从水里站了起来，站到了那个拿刀的人身后。这下子我们不敢动了。他们拿着刀慢慢后退，一直盯着我们，用刀逼着我们。当他们退到比较远的地方，就拔腿跑了。我们依然站在阳光下一动不动。莱蒙用手捂住流血的手臂。

马松说高地上住着一个经常来这里过周末的医生，莱蒙说想马上去。但是他一张口，就有血泡从他嘴里冒出来。

我们扶着他尽快赶回木屋。莱蒙说他只是伤了点皮肉，可以去医生那里。马松陪着他去了，我留下来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两个女人听。马松太太哭了，而玛丽脸色发白。而我给她们讲这个事的时候也很心烦意乱。最后我干脆不说话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马松和莱蒙回来了。莱蒙胳膊上缠着绷带，嘴角上贴着一小条橡皮膏。医生告诉他说伤势不要紧，但莱蒙的脸色看起来很阴沉。马松试着逗他笑，但是莱蒙始终一声不吭。

后来莱蒙说他想去海滩走走。我问他要去海滩的哪里，他只是说想随便走走，

呼吸下空气。马松提出我们一起陪他去，但是他发起火来，骂了我们一通，马松说那就别惹他让他一个人去吧，但是我还是跟了出去。

此刻的屋外就像一个火炉，毒辣的阳光照在沙子和海面上，金光闪闪。我们走了好一会儿，我有种感觉莱蒙并不是随便走走，他知道往哪里走，但是这大概是个错误的感觉。

我们来到海滩的尽头，这里有一眼不大的泉水，水在一块巨石的后面的沙窝里流着。在那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油腻的蓝色工作服躺在沙滩上。他们看上去很平静，好像也不太高兴，当我们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用刀刺伤莱蒙的那个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另一个人一边用一小节芦苇管吹着重复的三个音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我们。

这个时候四周再没有别人，空气中只剩下阳光、寂静、泉水发出的细微水声以及那三个音符。莱蒙将手伸进装着枪的口袋里，但是那两个阿拉伯人没有动。我注意到那个吹芦苇的人的脚趾分得很开。

莱蒙一直盯着他的对手，问我道：“干掉他？”我的脑子转得飞快。我想如果我不说，他一定会火冒三丈，说不定就立马开枪了。于是我下意识地：

“他什么都没说。就这样开枪不太好。”

过了几秒钟，仍然能够在一片寂静和酷热中听到潺潺的水声和笛声。

“好吧，”莱蒙开口了，“就按你说的办，我先骂他一顿，如果他还口，我就拔枪干掉他。”

“行，”我同意了，“不过如果他不掏刀子你就不能开枪。”

莱蒙又点火了。那个阿拉伯人还在吹着芦苇管，他们俩注视着我和莱蒙的一举一动。

“听着，”我又对莱蒙说，“我们还是一对一，空手上吧，你把枪给我。如果那个吹管子的人动手或者他掏了刀子我就干掉他。”

当莱蒙把枪交给我的时候，阳光在枪身上一闪而过。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动，就好像周围的一切把我们包裹住了无法动弹一般。我们就一直这么互相凝视着，在大海、沙子和阳光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凝固了，笛声和水声也都消失了。这时我在想

其实开不开枪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

过了一会儿，那两个阿拉伯人突然往后退，溜到了山岩的后面。于是我和莱蒙转身往回走。他看起来高兴了一些，还开始和我讨论回去的公交车。

当我们回到木屋，莱蒙慢慢地登上台阶，我在第一级台阶前停住了。阳光晒得我的大脑晕乎乎的，一想到还要费力爬上台阶面对两个女人说话，我就泄气了。可是天气那么热，一动不动地待在耀眼的天空下也够难受的。待在原地，或者是走开——结果都一样。过了片刻，我转身朝着海滩，迈开了步子。

四周到处都是火辣辣的太阳，海浪就像是大海的喘息声，一些细小的浪花被吹到沙滩上。我慢慢地向岩石走去，感到太阳要把我的额头晒裂开了。热气压在我身上，我简直迈不开腿。每当一阵热气扑到我脸上，我就咬咬牙，握紧插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都绷紧了，决心战胜太阳，战胜它带来的不可思议的醉意。我就这样走了很久。

沙砾上、雪白的贝壳上，或者是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一阵阵亮光，就像是一把把利剑向我劈来，每当剑光一闪，我就咬紧牙。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一堆黑色的岩石，阳光和海上的微尘让它的周围罩上了一圈炫目的光环。我想到了岩石背后那清澈的泉水。我想再听听潺潺的流水，想逃避阳光的照射，不要再走，不要再听到女人的哭声，总之，我想找一片阴影休息一下。

可是当我走近，我看见莱蒙的对头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是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头后，他的脸隐没在岩石的阴影里，身子露在太阳底下。蓝色的工作服被晒得冒烟。我有些吃惊，对我来说那事已经完结了，我来这里之前压根儿就没再想那事。

那个阿拉伯人一看见我，稍微欠了欠身，把手插进了口袋里。而我自然地握紧了口袋里莱蒙的那支手枪。过了一会儿他又朝后躺下了，但是手并没有从口袋里拿出来。我离他有些距离，大概有十几尺，我隐约看见他半闭着的眼皮下目光不时地在闪烁。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他的脸在我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晃动。海浪的声音比起中午时分更加无力和平静。但是耀眼的阳光依然没有变，还有那一片延伸到这里的沙滩。两个小时了，太阳没有丝毫的变化，它在这一片沸腾的金属的海

洋中抛下了锚。远处的海平面上，驶过一艘小轮船，我仅仅是瞥见了那个小黑点，因为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只要我转身离开，就不会发生事了。可是，整个海滩在阳光的热气中颤动，压在我的身后。我向泉水挪动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动。不管怎样，他离我还有点距离。或许是他脸上的阴影的关系，他看上去就像是在笑。

我就这么等着。阳光烤着我的脸颊，我感到汗珠聚在眉峰上。这天的太阳和安葬妈妈那天的一样，头也和那天一样痛，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了，又向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很傻的，就算走一步也不能逃离太阳。但是我仅仅向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站起来，但是却摸出了刀，迎着太阳对准了我。

刀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在我的额头上。与此同时，眉头上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我的眼前顿时蒙上了一层模糊的水幕。这眼泪和汗水混杂的水幕让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只觉得炙热的太阳扣在我头顶，那把闪闪发光的刀的刀锋总是在我眼前晃悠。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痛苦的眼睛。

接着周围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开始晃动。大海呼出一口灼热而强烈的气，我感到天空像是裂开了口，倾泻下巨大的火焰。我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紧紧握着手枪。枪的扳机扣动了，我摸着光滑的枪柄。就在这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干硬的枪声，使得一切都生动起来。我甩了甩汗水以及紧贴在我身上的阳光。我清楚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曾经是幸福的。那时，我又对着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开了四枪，子弹陷进他的身体里，不着痕迹。然而，那却好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

局外人 下部



我被捕后很快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是他们询问的都是一些关于身份的问题，时间也不长。第一次审讯是在警察局，看起来对于我的案子没有人感兴趣。不过，八天之后，倒是有一个警官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好奇的眼神看了看我。像其他人一样，他开始也只是问问我的名字、住址、职业、出生时间和地点之类的。接着他问我是否有请律师。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律师，于是我就向他打听是否必须要请一个。

“为什么你要这样问呢？”他很好奇。我回答他说，因为我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因此不需要律师。

“好吧，你可以这么想。不过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你不找律师的话，我们会为你指定一个局里面的。”

我发现原来法律还管这种小事，这倒挺方便的。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表示同意，还说法律制定得很好。起初我并没有多认真地对待他。他接待我的房子是一间挂着窗帘的小屋，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着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一片黑暗中。

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所以这一切在我看来像是一场游戏。我们开始谈话后我看清了坐在对面的他。他身材高大，五官清秀，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他给我的感觉比较通情达理，或者说至少

是和蔼可亲的。唯一一点就是他的嘴角时不时地会抽动一下，不过那看上去只是神经性的抽搐而已。出去的时候，我甚至差点就要伸出手和他握手告别，好在我及时地想起我杀过一个人。

第二天一个律师来到监狱看我，他身材矮胖，头发又黑又顺，很年轻。尽管天气很热——我穿着背心——而他却穿着一件深色衣服，硬领子，还系了一条非常怪异的领带，上面是黑白相间的宽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到我床上，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并告诉我说他已经研究了我案件的材料。他说我的案子不好办，但是如果我按照他说的办，胜诉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说：“很好，那让我们言归正传，说说案子吧。”

他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解了我的私生活。他们听说了我母亲不久前死在了养老院。他们去马朗戈做过调查，警察已经知道我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得有点“麻木不仁”。

“您必须知道，”我的律师说，“我并不乐于问这些事。但是这又非常重要，一旦我在法庭上找不到什么辩护词，那么这就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根据。因此，您必须帮助我。”

他继续问我在葬礼当天是否有感到“难过”，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吃惊；我认为如果是我问别人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尴尬的。

不过我还是回答了他，我告诉他这些年来我已经没有习惯去回忆事情了，所以我也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是爱妈妈的——但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又补充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

说到这里，律师打断了我，看起来很激动。

“您必须保证您刚才对我说的话不要再对别人说起，尤其是在法庭上法官面前。”

我答应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这个人有种天性，身体状况会让我的思绪和情感发生混乱。好比安葬妈妈那天，我筋疲力尽，非常疲倦。所以，我确实搞不清楚我那天的思维。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更希望妈妈没有死。

律师看上去并不满意，他说：“这不够。”

他思索了片刻，问我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是我努力克制住了情感。

我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

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好像我让他感到有些厌恶，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会出庭作证的。而他们的证词将对我很不利。

我提出母亲的死和我难不难过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说很显然我对法律完全不了解。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看上去有些生气。我很想叫住他，然后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并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我认为这样说话，只是因为这理所当然。我可以看出我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他并不理解我，甚至有点怨恨我。有那么一两次我很想告诉他我和大家都一样，绝对一样。不过，我知道说这些到底没什么用处——而我也就懒得去说了。

不久后，我又一次被带到审问室接受询问。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房子很亮，只有一层纱窗帘挡住阳光，天气依然很热。

他让我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不凑巧”而不能前来。他又补充说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并等候我的律师列席。

我告诉他不需要，我能够独立回答他的问题。他用指头按了桌上一个按钮，一个年轻的记录员走了进来，紧贴着我背后坐下了。接着我和那个审问我的警察一起舒服地坐下，审问就开始了。他首先说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我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

“呃，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很多时候都闭着嘴沉默。”

他就像第一次询问我时笑了笑，并承认这是最好的回答。“另外，”他又补充，“这其实无关紧要。”

停了一会儿，他突然把身子一挺，用眼睛深深地盯着我说道：

“您这个人真叫我感兴趣！”

我不是很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没有答话。

“在您的行动里，有些事情让我很费解。我很想弄个明白，希望您能配合

我。”

我说所有事情其实很简单。但他仍要求我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再复述一遍。于是我把对他讲过的事又重复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泉水、太阳和开的那五下枪。每当我说一样，他就接上一句“好的，好的”。当我讲到躺在地上的尸体的时候，他更是表示赞同地说“很好。”反复说同样的事情让我感到很疲惫，我感觉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

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并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我使他感兴趣，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他一定要为我做点什么。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要再问我几个问题。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爱我的母亲。

“当然，”我回答，“就和其他人一样。”在我身后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记录员一定是按错了键，因为我听到他很尴尬地往回退机器。

接着审问的警官又问了另外一个和刚才的问题看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问题。

“您是不是连着开的那五枪？”

我想了片刻，然后解释说并不是连续开的，我先开了一枪，隔了几秒钟后又开的四枪。

“那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要停留呢？”

我的眼前仿佛又看见了那时阳光曝晒下的海滩，我再一次感到太阳在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在一片沉默中，审问的警官看上去有些烦躁，他坐下来，抓了抓头发。最后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又问道：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您还要向一个死人开枪呢？”

我再一次无言以对。

警官把双手放在前额上，又换了一种语调重复他的问题：

“我在问你，为什么？您得回答我。”

而我一直保持沉默。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办公室一头的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银制的十字架，用手晃着，朝我走来。

“您认识这个东西吗？”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着大声问道。

我回答说当然认得。

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带着一种对信仰上帝的激情。他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人罪孽深重到上帝不可饶恕的程度。但是首先他必须悔过，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灵魂敞开，接受一切。他几乎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在我的头顶摇晃着他的十字架。

说实话，他的这番理论我真的有些跟不上，一来我有些热，他的办公室里几只大苍蝇，总是落在我脸上；二来我有些怕他。这时我也认识到这种说法很可笑，因为不管怎样我始终都是一个罪犯。但是他仍然在不停地讲，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在他看来，我的证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开的第二枪。而其余的事情都非常明了，但是这一点他不懂。

我告诉他这样固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最后一点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打断了我，站直身子劝告了我一番，还问我是否信仰上帝。当我回答说不是，他恼羞成怒地坐回了他的椅子。

他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弃上帝的人也会信仰他。这是他的信念所在，如果他对这有半点怀疑的话，那么他的人生也就毫无意义。他叫嚷着，“难道您希望我的生活没有意义吗？”说实话我认为这和我没有关系，于是我如实回答了他。

我说的时候，他已经隔着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了我鼻子下面，并且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请求上帝宽恕你的罪过。我可怜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因为你才受难的呢？”

我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热切，我感到了一丝厌倦。房间里开始变得越来越热。

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一个我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我就装出一副赞同的样子。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他还真以为自己胜利了，脸上闪烁着光芒。

“你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也相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对上帝说出真话了？”

我再一次确定地回答说不，他又一屁股坐回了椅子，看上去垂头丧气。

他一直沉默了很久，而打字机却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还在打着最后的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注视着我，看上去有些难过，轻声说道：

“我从未见过你这样顽固的灵魂。在我面前的罪犯看到上帝承受苦难的样子，没有人不痛哭流涕。”

我正想指出他们之所以痛哭流涕是因为他们是罪犯。但是很快我就想起我也是。看来我对这个想法还不太习惯。

这时，审问的警官站了起来，好像是告诉我审问结束了。他看上去依然很疲惫，只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否后悔自己的行为？

我思考了片刻，回答他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还没有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这之后，我也经常看到这位警官，只是每次都有律师陪同了。他们只是让我把过去说过的事的某些细节再明确一下。或者是警官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我的罪名。而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都不管我了，总之渐渐地，审讯变调了，警官对我的案子似乎不再有兴趣，而是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和我讨论上帝，我也再没有看他像那天一样激动过。结果，我们之间的谈话反而变得亲切了。提几个问题，再和我的律师聊一聊，审讯就结束了。按照他的话来说，我的案子在“照常进行”。有时候如果谈论的是一些常规的问题，他们就也把我拉上。我开始感觉到有些轻松了。在这段时间里，每个人待我都挺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事情解决得也很好，以至于我竟然有了一种“和他们是一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可以说令我吃惊的是在这十一个月中，竟然有几次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快活的时候，那就是在审问我的警官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友好地对我说：“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反基督教先生！”然后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2

有些事情是我从来都没兴趣谈论的。而在我入狱几天之后我就发现，在这里的生活是我将来不愿意谈论的话题之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不喜欢也毫无意义。事实上进来的前几天我确实不是在坐牢，我总是模模糊糊地在等着什么新的情况。

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真的开始。当我收到她的信那一天，她说她以后不能来看我，因为她的家人说她不是我的妻子，不允许她再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感到这里是牢房，我的生活到此为止了。

我被捕的那一天，他们先是我关在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其中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进来都笑了，并打听我是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是不久之后天黑下来，他们还是教了我怎样铺睡觉用的席子。把席子的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当枕头用了。整整一夜，都有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

几天之后我被关进了一个单间，睡在一块木板上。房间里除了床就只有一个铁盆儿和一个便桶了。监狱是建在城市里的高地上，透过一个小窗口我可以看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朝着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猜是玛丽，果然是她。

到接待室得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长廊。这是

一间非常大的房间，光线从大窗户中射进来，两道大铁栅横着把大厅分成了三部分。铁栅之间相距约八到十米，把前来探望的人和囚犯分隔开。我看见玛丽站在我对面，她穿着一条条纹样式的连衣裙。和我站在一边的还有十几个囚犯。而对面玛丽的周围都是些摩尔的妇女。她身旁的两个，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紧闭着嘴唇，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说话指手画脚，声音很高。由于铁栅间的距离，来探望的人和囚犯之间不得不大声嚷嚷才能听到。

当我进去的时候，嘈杂的声音从光秃秃的墙壁上又折射回来，明晃晃的阳光从天空泻下来通过玻璃射进大厅，让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牢房又静又暗。到这里以后我要好几秒才能适应。不过，最后我还是看清了光亮中的每一张脸。

我注意到有个看守坐在铁栅间通道的尽头。大多数的阿拉伯囚犯和他们家属都面对面蹲着。他们没有大叫大嚷，尽管大厅里嘈杂不堪，他们低声说话彼此还是能够听到。他们低沉的声音从下面飘上来，在他们头上来往穿行的谈话声，好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低音部。这一切，都是我到玛丽走去的时候注意到的。她已经紧紧贴在铁栏杆上，竭力地冲我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和她说这件事。

“你怎么样？”她大声地问道，“还好吗？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噢，我一切都好，不需要什么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玛丽一直保持着笑容。那个胖女人对着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大叫，很显然他是她的丈夫，他个子很高，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带着坦率的目光。

“让娜拒绝了他。”她扯着嗓子大声说。

“这可真糟。”

“我告诉她你出来以后会再雇佣他，但是她听不进去。”

这时玛丽也大声对我说莱蒙让她代他问好，我说“谢谢他”。但是我的声音被旁边那个人盖住了，他正在问：“他身体还好吗？”

他老婆笑了起来，“身体？我看他身体从来没这么好过。”

我的左边是个矮小的年轻人，有着一双纤细的手，从头至尾都没有说话。从他

的眼睛凝视的方向我注意到对面是个小老太太，他们紧紧地互相望着，一言不发。不过我没有时间再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在对我喊着不要气馁要振作的话。

“我不会放弃的。”我回答她。与此同时，我望着她，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摸一摸那细腻的布料。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盼望什么。我猜玛丽也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因为她一直在微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你出来我们就结婚。”

我可以看到她发亮的牙齿和眼角处细细的皱纹。我问她，“你真的这么相信吗？”其实我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

她很快地大声地喊道：

“我相信！你会被释放的，我们周末还会去游泳。”

这时旁边那个女人又嚷嚷了起来，对她丈夫说她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留了一个篮子。她一样一样地告诉丈夫她在里面放了什么，让丈夫核查，因为这些东西很贵。在我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仍然和他母亲对望着，地上蹲着的阿拉伯人继续他们低声的交谈。外面的阳光似乎越来越强，直射到窗户上，再照到人们的脸上，把人的脸照得发黄。

我开始感到有些不舒服，很想离开，离开这里的嘈杂。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多看看玛丽。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玛丽对我讲她的工作，她一直在笑。低语声、交谈声、喊话声交织成一片。唯有我身边那个年轻的矮小男人和他母亲之间是一片寂静的绿洲，他们一直那样对视着彼此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阿拉伯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走了。第一个人离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那个小老太太靠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儿子做了一个手势。儿子说，“再见，妈妈。”她把手伸出两道铁栏杆之间，轻轻地，缓缓地摇了摇手。

在她离开后，一个拿着帽子的男人又很快进来，占据了刚才站的位置。这一边也有一个犯人被带进来站在刚才那个年轻人的地方，他们的交谈很热烈，但是声音并不大，因为大厅这时已经安静了下来不再嘈杂。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了，不过他的妻子依然在对他大声喊叫——好像她并没有注意到已经不需要大声嚷嚷了——“好了，保重，一切小心！”

接着是轮到我该离开了。玛丽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我在离开之前又回了回头。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贴在铁栏杆上，她的嘴角依然带着一丝为难的、挤出的微笑。

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信。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再也不愿意谈论监狱里的生活。其实也不是非常糟糕，我不想夸张什么，我忍受的比其他人少而已。在我被监禁之初，最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就是我还有一些自由人的想法。例如我会突然想去海滩，想冲进大海游泳。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脚边的海浪的声音，身体跳入海水里，以及我所感到的解脱，这时我一下子就感到牢房里的四面墙壁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近。

不过，这种情况只坚持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剩下囚犯的想法了。我等待着每天在院子放风的时刻以及我的律师来访的时刻。而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每天只能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飞鸟飞过或者白云的相会，就像我现在在这里等待我的律师打着奇特的领带，或者就像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耐心等着星期六拥抱玛丽的身体。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上。这世上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我想起这其实也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的。

不过，通常来说我还没有想那么远。开头几个月确实很痛苦，但是我努力克制住，慢慢也就过来了。例如我一开始老是想女人——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正值壮年。不过我并不是特意地想玛丽。我只是想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一切我过去认识的女人，各种各样我爱她们的场景；这样想来想去，于是我的牢房里充满了一张张女人的脸，到处都是我的欲望。对于我来说这一开始让我有点精神失常，但是到最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帮我打发了时间。

我终于对看守长有了好感，他总是在开饭的时候跟厨房的伙计一起来。是他先和我谈论女人的，他说这是这里所有囚犯抱怨最多的一件事。

我告诉他我和其他囚犯感觉一样，又补充说我认为这种待遇不够公平。

“可是，”他说道，“正是为了这个才让你坐牢的啊。”

“什么？我不太明白。”

“自由。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剥夺你的自由。”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同意了他的说法，“是啊，不然，还惩罚什么呢？”

看守长点了点头，“是的，你和他们不同，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想不明白，最后他们总是自己解决。”说完，看守长就离开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香烟。在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收走了我的鞋带、领带以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我的烟。一进牢房，我就要求他们把烟还给我。但是他们说这里面是禁止吸烟的。最开始的几天非常难熬。这或许是让我最难受的一件事了。我甚至从床板上撕下几块木头放到嘴里咀嚼。在一天的大多数时候我都感到恶心想吐。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抽烟，抽烟并不妨碍任何人；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是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不抽烟了，这个惩罚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惩罚了。

除了这些烦恼以外，我还不算太不幸。再说一遍的话，问题依然是如何消磨时间。过了不久，当我学会回忆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点儿也不感到烦闷了。有些时候我会想起我曾经住的房子，我想象着自己从一个角落开始走，最后又走向原地，心里数着一路上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我只用两分钟就数完了。但是每当我重头再数，时间就会变得稍长一些。因为我想起了每一样家具，每一样家具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东西的每一个细节，细节中又包含什么，上面一个装饰的镶嵌，一道裂缝，一条有缺口的边，它们的颜色或木质的纹路。同时，我还试图让我脑海里的这份清单一直延续下去，试图把每一样东西都数上。结果，几个星期之后，光是数我房间里的东西，我就可以花上好几个钟头。我发现我越是去想，想出来的自己都记不清的或者是根本没注意的东西就越多。它们数起来似乎无穷无尽。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生活一百年。因为，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不会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失为在里面的一种好处。

还有就是睡眠。最初来这里的时候我夜里睡不好，白天又根本睡不着。但是渐渐地我不仅夜里睡得好，而且白天也能睡着了。事实上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的

睡眠达到了十六至十八个小时，这样一来，我每天需要消磨的时间就只有六个小时了。其中包括吃饭、大小便、回忆……以及读斯洛伐克人的故事。

有一天，我在草褥子和床板之间发现了一张旧报纸，几乎粘在布上。这张报纸已经发黄，变得有些透明了。上面印了一则故事。虽然开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依然可以读出事情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捷克人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二十五年以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在这个村子里开了一家小旅馆。他决定要给母亲和妹妹一个惊喜，于是把他的老婆和孩子安置在另外一个地方，自己来到母亲和妹妹的旅馆，捏造了一个名字开了一间房间。而他的母亲和妹妹并没有认出他。这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亮出了他身上的巨款，结果当天深夜他的母亲和妹妹就用大锤将他打死。在偷了他的钱后又把他的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老婆寻来，无意中说出了旅客的名字。于是，他的母亲上吊自尽。而他的妹妹也投井自杀了。这个故事我读了不下一千遍。一方面我感到这事几乎不像真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那么自然。无论如何，在我看来，那个旅客属于自作自受；他就不应该去演这一出愚蠢的戏。

于是，长时间的睡觉、回忆、读故事，昼夜不断地交替，时间也就这样流逝了。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人在监狱里就会失去时间的概念。但是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我始终无法理解，到什么程度人会觉得日子是既漫长又短暂的。日子很漫长，这毫无疑问，但是它竟然可以长到一天接一天。它们丧失了各自的名称。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日子有什么意义；除了“昨天”和“明天”这两个略带点意义的词以外。

有一天早上，看守对我说我进来就快要六个月了，我相信他说的——但是我又不是很理解。对我来说，我在牢房里过的都是同样的重复的一天，做的也都是同样的事情。

在看守走了以后，我从自己的铁碗中看了看自己的脸。我发现就算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看上去依然是严肃的。我晃动了一下铁碗，试着微笑，可是碗里显示出来的样子还是那么严肃和忧愁。

太阳渐渐下山了，夜晚来临，这是我最不愿谈及的时刻——“无名之时”——

我这么称呼它，这时监狱里各层的牢房里响起了夜晚的嘈杂声，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片寂静。我走近小窗户，借着最后的光亮，又端详了一番自己的模样。和之前一样的严肃，但是这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难道现在的我不正是这样么？在这一刻，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了某个声音。毫无疑问，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认出来这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于是我明白了，这些日子里我竟一直在对自己说话。

这时我想起了母亲下葬那天那个女护士说过的话。是的，没有出路。没有人能想象监狱里的夜晚是怎样的。

3

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我可以说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天气刚刚变热，我就知道我的事有了新动向。我的案子的审理日期被排在重罪法庭的最后一个档期，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

审理的那一天太阳非常刺眼。律师说案子审理不会超过两至三天。因为他听说法庭最近很忙，而我的案子不是很重要，他们会尽快处理完。因为在我案子之后还有一个弑父案要审理。

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有人将我带入了囚车，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警察把我押到一间小房间里，我似乎闻到了“黑暗”的气味。我们靠近门边坐下等着，隔着门我听到一片交谈声、叫喊声以及椅子在地上挪动的声音。这片嘈杂让我想起了那些群众性的娱乐节目，就像是音乐会结束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的声音。

一旁的一个法警告诉我还要再等一会儿才开庭，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要。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感到害怕。我说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看一场官司很有趣，我有生以来还没有机会看过呢。

“或许吧，”这时另一个法警说道，“但是看多了，也就累了。”

不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起来。他们给我取下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

法庭上坐满了人。尽管窗户挂着窗帘，但是仍然有阳光穿过缝隙，照射进来，空

气闷热得不行。窗户都是关着的。我坐了下来，两名法警在我椅子边一边一个站着。

接着我注意到在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注视着我，我猜他们就是陪审团。但是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感到就像是一个人坐在电车上，对面座位上是一排乘客，他们在盯着新上车的人看，想发现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当然，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在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区别都不大。

另外，门窗紧闭的大厅里坐了那么多人也让我有些头晕脑胀。我再一次看了看法庭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一张脸也看不清。首先我没有料到所有人都那么急于看着我。要放在平时，是会有人注意我这个人的。我想了半天才明白，我是引发这阵骚动的原因。

“竟然有这么多人！”我对我左边的法警说道，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报纸进行报导的缘故。

他指着坐在陪审团座位下的一张桌子旁边的一群人，“他们在那里。”

“谁？”

“报馆的人啊。”其中一个人是他的老朋友，他向他点了点头，那个人也看见了他。

过了一会儿那个报馆的人看了看我们，朝我们走了过来，很亲切地和法警握了握手。这个人年纪不小，样子倒是很和善，只是脸长得有点滑稽。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所有人都在互相握手、打招呼、交谈，就像是在俱乐部遇到了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高兴不已。我终于明白了我刚才为什么会有奇怪的感觉了，在这里我仿佛就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

不过，那个记者微笑着和我说话了，祝我一切顺利。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他又补充说：

“您知道，我们有点夸大您的案子。夏天对于报纸来说是个淡季，最近也只有您这个案子和那件案子可以写写的了。我想您应该听说了吧，还有那个弑父的案子。”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刚离开的那群人中，有一个矮个子男人，长得像只体型硕大的黄鼠狼，还戴着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镜。

“他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你这个案子来的。他是专门被派来报道那件弑父案的，但是他们也要求他把你的案子也顺便一起报道了。”

听到这，我感谢的话都含在嘴边了，但是我立时又觉得这会很可笑。接着他友好地对我们摆了摆手，走开了。我们又百无聊赖地等了好几分钟。

这时，我的律师穿着律师服到了，周围还有很多同行。他朝着记者坐着的地方走过去，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彼此说笑着打趣，一副完全放松的样子，直到法庭的铃声响起，他们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的律师向我走来，同我握了握手，嘱咐我一会儿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要简短，不要主动开口，剩下的就交给他办了。

我听见我左边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穿着红色法官服，戴着夹鼻眼镜的人小心翼翼地撩开长袍坐了下来。我想这就是法官了。法庭执事站起来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风扇开始嗡嗡地响了起来。三个审判员，两个穿着黑衣，一个穿着红衣，夹着案宗走了进来，快步向俯视着整个大厅的高台走去。穿着红衣的那个审判员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身边，用手帕擦了擦他那略有点秃顶的头，然后宣布审讯开始。

那些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准备记录，他们看上去都是一副漠不关心傻乎乎的样子，除了其中一个非常年轻的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的领带的男子，他把笔放在桌子上，注视着我。他有一张朴实的，甚至有些憨厚的脸；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非常淡、非常清澈的双眼，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有些让我难以捉摸。过了一会儿，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是我自己在看着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个，也或许是我不懂这种场合的规矩，总之我对后来发生的事都糊里糊涂的：例如陪审员抽签，法官向律师以及检察官、陪审团提问（每一次他提问的时候，所有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接着是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又是向我的律师提问。

接下来法官说应该传唤证人了。法庭执事念了一些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群我刚才没看清的人群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从旁门走了出去，他们是养老院院长、守门人、老多玛·贝莱兹、莱蒙、马松、萨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在跟着其他人走出去之前回头看了看我，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我正在

奇怪我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到他们时，就听到了最后叫到赛莱斯特的名字。他站了起来，我注意到在他身边是那个在饭馆见过的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我注意到她紧紧地注视着我。但是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什么了，因为这时法官开始讲话了。

他说辩论就要正式开始了，他相信也无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解释说他的职责是就不偏不倚地引导一场他需要客观对待的案子的辩论。陪审团们表示将会根据公正的精神做出判决。但是，如果有一点点扰乱法庭的行为，他都会把那个听众逐出法庭。

法庭上越来越热。一些人拿报纸当扇子扇了起来，大厅上立刻响起了一阵持续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法官对法庭执事做了个手势，示意他送来了三把蒲扇给三位审判员用。

我的审讯开始了。法官心平气和，我觉得甚至是带有点亲切地向我发问。虽然我我非常厌烦，但是他还是让我先自报家门，当然我也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程序，要是把一个人当成了另一个人来审，那就错大了。

接着法官开始陈述我做过的事，每读两三句，就要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也都按照律师对我的指示，回答说，“是的，法官大人。”这样的问答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法官叙述得非常详细。在此期间，记者一直在奋笔记录。不过我几次都注意到那个浅色眼睛最年轻的男子的目光，还有他们之中一个古怪的机械的女人。陪审团都面向着法官，我再一次感到他们就像电车座位上的一排乘客。法官咳嗽了一声，翻了翻资料，边扇着扇子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提几个与我的案子表面上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可能关系重大的问题。我猜他又要问到妈妈的事了，我感到无比的厌烦。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何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雇人照顾她。接着他又问我个人而言，我是否对此感到很难受。我解释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没有期望过从对方身上得到太多——或者说，我们也不需要得到什么，我们都习惯了新的环境。接着法官说他并没有想特意强调这一点，然后他问检察官有没有别的问题需要提问。

检察官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看也不看我地说如果法官允许，他很想知道我是否怀着要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才回到泉水边的。我回答说不是。然后他问那为什么我要来武器，单单又折返回到那个地方呢？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偶然。接着检察官用一种阴险的口气说道，“很好。暂时就这些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管怎么说，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了一番小声的商议之后，法官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再进行。

我几乎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把我装入了囚车，送回监狱吃饭。很快，就在我感到很疲惫的时候，又有人来把我押进囚车。一切又重新来了一遍，我再一次被带回到同一个大厅里，面前还是那些面孔，只不过是比之前更热了而已。但是仿佛奇迹一般，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个记者，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拿着了一把扇子。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女人依然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扇动扇子，而是默默地看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直到我听到传唤养老院院长，我才略微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以及我是谁。他被询问我的母亲是否有抱怨过我，他回答说是的，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养老院里面几乎所有老人都会抱怨自己的亲人。法官要求他明确回答妈妈是否有责怪过我把她送到养老院，他说是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再补充什么。

对于另外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法官又要求他进一步解释我当天是如何“表现冷静”的，接着又盯着他的鞋尖看了一阵。于是院长解释说那天曾表示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而且也没有流过一次眼泪，在妈妈下葬后我很快就离开了，没有在她的坟前默哀。还有一件让他感到惊讶的事，那就是殡仪馆的一个人告诉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年龄。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法官又问他是否能够确定所说的就是站在被告台上的囚犯。院长看起来没有听懂，法官又补充说，“这是例行的询问。我必须确定它。”

然后法官问检察官有没有问题需要向证人提问，检察官回答说，“噢，没有了！我想已经够了。”他的声音很响亮，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望着我，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想哭的愚蠢念头。因为我第一次感到，原来有那么多人都在

憎恨着我。

在询问过陪审团以及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要问之后，法官请上了养老院的守门人，听取他的证词。守门人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相同的仪式，他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接着他回答了法官的提问，他说我当时表示不想看妈妈的遗体，但是我抽了烟、在那里睡觉，甚至还喝咖啡。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头一次感到原来我是有罪的。他们又让守门人将我喝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详细复述了一遍。

检察官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带着一种嘲讽的眼光。我的律师站了起来，询问守门人当时是否和我一起抽烟了。但是检察官立刻站了起来，强烈反对，“法官大人，我想知道这里究竟是谁犯了罪呢？这种为了减弱证词的力量而反诬证人的做法是该被驳回的，难道证词会因此而减弱其本身不可抵抗的力量吗？”尽管如此，法官仍然请守门人回答这个问题。

老人感到有些不安。停顿了片刻才回答说，“呃，我也知道我不该抽烟，但是我没敢拒绝默而索先生递过来的香烟。”

接着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了，证人说的没错，我确实是递了一支烟给他。

守门人带着惊讶和感激的神情看着我。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

我的律师立刻得意地叫了起来，“陪审团会重视这一点的。”

但是检察官在我们头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不错，”他的声音震耳欲聋，“陪审团会重视的。而且他们的结论会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但是作为儿子，面对着那个生育了他的人的尸体，是理所当然该拒绝的。”

守门人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接着是多玛·贝莱兹的证词，一个工作人员把她扶到了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虽然是我母亲的朋友，但是他只在母亲下葬那一天见过我。他们又问他我那一天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

“你们明白，那一天我太难过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事。痛苦让我

什么也不愿意注意。因为我最亲爱的朋友去世了，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痛苦；事实上我甚至晕了过去。所以，我没有看见这位年轻的先生做了什么。”

检察官问他是否有看到我哭过。他回答说没有，于是检察官点头说，“我请陪审团重视这一点。”

我的律师立刻就火了，他用一种我觉得有些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

“好吧，现在，先生！请回答我，您是否确定看到我的当事人没有哭？”

贝莱兹说没有。

他的回答引来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挽起了袖子，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

“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特点。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

检察官沉下脸来，居心叵测地拿着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乱戳。

审讯暂停了五分钟让人们休息，我的律师告诉我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赛莱斯特被传唤上庭，他是由被告请来做证人的。当然，被告就是我。

赛莱斯特不时地朝我望望，手里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几个星期前他和我一起去看赛马的时候穿的。但是我认为那时他没有戴领结，因为我注意到他的领口上只扣了一颗铜纽扣。他们问我我是否是他的顾客， he 说是，但是强调我也是他的朋友。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很好，他们叫他解释“很好”是什么意思，他说任何人都应该明白。他们继续问我我是否是一个孤僻的人。“不，”他回答，“他只是不喜欢说废话而已。”

检察官问我我是否总是不按时支付在他饭馆里吃饭的账单。赛莱斯特笑了起来，“噢，我想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吧。”接着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他把手放在了前面的栏杆上，看上去他是有所准备的。

“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件意外，如果好听点，可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你没有办法抗拒。”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法官打断了他，说他说的很好，并感谢他。

赛莱斯特愣了一下，接着他解释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想继续说。他们同意让他继续说下去，但是嘱咐他要简短。

不过他仅仅是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件不幸的事”。

“是的。”法官看着他说，“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依据法律来判断这一类的不幸。你可以坐下了。”

赛莱斯特转过身来向着我。他的眼睛在发光，嘴唇有些哆嗦。看上去就像是在对我说：“老兄，我尽力了，但是我很抱歉，似乎对你的帮助并不大。”

我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动作，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亲吻一个男人。

法官再一次要求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赛莱斯特才回到了旁听席。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前倾，两肘支在膝头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

接着是玛丽进来了。她戴着一顶帽子，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美丽，虽然我更喜欢她披着头发。从我坐的位置我可以感觉到她轻盈的乳房，总是让我神魂颠倒的嘴唇看上去有些发肿。她看上去非常紧张。

他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和我是什么时候相识的。她说是她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时候。接着法官询问她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她是我的女朋友。在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她表示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检察官翻了翻材料，突然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出了时间。检察官立即用一种漠不关心的口气指出，那似乎是我妈妈死后的第二天。接着他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能够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口气变得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能不越过通常的礼仪。

因此随后他又要求玛丽讲述我遇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起初不愿意回答，但是在检察官一再坚持下，她说出了我们游泳、一起看电影，以及回到我的住处。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当天的电影片目表，并让玛丽告诉大家那天看的电影是哪一出。玛丽在回答他的时候声音都有些变了，她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片子。她话音一落，大厅里立马变得鸦雀无声了。

这时，检察官站了起来，看上去非常庄严，他伸出手指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我希望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人在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大厅里依然是鸦雀无声。紧接着玛丽突然哭了起来。她说情况不是这样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说的，是有人逼着她说的。她还说她很了解我，我是一个好人，不会做任何坏事。但是法官对法庭执事做了一个手势，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将她领了出去，审讯继续进行。

下一个证人看上去是马松，但是大家都不怎么想听了。他说我是一个正经人，“甚至还可以说是有点老实。”至于萨拉玛诺的话他们更不想听了，他告诉他们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我和我母亲的时候，他说我和妈妈很少交流，所以我把妈妈送到了养老院。“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断点着头。但是看上去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带回了座位。

下一个是莱蒙，他也是最后一个被传唤的证人了。他朝我点了点头，然后立刻说我是无罪的。但是法官告诉他，他们需要的是证据而不是判断，他让他莱蒙等提问再回答问题。

他们让他清楚地说明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莱蒙趁此机会说我和那个死者没有任何关系，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莱蒙羞辱了他的姐姐。法官问他那么被害人是否就没有理由恨我。莱蒙告诉法官我们那天去海滩完全是出于偶然。

检查官则问他为什么作为悲剧根源的那封信会是我写的？

莱蒙回答说这也是一种偶然。

但是检察官指出，在这件案子里，所谓的“偶然”或者说“巧合”，看起来已经对人的良心产生了太多的作用。那么当莱蒙要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阻止和干涉，是不是也是出于偶然呢？我去警察局为莱蒙作证，而作证时说的话完全是偏向他，是不是都是出于偶然呢？最后，他问莱蒙是靠什么生活。

莱蒙回答说他是仓库管理员，然后检察官朝着陪审团说众所周知，莱蒙是靠女人吃饭的。他还说，我是莱蒙的朋友兼同伙；事实上这一次的罪行是一件最下流最无耻的罪恶。由于加进了一个道德上的魔鬼，甚至可以说变得更加严重。

莱蒙想要声辩，我的律师也提出了抗议。但是审判员们让检察官继续把他的话说完。

“我就快说完了，”检察官转向莱蒙，“他是你的朋友吗？”

“当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接着检察官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莱蒙，他也正看着我。

于是我回答说：“是的。”

检察官又转向陪审团。

“还是这个人，在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他随随便便就杀了一个人，而理由，仅仅是为了了结一桩卑鄙无耻的桃色纠纷。”

他还没有坐下，我的律师已经是按捺不住了，只见他举起胳膊，律师服的袖子都掉了下来，露出里面雪白雪白的衬衣。

“说到底，我的当事人究竟是被控杀人还是被控埋葬了他的母亲？”

听众们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是很快检察官又站了起来，理了理他的袍子，说只有像这位可敬的辩护人一样聪明的人才会感到这两件事之间不存在一种深刻的、本质的关系。“是的，”他大声喊道，“我控告这个人怀着杀人犯之心埋葬了他的母亲！”

这句话对于听众，看起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他脸上的汗水。但是看起来他自己似乎也被这句话震动了，我感到我的事不妙了。

很快审讯就结束了。当我走出法院登上车子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我又感受到了外面夏日傍晚的气息和色彩。站在昏暗的移动着的囚室里，我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钟爱的城市所发出的偶尔让我感到满意的熟悉的声音。在几乎无力的空气里飘荡着报童吆喝的声音，滞留在街头草坪上的鸟儿，售卖夹心面包的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地转弯时发出的呻吟，港口上空夜幕降临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的心中勾画出了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市里乱跑的路线。

是的，这就是看起来很久以前的我常常感到满意的傍晚时刻。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松、少梦的睡眠。现在是同样的傍晚，但是某种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又回到了牢房里，等待着第二天。仿佛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静的睡眠。



坐在被告席里听人谈论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在对于我的案件进行辩论的时候，我认为事实上，大家谈论我本人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

其实两者的辩词上不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律师举起胳膊辩论说我虽然有罪，但是存在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则伸出双手，表示我有罪，而且不可饶恕。

这个阶段的审讯有一件事让我略微感到有些尴尬。我感到不安，想插进去说几句话。但是我的律师总是打断我说：“你别说话，这样对你才有利。”事实上，看起来就像是我与这件事无关，他们在处理这宗案子的时候完全把我撇到了一边。我的命运被他们决定，但是他们却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

我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打断他们，质问他们，“你们说来说去，可究竟谁才是被告呢？一个人被控告谋杀是非同小可的事。为什么要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呢。”

但是再三思考后，我发现我确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于谈论别人的兴趣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就好像检察官，对于对我的控诉已经似乎感到了不耐烦，他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无关痛痒的字句，以及几个手势。如果是连珠炮般的长篇大论还能使我感到一丝惊讶或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目的是指出我杀人是预谋的。我记得他刚才才说过：“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我可以对这宗谋杀提出证明。首先，是被告在光天化日之下犯下的罪行，其次是被告我可以称之为阴暗一面的心理向我提出的隐晦的

启示。”

于是他开始阐述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情。他指出我非常冷漠，甚至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岁数，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同一名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南代尔的电影，最后还把那个女人带回了房间。起初我一直都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总是在说“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那是“玛丽”。接着他又开始讲莱蒙。在我看来他观察事物和思维的方式确实是非常清晰。他说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我和莱蒙先是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到他的房间，然后让“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接着在沙滩上，我又向莱蒙的仇人进行了挑衅，在这场争执中，莱蒙受伤了。于是我向他要来手枪，为了报复我又回到了事发地。然后我就射杀了那个阿拉伯人。第一枪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事情要做得彻底”，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带着一种冷血残酷的心理，沉稳地又补了四枪。

“我想说的就是这样，”检查官说着，“我把整件事的过程、线索给你们勾画了出来，这足以证明这个人是在意志完全清醒下杀的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凶杀案，他是经过了思考、预谋，他的行为并不能因为当时的情况而减轻罪行。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我恳请你们注意，这个人是一个很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们之前也听到了他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他对于用词非常谨慎和熟悉。我要再次强调的是，非常显然的，这个人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时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我注意到他提到我很聪明。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犯罪人身上为什么就变成了沉重的罪名。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再去听检察官接下去讲的话了，直到我听到他说：“难道他曾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吗？一次也没有，先生们。这个人在审讯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他自己卑劣的罪行表示过哪怕一次激动。”

说着，他转过身对着我，用指头指向我，继续对我横加指责。而我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有道理，我确实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我恨不得友好地、甚至是亲切地向他解释——我从来不会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后悔。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明天的事操心。当然，就我目前所处境况而

言，我是不能用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的。我没有权利对别人表示亲切友好，也没有权利拥有善良的愿望。我想再听听他说的，因为检察官开始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他曾试着探索——探索我的灵魂，“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但是我一无所获。”他说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对于人类心中的道德原则我也是完全没有。“当然，”他补充，“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他。我们不能责怪一个人拥有他原本就没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律上，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是非常高尚的，尤其是当这个人的心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程度，它将有害社会。”接着他又一次提到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重复着他在辩论中说过多次的话。但是他所说的话比谈到我的罪行时说的话要多得多——多到最后我只能感觉到早晨的炎热了。

检察官停了一下，片刻沉默后他用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尊敬的先生们，同样的法庭，明天就要审判一宗滔天大罪，一个儿子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在他看来这种残忍的谋杀是几乎不能想象的。他希望人类的正义对于这种罪行要坚决予以惩罚。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在他心里引起的憎恶感比起我的冷漠而引起的憎恶感可谓是相去甚远的。

“这一个人，在精神上谋杀了他的母亲，比起一个人杀死他的亲生父亲的恶劣程度在这个人类社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一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是的，先生们，我坚信，”他提高了音调，“当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时，你们丝毫不会感到夸张。因此，我希望你们判这个人有罪。”

检察官又一次停了下来，擦了擦他因为出汗而发亮的脸。接着他解释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地完成它。“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完全漠视社会道德原则，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悔恨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心，没有任何的仁慈宽容之心。我恳求你们用法律制裁这个人，而我对自己的这一请求没有丝毫的不安。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也有过请求对被告处以极刑，但是却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我感到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我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指令，因为我在这种除了残忍一无所有的脸上，看到了憎恶。”

当检察官坐下之后，大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至于我，我已经被炎热和惊愕弄得头昏脑胀了。法官轻轻地咳嗽了几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是否还有话要说。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实在是很想一吐为快，于是我首先就说我并没有意图要打死那个阿拉伯人。法官说这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搞明白我的辩护方式，他说他很高兴我在律师发言之前就说清楚自己行为的动机。

接着我继续说下去，我说得很快，有点语无伦次，我解释说杀他是因为太阳。我也意识到了我的话很荒谬可笑，事实上我也听到了法庭上人们的笑声。

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接着，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指出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于是他要求改在下午继续。法官同意了。

当我下午被带回来的时候，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团手上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向着一个方向在摇。我的律师的辩词看起来像是没完没了。但是有一阵，我竖起耳朵注意听了下，我听到他说“是的，我确实杀了一个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说了下去，当说到我的时候，他总是用“我”来表述。这听上去是非常古怪的，于是我弯下腰，向一个法警寻求解释。他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律师都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律师还是在排斥我，我在这里就是形同虚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代替了我。或者说，我离这个法庭已经很远了。无论如何，我感到非常烦，我甚至觉得整个法庭都显得那么乏味和可笑。

我的律师很快以挑衅为理由，继而也谈到了我的灵魂。但是我认为他的才华和辩护比起检察官还是大大逊色的。

“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人的灵魂，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和这位杰出而友好的检察官完全不同。事实上，我可以说我懂得当事人的灵魂，就像在读一本书一样。”接着他说他看到我是一个正派的年轻人，一个普通职员，忠于自己的老板，工作卖力，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我是一个称职而孝顺的儿子，因为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供养着自己的母亲。最后，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为了让母亲享受到我所不能给她的舒适，我才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先生们，我感到很惊愕，”他补充着，“检察官对养老院颇有微词。事实上，如

果要证明养老院里的设施的各种好处和舒适，我们仅仅只需要记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出资建设的就可以了。”我注意到他并没有提到下葬那天的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他辩词的一个漏洞。但是，由于他满口的长句，由于人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似乎变成了没有颜色的水，让我头昏目眩。

最后，我只记得，就在我的律师继续高谈阔论的时候，传来了卖冰激凌的小贩的喇叭声，尽管很小声，但是依然穿过了大街、穿过了法庭，传到了我的耳畔。这时，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又浮上了我的脑海，虽然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是我在回忆里发现了我曾经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温暖的夏季的气味，我所热爱的街区，夜晚的天空，以及玛丽的笑容和裙子。突然，我感到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快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让我赶快回到牢房里去睡觉，是的，睡觉。

所以后来我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大喊大嚷，我几乎没有听到。

“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难道你们要把一个年轻的、正直的劳动者送进死亡的深渊，就仅仅因为他一时糊涂杀了人？难道他一生都要背负的悔恨、罪责，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我请求你们再次考虑这件案子里的情有可原之处，慎重做出裁决。”

辩论停止了，我的律师筋疲力尽地坐了下来。他的同事们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中一个说道：“老兄，你的表现棒极了。”其中一个律师甚至拉着我做证人，“你觉得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我的赞扬不是真心的，而是我感到太累了。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不那么热了。从街上传来一些声音，我可以猜想到外面夏季傍晚的凉爽。我们都在那里等着，而实际上所有人都在等的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系而已。我再次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碰到了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自动机器一样的女人的目光。这让我想起，在整个审讯的过程里，我都没有朝玛丽坐的地方看过一眼。并不是我忘了她，而是我要注意的事太多了。现在我看了看她，她坐在赛莱斯特和莱蒙之间。她对着我轻轻地做了

个手势，就像是在说“总算结束了”。她依然是微笑着，但是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焦虑。但是这一刻我的心仿佛和外界已经隔绝了，我甚至没有回答她的微笑。

法官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很快有人将一连串的问题念给陪审团听。我听见一些词语：“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团出去了，我被带到我之前在里面等候的那间小屋里。我的律师进来看我，他一番高谈阔论，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和亲切过。他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我只需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询问他如果判决对我不利，是否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他说没有机会。因为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是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的。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表示了同意。我对他说的要冷静地看待问题的观点表示赞同。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浪费太多的公文纸了。“无论如何，”律师说道，“你是可以上诉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有四十五分钟。接着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同我告别，并对我说：

“法官要宣读对质询的答复了。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

门响了。我听到有人在楼梯上跑过的声音，但是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到了大厅里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宣读什么。

铃声再次响起，我被带进了被告席，大厅里鸦雀无声，寂静极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别处，我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她，因为这个时候法官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宣布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

这时候我似乎才看清了我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确信他们脸上都带着尊敬。法警对我的态度温和了很多。我的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的大脑已经停止了一切思考。我听见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了。于是法警把我带了出去。

5

我已经是第三次拒绝神父的指导了。我没有什么对他说的，我不想说话——但是我很快又会看到他。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可逆转的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条出路。

他们为我更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能看见天空，也只有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那慢慢变化的色彩，从白昼变为黑夜。我把我的手放在脑袋后面，就这么躺着，等着。

我不止一次地想，是否曾有判了死刑的人能够逃过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刑，比如说法警的绳子断了，不翼而飞了。于是，我开始责怪自己之前从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这种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事。和其他人一样，我读过报纸上有关的报道。但是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找来看看。在这些书里，说不定我能找到有关逃跑的描写。那么我就能确信至少曾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一种不可遏止的预想中，仅仅有那么一回，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什么东西。仅仅一次就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只有一次对我就够了，剩下的就交给自己的良心去处理吧。报纸上总是谈论一些“对社会欠下的债”——按照他们的意思，欠了债总是要还的。但是这无关乎想象的世界。不，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子跳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般地跑，跑能够为希望提供各种机

会。但是自然的，所谓的“希望”，就是全力地奔跑，然后被流弹打死在街道的一角。但是我仔细想了想，任何非分之想都是禁止的，我再一次被那不可逆转的东西抓住了。

在我美好的愿望里，我是不接受这残酷无情的事实。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扭曲。判决要是在二十点而不是在十七点宣布的，它就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作出的，它得到的是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所以在我看来这样做出的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作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

这时，我脑海里想起了妈妈曾对我讲述的一段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从没有见过他。我对这个人所知道的全部事情，或许都是从妈妈那里得知的。有一天，他去看一个犯人被处决。虽然这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去了，回来后呕吐了一早上。当时我听到这里时，对父亲产生了一丝厌恶。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是非常正常、自然的。而我当时竟然没有认为死刑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或者说，我竟然没有想到，那是唯一真正让人感兴趣去看的事。于是我决定，如果一旦我能从这座监狱里出来，我就去观看所有的处决。不过，我想，毫无疑问，我不该去想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清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子后面——或者说站在绳子的另一边——作为一个看客，来观看一场热闹，然后回家后呕吐一番。想到这些，我感到一阵恶毒的喜悦。然而这是不理智的，我不应该让自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这样一想就感到一阵寒意，忍不住缩在被窝里打颤。而我的牙齿冷得格格作响，停不下来。

好吧，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自己拟定了一些可笑的法律草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给犯人一个机会，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这也足够安排好事情了。我觉得或许可以发明一种化学药物，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几率杀死受刑者（是的，我想的是受刑者）。当然，他是先得知道，这是前提。因为经过我反复的思考和权衡，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有给受

刑者任何机会，毫无机会。一旦刀砍了下来，受刑者的死亡就是一种已经确定的结果，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如果一旦头没有被砍下来，他们还会再来一次。于是令人无奈的是，受刑人不得不祈祷断头刀运转正常！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制度不完善的地方，但就表面上来说，这也不过是我的想象。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也证明了制度的效率。总而言之，一个人在受刑之前有所准备的话，他所关心的就是不发生意外。

另一件我必须承认的事就是时至现在为止，我在有些问题上一直持有不正确的想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地爬到架子上去。或许这是因为1789年大革命的缘故，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学校学到的、或者人们告诉我的，就是这样。但是接着在某一天早上醒来，我又记起了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一张照片，一次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处决用的机器就放在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要小一些。在此之前我是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这使我很是叹服。一个人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有夸张的想法。现在我必须承认，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过它的时候就像是和另外一个人擦肩而过一样平常。这也是非常讨厌的。一旦登上断头台，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人的想象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了。但是，在现在，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倒一切，他们要把你迅速地处死，带着一点点的羞愧。

还有两件事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黎明和我的上诉。但是我又总是克制自己不去想它们。我躺着，望着天空，强迫自己不去想。当天空开始变成青色，傍晚就到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听着自己的心跳会有一种想法。我无法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消失。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是我仍然试图去想象那样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心的跳动将不再传到大脑里。但是这一切都是没用的。黎明和上诉依然摆在眼前。最后我对自己说，一切都顺其自然，不要再勉强自己了。

我知道，他们总是在黎明的时候到来。于是，整个夜里我都全神贯注地在等待黎明来临。我从不喜欢遇事措手不及。当有什么事要发生，我更愿意有所准备。

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整一夜，我都在耐心地等待着阳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就是那个朦胧混沌的时刻，我知道他们总是在那个时候行动，所以半夜一过，我就开始耐心等待。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声音，从来没有分辨出那么多的声响。我不得不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有运气的，因为我自始至终还没有听到脚步声。妈妈曾经说过，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痛苦的。当天空慢慢变亮，阳光照进我的牢房，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话实在非常正确。因为我是可以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也是可以紧张到炸开的。甚至是一点点细微的声音也能令我扑向门口，把耳朵贴在冰冷的木头门板上，全神贯注地聆听，直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又急又粗，就像是狗的喘气，并且感到惊恐不安——这一切本该发生的，但是我的心没有炸开，因为我知道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的生存时间。

接下来的整个白天我都在思考上诉的问题。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这个念头里最重要的一点，我从思考中获得了最大的收获。那就是我总是在想，即使我的上诉被驳回了，下场也不过就是死亡。这是非常显然的结局。但是，我自己认为，不管怎么说，活着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亡和七十岁死亡的区别，可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都会继续活着，世界还会和之前一样继续，地球依然在转，没有什么区别。总之，无论我是现在立刻就死去，还是过四十年再死去，最后都以我的死亡告终。此刻在我的思维中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想到我还要再活四十年时心中所产生的可怕的巨大落差！但是，在设想我几十年后会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时，我会尽量克制自己的感受。如果真的要死，什么时候、怎么死其实都不重要。因此——不过，困难的是念念不忘这个“因此”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我的上诉即使被驳回，我也应该坦然接受。

就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这个时刻，可以说我才有了权利，去思考或许发生的另一种假设，那就是我获得了特赦。然而紧接着的麻烦就是我必须使我的血液和肉体的冲动不那么强烈，不因为疯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昏花。我必须努力克制自己，压抑住喊叫的冲动，使自己冷静和理智下来。在这一假设中我得表现得较为正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设。当我成功压抑住自己，我就获得了一个钟头

的宁静，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事。

也是在这一时刻，我又一次拒绝了神甫的接见。我躺下身子，仰望天空，天空中一种柔软的金色告诉我黄昏来临了。我刚刚放弃了上诉，我感觉到血液在我的全身静静地流淌着。我不需要见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玛丽。她已经很多天没给我写信了，我猜测她一定很烦恼，因为她是一名将要被处死的囚犯的情妇。我也想到她或许是病了，甚至是死了。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的我们除了分开的肉体之外，已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們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彼此想念，所以我又怎么能知道呢？而且如果她真的死了，那么我也就不会再关心她了，因为我不会对一个死去的女孩有兴趣。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死了，人们也就会把我忘了，我和他们也不再有任何关系。我甚至认为这样的想法不能说是冷酷无情的。

正在我想这一切的时候，神甫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我看见他进来，稍微颤抖了一下。他注意到了我的举动，因为他对我说不要害怕。我记得他通常总是在另外一个时间进来，比如一场残酷的死刑之前。他解释说这一次只是完全友好的访问而已，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而其实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他坐到了我的床上，然后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但是我感到他的态度还是很友善的。

他坐了一会，胳膊放在膝头，低着头，看着他的手。我注意到他的手又细又长但是很有力，这让我想到了两头灵巧的野兽。接着他慢慢地搓着手。他一直那么低着头坐了很长时间，有一阵子我几乎都要把他忘记了。

他突然抬起头来，盯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你要拒绝见我？”

我解释说是因为我不相信上帝。

“你确信吗？”

我说我根本用不着考虑，无论我相信或是不相信，这都是一个根本不重要的问题。

于是他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墙上，两手贴在大腿上。几乎看都没有看我地说，他注意到有些人有时候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说，他再次看了看我，问：

“你同意吗？”

我回答说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虽然我对什么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可能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能确信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而他对我所说的事，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往另一边看，没有离开他坐的位置，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感到极度的绝望。我解释说我没有感到绝望，只是害怕——这是自然的。

“那么，”他很坚定地说，“上帝会帮助你的。我见过的所有和你相同情况的人，最后都归附了他。”

我说，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我，不需要帮助，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发生兴趣。

他气得双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理了理袍子上的褶皱。接着他继续和我说起来，并称呼我为“亲爱的朋友”。他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

我打断了他，并指出这根本就是两码事。而且这话也根本无法安慰我。

他点了点头，“或许是的。但是，你今天不死，迟早有一天也是要死的。到那时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面对这个考验呢？”

我解释说以后面对和现在面对都是一样的。

听到这句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一招我很熟悉。我常和艾玛努埃尔、赛莱斯特这样闹着玩，通常来说，最后都是他们移开目光。我看得出来神甫也很熟悉这一招，因为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他的声音不再发抖了，“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希望吗？你就一边这么活着一边想着自己将死去吗？”

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下了。他说他怜悯我。这样的结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像我说的那样活着，那就同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感到一阵厌烦，我转过身，用肩膀靠着墙，正好在小窗口中的天空底下。他又开始问我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他的问题。他的声音变得不安而急迫，我认为他是动了感情在说的，于是也就听得稍微认真了点。

他说他认为我的上诉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背负的罪恶需要得到解除。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是小事，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指出正是前者宣判了我的死刑。他说是的，并表示同意，但是他认为这并没有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罪孽”，我只知道人们说我是个犯人。是的，我是个犯人，就要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能再对我要求更多的东西了。

这时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个狭小的囚室里，他如果想活动活动，也只有站起来、坐下去这样的办法了。我盯着地板。他又朝我走了一步，然后停下了，就好像是他不敢再靠近一样。他看向窗子外的天空，说：

“你错了，我的儿子，”他的表情非常庄严，“我们可以要求你更多。或许我们可以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什么意思？”

“我希望要求你看……”

“看什么？”

神甫缓缓地环顾了一下我的囚室，我发现他有些疲惫不堪，他回答说：

“这些石头墙壁，我知道它们都很痛苦，它们记录着人类的悲痛经历。我每一次看见它们，心中就充满了忧虑。但是——相信我，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当中最悲惨的人就从这些乌黑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浮现出来。我要求你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些激动了。我告诉他我已经看着这些墙有好几个月了，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比我更熟悉它们了。也许很早以前，我试着找寻过这么一张面容。但是那张面容带着阳光般的金色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脸。可是，我白费力气，什么也没有看到，而现在我已经放弃了努力寻找。总之，在这些潮湿的墙壁里，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浮现”出来。

神甫带着一种悲哀的神色看着我。我现在整个后背都靠在墙上，阳光就洒在我

的脸上。他很快地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然后他询问是否可以亲吻我一下。我拒绝了。他转过身去，朝着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

“你真的就这么爱这个世界吗？”他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问着。

我没有理会他。

他就这么背着我站了一会儿。他呆在这里让我感到越来越压抑和恼火，我正想叫他离开，叫他别管我，结果他突然转过来，对着我大声喊叫：

“不！不！我不相信。我确信你一定憧憬过另外一种生活。”

我告诉他那是当然的。任何人都一定憧憬过。但是，那并不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很快，或生一张更好看的嘴这类愿望来得更重要。因为那都是一样的。我本想继续阐述一番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但是他打断了我，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所憧憬的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朝他喊道：“一种可以令我回忆起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然后我告诉他够了，可以结束谈话了。

但是，显然地，他还想和我谈谈关于上帝。我朝他走过去，试图告诉他我所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不愿意把它浪费到上帝身上。

接着他试图转移话题，并问我看到他是一个神甫，为什么不称呼他为“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告诉他他不是我什么父亲，并叫他去当别人的父亲好了。

“不，不，我的儿子，”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我是你的父亲。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因为你的心被蒙蔽了。但是，我仍然为你祈祷。”

他说完这些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弄爆炸了一样，我冲着他扯着嗓子怒吼。我骂他，并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那股夹杂着狂喜和愤怒的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他看起来竟然还是那么自信满满。但是，无论他如何的确信无疑，都不及一根女人的头发丝。像他那样活着，就像一具尸体一样，他甚至都不能确信是否真的是活着的。我两手空空。但是，我对自己，比他更有把握，对我的生命以及即将到来的死亡更有把握。是的，毫无疑问，我只有这么一点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

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是正确的，我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我以后也会永远正确。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只要我喜欢。我用了这种方式，而没有用那种方式；我没有做A，但是我做了B和C。但是它们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一切都已经不重要，我完全知道为什么。而他，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这一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在这股气息之中，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亡，母亲的爱，或者他所谓的上帝，与我何干；既然我只有一种命运可选，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择的命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确信吗，他确信他真的懂吗？每一个人都幸运地活着，世界上也只有幸运活着的人。每一个人都总会有一天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被处决，只因为在母亲下葬的时候没有流泪，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像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都具有同样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或者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以及想跟我结婚的玛丽。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哪怕此时此刻，玛丽把嘴唇伸向另一个默而索，那又有什么关系？他根本无法理解，作为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从我昏暗无边的未来的深处发出的喊叫。

我愤怒地大喊着，差点喘不过气来，这时候看守冲了进来，试着把神甫从我紧紧拽着他的手中解救出来。他们中的一个威胁我。但是神甫劝他们不要发火，他又一言不发地看了我一阵。我看见他的眼里渗出了泪水。接着他转身离开了牢房。

他走了之后，我慢慢平静了下来。但是刚才的过于激动让我十分疲惫，我一下子扑到了床上。我想我一定是睡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满天的星光正照在我的脸上。从外面田野传来的声音回荡在耳畔，凉爽的空气，大地的气息，海盐的味道，轻抚着我的脸颊。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像潮水一般浸透了我的全身。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汽笛的鸣叫，撕裂了这宁静的夜。有人将要踏上旅程，去一个和我从此没有任何瓜葛的世界。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她晚年还要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要“重新

再来”。当时的养老院和这里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将尽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如同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死亡在临近，妈妈一定是感到了一种解脱，于是才决定把生命再来一遍。没有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权利为她哭泣。我也是一样，准备把一切再重新过一遍。好像刚才那巨大的愤怒清洗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指示和星星的夜空，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感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确实，非常亲切，我认为我曾经幸福过，现在也是幸福的，将来也会幸福的。为了让一切都做得完善，也为了让我不感到孤单，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能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代序

2012年快要到了。不管是杞人忧天，还是确有其事，我们不得不承认灾难越来越多地在身边发生，天灾人祸正不断向我们袭来。在灾难来临之前，人类又该做什么？在灾难面前，人类能做什么？也许加缪的小说《鼠疫》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降落在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城市里。开始是城中老鼠大量死亡，人们只是感到惊奇，但并不惊慌，政府部门也是极力掩盖事件的真相。但是随着疫病的加重，市民当中相继有人得怪病死去，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没人敢站出来说明这是什么，直到医生里厄面对眼前的事实，考虑到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危，宣布了这是鼠疫。政府经过开会讨论，迫不得已宣告鼠疫疫情，下令进入封城状态。市民在这种隔离和流放的境况中，每个人做出了自己的不同的选择。原本生活颓废堕落的小人物，开始投机倒卖稀缺物资，大发灾难财，为身处鼠疫之中感到心安理得；卑微的公务员虽然只是局限于个人的感情，兢兢业业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写作兴趣上——一部关于女骑士的小说，但他还是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参与同鼠疫的抗争；一位被鼠疫困在城中的法国记者为与恋人相会，四处奔走希望能够离开疫城，但最后因为意识到自己和全城市民在灾难中是一个集体，根本无法逃离，所以他选择了留下，和城内的人一起进行抗争；德高望重的神父面对可怕的灾难对自己的信仰开始产生了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到了抗疫队伍的第一线，另一位被留在城中的异乡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同鼠疫抗争，因为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杀人和判决他人的死刑都一样是不正义的，所以他反对任何自觉和不自觉地判决，他第一个站出来要求组建卫生防疫组织，最后是名叫里厄的医生，他从一开始就用理性的思考来分析灾难，毫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以及自己远在他乡的生病的妻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抢救工作中去。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如老卡斯特尔、预审法官、足球运动员等人物都在加缪的笔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灾难当中，不管人们是不是愿意，他们都已经成为一个集体，集体被隔离，集体接受流放，他们要么一起死亡，要么一起进行反抗。

鼠疫到底是什么？很显然作者不是要写鼠疫，或者说尽管他的纪实手法使得小说中的事件真实可信，但是加缪想写的不单单是鼠疫。这在文章的题记中加缪就已经说明了。显然这是一部现实生活的寓言。这是一部二战期间写成的小说，此时的法国正处于被占领期。作者创作的内容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思考。所以首先这部小说是一个对二战中的法国的隐喻，并对大量的战争中发生的事实进行了人性和哲学上的思考。战争是合理的么？任何一个人有宣判别人死亡的权力么？加缪在小说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回答。

走出小说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小说依旧焕发出他永恒的光辉。这是因为战争其实也只是小说一个现实层面的隐喻。在更进一步的哲学层面上，加缪想叙述的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永久不变的生活，和这样的生活当中的人的状态，只不过他考察人性的视角是极端的——是面对死亡的人，因为只有在死亡面前人性才能得到了最大的揭露。我们说人类的最初的思考就是源于对死亡和思考。在死亡面前他们才会作最本质、最彻底的思考。加缪在小说中不但谈到了他认为的“最有趣的”爱情，还谈到了感人的友情和真挚的亲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与现实。加缪为我们阐释了一个存在主义者对生活不断的反思和抗争。小说以一个禁闭中的城市展现了现代生活中人们渐渐失去的善良纯真的人性。它使我们这些还在忙忙碌碌生活的，忘却了自我，失去了基本信仰的人陷入深刻的思考。

很多评论将《鼠疫》归类为哲理小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实践。尽管加缪先生可能不喜欢别人把他的作品和这个词加上什么联系，但是我不得不提到这个概

念，因为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理解小说的入口之一。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鼠疫”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外部事实，而身处这种境况中的人的存在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人的本质和价值是需要人自己去决定和选择的，而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此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选择的重要性，并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行动和承担生活的责任，为自己争得生命的意义，创造自己的价值。

小说《鼠疫》中加缪的笔法简洁明了，朴实无华，不追求辞藻的华丽，而叙述注重对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对主题的深化。比如他在描写中运用的都是很简单的比喻，但在小说的情节进程中很有力量和说服力，画面感很强，人物的形象很清晰，事物的情状显得非常的逼真。举个例子，当我读到那个烂苹果似的破裂的脓肿时，会使人真的产生了一种恶心的感觉。在加缪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太多的刻意地抒情，但他却在用最理性的笔调呼唤一个充满真情的世界。

在小说翻译期间，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鼓励和支持。感谢本书的编辑在翻译工作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初执译笔，囿于本人水平，译文中不免错讹之处，还请读者与大家不吝指正。

杨广科

二零一零年九月于成都眷诚斋

鼠疫 第一部



用另一个禁锢的世界来描绘某个禁锢的世界，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实的事件，两者都是合理的。

——丹尼尔·笛福

故事取材于40年代发生在奥兰城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事发生得似乎不是地方，有点出乎寻常。乍看来，奥兰城仅仅只是一个平常的城市，一个阿尔及利亚沿海的省份而已。

城市本身丑陋至极，这一点不得不承认。单从它平凡的外貌，很难看出它和同纬度的其它商业城市有什么不同。不过时间久了，你就能观察出它的不同寻常。人们怎能想象到世界上还有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木，没有花园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听不到鸟儿翅膀的扑哧，树叶落地的沙沙？这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只有通过天空才能看得到季节的变化。春天意味着有大量的清新空气，或是小贩从郊外采来的几篮子鲜花。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被太阳炙烤得过分干燥的房子，墙上好像蒙了一层白灰；人们只有躲在紧闭的百叶窗里才能过活。到了秋天，又总是暴雨，到处泥泞。只有在冬天，才算迎来了晴朗的日子。

要了解一座城市，人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通过打听那里的人们是怎么工作，怎么恋爱以及怎么死去的来加深印象。在我们的小城里，不知是否是天气所致，所

有这一切都混合到了一起，他们对事物充满热情，但又对一切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人们都有所担心却又习以为常。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富裕。据他们所言，他们所感兴趣和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做生意。他们当然也追求一些简单的快乐——喜欢女人，到电影院看电影以及享受海水浴。但是，所有的这些乐趣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到了周六的晚上和周日，而其他日子需要用来挣更多的钱。晚上一离开办公室，他们就准时地聚集到咖啡厅里，或结伴到马路上散步，或者就待在阳台上。年轻人的想法总是强烈而直接，而上了年纪的人最多也不过是参加个滚球协会，或是在朋友和圈子里的宴会上打打牌赌赌钱。

有人肯定会说这些现象并非只在这个城市才有，现在的人都这样过着。没错，也许在今天，看到人们从早忙到晚，然后把剩下的时间消磨在纸牌，咖啡和闲谈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也存在这样的城市和地方，那里的人不时对生活之外的其他事情抱有幻想。通常情况下，这并不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些许改变。可是这种幻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收获。而奥兰城恰恰相反，表面上看来，它是一座完全不带幻想的城市，也就是说它是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城市。因此，也没有必要来准确说明我们的恋爱方式。男人们和女人们，不是在后悔他们所谓的“爱的契约”而速度地离婚，就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安于两个人的夫妻生活。除了这两个极端，通常没有中间状态。这样的情况就更谈不上独特了。和其他城市一样，奥兰城的人们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通常对于爱情他们是不自知的。

我们的城市比较独特的一点是当人们面对死亡时所要承受的痛苦。痛苦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安。生病绝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在有些城市和地方，有人悉心照料、体贴关怀病人，让其有所依靠，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在奥兰城，极端的气候、忙碌的生意、恶劣的环境、短暂的黄昏、对生活幸福的追求等，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适应。所以如果是一个病人则会感到相当的孤独。试想一下，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被困在因炎热而噼啪作响的墙壁之后，而在同一时间里，所有其他的人，不是在打着电话，就是在咖啡厅里讨论着汇票、提单以及折扣等，这个垂死的病人会感到一种怎样的不安？试想一下，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这个干旱之地发生时，面临死神，病人该

有多么难受！

从以上这番情况也许可以看出我将要叙述的这个城市的大概的面貌。我保证没有在其中添加任何夸大的成分。而我认为应该予以强调的，是这个城市和这里的生活所具有的平淡的那一面。一旦生活成了习惯，人们就能毫无痛苦地度日。既然这座城市也有了这种习惯，我们也就认为一切都已趋于完美。从这个角度看，生活也许就不是那么动人了。但至少可以说，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混乱的现象。而人们的坦率，他们所具有的同情心和积极的态度总能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对这座城市给以好评。这个城市没有什么风景，也没有植物，甚至都没有灵魂，一切好像都在休养生息，然而，就是这样的宁静也总能让人安然地进入梦乡。话说回来，该城周围的风景却是相当漂亮，它坐落在一个平坦的高原中间，由几座被太阳照得发亮的小山丘包围着，靠着风景如画的港口。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它的布局方向完全与这个港湾相反，以至于你要想观赏海景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走上一段路特意去寻找。

讲到这，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接纳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任何可能性使这个城市里的人们能够预料到那年春天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正是我的小说所要描述的一系列严重事件发生的前兆，下面我将对这些事情做精简的叙述。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觉得很自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写报道的人来说，他就不能考虑太多，他的任务仅仅是在他得知事件发生时宣告“它发生了”。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关联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见证者在他们心中评论它所讲述的真相。

另外，如果不是机缘让作者有幸收集到足够数量的陈述材料，而且这些事件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正好和作者希望表达的观点相符的话，我们将要认识的叙述者就绝对不会以这个名义来采取这样的行动。因而他才有机会充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对历史学家来说，即使只是个业余人士，也应当具有相当数量的论述材料，这是当然的了。为此，本故事的叙述者收集了如下材料：首先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其次是他人的，然后，由于他的职位关系，他还听到了这篇故事中所有当事人的一些个人隐情，最后还有一些辗转落到了叙述者手里的文字材料。他可以从中抽取一

些他所认为有益的片断，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引用他们。他还可以……可能是时候要让评论和舆论的注意力转向这个故事本身了。我还需要花些时间来理清事件开始几天的前后关系。

2

四月十六号早晨，医生贝尔纳·里厄离开他的诊所。走到楼梯中间时，脚上踢到一只死老鼠。当时他避开了，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下楼了。但是，来到街上时，他细想起来这只老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于是他又转回去想提醒一下看门人。而看门人米歇尔先生的奇怪反应，使他更加感到自己发现的事情不太寻常。在他看来，房子里出现死老鼠实在是太奇怪了，而在看门人看来，这简直荒唐可笑。他斩钉截铁地说：“房子里肯定不会有老鼠的。”医生也没办法说服他相信在一楼楼梯上确实有一只，而且差不多已经死了。但看门人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房子里没有老鼠，这只老鼠要不就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走在楼里的过道上，正准备掏钥匙时，忽然看到过道的尽头窜出一只全身湿漉漉的老鼠，摇摇晃晃向前爬着，中间停下来一会，好像在努力保持平衡，接着就朝着医生这边爬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原地转起圈来，还带着小声的嘶叫，最后竟然倒在了地上，从它裂开的嘴唇里吐出些血来。医生盯着它看了一会就上楼了。

他并不是在考虑老鼠的事情。而是那滩吐出的血又让他想起他正在担心的事。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一年了，明天要出发去一个山里的疗养院。回到家，他看到她遵照他的嘱咐，睡在房间里。这是为了这趟劳累的旅途作些准备。她看见他时微笑着。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她说。

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医生注视着那张转向他的脸。在里厄看来，已经三十岁的妻子，尽管还带着病中的倦容，这张脸还一如她年轻时候的模样。这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胜于其他的一切。

“想睡就再睡会”，他说，“护士十一点来，我中午把你们送去火车站。”

他吻了一下她微微渗出汗水的额头。她的微笑一直伴着他走到门口。

四月十七号，第二天早上八点，看门人在过道上叫住医生，咒骂着那个搞恶作剧的家伙又在过道的中间放了三只老鼠。而且老鼠满身的血说明它们是被人用很厉害的捕鼠器给抓来的。看门人手里抓着那几只老鼠的爪子，站在门槛那，想通过几句讽刺挖苦让那个干坏事的人自己出来承认。但是没有人过来。

“看着吧，我会把这些家伙一并都给抓起来的。”米歇尔先生嚷着。

带着困惑，里厄决定先从外环的几个街区开始他的巡诊，那里住的都是他的病人中最穷的那部分人。那里的垃圾采集要晚很多。小汽车沿着土灰色的笔直的公路行驶，差点就会碰到被丢在人行道上的垃圾箱。在他沿着走的那条马路上，医生在烂菜叶堆和破抹布上发现了差不多有十二只老鼠。

他的第一位病人住在一间兼做卧室和餐厅的临街小屋里，他躺在床上。这是一个面孔生硬，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在他面前的毯子上放着两口盛着豌豆的铁锅。他原来半坐在床上，当医生进去时，他向后翻了一下身，想喘口气，重新发出老哮喘病人的那种呜呼声。他的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医生，昨天它们都跑出来了，您看到了么？”打针时老人说。

“是啊，”他的妻子附和道，“有邻居抓到了三只。”

老人搓着手接着说：

“它们跑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能看得到，一定是老鼠闹饥荒了！”

里厄随后发现这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结束后他就回诊所了。

“上面有份寄给您的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医生问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老鼠。

“哦，没有了，”看门人说，“你知道的，我一直在这盯着，量那帮畜生也不敢。”

里厄从电报中获悉他的母亲明天到这。她是因为儿媳外出养病，所以过来这里替儿子照料家务。医生走进房间时，护士已经在那儿了。里厄看到他的妻子站在那里，已经化好了妆。他走过去对她笑着说：

“这样子不错，很好看。”

一会儿之后，他们到了火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她看着车厢的隔间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不是么？”

“你需要这些。”里厄回答道。

“关于老鼠的传闻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只是有点奇怪，没事的。”

然后他语气很快，请她原谅他对她的疏忽，他本该一直守在她身边。她摇着头，好像意思是叫他别再说了。但他接着说：

“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重新开始。”

“好的，”她答应到，眼睛里闪着亮光，“我们要重新开始。”

再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望向窗外。站台上，人们匆匆地赶路，互相擦碰着肩。这时传来了火车头的吡吡声。他喊着他的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时，他看到她的脸上已满是泪水。

“不要这样。”他温柔地安慰道。

带着泪水，微笑又出现在她的脸上，肌肉有些抽搐。她深吸了一口气：

“你回去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从背后把她紧紧地拥入怀里。现在，他立在站台上，在玻璃的另一边，再也看不到她的笑容了。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但她已经听不到了。

在火车站站台出口的地方，里厄碰到了预审法官奥登先生，手里还牵着他的小孙子。医生问他是不是要出去旅行。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奥登先生，看起来像是——正如人们以前所说的——一半貌似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是一个

郁郁寡欢的运尸人。他用亲切而简练的声音回答道：

“我在等我的妻子，她去探望我的家人了。”

火车鸣起了长笛。

“老鼠……”法官说着。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转向出口处。

“老鼠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答道。

这时，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到了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的身上，因为他手臂里提着整整一箱子的死老鼠。

当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就接待了一位叫汉蒙·朗贝尔的年轻人，听旁人讲这个人是一名记者，早上就已经来过。他身材不高，平肩，神情坚决，眼睛明亮，透着机灵。他穿着一身运动服，看上去生活很宽裕。他一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正在为巴黎的一家大报社作一个关于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调查，需要咨询一些关于当地人的卫生条件方面的问题。里厄告诉他说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在双方进一步交谈之前，里厄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如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想问的是你能否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的谴责？”

“全面的，恐怕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没有根据。”

里厄不紧不慢地说，事实上这样的谴责可能没有什么根据。但他还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想知道朗贝尔的报道是否能做到坦率而又毫无保留。

“我不承认没有任何保留的证词。因此我也不能为您的报道提供依据。”

“这话真像是出自圣茹斯特之口。”那个记者笑着说。

里厄继续他平静的语调，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但是，这是一个已经对他生活的世界厌倦了的人才会使用的语言。不过，他喜欢志同道合的人。因此，他本人拒绝接受不公正和任何妥协。朗贝尔缩着脖子，看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意思。”他起身告别时说道。

医生把他送到门口：

“我也谢谢您如此关心我的事。”

朗贝尔有点不难烦了：

“是的，我理解，请原谅我的打扰。”

医生一边紧握着他的手，一边告诉他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他可以写一篇有关的报道。

“啊，太好了”，朗贝尔叫起来，“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下午五点，医生又要出诊，刚走到楼梯时，碰到一个人，尽管还很年轻，却有着深陷的脸颊，眉毛又浓又粗。这个人名叫让·塔鲁，里厄在公寓底层的西班牙舞者那里碰见过他几次。他正抽着烟，眼睛盯着人行道上一只倒在他脚边的老鼠，这只老鼠就快没命了，正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用那双灰色的眼睛注视着医生，带着深沉的目光。他跟医生打了一个招呼，还对医生说起最近出现老鼠的事挺奇怪的。

“是的，”里厄说：“毕竟是件令人反感的事。”

“在某种仅有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就是原因。但我发觉这还挺有趣，可以说是相当有趣。”

塔鲁把他的头发捋到后面，重又看了看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然后对里厄笑笑。

“可是医生，我觉得看门人要负很大部分责任。”

这时医生看到看门人立在房子前，背靠着入口处的墙，平常红润的脸颊上带着一副倦容。

当里厄医生向看门人说明新发现的情况时，老米歇尔回答道，“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每次能看到两三只。但别处的房子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看上去焦虑不安，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只见他用双手不停地摩挲着脖子。里厄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看门人说他自己也不清楚，就是感觉很糟糕，浑身不自在。照他的说法，这是心理作用的缘故。老鼠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它们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到了第二天，四月十八号的早上，医生去车站接他的母亲时，发现米歇尔

的脸颊凹进去更多了。从地窖到谷仓的一路上，竟然有十几只老鼠倒在楼梯上。隔壁家的垃圾桶都已经被扔满了。医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惊讶：

“这样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是个满头银发、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有一双温柔黑亮的大眼睛。

“见到你真让我高兴，贝尔纳，”她说：“老鼠可打消不了我来的念头。”

医生觉得，和母亲在一起，什么事都变得容易多了。

里厄此间往公共灭鼠行动队打了个电话，他认识里面的主任。他问对方有没有听说最近有大量老鼠在露天死亡的事？主任名叫梅西耶，他说自己已听说，甚至在他离堤岸不远的办公室里也发现了五十多只死老鼠。他们正在评估这件事的严重性。里厄也不能定夺，但他认为灭鼠行动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

“是的，”梅西耶用发号指令的口气说，“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采取措施来控制局面的。”

“很有必要。”

主任的佣人刚刚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里也发现了几百只死老鼠。

几乎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市民们再也耐不住了，都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从18号起，人们在附近的工厂和仓库里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死老鼠。有时，碰到地上还在抽搐的老鼠，人们不得不上去踩死它。但是从远郊到市中心，里厄先生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市民们收集到的成堆的老鼠，丢弃在垃圾桶或臭水沟里。从那天开始，晚报抓住死老鼠这件事，责问当局是否采取了预先制定的紧急措施来阻止这种让人恐慌的情势的蔓延，以保证市民的安全。而事实上，市政府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措施，也根本没有制定应对计划。总算在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之后，政府给灭鼠行动队下达了指令，要求行动队每天从黎明开始收集死老鼠。收集起来之后，再用两辆专车把老鼠运到垃圾焚化厂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死老鼠的数量不断上升，每天早上的收集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从各个地方涌出来：屋角、地下室、地窖还有污水管，并且成群结队地死去。众多的老鼠像排了队一样，在灯光的照射下，走路摇晃，原地打转，然后倒在人们的身边。晚上，在走廊和巷子里都

能听到这帮畜生的惨叫声。早上，在郊区，死老鼠浮在水沟上，它们的尖脑袋上满是血迹，有些已经腐烂发胀，有些身体僵硬，但胡须还翘着。在城里也一样，在台阶或院子里死老鼠一堆又是一堆。甚至在行政大楼和学校操场的偏僻角落里也有，有时候还出现在露天咖啡座旁，并迅速蔓延到阅兵场、大马路、沿海公路的步行区，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黎明刚清理完的死老鼠，在白天里又一点点越变越多。在人行道上，有不止一个的夜行人踩到过刚死不久，还有点弹性的老鼠尸体。看起来好像我们房子的地基都被彻底清洗了一遍，把它们身上的毒脓恶疮都弄到外面来了。想到在我们这个素来平静的小城，几天之内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里的人们所感到的惊恐，就像一位气血旺盛，身体强壮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衰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事态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负责咨询和提供各种资料的情报机构）在免费的电台资讯节目中播报，单单二十五号一天就有六千两百三十一只老鼠被收集并焚烧。这个数字明确地告诉民众，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城市陷入了不断增加的混乱当中。此刻之前，人们还只是抱怨这个有点令人反感的意外事件而已，而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件目前还无法估计其影响程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事件带着某种威胁的成分了。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继续摩挲着两只手，重复着一句话：“他们出来了。他们出来了。”他说话时带着一种老年人的高兴的神情。

四月二十八号那天，朗斯多克情报局报告当天收集的死老鼠数量共有八千只，城里市民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指责政府当局，要求其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有些在海边有房子的人已经开始计划搬出那里。但到了第二天，情报局又宣布这个怪现象突然停止了，灭鼠队收集到的死老鼠的数量微乎其微。整个城市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中午，当里厄医生把车停在楼房前的时候，他看到在路的尽头，看门人正吃力地走过来，脑袋偏向一边，走路的姿势就像一个皮影人。老人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里厄认识这位教士，碰见过他几次。他是帕纳卢神甫，一个博学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城里很受大家的尊重，甚至连那些不关心宗教事务的人对他也是敬重

有佳。里厄等着他们走过来。米歇尔老人眼睛发亮，呼吸急促。他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想要换换空气。但来自脖子、腋下和腹部的疼痛让他不得不请求帕纳卢神甫帮忙。

“这些是肿块，”他说，“我可能有点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到门外，用手指在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根那按了按。那里长出了一个木头结似的肿块。

“你先躺下，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回来时再来看您。

看门人离开后，里厄向帕纳卢神甫打听他对老鼠事件的看法。

“噢，”神甫说，“这肯定是一场瘟疫。”在那副散发着智慧的眼镜后面是他微笑的眼睛。午饭后，里厄重新读了一遍卫生所给他发的关于他妻子顺利抵达的电报，这时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是市政府的公务员。他曾长期忍受着主动脉萎缩的病痛。因为他很穷，里厄给他免费治过病。

“您好，”他说，“您还记得我？现在我这有另外一个病人。请您快点过来，我的邻居出了点事。”

他声音听起来气喘吁吁。里厄先想到了看门人，但他决定过后再去看他。几分钟之后，医生就到了位于郊区的芳草路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新修的，因油漆未干而发出难闻气味的楼梯中间，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公务员，他正走下来迎接医生。他差不多五十几岁，留着因过长而弯曲的黄胡子，肩膀很窄，身材瘦弱。“现在好点了，”他一边朝里厄走过来一边讲，“我相信他会度过这道难关的。”

他擤着鼻涕。在二楼和最后一层楼之间的左边的门上，里厄读到一句用红粉笔写的话：“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在一把倒放的椅子上方，一根绳挂在吊灯上，空荡荡的悬在空气中。桌子被推到角落里。

“幸亏我及时把他放下来，”格朗说着，好像他整天都在找合适的用词，尽管他用的是最简单的语言，“我刚要出去，就听到一些响声。当我看了说明文字后，就像你解释的那样，我猜这只是个恶作剧。但是他发出的呻吟很奇怪，可以说像是

在经受莫大的痛苦。”

他捋了捋头发。

“我知道动手术很痛苦。不过请放心，我会去的。”

他们推开一扇门，发现里面是一间亮堂的小屋，只是房间里的布置过于简陋了点。一个胖胖的小个子躺在铜床上。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充血的眼睛看着刚走进来的他们。医生摒住呼吸，这时好像听见老鼠的小声叫唤。但角落里又没什么东西在动。里厄走到床边。他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不是突然一下子。脊椎保住了。当然还是有点窒息。所以需要拍一下X光片。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并嘱咐说过几天就能好起来。

“谢谢医生。”那个男的用气喘吁吁的声音说。

里厄问格朗是否通知过警察局，但他却露出窘迫的神情。

“没有，”他说：“我只想着最紧要的事了……”

“这是当然的，”里厄打断他，“要是我也会这么做。”

而这时候，病人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装出自己没什么疼痛，身体还好的样子。

“请您放心，”里厄说，“这并不是一回事，相信我，我会跟警察局去说的。”

“噢。”另外一个人应了一声。

他转过身去小声哭泣起来。格朗摆弄着胡子，走到病人身旁。

“坚持住，科塔尔先生，”他说，“您要知道，里厄医生是个负责任的人。你应该以他为榜样，重新开启你的生活。”

但科塔尔回答说，新生活不会从眼泪中开始。现在心里很乱，他只想安静会。里厄开了一个药方。

“好的，”他说，“放宽心。我过两三天再过来。但不要再做傻事了。”

在楼梯台阶上，里厄告诉格朗，他不得不通知警察，但他会要求警长过两天再过来录口供的。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好他。他有家人么？”

“我也不太了解他家的情况。不过我会看着他的。”

格朗摇了摇头。

“老实说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人总要互相帮助。”

在房子的走廊里，里厄机械地朝角落望去，问格朗这个区的老鼠有没有全部消失。这位公务员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别人跟他讲过这件怪事，但他向来不太关心街道里的传闻。

“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他解释道。

里厄和他握手告辞。在给他的妻子写信之前，他还要赶去看看看门人的情况。

卖晚报的小贩大声叫喊，鼠患已经结束。里厄到了那里，看到看门人半个身子倒着探出床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支着脖子，痛苦地把暗红色的胆汁吐到垃圾桶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缓过气来，重新躺回床上。他的体温到了三十九点五度，颈部的淋巴结和四肢都出现了浮肿。在他的腹部有两个黑斑在渐渐扩大。体内的疼痛使他发出痛苦的呻吟。

“有东西在燃烧，”他说，“这畜生要把我烧死。”

从他发黑的嘴唇里艰难地吐出这些话，他转向医生，突出的眼球因头痛而流出泪来。他的妻子焦急地看着依然沉默的医生。

“医生，我先生得了什么病？”她问。

“什么病都有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一直到今天晚上，注意饮食和卫生。他要多喝水。”

确实，看门人已经口渴得要命。

回到家后，里厄打电话问他的同事里夏尔，他是城里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不，”里夏尔说着，“我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没有局部发炎的高烧病例么？”

“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个淋巴结肿大的病例。”

“有什么异常么？”

“我想你应该知道正常情况是怎么样的。”里夏尔回答道。

晚上，还是没办法，看门人嘴里开始将胡话，体温升到了四十度，嘴里诅咒着老鼠。里厄试着用固定法来去除脓肿。松脂在慢慢融化，看门人喊骂着：“啊！这帮畜生！”

那个淋巴结仍然肿着，摸着像块木头一样硬。看门人的妻子惊慌不安。

医生跟她说：“晚上您在这里看着他，有什么事马上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一阵温热的微风吹过潮湿而泛蓝的天空，从远处的郊区带来花的芬芳。清晨街道上的喧闹似乎比平日更加生动悦人。整个城市里，一星期来人们经历的那种无声的恐慌消失了，这一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妻子的来信也使里厄放心多了。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楼下看门人家里。事实上早上看门人的高烧已经退到了三十八度。这个虚弱的病人躺在床上微微笑着。

“医生，您看他现在是不是好多了？”他的妻子问。

“还要等等。”

但到了中午，高烧一下子又升到了四十度，病人一直喊个不停，又开始呕吐。颈部的淋巴结碰一下就疼，看门人好像要把他的脑袋从他自己的身体上拿掉，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的另一头，望着里厄。

“请您听我说，”里厄说，“他需要被隔离接受专门的治疗。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派救护车过来接他。”

两个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医生和那位妻子俯视着病人，从他布满霉菌的嘴边，吐出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睛也呈铅灰色。短促的呼吸断断续续。全身的淋巴结都突出来了，好像要把他的身体撕成一块一块的。他在床铺上缩成一团，好像要用它把自己裹起来，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地底钻出来，在不停的呼唤着他。看门人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停止了呼吸。他的妻子放声地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么？”

“他死了。”里厄说。

3

看门人的死，给这段充满令人担忧迹象的时期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是另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的开始。起先的震惊开始转变为心里的恐慌。我们的市民之后想到这里，发现他们从未想到过我们的小城里竟会成为一个看门人得怪病和老鼠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亡的鬼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所有人都处在这个错误之中，他们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切到此就结束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对此习惯成自然的。可是除了看门人和穷人外，市民当中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和看门人一样的道路，成了第一批接替者。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人们才真正害怕起来，开始对其认真思考起来。

在开始叙述新事件的细节之前，叙述者相信先来讲讲另外一个见证人对刚刚描述的时期的观点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正是让·塔鲁，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讲述中提到过他了。他已经在奥兰城待了几天了，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市中心的大酒店里。表面上看来，凭他的收入，他好像过得非常舒适。然而，城里的人里渐渐对他见怪不怪了，但却没人关心过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人们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见到他。一开春的时候，他就时常出现在海滩上，喜欢欢畅地游泳。这个爱笑的家伙，似乎对所有的娱乐都很喜欢，但又不沉迷其中。事实上，人们所了解到的他的唯一习惯就是经常殷勤地接待来自西班牙的舞者和歌手，其接待的数量在我们城里着实算得上多了。

不管怎么说，他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也算得上是对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形式了。但这些笔记本里的记事却很特殊，因为其中掺杂了许多无用的东西。乍看之下，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在努力通过望远镜的镜片在观察和思考这里的人和事。在整个慌乱之中，他最终选择了专心做一个历史学家，对这些不能称之为历史的事件进行记录。我们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决定感到惋惜，并猜想他是个冷酷心肠的人。但他不仅仅留下了这些可以作为这段时期记事的笔记本，里面提供了对此事件的大量重要的补充细节，而且细节中的一些怪事甚至能告诫我们不要太急于否定这个有趣的人物。

塔鲁的第一份记录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他刚来到奥兰城那会。从一开始，他的日记中就显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本身如此丑陋的城市时，却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我们在其中发现，他详细描写了一对用来装饰市政厅的铜狮子，带着善意的思考这个没有树木的城市，和这里粗俗的房屋建筑以及糟糕的城市规划。塔鲁甚至在其中记录了他在地铁和街道上听到的对话，而且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评论，除了在后面一则关于一个名叫冈的人的对话。这也是因为塔鲁加入了这场在两个地铁售票员之间的谈话。

“你认识冈么？”方说。

“冈？是那个长着黑胡子的高个子么？”

“就是他。那个曾经开关火车电闸的。”

“是的。”

“听说他死了。”

“是么！什么时候的事？”

“在出现鼠患后不久。”

“啊，当时他身上有什么反应？”

“我也不太清楚。开始是发高烧，接着，由于他身体本身不是很好，他的腋下肿了起来。最后他没能坚持住。”

“但他看起来跟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啊。”

“不，他的胸腔一直有病。因为他原先在合唱团搞音乐。整天对着短号，这对

身体损耗很大。”

“原来是这样！”第二个人总结道，“要是我们生病了也不该再吹号。”

塔鲁自己寻思到，为什么冈会放弃自己最明显的兴趣而选择进合唱团，他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导致冈听从上帝神秘的指引，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接下来的一篇里，塔鲁对他住处的窗户对面阳台上发生的一个场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的房间朝向一条横贯的小路，一群猫在墙角的阴影下酣睡。但到了每天吃完中午饭的这个时间，正当整个城市似乎因炎热而沉睡过去时，一个小老头就出现在小路对面的阳台上。他梳着一头齐整的白发，身材笔挺，神情严肃，带着一种军人的风范。他一边“喵、喵”地唤着小猫，一边把纸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扔到小路上，让那些畜生大概以为这是一群乱飞的白蝴蝶，都被花香吸引着来到小道的中间，小猫用它们的爪子试探着碰碰最后一块纸片。这时小老头开始对着小猫用力地吐痰。如果吐中了他的“靶子”的其中之一，他就大笑起来。

最终，塔鲁似乎完全是被这个城市的商业气息所吸引的，无论是它的外表，还是都市里热闹景象，甚至包括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乐趣好像都是为了满足生意的需要而设。这一独特之处（这是他在日记本中使用的词），得到了塔鲁的赞许，在他赞扬的评论之中，有一段话甚至用了一个感叹句来结尾：“终于！”这是在这个时间的旅行笔记中唯一几个看起来带了他个人痕迹的地方。这也仅仅是在评价它的意义和严肃性时才会有些困难。在他的笔记中，记述了有一次，他发现酒店前台因为死老鼠而记错帐，他也做了同样的叙述。他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写得没有平时端正：

“问题：怎样才能做到不浪费时间？答案：去体验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方法：在牙医的候诊室里选把不舒服的椅子坐着度过整个白天；星期天下午待在阳台上；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做报告或选择一条最不舒适、最漫长的铁路旅行线路，自然而然地一路站着旅行；到演出剧场的窗口排队但还买不到位子等等”，但是在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考之后，笔记又开始详细描写起城市里的有轨电车，它的车厢样式，它模糊不清的颜色，它一贯的脏乱，最后，他在结束他的这些思考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这些都值得注意”。但这依然解释不了什么。

不管怎样，下面塔鲁给出了许多关于鼠患的一些迹象，以下是他的记录：

“今天，街对面的那个小老头和往常不一样。路上的猫都不见了，因为它们在路上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而受了惊吓。要我说，这不一定是因为猫吃了死老鼠。我记得自己养的猫是讨厌死老鼠的。它们应该是跑到哪个洞里去了，小老头也无可奈何。他现在头发也不似先前梳得精细，身体也没先前健壮。仿佛有什么心事。他在那待了一会，就转身回去了。他也习惯性地吐了口痰，但只那么一次，对着空气。

“今天在城里，一辆电车中途停了下来，因为有人在上面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但不知道它是怎么钻到那上面去的。两三个胆小的女人下了车。人们把老鼠拿去扔了之后，电车又发动了。

“酒店的夜班值班员是个迷信的人，他跟我说他预感到这些老鼠会带来一场灾难。‘当老鼠从船上跑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个出现在船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对于城市，过去从没人证实过这一点。但他却对此深信不疑，我问他指的是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倒要等着瞧瞧。他说他也不知道，灾难是预测不了的。但如果只是场地震的话，根本没什么惊奇的。据我所知这是可能的。然后他就问我是否对此有所担心。

‘我唯一关心的事情，’我对他说：‘是寻求内心的平静。’

他终于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

“酒店的餐厅里，有一家子特别滑稽。父亲身材瘦削，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扎着笔挺的领口。头中间是秃的，左右长着两簇灰色的头发。加上一双滚圆的小眼睛，细长的鼻子和一张没有曲线的嘴巴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立着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来到餐厅门口，然后让出一个位置，让他那位小得跟只黑鼠似的妻子先溜过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跟在她屁股后面，活像两只活泼的小狗。到了餐桌旁，他要等他的妻子坐下了，他才坐下，之后两只卷毛狗才爬到他们的座位上。他跟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称‘您’，对他的妻子说话就像在诵读课文，而跟他的孩子又换上一种坚决的口吻。”

“‘妮科尔，您这样很讨人厌。’小女孩听了都要哭了，这是自然的。”

“早上的时候，小男孩对鼠患的故事兴奋不已，他想在餐桌上讲几句：

‘菲利普，在餐桌上不能谈论老鼠。以后您不准再提到这个词。’

‘您父亲说得很对。’那只小黑鼠说。”

“两只卷毛狗把鼻子埋在食物当中。猫头鹰用头做了个简单的动作表示感谢。”

“先把这个有趣的一家子放一边，城里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关于鼠患的事。报纸都刊载了相关的内容。平常题材比较广泛的本地专栏，现在几乎完全都是针对市政府的攻击性语言：‘这些畜生尸体是会腐烂的，我们的官员难道能置市民的健康于不顾么？’酒店经理也无可奈何，这总是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在这么一个知名酒店的电梯里竟然发现了老鼠，在他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于是我安慰他说：‘但是所有人都碰到了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这个，’他回答我说，‘弄得现在我们跟其他酒店都一个样了。’”

“也是他告诉我第一个高热病例的，酒店佣人中有一人得了这种怪病。我很吃惊，人们都为此感到担心。

“‘当然，请您放心，这种病不会传染。’他急忙殷勤地解释道。”

“我就跟他说传不传染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知道了。原来先生和我一样是个宿命论者。’

‘我可没有预先对这类事情有任何感知。另外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把这句话告诉他。”

从这里起，塔鲁的笔记开始讲述有关这个还未确定的高热病的一些细节，不安的情绪已经在公众中蔓延开来。在记录中他还讲到那个小老头在老鼠消失之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猫，他又重新耐心地调准起他的枪口。塔鲁在其后附加地说到人们已经发现了差不多十起相同的高热病例，其中大多数都是致命的。

作为另一个材料，我们能够通过塔鲁的叙述重新塑造里厄医生的形象。在叙述者给出自己的评价之前，一切的这类描述都是相当可靠的。

“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岁的样子，中等身材。有一幅有力的肩膀。脸型几乎呈长方形。一双率直而忧郁的眼睛，下颌突出。匀称的鼻子坚挺有力。黑头发被剪得很短。嘴巴弯成弧形，厚实的嘴唇几乎整天都绷紧着。他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西西里来的农民，黝黑的皮肤，黑胡子，整天穿着深色的衣服，但很适合他。

“他走路很快。下人行道时也不变换步伐，但三次中有两次当他走上对面的人行道时他是轻轻跳着过去的。开车的时候他也是漫不经心，经常把拉杆留在抬起的位置，甚至在调头之后也会忘了拉回来。他从不戴帽子，好像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塔鲁统计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知道一些内幕。看门人的尸体被隔离后，他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这种由腹股沟开始的高热病例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夏尔说，“总共有两位死者，一个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后死亡的，另一个则是在发病三天后。一天早上我把后者在康复期所有的表面病征都记录下来了。”

“如果出现新的病例，请您马上通知我。”里厄说。

他还给城里的其他几位医生打了电话。几天时间里他通过重复的调查找到了二十个左右的相似病例。差不多所有病人都死了。于是他要求担任奥兰城医生联合会秘书的里夏尔对新病例进行隔离。

“可是我对此也无能为力。”里夏尔说：“需要省里下通知才能采取措施。另外，是谁告诉您这种病有传染的危险？”

“没人告诉我。但是病人的症状令人担心。”

听到这，里夏尔就说“这无法让人信服”。他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反映这些情况。

但是在转达情况的过程中，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笼罩了整个天空。洪水般的大雨从天而降，这场突如其来的骤雨过后，是一阵难挡的酷热。大海失去了原来的深蓝色，在漫天的大雾之下，海面上倒映出难看的

银灰色的光彩。春天潮湿的热气预告着酷热夏天的来临。在靠近大海的沙滩上，形成了一片螺旋状的混沌，渐渐弥漫到城里来。在涂粉的墙中间，在街道旁沾满灰尘的橱窗上，在肮脏的黄色的电车车厢里，人们产生了一种被天空囚禁的感觉。只有里厄的那位老病人，由于自己的哮喘病没有再犯而感谢这个鬼天气。

“天气越热才好。”他说，“这样的天气对我的支气管倒有点好处。”

天气真的很热，但这也只是一场高热，整座城市在发高烧。至少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里厄医生。那天早上他为了科塔尔的事特地去了趟芳草街，警察要向他了解情况。但他知道这种感觉是十分不理智的。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几天碰到的烦恼担心的事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他想他现在要赶快理一下事情的头绪。

他到了之后，发现警察还没来。格朗一直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他，于是他决定先到他的家里坐坐，把门留着。这个在市政厅上班的公务员住着两间套房，里面的家具都很简陋。他注意到一个白色的木制书架上摆了两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还能读到被擦去一半剩下的几个字：“花开的小径”。据格朗说，科塔尔这个晚上过得不错。但是他自己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头疼得厉害，动也动不了。格朗看起来非常的疲惫不安，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把桌子上一个很大的装满手写稿的档案袋打开了又关上。

他告诉医生其实他对科塔尔了解得很少，但他猜他家里还是有点资产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楼梯上碰到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以前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就在几天前，我在门口台阶那打翻了我带回家的一盒粉笔。里面装着红色和蓝色的粉笔。这时正好碰到科塔尔要出去，他就帮我把粉笔捡起来。然后他问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是用来做什么的。”

格朗就跟他解释说他是想重新学一下拉丁文，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以前学过的东西就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他跟医生说，“别人告诉我学习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文的字词。”

说着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拉丁文的词。他用蓝粉笔把这些词的词性变化和变位

的词尾先抄上，又用红粉笔写上不变的词根。

“我也不知道科塔尔听懂了没有，但他好像挺感兴趣的，又向我要了一支红色的粉笔。我当时只是有点奇怪，但谁知道……我从没想到过，绝对没有，他是拿它去写自杀遗言的。”

里厄本想接着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内容。但这时警长跟他的秘书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口供。医生注意到当格朗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把他称为“那个绝望的人”。甚至有一次他用到了“命运的诀别”这样一个说法。他们还讨论了当事人这次自杀的动机，但格朗似乎对咬文嚼字更感兴趣。最终他们把这归结为“抑郁的内心”这个词组。警长还询问科塔尔之前有没有任何细微表现预示他将做出他所谓的“他的决定”。

“他昨天倒是来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想问我借几根火柴。我就给了他一盒。他想对我解释什么，说邻居之间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还向我保证归还我的那盒火柴。我叫他留着好了。”

警长又问这位公务员，他有没有觉得科塔尔当时看起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就是看他的样子好像很想跟我谈些话。但是那时我正在工作。”

格朗转向里厄，带着一种难为情的表情补充说：

“干一项私人工作。”

这时，警长想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是他先过去和科塔尔讲一下，让他对探访有点心理准备。里厄到他的房间时，科塔尔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外套，对着门坐在床上，带着一种焦虑的表情。

“是警察来了么？”

“是的。”里厄说，“您先不要激动。他只是问两三个程序上的问题。您还是可以安静地待着。”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也不喜欢见警察。里厄也有点不耐烦了。

“我也不喜欢他们。所以你最好快点好好地回答完他们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科塔尔不说话了。医生转过身正要朝门口走去，这个小矮子又叫住了他，在他

还在床边时拉住他的手说：

“医生，他们该不会对一个病人动手吧？我可是个上过吊的人啊。”

里厄端详了他一会，最后向他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并且他也会在这保护他的病人。这个可怜的人似乎这才放了放心。里厄把警长叫了进来。

他们向他陈述了格朗的供词，并问他是否可以具体讲一下他的行为动机。他没有看着警长，仅仅回答说“抑郁的内心，这样很好”。警长逼着让他说明是否还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激动的科塔尔回答说，他只想别人给他留点安宁。

“我得跟您重申一下，”警长用一种愤怒的语调说，“现在是您给别人带来了麻烦。”

但是里厄做了个手势，大家也就此停止了。

“您该想想，”离开时警长叹了口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最近人们都在议论高热病的事……”

他问医生这件事是否很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也一无所知。

“一定就是天气的原因。”警长总结道。

天气的原因，也许吧。随着白日的到来，手心因为流汗变得粘乎乎的。每次出诊，里厄的担心又增加一点。当天晚上在郊区，老病人的一个邻居手按着腹股沟，边呕吐边说着胡话。他身上淋巴结肿得比看门人的还要厉害。有一处已经开始化脓，裂开了，就像烂了的水果。回到家，里厄给省药品站打了个电话。当天的工作笔记上，他只写着：“回应不太乐观”。同时，别人通知他在别处也出现了相似的病例。很显然，要治病就先得试试把脓肿挑破。用两道成十字的手术刀切开之后，从淋巴结里就流出了带血的黏稠的脓水。病人的伤口上淌着血，好像要被撕裂开来。但是病人的腹部还是出现了黑斑，腿上的淋巴结停止化脓后又重新肿了起来。大多数时候，病人的状态就像死了一样，带着一股恶臭。

那些对鼠患叽叽喳喳的新闻报导，也讲不了更多。说的无非是街道上老鼠死了，有人在他们的房间里死了的事。报纸只关心市井里的传闻。但省里和市政厅现在开始询问起这件事情来。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每个医生也只知道自己管区里的两三个病例，所以没人想过要采取什么行动。总之，只要有个人去买单，那么这个

单就够他受的了。几日的痛苦之中，死亡病例还在增加。对那些担心这种怪病的人来说，已经很显然，这是一场真真切切的瘟疫。这时正巧一位里厄的同事来看他，他叫卡斯特尔，比他要年长。

“显然，”他说：“里厄，您已经知道这是什么病？”

“我在等待分析结果。”

“我是知道的。而且我不需要分析。我在中国做过几年医生，并且差不多二十几年前我在巴黎也看到过几个病例。当时人们也是这样，只是不敢叫出它的名字。神圣的公众舆论永远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出现混乱。接着正如我的一位同事说过，‘这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它已经在西方国家灭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那些死者。去干吧，里厄，你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思考着。通过他办公室的窗，他看到海湾边与他比肩的岩石陡峭的悬崖一直延伸到远处又围拢回来。蓝色的天空中一片灰暗的云彩随着下午的到来慢慢淡了下去。

“卡斯特尔，确实，”他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但是这情形看起来确实说明这就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来，朝门走去。

“您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么，”老医生说，“它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好多年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消失？”里厄挺起肩膀回答。

“是的，您不要忘了，它在巴黎再次出现时，也是在它绝迹了二十年之后。”

“好的。但愿如今的这次不要比那时更加严重。但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5

“鼠疫”这个词还是第一次被提到。小说暂且停留在贝尔纳·里厄站在窗后的这一刻。请允许叙述者对医生的迟疑和吃惊做出一些自己的判断，因为虽然带着些许不同，他的反应仍是和大多数的市民一样。灾难实际上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当它落到你自己头上时，人们很难去相信这就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鼠疫和战争一样的多。然而处在鼠疫和战争中的人们又总是没有经验的。里厄医生没有经验，城里的市民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这种犹豫。因此也要知道这其中同时存在着不安和自信的想法。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会说：“仗打不了多久，这太愚蠢了”。战争显然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但这并不影响它打下去。蠢事总是存在，如果人不整天考虑自己的话就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的市民和世上的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只考虑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是完全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会有灾难。灾难是不会发生的，人们自我安慰时会说灾难都是不真实的，这只是一场噩梦，终将消失。但它又总是不消失，而且还一场接一场地上演。真正消失的是人，首先是那些人道主义者们，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的市民并不是说犯了什么比别处的人更严重的罪过，只是他们不够谦虚谨慎，这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总认为他们对一切皆有办法，怀疑灾难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他们继续忙他们的生意，为出门旅行做准备，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们怎么可能想到会发生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自以为可以自由自

在，然而一旦灾难来临，没人能够得以自由。

尽管里厄医生已经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有一些分散在各处的病人在没有任何预知的情况下因为得了鼠疫而死去，但危险对于他说还是不真实的。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做医生的对病痛只存在一种概念，他们要求助于一点想象。透过窗户看到的城市几乎很少有改变，想到即将到来的令人担忧的未来，医生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厌恶。他试着在脑子里搜寻他所知道的关于这种病的一切。一些数字从他的记忆中浮现出来，他知道在历史上经历的三十几次大鼠疫造成了近亿人的死亡。但这几亿人的死亡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战争发生时，我们几乎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既然在没有被看到的死亡中，死者本就没有什么分量，那么几亿的像种子一样掩埋的尸体在历史的过往中也只是一段脑海中的思绪。医生想起了发生的君士坦丁堡的那场鼠疫，据普罗科佩记载，它一天就夺走了一万人的生命。一万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五个大的电影院里的观众人数。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把这样五个影院里的人都集中到出口处，把他们赶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将他们成堆地处死，只是为了还这里一片清静，但至少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堆积成山的无名氏里找到几张熟悉的面孔。自然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那么谁又知道那一万张面孔呢？另外，像普罗科佩这样的人对统计也不在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七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广东的那次，当那里的居民意识到灾难的时候，已经有四万只得鼠疫而死的老鼠。但是，在1871年，人们也没有统计老鼠数量的有效手段，只是做一个大概的估算，显然这样统计出的数据有很大的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但我们尽可以推算一下，如果一只老鼠有三十厘米长，那四万只头尾相接摆放的老鼠是……

但是医生渐渐失去了耐心。他顺其自然，听之任之。有几个病例并不是疫病，只要留心照料就可以了。他早已把病征记在心里：起先病人会感到吃惊和沮丧，发红的眼睛，肮脏的嘴唇，头开始痛，腹股沟淋巴结发炎，口渴难耐，说胡话，身体出现黑斑，体内产生撕裂感，最后……最后，在里厄医生的脑海里闪过一句话，一句话结束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的一系列病症：“经脉突出成一条一条的，身体稍微动一下就能带来死亡。”是的，在这些症状的最后，他们选择了上吊。有四分之三还多，这是准确的数字，他们相当迫不及待地选择了这种别人难以察觉的行动来加速

自己的死亡。

我们还是拉回到医生站在窗边向外远眺的时候。在玻璃的一边是春天晴朗的天空，而另一边那个词仍在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鼠疫。这个词不仅包含了科学期望赋予它的定义，还夹杂了一幅幅不同寻常的画面，显得与这个灰黄的城市格格不入。城市这时候刚刚苏醒过来，熙熙攘攘的但还不至于嘈杂，总之它是快乐的，如果可能，它可能既是快乐的又是忧郁的。如此平静、如此冷漠的安定几乎毫不费力就能否定关于灾难的所有传说：臭气熏天的雅典城里没有鸟儿的鸣叫，中国城市里满是沉默的垂死的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还在淌水的尸体堆积在洞口，普罗旺斯正在修筑高大的围墙以阻止鼠疫疯狂的蔓延，雅法^①城里丑陋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潮湿的病床已经腐烂得快贴到地面上，病人被吊钩拉着，在黑鼠疫期间医生们举行了化妆舞会，米兰墓地里活人在寻欢作乐，恐怖的伦敦城里是装满死人的手推车，从晚上到白天随时随地能听见人们无休止的呻吟。不，所有的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白天的平静。再回到窗户的另一边，电车还没驶入，突然响起的铃声在一秒钟之内去除了这里的残酷和疼痛。只有那片海，在星罗棋布的房子的尽头，见证着在这个令人担忧的世界，它从没有平息过。里厄医生注视着这片海湾，想到了卢克莱修^②讲述的，遭受天灾的雅典人在海边搭起的柴堆。在夜晚的时候雅典人将死去的人运送到那里，但柴堆上的位置不够用了。为了将自己的亲人放到上面，那些活着的人举着火把相互扭打在一起，他们宁愿进行流血的战斗也不愿丢弃他们亲人的尸体。我们可以想象，在平静、阴暗的海水旁边那些被鲜血染红的柴堆，夜晚中打斗用的火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迸发出火星，弥漫的有毒的浓烟升向一直注视着他们的天空。我们有理由担心……

但是不能让这种幻觉代替了理性的思考。事实是“鼠疫”这个词已经被提出来了，灾难已经降临到这块土地上，它带走了一两个牺牲者，这也是事实。然而让灾难停止的方法又是什么。现在应该做的，是重新清晰地认识应该被认识的，驱赶心头的疑虑和阴霾，采取恰当的措施。如果灾难就此停止，最可能的情况是一切都会

①今以色列港口。

②即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

好转。而如果相反，我们也知道了灾难的真相，那么首先要弄清楚是否有方法对付它，然后才是战胜它。

医生打开窗子，城市的喧嚣一下子增大了许多。从隔壁的作坊传上来一阵短促的口哨，还有工匠来回拉锯的声音。里厄摇了摇头。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我们才有把握。其他的都寄托在几根线上，几次微不足道的行动上，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关键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6

当外面通知格朗的来访时，里厄医生还沉浸在他的思考当中。作为市政厅的公务员，他的职责涉及很多方面，所以他也定期地做一些统计的工作。这样他就被安排去负责统计死亡人数。出于乐于助人的天性，他同意亲自给里厄送来每次统计结果的复印件。

医生看到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他的邻居科塔尔。公务员手中挥舞着一张纸。

“医生，统计数字显示，”他宣读到，“在四十八小时内共有十一人死亡。”

里厄先是跟科塔尔打了招呼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格朗连忙解释道，是科塔尔自己坚持要过来感谢医生并为他对他造成的不便道歉。但里厄马上把注意力转向了统计资料。

“我们开始吧。”里厄说，“也许我们应该先给这个病取个名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进展。请你们跟我走一趟，我要去趟化验室。”

“好的好的，”格朗一边跟在医生后面下了楼梯，一边答应着，“每样东西都应该叫出个名字。但它叫做什么呢？”

“我不能告诉你，再说这对你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好了，”公务员笑着说，“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朝着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没说话。街上的人渐渐开始多了起来。此处短暂的黄昏在夜晚降临之前早已退下，第一批星星出现在还泛着白的地平线上。几

秒钟之后，街道上亮起的灯光模糊了整个天空，人们闲谈的噪音似乎也提高了一个声调。

“请原谅，”在阅兵场的角落上格朗说，“我要去乘电车了。夜晚对我来说太神圣了，正如我们那的人常说的‘时不我待’。”

里厄早已就注意到出生在黑山的格朗有这种癖好了，他喜欢引用他们当地的熟语，然后加上一些不知从哪来的无聊的格言，就像“梦寐的时间”或者“仙境般的光线”。

“嗯，”科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就不能有人留他家里了。”

里厄问格朗是不是要回市政厅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去做自己的工作。

“原来如此，”里厄想说点什么，“那事情有进展了么？”

“从我开始做这件事起，多少有点。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进展不是很大。”

“那它是关于什么的？”医生说完就停下了脚步。

格朗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把他的帽子严严实实地扣在他的两只大耳朵上。里厄对他所说的关于个人成长的故事还是一知半解。这时公务员着急着离开，快步走上了马恩大道，道路两旁种着枝叶茂盛的榕树。到了实验室里，科塔尔对里厄说他今天过来其实是希望医生给他点建议。里厄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那张统计报告，他请科塔尔在就诊的时间再过来问他。可是过了一会，他又改变了注意，告诉他明天要去一趟他们街区，下午办完事后他会顺道过去看他的。

送走科塔尔，医生又想到了格朗。他想到如果格朗在鼠疫中会发生什么，而且还不是现在的这场也许不算是很严重的鼠疫，如果是在历史上的那些大鼠疫中呢？

“他就是那种在这种情况下侥幸逃脱的人。”他想起好像在哪里读到过一种说法是鼠疫会放过那些脆弱的人，首先受到威胁的反而是那些体格健壮的人。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公务员有点神秘莫测。

第一眼看到格朗，他只不过是个市政厅里的小公务员，神态动作都说明了他的身份。他身材瘦长，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是故意选的特别大，想着这样可以穿得久点。他下牙床的大部分牙齿还在，而上面的都已经掉光了。他笑起来时，先掀开上面的嘴唇，嘴巴看起来就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和修道院道士一样的走路姿势，

总是贴着墙根悄悄溜进门缝里，还有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和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就只能想到他是一个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专心地核算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者为年轻的秘书写关于新增的生活垃圾清理税的报告收集材料。即使在一个不带偏见的人看来，他也好像是生来就为了担任市政府的临时工，每天领六十二法郎的薪水，做这些默默无闻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在职员登记表的“鉴定”一栏里写道的评语。自从二十二年前他拿到了学士学位后，由于家里缺钱，他就没有再进修，而是接受了这份差事。据说本来别人跟他说有希望很快转正。显然，这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证明他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市行政方面的棘手问题。他错过那次机会，之后他们又跟他保证给他一个可以让生活过得比较宽裕的秘书的职位。诚然，格朗不是那种想飞黄腾达的人，这从他的忧郁的苦笑上可以得到证实。他想通过勤恳的劳动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因此可以问心无愧的从事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期望已经使他心满意足了。他之所以接受人们提供给他的这份差事，也正是出于一些可敬的原因，正如人们所说的，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

他这个临时工一做就是好几年，这期间生活花费大幅度地上涨，而格朗的工资除了那么几次一般的加薪外，还是少的可怜。他也跟里厄抱怨过这些，但似乎没人理会他的意见。这也是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是他的特征之一。实际上他本来能够提出要求，即使不是那些他不确定的应得权利，至少还有别人对他做的保证。但是当初雇用他的办公室领导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而继任者又想不起当初做的保证到底是什么了。但归根结底，是里厄没有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个最后的特征最形象地刻画了我们这位同胞，这点里厄也注意到了。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点使他一直写不出那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者做些他的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活动。这么想着，“应得权利”这样的字眼他更加难以说出口，何况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坚定，也不想用“作出的保证”来要求当初做保证的人给予他应得的东西，因为这未免显得过于大胆，而他自己只是个地位低微的小职员。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诸如“好意”，“恳请”，“感激”这样的套话，因为他觉得这有损他的个人尊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言词，我们的同胞就这样一直干着这份

卑微的工作，直到如今上了年纪。之后，就像他跟里厄说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惯，他发现物质生活也还算有保障，只要做到量入为出就好了，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也从市长——一位本市的工业巨头——所发表的演说中得到了一句证明，市长极其肯定地指出，到底（市长反复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的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底，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饿死。不管怎么样，这种几乎如苦行僧般的生活，到底让格朗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值得学习的。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在本市或是别处都是很少见的，他们一贯勇于坚持他们正确的思想。从他所说的只言片语中，我们看得到他的善良和感性。在如今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样的品质。他可以毫无羞色的承认他深爱着他的外甥们和他的姐姐，他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想起他们，让他时常感到悲伤。他直言不讳他最喜欢每天下午五点从他们街区的教堂传来的钟声，它们柔和的回荡在空中。但是当他提到如此简单的感触时，每一个很小的字眼也要绞尽他的脑汁。到底，这个困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每次碰到里厄他总这样说，“唉！医生，我实在想学学怎么表达自己。”

那天晚上，医生看着公务员离去的背影，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格朗想要说的话：他可能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直到进了化验室，里厄才安下心来。他明知这样的想法很愚蠢，但他还是无法相信，在这个连职位低微的公务员都有高尚的癖好的城市里，鼠疫竟真的会降临到这里。更确切地说，是他很难想象在鼠疫中还会有人坚持着这样的怪癖，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真的在我们的市民中蔓延开来。

7

第二天，里厄提出了被人们认为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终于省里为此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里厄表示：“现在人群中已经出现了恐慌，而谣言只会夸大事情的真相。省长跟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马上开展行动，但不要声张。另外他又认为这只是虚惊一场。”

里厄开车载上卡斯特尔，一同去省府。

“省里已经没有血清了，你知道么？”卡斯特尔问道。

“我知道。我给药品站打过电话。那边的主任也急得很，血清需要从巴黎调运过来。”

“但愿不要花太长时间。”

“我已经给巴黎那边发电报了。”

省长待人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先生们，那我们开始吧。”他说道，“需不需要我总结一下现在的情况？”

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已经很清楚情况。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合适的。

老卡斯特尔粗声说道：“问题是要确定这是不是一场鼠疫。”

两三个医生听到这个名字都惊得叫出声来。其他人则似乎还有点犹豫。至于省

长，他竟跳了起来，机械地转身向门口走去，好像是为了去确认一下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有没有传到门外的走廊上。里夏尔却说根本不必要为此惊慌，现在能够确切证明这只是一种腹股沟并发症，任何不当的假设，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将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嚼着他那发黄的胡须，一边抬起清澈的眼睛向里厄这边望了望。然后慈祥地看着在场的人，再次强调说他心里很清楚这就是一场鼠疫，但是，当然正式地承认这个事实需要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其实他也清楚这就是使他的同行们退缩的原因，但为了使他们安心，他也就自愿承认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很激动，说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讨论不是正确的方法。

“现在的重点，”卡斯特尔说，“不是研究讨论方法的好坏，而是要让这件事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时里厄一直没有说话，大家就问他是什么看法。

“这是一种带有伤寒病征的高热病例，同时伴有腹股沟淋巴炎和呕吐症状。我对病人的发炎部位做过切口。在化验室里进行的分析显示它里面包含一种短小形鼠疫杆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有一部分病菌的特异性变化并不符合典型病例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说那我们还要斟酌一下再下定论，一批实验分析已经开始几天了，等统计结果出来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措施。”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里厄接着说：“当一种病菌可以在三天之内使脾脏的体积增大四倍，在肠膜炎上引起跟桔子一样大小的淋巴结肿块，并化成黏稠的脓浆，这就不允许我们再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在不断扩大，如果疫病继续以这样的速度扩散下去而不加以阻止，要不了两个月，半个城市的居民就可能死亡。所以，你们想称它为鼠疫也好，或者高烧也罢，这些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要去阻止它夺走半个城市的居民的生命。”

里夏尔又说到：“不该把目前的情况看得这么悲观，另外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被证实，因为病患的亲属们都还没有受到感染。”

“但其他人都死了，”里厄强调道，“好吧，当然传染性从来不是绝对的，除去我们所知的一个无限增长的数字和急剧减少的人口数量。这不是说把情况看得太

过悲观，而是这样的情况要求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这时里夏尔想总结一下目前的情况，以找到阻止这场疾病的方法。如果它没有停止的迹象，那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措施；而为了实施这些措施，就需要确认这是否是一场鼠疫，而目前看来还没办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现在的问题，”里厄坚持道，“不是去了解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够严厉，而是现在已经必须使用它们以阻止半个城市的居民的死亡。剩下的仅仅是行政事务，我们的国家体制已经安排了一个省长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是当然的，”省长发话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正式的确认这是否是一场鼠疫传染病。”

“即使我们不进行确认，”里厄说，“它还是会夺走半个城市的居民的生命。”

里夏尔马上紧张地插了一句：“事实是我们的这位同行相信这是一场鼠疫，他对症状的描述可以证明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 he 并没有想描述病征的意思，他只是在陈述他所见到的。而他所看到的，正是腹股沟淋巴结炎，黑斑，高热和四十八小时内的死亡。“难道里夏尔先生，您可以负责任地断言不采取任何严厉的防疫措施，疫病就会自己停止？”

里夏尔迟疑了一下，看了看里厄。

“那么请您来告诉我您的观点吧，您可以断定这就是鼠疫么？”

“您提这个问题就不对了。这不是用词上的问题，这可关系到时间啊。”

“您的观点是，”省长说，“即使这不是鼠疫，当前及时的预防鼠疫的措施也必须开展起来。”

“如果硬要我说出个观点，实际上正是这个。”

在场的医生们开始互相议论起来，里夏尔最后总结道，“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负起责任行动起来，把它当作一场真正的鼠疫来对待。”

这个说法得到了医生们热烈地响应。

“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道。

“什么说法对我来说无关紧要，”里厄说，“只是我们不应该无视半个城市的

居民的生命安危，那样的话，这就可能真的会发生了。”

在一片不快的气氛中，里厄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那个弥漫着难闻的油污味和尿骚味的郊区。他看到一位垂死的妇女在喊叫着，她的腹股沟血淋淋的，她转过来面对着他。

8

会议的第二天，高热病人的数量仍在增加。连本地的报纸也好像感染上了这场高热，语气热情了许多，因为它们对病情的报道也仅限于使用一些含沙射影的文字。第三天，里厄看到省府很快在市里各处贴出了小布告，但颜色是白的，位置都选在城市最隐蔽的角落上。从布告上很难看出政府机关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不严厉，他们好像为了不惊动舆论而做了很多努力。布告的开头宣布，最近奥兰市中出现了几起严重高热的病例，目前还无法确定它是否具有传染性。这些病例的特征并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会保持镇静。尽管如此，为谨慎起见，省长为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些措施只是为了阻止任何瘟疫的威胁，市民应给予理解并照办。省长完全相信市民会通力合作，配合为此所做的努力。

布告接着列举了总体的措施，包括通过在下水道注入毒气来实施科学灭鼠，并对水源进行严格的检测。布告还提倡市民尽量讲究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诊所去。另一方面，所有病人家属必须及时上报由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病人在医院的特设病房内进行隔离。此外，特设病房有特殊设备用以照料病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大的疗效。另外几条补充条款规定病人的房间和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必须进行消毒。最后要求病人家属也接受健康检查。

里厄医生突然转身离开布告处，向诊所的方向走去。

正等着他的格朗，看到他时又抬起手臂向他挥舞着。

“好的，”里厄说，“我知道了，数字又上升了。”

昨天，市里死了十几位病人。医生告诉格朗晚上可能会过去看他，因为他还要去科塔尔那一趟。

“您是对的，”格朗说，“他从您这里很是受益，因为我发现他变了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有教养多了。”

“他以前不是这样么？”

格朗犹豫了一下。他不是说科塔尔从前没有教养，这个词用得并不准确。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的举止是有些粗鲁。他全部的生活就是在他的房间和一个简陋的饭馆之间，出入神秘。平常他是个葡萄酒和饮料的代理商。渐渐地他也有了两三位来访者，看来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会去屋对面的电影院。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好像比较喜欢看强盗片。总之，在任何场合，这位代理商都显得孤僻而又多疑。

但据格朗说，现在他似乎变了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觉得他开始极力想与人接近，和他们待在一起。他经常找我说话，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去，而我又一直不知道怎么拒绝他。除此之外，他还是挺让我感兴趣的，想来可能是因为我救过他的命。”

自他开始有自杀的倾向开始，科塔尔就一直没有接待过客人。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都试图博取人们的好感。还从没人像他一样跟这些杂货店的老板讲这么多奉承话，还有耐心听烟店的女店主唠叨个不停。

格朗说：“烟店的女店主是条十足的毒蛇。我曾警告过科塔尔，但他回答我说是我错了，应该还要看看人家好的方面。”

有这么两三次，科塔尔拉着格朗去城里的高级饭店和咖啡厅。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出入这些场所。

“在那里挺好的。”他说，“而且那里面的人也好相处。”

格朗注意到里面的服务员对这位代理商照顾的特别周到，当他看到科塔尔给他们大方的消费时，他知道其中的道理了。科塔尔看来对别人回报他的殷勤十分在

意。一天酒店服务员把他送到门口，还帮他披上大衣时，科塔尔对格朗说，“这个伙计不错，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迟疑了一下。

“哦，这个……证明我不是个坏人。”

此外，他的脾气阴晴不定。有一天杂货店的老板稍稍对他怠慢了些，他回到家后他就怒气冲天。

“这个混蛋，他拿的小费不比别人少。”他一个劲的诅咒着。

“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还有一次格朗在烟店那里看到了奇怪的一幕。本来他们正在热烈地谈话，然后那个女店主谈起一桩最近发生在阿尔及尔引起议论的逮捕事件。这个案子有关一个年轻的公司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那个店主说，“那我们这些老实人就能松口气了。”

但她的话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科塔尔这时突然激动起来，没说任何抱歉的话，转身就往店外走去。只剩格朗和店主还立在那里，无奈地摆摆手。

后来，格朗还跟里厄讲了科塔尔性格上的一些其他变化。科塔尔一直保留着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最爱说的话是“大鱼吃小鱼”，这个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就只买持正统观点的报纸来看，你甚至不敢相信他居然还像炫耀什么似的，在大庭广众面前读报纸里的文章。还有，他病好之后下床没几天，格朗要去趟邮局，他恳请格朗帮他给他远方的姐姐寄一张一百法郎的汇票，这是他每个月都在寄的。但是格朗正要走的时候，他又说：“给她寄两百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一直以为我不关心她，其实我很爱她。”

后来他和格朗有了一次奇怪的谈话。格朗在科塔尔的一再要求下不得不回答关于自己每天晚上专心干的小事情。

科塔尔说：“那么，我猜你是在写一本书。”

“如果你这么想，就算是吧，但我做的事比这要复杂得多。”

“啊，”科塔尔惊讶地叫了一声，“我也想和你一样这么做来着。”

格朗听了很吃惊，科塔尔接着吞吞吐吐地说做艺术家就要忙很多事情。

“为什么？”格朗问道。

“那是因为艺术家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所有人都知道这点。所以他要承担更多的事情。”

布告贴出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照我看，是老鼠的事把他搞晕了头，跟其他很多人一样。这就是原因。或者他是在害怕高热病。”

格朗回答道：“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听听我的看法……”

这时灭鼠车正巧从房间的窗户下经过，发出一阵巨大的噪音。里厄停止了说话，直到两个人又能听见彼此讲话的声音。里厄心不在焉地询问公务员的看法。对面的人用一种严厉的目光看着他。

他说：“人有需要自我反省的地方。”

里厄耸了耸肩，学着警长说道：“还有其他事要忙。”

下午的时候，里厄和卡斯特尔一道开了个会。血清还没有运到。

“另外，”里厄问道，“血清真的有效么？这次的杆菌很特别。”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卡斯特尔说，“这类生物一直存在着特异性。但是，从源头上讲，它们属于同一种类。”

“这也只是您的猜测。事实上，我们对它还一点也不了解。”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所有人都等着这个结果。”

一整天，医生每次想到鼠疫，就觉得自己的头在隐隐作痛。最后，他承认自己是害怕了。他去了两次挤满人的咖啡厅。他也和科塔尔一样，感觉自己需要沾点人气。里厄发觉这种想法很愚蠢，但是这也让他想起自己答应过去看望这位代理商。

晚上，医生发现科塔尔坐在他家餐厅的桌子前。当里厄走进时，桌子上还摊着一本侦探小说。可是夜幕已经降临，而显然在这片刚起的夜幕中是很难看书的。一分钟前，科塔尔大概只是一直坐在那，在黑暗中思考着什么。里厄问候他的身体状况。科塔尔重又坐了回去，嘟哝着说他很好，要是能保证没人来打扰他就更好

了。里厄提醒他不能老一个人待着。

“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那些专门找麻烦的人。”

里厄就不说话了。

“我也不是指我自己，希望你能理解。我在读小说呢。里面讲到一个倒霉的人一天早上突然被逮捕了。别人一直在留意他，而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别人在办公室里对他议论纷纷，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册。您觉得这公平么？您认为别人难道有权利对一个人做这些么？”

“这要看情况，”里厄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总之不能长时间地封闭起来。您要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有点生气，说他不会出去的，要是他出去了，整个街区的人都会看到他。甚至在街区之外，他也不缺关系。

“您认识里戈先生么？是个建筑师，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屋子里更暗了。郊区的街道也开始热闹起来，外面的灯一亮起来，就响起了一阵轻松低沉的欢呼声。里厄走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着他走了出来。和城里的傍晚一样，从周围所有的街区的上空，吹来一阵微风，夹杂着人们的闲谈声和烤肉的香味。一群吵吵嚷嚷的年轻人走上了街道，伴随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一股自由的气息渐渐膨胀起来。夜晚，看不见的船只拉起响亮的汽笛，从海面上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动人的时刻对里厄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因为他所知道的情况，今天一切却显得那么的沉重。

“能把灯打开么？”他对科塔尔说。

灯光一亮起来，这个小矮个眨巴着眼睛望着他。

“医生，请您告诉我，要是我生病了，您会在医院里照顾我么？”

“为什么不？”

科塔尔又问，那么人们是否会带一个住在诊所或医院里的人。里厄回答说这事发生过，但是一切还取决于病人的身体状况。

“我，”科塔尔说，“我对您有信心。”

然后他请求医生是否愿意让他搭车进城。

到了城里的时候，街上已经没有太多人了，灯光也少多了。一些孩子还在门前玩耍。在科塔尔的要求下，医生把车停在了一群孩子前面。他们正一边玩着造房子的游戏，一边叫嚷着。但他们其中的一个，贴头的黑发梳得笔直，但脸上却很脏，用他吓人的明亮的眼睛盯着里厄。医生移开了视线。立在人行道上的科塔尔，握了握医生的手。代理商转而用一种粗野而冷漠的口气跟他说话。有两三次，他还转过去看看身后。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医生，这是真的么？”

“人们总停不住议论，这很正常。”里厄说。

“您说得有道理。要是死了十个人，那世界末日也就到了。我们不该这样死。”

发动机已经开动了。里厄的手握着变速杆。但他又注视着那个孩子，发现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带着严肃而又安静的神情。突然，没有任何过渡，那个孩子对他微笑着，露出整排的牙齿。

“那我们应该怎样？”里厄边对孩子笑着边问道。

科塔尔突然紧紧抓住车门，极其激动地用痛哭一样的声音喊道：“一场地震。一场真正的地震。”说完就撒腿跑开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在城里来回奔波，忙着和病人的家属及病人自己商量和讨论。里厄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的职业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都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多说话，并且带着惊恐和某种不信任，对他们的病情避而不谈。

这是一场他还不是很习惯的战斗。快到晚上十点的时候，他的车停在了老哮喘病人的屋子前，这是他最后一个要看望的病人。里厄感觉连从车座上下来都有些困难。他停下来环顾昏暗的街道，看到夜空中的星星出现了，又消失了。

老哮喘病人靠在床上。他看起来好多了，还在数着鹰嘴豆，说过一遍后就把豆子从一只锅放到另一只锅里。他带着高兴的表情欢迎医生的到来。

“那么，医生，这是霍乱么？”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在报纸上，广播也公布了。”

“不，这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样，”老人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把情况说的很严重，嗯？”

“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医生说。

他给老人做了检查。现在他就坐在这间简陋的饭厅中间。是的，他害怕了。他知道明天一早，郊区里还会有十几位腹股沟发炎，身体蜷缩着的病人等着他。仅有两三个病例，在做了切口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去医院接受治疗，而他知道医院对穷人意味着什么。“我可不愿让他去给他们做实验。”一位病人的妻子这样跟他说。他不去给他们当实验品，那他就会死，这就完了。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根本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说到“特设装备”病房，他知道那是什么：两间由其他病人整理出来的房间，窗子被堵上，缠着卫生纱线。如果瘟疫不能自行结束，那仅靠政府现在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完全阻止不了它的。

然而晚上的官方公告还是持乐观态度。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局宣告省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市民的积极配合，已经报告了三十位左右的病人。卡斯特尔给里厄打电话。

“那些房间能提供多少床位？”

“二十四个。”

“现在城里的病人确定不止三十个么？”

“这只是那些害怕了的，其他的还要多。”

“有没有注意尸体的掩埋工作？”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电话，告诉他一定要采取完整的措施，但他没回应。我又说需要建立一道真正针对瘟疫的防线，要是不严格控制的话等于什么都没做。”

“然后呢，他怎么说？”

“他说他没有权利。依我看，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事实上两个停尸间三天内就被塞满了。里夏尔认为需要征用一所学校来作为备用医院。里厄焦急地等待着疫苗，并切开出现在病人腹股沟的淋巴结肿块研究。卡斯特尔则翻看他的旧书，一直待在书架前，希望找到阻止鼠疫的方法。

“老鼠得了鼠疫而死亡，或者与这类似的东西。”卡斯特尔总结说，“它们身

上成千上万的跳蚤携带了这种病菌。所以跳蚤引起了感染，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那感染的人数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里厄听了之后，默默无语。

这时候时间好像停止了。太阳抽干了最后几场暴雨留下的水坑。从晴朗的蓝天中漏出一道黄光，在初生的炎热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这个季节里的一切渴望着这份安详。然而四天里，高热病做出了惊人的四级跳：死亡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第四天由一座幼儿园改建的备用医院宣布投入使用。直到现在，我们的同胞还继续在用玩笑掩饰他们内心的不安，但现在走在街上时，他们显得更加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

“目前的措施还远远不够。”

“我得到了数据，”省长说，“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很明显，它们不仅仅只是令人担忧的。”

“我马上请示总督的指示。”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挂了电话。

“指示！他还真有想象力。”

“血清怎么样？”

“本周之内能到。”

通过里夏尔，省府要求里厄写一份报告，用来寄到殖民地首府去申请上面的指示。里厄在其中放入了一份详细的临床诊断描述和一些数量报告。同一天，又有四十个左右的病人死亡。省长出面负责此事，就像他前面说过的，从明天起加强实施规定执行的措施。要严格控制病人的申报和隔离。病人的房间需要在封锁后进行严格的消毒。病人家属必须接收安全检疫隔离，在可能的情况下，市里会组织安排病人的埋葬工作。一天之后，血清由飞机运抵。它们暂时可以满足目前在治的病人。但一旦瘟疫爆发就不够用了。上面回应里厄的电报说保障库存已经耗尽，新的生产工作已经开始。

这时候，从周围的郊区开始，春天的气息飘进了街道。小贩花篮里的玫瑰花

凋谢了，沿着人行道，它们的香味飘散在整个城市中。从外表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电车在高峰期的时候还是那么的拥挤，白天却又空又脏。塔鲁还能看到那个小老头，他还在往猫身上吐口水。格朗每天晚上还是回家干他的神秘工作。科塔尔到处转悠。奥登先生，那位预审法官，仍整天带着他的小动物园。老哮喘病人还在捡豆子。我们有时候还能碰见那个叫朗贝尔的记者，总带着一副镇静有趣的表情。傍晚，同一批人群涌到马路上，电影院门口还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此外，瘟疫也好像退缩了，几天中死亡的人数只有十来个。不久，死亡病例突然直线上升。在死亡病例又重新达到三十人的那天，里厄眼睛盯着省长寄给他的急件，说道：“他们已经害怕了。”急件上写着：“正式公布鼠疫，开始封城。”

鼠疫 第二部

9

从这时候起，可以说鼠疫就成了件大家的事了。直到现在，尽管这些怪事引发了市民的惊奇和不安，但每个人继续忙着他们的工作，一如往常。也是，生活还要继续。然而门一旦被关上，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集体——叙述者自己也和他们同一条船上——他们还要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结果是，比如说要与相爱的人分别的感情本来只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感受，但从前几个星期起，它突然成了所有市民的共同感受，伴随着恐惧，这才是这段漫长的流放时期里人们主要要承受的痛苦。

封城造成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要面临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母子，夫妻或是恋人，在几天以前的分别时，他们在站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嘱的话后相拥道别，带着人类愚蠢的自信，满以为几天或最多几个星期之后就能再次与对方相见，这次分离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要无助的面对与亲人相隔两地，既无法相聚又无法通信的事实。因为在省府发出法令的几小时之前，城门就已经被关闭了，显然，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类特殊情况。也可以说，这次疫病突然的蔓延，首先对我们的市民造成的影响是，迫使他们放下他们身上的个人感情。法令实施那天的开头几个小时里，一大批人涌到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有的是打电话，有的是直接找官员反映情况。每个人的问题都值得关心，但同时又不可能考虑。事实上，过了好几天时间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毫无妥协余地的境况里，现在“通融”，“照顾”，“破例”这些已经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简单的要求也无法满足我们。一方面，实际情况是市民无法使用平常的联系方式，城里与城外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政府还颁布了新的法令，禁止一切来往的通信，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途径。刚开始，几个有特权的人还可以在城门那接洽，但要经过守卫的哨兵的批准才能往外面捎信。也正是在瘟疫开始的那几天，哨兵有时也会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行些方便。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当同一批哨兵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后，他们就不敢再为这类事负责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一开始本来可以用的长途电话，但是因为繁忙的通话堵塞了公共电话亭和电话线路，导致电话中断了好几天，于是政府就给出了严厉的限制措施，仅允许在诸如生死事和婚事等紧急情况下使用电话。最后剩下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电报了。我们这些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生物，现在只能在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寻找同过去的联系。实际上由于在电报中能使用的词汇很快被用完了，这段漫长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感情，在定期的通信中最后都被简短地归结为几句套话：“好。想你。爱你。”

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仍坚持不懈地写信，不断地幻想能与外面取得联系，最后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一切都只能是幻想。可能有些设想的方法真的成功了，但我们也无法知道，因为我们收不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重复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消息和呼吁，而一段时间之后，原先发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了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抄写同样的内容，试图在这些毫无生气的句子中表现出我们艰难的生活。到最后，这些贫乏而又固执的自言自语，这些对着墙讲出的枯燥无味的对话，对我们而言，反而还没有电报上几句规范化的用语显得有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认识到出城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又想到是否可以申请让瘟疫发生之前出城的人回来。经过几天的考虑，省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明确地指出，回城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再次出城——回城自由，但不得擅自出城。这样有几个家庭，当然是极少数的，把情况想得太简单了，在没有仔细考虑的前提下，只是一心想着早点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就催促他们抓紧机会。但是，很快，被鼠疫困在城中的人意识到了回城的危险性，于是重又接收了承受这种分离的痛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相比于他们所承受的对死亡的恐惧，我

们人类的情感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但我并不是说，就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两个恋人彼此之间的爱情就一定能够超越他们所承受的苦痛。我说的只是老医生卡斯特尔和他的妻子，他们已婚多年。在瘟疫发生的前几天，卡斯特尔夫人刚好返回邻近的城市。他们甚至也不是那种可以供世人学习的模范夫妻。叙述者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到目前为止这对夫妻还对他们的结合不是非常满意。但是正是这场持久的突然发生的分离，让他们同时确信他们无法离开彼此而生活，并且在他们刚刚意识到这个真相之时，鼠疫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上面的这个例子是个例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次隔离显然只有到瘟疫消失的那天才会结束。而对于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本以为已经对它非常熟悉（我前面提到过的，奥兰人过着简单的生活）——此时也具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那些对女伴一向报以最大信任的丈夫和男友现在也开始心生嫉妒。那些自以为在爱情上轻浮随性的男人们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那些跟随在母亲左右长大的儿子以前对她们不加关心，而现在在他们的脑际经常浮现母亲脸上的一丝皱纹，在这上面集中了他们的担忧和悔恨。这场突如其来的隔离，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出口，也没有可以预见的未来，使我们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对离别不久但又相隔千里的亲人的回忆现在占据了我們平常的日子。事实上，我们经历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我們自己的痛苦，其次是我们思念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者恋人所产生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的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又让市民无事可做，只能在这座被丢弃的围城里转悠，一天接着一天地重复着这种令人失望的回忆游戏。在他们漫无目的的散步中，他们总会来到那几条同样的马路，而且大多数时候，在这样一个小城中，这些路又正好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们与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起走过的。

因此，鼠疫给市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叙述者确信他所写的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感受，因为他和许多市民共同经历了这段时间。长期以来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空洞感正是这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的情绪，一种记忆之箭，幻想着时光倒流，或者相反地盼望着时间飞逝。有时，我们放任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之中，欢

欣地等待着回家的亲人敲响门铃，听到楼梯上他们熟悉的脚步声；彼时，我们有意地忘记火车停开这件事，在往常傍晚的火车到达的时间在家里等待着亲人的归来。当然，这种游戏不会持久。总有一个时刻我们会清醒的意识到火车是不会来的。我们知道这种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我们要试着去安排余下的时间。一旦如此，我们又会重新陷入被囚禁的状态，最后只剩下可以回忆的过去。即使我们当中有些人还会期待着未来的生活，但很快他们也会放弃这样的幻想，因为幻想最终会惩罚那些相信他人的人，在幻想的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受伤。

特别是，我们的市民很快就克制了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甚至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是因为当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段分离的时间说成例如六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这一时期事先做好承受所有痛苦的准备，鼓起勇气接受考验，并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然而那时，可能是一位偶遇的朋友，一则报纸上的消息，或者是头脑中闪过的某个怀疑，某种突生的洞察力，让他们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场疫病不会持续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这时，他们保留着的勇气，意志和耐心突然全都崩溃了，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重新填补上心底里的缺口。于是他们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期限，不再期望未知的未来，或者说强迫自己一直垂头。但是这种小心翼翼，逃避痛苦，自我封闭，拒绝战斗的方式当然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在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竭力避免这种极不希望的精神崩溃发生的同时，连能把鼠疫忘在脑后，幻想将来与亲人团聚的画面的时间——这样的幻想还是经常发生的——结果也被他们给省去了。现在他们被困在深渊和险峰之间，不上不下，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那里沉浮着，被遗弃在迷茫的日子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这片痛苦之地，否则就会成为无物。

他们体验了囚徒和流放者所经历的一切痛苦，那就是生存在毫无意义的记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过去，但感到的只是一片惆怅。其实他们真想把与自己现在等待的他或她那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填补进过去的回忆当中。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即使是在比较快乐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随时回忆起远在他乡的亲人，想

到未能满足他们的事。对现时的无奈，对过去的厌恶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受到人类的法律制裁或者仇恨报复而过着铁窗生涯的人。最后，为了从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中逃脱，唯一的办法是让火车在幻想中再次开动，让反复的门铃声响彻等待的时间——然而这门铃却固执地保持着沉默！

但是如果这确是一种流放，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受的是一种在本地的流放之感。所以，尽管叙述者只了解了一般人的流放之感，但也不得不提一下像记者朗贝尔这样的人，对于他们，因为他们是被突来的鼠疫挡在了城内的，这也倍增了他们的流放之感——既不能和亲人相聚，又远离他们自己的家园。在所有的流放者中，他们的流放之感也是最强烈的，因为不仅时间引起他们内心的恐慌，如同所有人，而且空间也束缚着他们，一堵高墙将他们与那个能给予他们庇护的丢失了的故乡远远地隔开。我们看到他们在满是尘土的城市里整天游荡，低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故乡的傍晚与清晨。他们把思乡之情寄托在令人费解的事物上：掠过的飞燕，黄昏的露珠，或者有时在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出现的一抹斜阳。而对于这个能让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起眼睛，视而不见，宁愿沉浸在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中，竭力想象着这样一片土地：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参天的树木和几张妇女的面庞沐浴在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无可替代的梦境。

最后我们来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恋人的情况。这恐怕也是叙述者最有资格谈论的事情。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的烦恼，其中必须提到的是他们愧疚的情绪。目前的处境，事实上能够使他们能够以极其客观的眼光来思考彼此之间的感情。并且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往往能发现自身的缺陷。首先，他们发觉自己已经很难准确地想象出远方的亲人的动作姿态和所作所为。他们抱怨自己对对方的日程安排竟一无所知，责怪自己过于轻率，没有去仔细了解对方，并且装腔作势的认为，对于一个恋爱中的人来说，了解对方的时间安排并不是一切快乐的来源。从此刻开始，他们很容易就会去重新追溯他们的爱情，并觉察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明白，任何爱情都可以变得更加完美，然而我们又或多或少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的爱情仍然处在不足的阶段。但是回忆之中的我们却是苛刻的。这个来自于我们外部世界的，侵袭了整座城市的不幸，不仅带来了让人抱怨的苦难，而

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身的痛苦，也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痛苦。这正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方式之一。

这样每个人都应该一天接着一天勇敢地生活下去，独自面对上帝的旨意。那种得过且过的生活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够磨练人的意志，然而目前它还不具有任何价值。比如说，市民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了另一种事物的奴隶，他们受到晴雨天气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他们这是第一次直接地听凭天气的左右。看到一道金色的阳光，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喜悦的笑容，而到了阴雨天气，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都好像蒙上了一片愁云。就在几星期之前，他们还不耻于这样的脆弱和无力的屈服，因为那时他们还要面对所有人，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身边的人比他们自己还要重要。而从此刻开始，相反地，他们肤浅地只听任老天随意的安排。也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苦，又毫无依凭地抱着希望。

最后，在这种极端的孤独中，没人期望邻居的帮助，人人都带着自己的不安和孤独生活着。如果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偶然一次，试着袒露心声或者讲出自己的情感，他所得到的回应，不管那是什么，大多数时候都将伤害到他自己。那时他就会意识到跟他对话的人和他自己都只是在自言自语。一个人讲的确实是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和痛苦之后才最终选择了表达方式，他想表达的东西已经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他满含着等待，神情激动。而另一个人则认为他只是在发一些老生常谈的牢骚，他的痛苦是拿来在市场里叫卖的，他的忧伤是一打一打的。无论回答是出于好意或者敌意，总是与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或者至少对那些无法忍受沉默的人，还有其他不善于讲真心话的人来说，他们愿意接受这种市场里的语言，用一种老生常谈的语气，聊聊简单的人情往来，时事动态和坊间流言。也正是在那里，最真实的痛苦习惯于通过谈话中平庸的套话讲出来。鼠疫的囚徒也只有以这种代价来换取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烦恼有多么的痛苦，不管空虚的内心感到多么的沉重，这些流放者们，在鼠疫发生的初期，却可以说是一群幸运的人。事实上在人群中出现恐慌的同时，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他们所思念的亲人身上。在所有人的不幸中，爱情的自私心理保护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那也是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鼠疫

带给他们永久分离的危险。这样他们甚至在心里产生一种对疫病心不在焉的态度，而这正好被当做是一种泰然自若的心态。绝望将他们从惊恐中带了出来，他们的不幸倒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比如，如果我们当中某个人得鼠疫而死，那也总是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发生。正当他沉浸在内心里不断的对话的时候，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一下子被扔到最寂静无声的地底。他们根本来不及做些什么。

10

在市民想办法适应这种流放生活的时候，鼠疫把卫兵领到了城门，使驶向奥兰的轮船掉转了航向。从封城那天起，再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入城。那时起，城里的汽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原地绕来绕去。从大道的高处望下去，港口呈现出一副形单影只的样子。作为这条海岸线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往常热闹的景象如今突然从这里一下子都消失了。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舶还停在那里，但是在码头上，卸去绳索的升降机，倒翻在一旁的货车，孤零零堆放着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已经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看到了这些不同往常的景象，市民显然还不容易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除了隔离或者害怕这样共同的感受之外，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担忧放在第一位。还没有人从事实上接受这场疫病。大多数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些破坏了他们的习惯或者影响他们的利益的事。他们为此感到愤怒，但这并不是应对鼠疫的合适的情绪。他们的第一反应，更多的是指责政府。对于媒体的批评：“难道我们不能想出一种比计划的措施更为灵活的方式么”，省长的回应却是相当的出人意料。直到现在，不管是报纸还是朗斯多克情报局都还没有收到有关疫病的统计数据的官方通告。而是省长自己每天往局里送来数据，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这时，甚至公众也猝不及防。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三百零二人，而事实上公众根本从没想到过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这些人可能并非都是死于鼠疫；

另一方面，城里也没有人知道平常的时候每周会有多少人死去。城市的总人口有二十万人之多。大家不清楚这是否只是正常的死亡率——这属于我们从不关心的一类数字，尽管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来公众此刻所缺少的是比较的对象。只有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们才能觉察到死亡的增长，并对事情的真相形成一个清楚的认识。到了第五周，数字变成了三百二十个，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个。至少现在这样的数字增长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但这个事实还是不足以让处在担心中的市民产生事关重大的印象，他们会说，这毕竟只是暂时的。

于是路上依旧车水马龙，露天咖啡座也照旧人来人往。总的说来，他们并不算是懦夫，他们还能够谈笑风生，而不是唉声叹气，对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也是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面貌还是照旧。可是到了月底，也是在下文要提及的祈祷周快要临近的时候，更严重的情况使城市的面貌有了变化。首先，省长在交通和物资供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严格限制食物供给，汽油定量分配，甚至包括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才通过陆运和空运到达奥兰。于是，我们看到，市里的交通渐渐减少直到差不多都停止了；高级商店一家接着一家的关门，其他商店也挂上了停止营业的告示牌，尽管它们的门前还驻留着排成长队的顾客。

这样奥兰城就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面貌。路上行人的数量急剧增加，甚至在平常的上班时间，很多因为商店或者机构的关闭而变得无所事事的人挤满了街道和咖啡座。这时候他们还不算失业，只是在休假中。这时的奥兰城，比如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在一片晴朗的天空下，它会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这是一座处于节日中的城市：封锁交通和关闭商店都是为了方便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而挤满街道的居民也都是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

电影院自然是从这个大假中受益颇多，生意兴隆。但是省里电影胶片的流通也被中断了。两星期之后，影院不得不更换他们的节目单，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只得整天重复播放相同的电影。然而他们的收入倒没有因此而减少。

最后要讲到的是咖啡厅。幸亏在这个以葡萄酒和烈酒贸易而著称的城市里还有很大的库存，所以，咖啡的供应不成问题。老实说，这里的人喜欢喝酒。一个咖啡厅甚至挂出了写着“好酒除菌”的牌子，其实公众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

酒精能够对感染病人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的意志变得坚强。每天凌晨两点左右，从咖啡厅里走出一群数量可观的酒鬼，他们堵在马路上，满口胡言。

但是所有的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如此的超乎寻常，完成的也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让人很难认为它会成为一种常态而且持续下去。结果是我们仍旧把私人事务摆在第一位。

封城两天之后，里厄医生正从医院走出来，碰见了科塔尔，看见他带着一副满意的笑容。里厄称赞他的神色。

“是的。我身体已经完全好了。”这个小矮个说，“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呸！严重起来了么？”

医生对他点点头。而对面那个人却带着一种欢快的语气重复道。

“它没理由现在就停止啊。这下子一切都要变得乱七八糟了。”

他们一起走了一阵。科塔尔讲到他们街区里一个大杂货商囤积了一批食品用来高价倒卖。人们过去找他并把他押到医院去的时候，有人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食品罐头。“他在那里就死了。靠鼠疫可赚不了钱。”看样子，科塔尔好像知道很多这类道听途说的有关疫病的故事。比如他说有人告诉他，在市中心的一个早上，有个人发现了鼠疫的征兆，他当时因为生病嘴里说着胡话，就突然冲到屋外，倒向他在路上第一个碰到的女人，抓着她大喊他自己得了鼠疫。

“好极了。”科塔尔强调道，但他用的一种可爱的语调和他肯定的态度有点不太合适，“大家都要疯了，这是肯定的。”

同样的，当天下午，格朗也把个人的秘密告诉了里厄医生。他在里厄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里厄夫人的照片，他看着里厄。里厄回答说他的妻子在另一处养病。而格朗却说：“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一个机会。”医生答道这可能确实是个好机会，但他只希望他的妻子快点好起来。

“啊，”格朗好像很惊奇，“我理解。”

从里厄第一次跟他认识开始，他就开始无话不谈。尽管他还是要努力找词，但他也差不多总能成功地找到，就好像他已经把他正在说的东西思考了很长时间。

他年纪轻轻就和邻居穷人家的一个年轻女孩结婚了。也正是因为结婚，他才辍

学并接受了现在的这份差事。之后珍妮和他从没走出过他们的街区。他去她家看她的时候，珍妮的父母还嘲笑他这个沉默寡言又笨手笨脚的求婚者。她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一歇下来，就会坐到角落里靠着窗，一边看着马路上的行人，一边沉思，他的那双大手摊开放在腿上。她的母亲总是忙着家务活，珍妮则在一边帮忙。她长的很小巧以至于格朗看见她过马路时总是担心不已，因为汽车在她面前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一天，珍妮站在圣诞商店前，看着橱窗惊叹不已，然后她背身依偎着他，仰头对他说：“多美啊。”他扣紧了她的手指。正是这个情景确定了他们的婚姻。

余下的故事，照格朗的话说，是极其简单的。和所有人的故事一样：我们结婚了，彼此还存在着一点爱，然后工作，如此多的工作以至于忘了去爱对方。后来珍妮也开始工作，因为格朗的主管没有兑现他的诺言。现在，需要一点想象力来理解格朗接下来想说的话。他对工作的疲惫不管不顾，人也变得越来越沉默，无暇去关心他年轻的妻子，让她感受到他的爱。一个不停工作的男人，生活的贫穷，没有保障的未来，晚餐时桌上的沉默，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已没有爱情的位置。珍妮大概已感到痛苦，然而当时她还忍着没有立即离开他，这是因为当我们受苦时有一段时间是不自知的。一晃就是好几年。再后来，她就离开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离开的。“我爱过你，但是现在我累了……选择离开时我并不快乐，但是不一定要为了幸福才去寻找新的开始。”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格朗那时也承受着痛苦。他也可以重新开始，正如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问题是，他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想念她。他现在想做的，就是给她写一份信为自己辩解。“但是这很难，”他说，“对此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在我们相爱时，我们不需要说话就能彼此理解对方。可是我们又不是一直爱着对方。在那段时间，我本可以说些话把她留住，但是我没有做到。”格朗把脸埋在一块方巾里擤鼻涕。然后他把胡子擦干净。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医生。”老头说，“但是，我又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出来才使我感到好受些。”

很明显，格朗和鼠疫相隔万里。

傍晚，里厄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跟他她讲封城的事，说自己很好，嘱咐她要照顾好自己，对她说他很想念她。

城门关闭后的第三个星期，里厄在医院的门口发现有个男人在等他。

“我猜，”那个等他的人说道，“您应该认识我。”

里厄觉得自己认识他，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有点犹豫。

“我在此事发生之前就已经来了。”对方说，“来向您询问一些关于阿拉伯人生活状况的问题。我叫莱蒙·朗贝尔。”

“啊，是的。”里厄说，“那么您现在可有的写了。”

对方显得有些紧张。他说这次过来不是为了这个，他想请医生帮他个忙。

“请您原谅，”他补充道，“但我在城里没有其他认识的人，不幸的是我们报社的通讯员又是个蠢货。”

里厄邀他一起去中心门诊部，因为他还要到那里下达一些指令。他们需要从黑人区的小巷那穿过去。傍晚临近了，以前这个时候城市是非常喧嚣的，而现在却显得出奇的僻静。几声响起的号角划破了余晖未尽的天空，但这只是说明军队要去执行他们的任务了。这期间，他们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房屋有着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相间的墙头，朗贝尔激动地说着话。他把他的妻子留在了巴黎。确切地说，还不算他的妻子，但也差不多了。他在封城一开始时就给她拍了封电报。起先他认为这种事只是暂时的，他只想尽快联系上她。但他在奥兰的同事却告诉他，他们无能为力，因为邮局把电报退回来了，省府的一位女秘书也对他嗤之以鼻。最后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发上电报，上面他只打了几个字：“一切都好。不久再见。”

但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毕竟他不知道事态会持续多久。于是他决定马上离开奥兰。由于得到别人的介绍（他的工作给他这种便利），他有机会接触到省长办公厅的主任，他跟主任说明原由：他和奥兰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理由留在这里，而且他只是碰巧来到这，他理所当然可以离开，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他也在所不惜。主任跟他说，他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大家都不能有例外，总之是因为事态确实严重，这是他们所决定不了的。

“但是，”朗贝尔说，“我在这里终究只是个外乡人。”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疫病不要持续下去吧。”

最后他还试图安慰朗贝尔，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想想，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朗贝尔只能对他耸耸肩。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了市中心。

“医生，我想您能理解，这实在可笑。我来到世上又不是专门写报道的。我反倒有可能是为了来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里厄也说任何情况下这都是说得通的。

在中心大道上，人群也与往常不同。三三两两的路人急匆匆地往远处的住所赶。没人带着笑容。里厄想到这可能是朗斯多克情报所今天公布的通知造成的结果。二十四小时之后，市民开始期待。但是在当天，人们对这个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又说：“要知道我和她是不久前才相遇的，我们相处得很好。”

里厄没说任何话。

“我打扰到您了，”朗贝尔又接着说，“我只是想问您是否可以给我开张证明，证明我没有得这该死的病。我想您可以帮我这点忙。”

里厄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摔倒在地，他轻轻地把男孩从脚边扶起来。他们重新出发，来到了阅兵场上。围绕着一座上面布满肮脏的灰尘的共和国的雕像，榕树和棕榈树的枝桠低垂下来，一动也不动地，上面沾满了灰尘。他们在纪念碑前停了下来。里厄把脚跟往地上敲，一只脚完了又换了另一只，因为他的脚上也盖了一层白色的灰尘。他又瞧瞧朗贝尔。他的毡帽有点偏到后脑勺上了，领带下衬衣的领扣解开了，胡子也胡乱刮过，这位记者还真是既固执又爱赌气啊。

“请相信我对您的理解。”里厄终于开口了，“但是您的理由并不好。我不能给您开这份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有得这种病，再者我也不能肯定在您走出我的办公室到您走进省府的这期间，您是否会受到感染。然后即使……”

“然后怎么样？”朗贝尔说。

“然后，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份证明，一张纸条也帮不到您什么忙。”

“为什么？”

“因为现在城里有几千个和您一样情况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他们出去。”

“可是要是他本身并没有得鼠疫呢？”

“这样的理由还不够充分。我也知道这种做法很愚蠢，但考虑到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安危，还是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

“从现在起，很遗憾，您和所有人一样都算这里的人。”

对方突然激动起来：“我向您发誓，这是个人道问题。也许您并未考虑到像这样的隔离对相处愉快的两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里厄没有立刻回应。过了一会他才说他考虑过他们的情况。他全心全意地希望朗贝尔能够找到他的妻子，也期望所有相爱的人能够团聚。但是不能否认他们还要遵守法令和法律，这里发生了鼠疫，他的职责就是做好他应该做的。

“不，”朗贝尔痛苦的说，“您理解不了。您讲的都是些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起眼睛看着那座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讲大道理，但是他讲的都是事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记者整理了一下他的领带。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我还要想想其他办法？但是，”他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说，“我仍旧要离开这个城市。”

医生说他能理解他这样的想法，但是这跟他没什么关系。

“不，它和您有关。”朗贝尔突然大声说，“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听说您对上面作出决定有很大的发言权。于是我想着您至少可以撤回您前面帮着做过的决定，但对您来说又是一样的。您没有思念过任何人。您根本没考虑过那些被迫分开的人们。”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他是不愿意把这些人考虑进来。

“好啊，我算知道了。”朗贝尔叫道，“您要说的是公共服务。但是最好的公共服务是让每个人都高兴。”

“我们走吧。”医生好像刚回过神来，一会想到这，一会想到那。“现在还不是做出判断的时候。但是要是您生气了。就是您的错了。如果您能先把这件事放一

放，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有些事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去做的。”

另一个人不耐烦地摇摇头。

“是的，生气是不对。我还烦了您这么长的时间。”

里厄要求他记住他说过的话，但不要记仇。他们肯定还有机会碰面的。朗贝尔突然困惑起来。

“我也相信。”沉默片刻之后，他说道，“是的，我相信会的，撇开我刚才的冒犯和您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他又迟疑了一下。

“但是我还是不能同意您的观点。”

他把他的毡帽向前面的额头这边拉低了点，就疾步离开了。里厄看见他走进了塔鲁住着的那家酒店。

一会之后，医生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理由的，但是记者对他的指责是不是对的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鼠疫张开它的大嘴，肆意蔓延，平均每周的遇难者有五百人之多，而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么？是的，这场灾难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是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就要认真对待了。而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的事。比如说，他要负责管理辅助医院（现在已经有三家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叫人把那间朝向门诊室的房间改装了一下，以供接收病人之用。在那间房间里，地面被掏空做成了一个水池，里面倒上了消毒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用砖垒成的小平台。病人被抬到平台上，迅速脱去衣物，扔到池里。经过清洗，晾干，穿上医院的粗制外套等步骤后，病人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不动用学校的操场来放置这些病人，总共的五百个床位现在差不多都被用上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他还要核对统计数字，下午又回到门诊室。到了晚上再去出诊，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前天晚上，他母亲把他妻子发来的电报递给他时，注意到医生的双手在打哆嗦。

“没事的，母亲”他说，“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抵抗力强。其实他还不感到疲劳。但是他在出诊碰到的事却让

他受不了。诊断出疫病的高热注定会马上激怒病人。这时才真的是抽象和困难的开始，因为病人的家人会被告知他再也看不到病人是死是活。“可怜可怜我们吧，医生！”洛雷夫人说，她是在塔鲁住的酒店里工作的那位女服务员的母亲。这又意味着什么？当然，他可怜她们。但是这改变不了任何事。还是要打电话，不久就能听到救护车的铃声响起。邻居们起先会打开窗户看一看。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匆匆地把窗户关上。这时一切都开始了：打斗，眼泪，说服，总之这都是抽象的。在这个被高热和焦虑笼罩的公寓里，上演着疯狂的剧目。但是病人还是要被带走，这时里厄也就能离开了。

刚开始，里厄仅仅是打个电话，来不及等救护车到，他就又要赶往下位病人的家里。但是他走之后，病人的亲人就把门锁起来，宁愿和鼠疫拼个你死我活也不愿接受隔离。他们会尖叫，但还是不接受隔离的命令，警察来了，甚至动用了武力，病人会被当做敌人一样受到攻击。于是开始几周里，里厄被迫待在病人家里直到救护车的到来。之后，政府给每个医生分配了一个志愿监察员，这样一来，里厄就能从病人家里出来去下一家了。但是最初，他每晚都会碰到像今晚在洛雷夫人家一样的状况。这是一个装饰着折扇和假花的小公寓，当他走进去时，那位病人的母亲挤出一个笑容来。

“我真心希望这不是人们谈论的高热病。”

他掀开被单和病人的衬衣，沉默地注视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大的淋巴结。母亲看到女儿的腿就克制不住地惊叫起来。每个夜晚，面对着显示出致命症状的腹部，那些母亲都这样嚎哭，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神情。每个夜晚，里厄的手被她们的手紧紧抓住，她们声泪俱下；每个夜晚，救护车的鸣叫声都会引发这样痛苦而又无济于事的场面；每天晚上，经历着这样一段类似的难熬的时间，里厄已经不期望别的，他只知道这样的情景会无限期的重复上演。的确，鼠疫和抽象观念一样一成不变。也许唯一起着变化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今晚站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脚下，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觉察到那种难以抵御的麻木不仁的感觉开始侵入他的内心。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直到他消失在那个酒店的大门。

几个星期的令人疲惫不堪的生活过去了，市民们仍旧会在每个黄昏之后涌上

街头，在那里原地转圈，这时，里厄明白了他没有必要再强忍自己的怜悯之心了。当怜悯变得无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怜悯感到疲倦。在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他感到轻松的是他感到自己的心肠渐渐变硬了。他知道这反倒便利了他的工作，这也是他此刻感到欢欣的原因。而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他回家时，看着他投向她的茫然的眼神，就会感到一阵心酸，因为里厄对现在能得到的唯一的母爱的温暖也这样的漠然，她感到悲伤不已。然而为了与抽象作斗争，就要求他像现在这样。但是怎样才能让朗贝尔明白这些呢？对于朗贝尔来说，抽象观念就是一切阻碍他追求幸福生活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记者这么说是对的。但是他知道有时抽象观念要比幸福的生活更加要紧，而在那种情况下，也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今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大家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抽象观念之间的这种沉闷的斗争，就会以一个新的局面展开，成为整个城市在这个漫长时期里的全部生活。而里厄将自始至终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



然而，在这件事中一些人看到的是抽象观念，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却是某种真理。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爆发，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场措辞严厉的布道。这位帕纳卢神甫就是在老米歇尔生病之初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以其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的权威地位而闻名，经常在奥兰地理学会简报上发表文章。但是他过去做的关于现代个人主义的一系列报告，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听众，比许多这方面的专家还要受欢迎。他在他的报告中激烈地捍卫严格的正统基督教，同时排斥现代的放纵主义和古代社会的蒙昧主义。面对当前的情势，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继续向他的听众传播真理，因此他具有很高的威望。

到了月底，城里的教会组织决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抵抗鼠疫：组织一次为期一周的集体祷告活动。这个显示公众虔诚的集会，结束的时候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弥撒，向为照料鼠疫病人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次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出来讲话。半个月前，他已经从有关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研究中他在所属的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位天性热情、充满激情的神甫答应了人们的请求，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在布道之前，大家就已经议论纷纷了。这次布道也算得上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祈祷周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公众。这不是因为奥兰城的居民平时不虔诚。其实

他们也是虔诚的，但是星期天的早上，弥撒敌不过海水浴对人们的诱惑。这更不是因为突然想到要皈依宗教。而是因为，一方面封城后城门紧闭，海水浴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他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很特别：他们打心底里不愿承认这个令人震惊的、使他们受到打击的事实，但他们又明显感觉到周围的某些东西显然是改变了。然而很多人一直等待着疫病自己结束，并且相信它会放过他们的家人。结果是他们感觉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恩惠。对他们来说，鼠疫只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既然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他们虽然害怕，但不至绝望。鼠疫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忘记鼠疫之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还远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还在观望。从宗教上看来，就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情感的表达方式，这种特殊的情感也不属于热情或者麻木，我们倒可以用一个词来定义它：“客观性”。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会有个自己的说法，就像这批信徒中其中一对里厄讲的那样，“不管怎么样，这总没什么坏处。”在塔鲁的日记本中，他也记录了中国人的例子，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会在鼠疫之神面前敲锣打鼓来祈求保佑。之后塔鲁自己指出，绝对不可能知道，现实中这样在神的面前敲锣打鼓是否真的要比防疫措施还要奏效。他仅仅补充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鼠疫之神的存在性，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扼杀一切我们本应该知道的信念。

不管怎么样，城里的大教堂这一周来几乎每天都挤满了忠实的信徒。开头几天，很多居民待在门廊前种着石榴和棕榈的院子里，听着祝圣和祈祷的声浪一直涌到街道上。渐渐地，有人做了榜样，这类在外面的听众也决定参加集会，混在众多信徒中害羞地唱着颂歌。星期日那天，大量的人群涌入教堂的大殿，最后都挤到了教堂前的小广场和最后几级台阶上。从昨夜开始，天色阴暗，大雨如注。那些站在外面的人就打起了雨伞，教堂的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蜡烛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走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他靠在讲道台的栏杆上，两只大手抓着木栏。这时人们远远地只能看到了一个黑色的，敦实的轮廓，一张两边泛着红光的脸颊，鼻梁上面架着一副钢制的眼镜。他的声音洪亮，热情洋溢，远远地就能听见。他面对着翘首以盼的听众，用一句措辞严厉的句子，一字一顿地讲出：“我的弟兄们，你们

正处于不幸之中！我的弟兄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立刻，听众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从教堂内一直传到外面的小广场上。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样一个悲天悯人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接下来的这段话才让市民们明白了，神甫在这里使用了一种高超的演说技巧，像猛击一棍似的，一下子就点出了他整个布道的主题思想。紧接着第一句话，帕纳卢神甫诵读了《圣经》里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着说：“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上帝的敌人。埃及法老违抗天意，于是鼠疫降临，使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发动灾难，使那些盲目自大的人屈服于他的脚下。你们把这点认真反思一下。跪下吧。”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他的最后那句话，在全场的寂静中讲出。暴雨打在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上，发出连续的爆裂声，把他的话衬得更加响亮了。在如此大声的回响作用下，有几个听众在迟疑了一会之后，竟情不自禁地滑下了他们坐着的祷告椅，跪下了。其他人也以为要学他们的样，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紧挨着一个，教堂里除了几把椅子发出的折断声没有其他的杂音，所有的听众不一会儿，都跪到了地上。这时帕纳卢神甫又挺直了身子，深吸了一口气，用一种更加有力的声调讲到：“如果今天，鼠疫降临到你们的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该认真思考的时刻到了。正直者不用对此感到害怕，但是恶毒者就该打颤了。在人间这个广阔无垠的粮仓里，无情的灾难敲打着人类的种子，直到麦秆上脱下麦粒。麦秆总比麦粒多，受上帝召唤的人总比得救者多，而这种不幸并不是上帝的意旨。长久以来，这个世界充斥着恶行，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蒙受着神的宽恕而得以繁衍生息。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忏悔罪恶。从现在到那时，最容易的事就是顺其自然，剩下就让仁慈的神来决定。好吧，这样的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那么长时间里，上帝一直用他怜悯的目光，俯视着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现在他厌倦了等待，在他长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于是他转过了脸去了。失去了上帝之光的我们，如今要长久地处于鼠疫的黑暗之中了。”

大厅里有人像马那样不安的呼着鼻气。停顿片刻，神甫用稍低的声调接着说：

“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经受了一场鼠疫的浩劫，情况严重到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去掩埋死者。这场鼠疫主要在罗马和巴黎地区横行。当时一个善神显灵，他命令一个恶神拿着他捕猎的长矛去敲打房屋，他在屋顶上敲多少下，这个屋里就要死多少人。”

帕纳卢这时将他的两只短胳膊伸向广场的方向，就好像他指着雨幕后的某样东西：“弟兄们，”他再次有力地说道，“今天同一位死神来到了我们的街道上。看着他，这位鼠疫的使者，如同金星一般美丽，同他自己的凶恶一样闪亮，站立在你们的屋顶之上，右手将他的那杆红色的长矛举到头顶，左手指着你们的其中一间房屋。过一会，也许他的手指就会伸向你们家的大门，响起长矛敲打木头的声音。再过一会，鼠疫来到你们的家中，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待着你们回家。他就坐在那里，耐心而又专心的坐着，自信得就像这个世界的主宰。他要伸向你们的那只手，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也没有类似的，你们有必要明白这一点，人类吹嘘的科学，只能帮你们逃命，但这都是徒劳的。你们会被打倒在充满苦痛的淌血的平地上，然后同麦秆一起被丢弃。”

说到这，神甫更全面地讲起了这场灾难中令人悲痛的画面。他提到了在城市上空盘旋的数不清的木棍，随意地敲打着，拿起来的时候沾满了鲜血，最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将来收获真理的种子。

讲完这么长一段话，神甫停了下来，头发披在额前，整个身体由于激动而开始摇晃，他的手紧抓着椅子。然后他接着说，这回语气更加低沉，但是，带着控诉的语调：“是的，思考的时刻到了。你们以为只要每周日来看看上帝，平日里就可以自由了。但是上帝没有那么温柔。这种间断性的汇报并不能使他贪婪的温情得到满足。他想更长时间地看到你们，这就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就是爱的唯一方式。他已经失去了等待你们去看他的耐心，于是他让灾难降临到你们头上，就像降临到在人类存在以来所有罪恶的城市上一样。你们现在知道什么是罪恶了，就像我们知道该隐^②和他的儿子们、大洪水发生之前的人们、索多玛和蛾摩拉^③、法老和

①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②《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

③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

约伯^①以及一切魔鬼所经历的那样。所以就像所有以前的人做的那样，从城市把你们和鼠疫用围墙封闭时开始，你们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和事。现在你们可以知道，我要说的重点到了。”

这时一阵风猛烈地吹入教堂的大殿中，蜡烛的火苗摇晃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一股浓烈的蜡的气味，咳嗽声，喷嚏声朝帕纳卢神甫袭来。他凭借着令人赞叹的敏锐观察，重又回到他的陈述中来，用沉着的声音接着说：“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我是知道的，仅仅是想知道我们在这里想做什么。不管我说过什么，我想让你们了解真理，教会你们如何获得快乐。现在正是跟你们建议的时候，伸出友爱的手是你们达到善的方式。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获救的道路就是一杆红色的长矛将你们指明，领你们前进。弟兄们，正是现在神的仁慈将最终显现出来，它统领着一切事物的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和拯救。甚至这场降临到你们头上的灾难，它也将扶持你们，为你们指明前进的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②的教友们认为鼠疫是出自神的意旨，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没有感染的人为了死去还用鼠疫病人睡过的被单将自己裹起来。但这种疯狂的获得解救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它带着一种令人遗憾的仓促，近乎傲慢。所以不要试图超越上帝，一切想要加快永恒的秩序的行为，一旦被大家采用，都将引向异端。但我刚才说的例子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个教训。凭借我们敏锐的思想，通向永恒的美妙的微光隐藏在一切痛苦的劲头。这束微光照亮了通向解救的黄昏的道路。它完整地揭示了神的意旨，化恶为善。今天，我们经历了死亡，烦恼和喧嚣，最终它将导引我们走向真正的寂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我的弟兄们，这些正是我希望带给你们，可以安慰你们心灵的东西。因为你们今天从这带回去的不仅仅是我对你们的责备，还有更多的是能够抚平伤口的圣言。”

大家觉得帕纳卢神甫已经讲完了。外面的雨也已经停了。阳光与雨水交融的天空中一道淡淡的阳光倾泻到广场上。街道上响起了嘈杂的人声，汽车开动的声音和在这座城市里苏醒过来的一切声响。听众小心翼翼地收拾起他们的东西，努力不

①《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②即埃塞俄比亚。

发出一点声响。这时神甫又接着说在揭示了鼠疫的神性的来源和灾难的惩罚的性质后，他要结束今天的讲话，他并不想用一些漂亮的词句作为自己的讲话的结论，面对这样一场悲剧，这将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把一切问题都给大家讲清楚了。他只想提醒人们，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的！恰恰相反，神甫从来也没比今天更加强烈的体会到，他给所有人带去的来自神的救助和作为基督徒的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不管这些天出现的可怕事物和垂死的人发出的叫喊，这个城市的人都将对着苍天发出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的心声，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其他的事，就让上帝来做安排。

12

这次布道是不是在市民身上起了作用，这很难说。奥登先生，那个预审法官，却向里厄宣告他坚信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无可辩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明确的观点。布道也只是使一些至今仍模糊不清的想法变得更加明了：因为某种未知的罪过，他们受到了神的审判，接受不可思议的囚禁的惩罚。当一些人继续呆在他们的小天地中，逐渐适应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时，另一部分人，恰恰相反，他们一直以来，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这座监狱。

人们首先接受的是与外面断绝往来的状态，正如他们同样接受那些只打扰到居民中的一部分人的，他们认为只是暂时存在的烦恼。但他们又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他们的关押，这个夏天下起冰雹的天空就是囚室的盖子，这时，他们模糊地感觉到，这种监禁威胁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夜晚降临时，他们从凉爽的空气中恢复的精力，有时会让它们作出绝望的举动。

首先，不知是不是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从这周日开始，城里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相当深刻的恐慌心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市民们真的开始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境况了。这样一来，城中的气氛也改变了许多。但是，这种改变到底发生在周围环境中还是人们的内心中，这才是问题所在。

在这次布道不久之后的一天，里厄向格朗谈论这件事情，并一起朝着郊区走去。在黑夜中，里厄突然撞见一个男人，在他们面前身体左右摇晃，但又没有走近

的意思。正在这时，城里的路灯一下子发出了亮光，因为这几天城里的开灯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立在行人背后的高大的路灯突然照到这个男人身上，他正笑着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眼睛闭着。两人这时看清楚了，对面是一张由于突然挤出无声的笑而绷紧了泛白的脸，大滴的汗水从那张脸上渗出来。他们马上走开了。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刚用手把他拖出来的时候，感到这个公务员紧张得有点发抖。

里厄说：“不久之后，我们的围墙之内就都是疯子了。”

在疲劳的作用下，里厄感到喉咙里一阵干燥。

“去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一家小咖啡厅，里面只亮着柜台上的一盏灯，客人们不知为什么，都动作笨拙，脸色泛红，在低声细语。令医生感到吃惊的是，格朗叫了一杯烈酒，一口气喝完还以此吹嘘自己酒量甚好。然后他就想离开了。来到外面，里厄好像感到这个夜晚到处都是呻吟声。在黑暗的天空中的一角，路灯的上空，一阵隐隐约约的呼啸声让他想到，那个看不见的瘟神正不知疲倦地穿梭在炎热的空气中。

“幸亏，幸亏”格朗说。

里厄琢磨着他想说什么。

对方说：“幸亏，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里厄说：“确实，这倒有些好处。”

从这阵呼啸声中回过神来，里厄问格朗他对目前的工作是否感到满意。

“好吧，我想我的方向是对的。”

“您还要在这上面花很长时间么？”

格朗变得激动起来，酒精的热量传到了他的声音上。

“我也不知道。但是医生，问题不出在这，这并不是重点，不是。”

在一片黑暗中，里厄猜想他在摇晃手臂。他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准备一口气把它讲出来。

“医生，您瞧，我希望的是，有那么一天我的手稿到了出版社编辑的手里，而他在读完之后就会站起来对他的同事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句突然讲出的宣告吓了里厄一跳。他似乎看到他面前的这位同伴真的做了一个脱帽的手势：先把手举到头上，再拿下来放平。高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重又响起，这次更加有力了。

格朗说：“是的，这样就完美了。”

尽管里厄自己不知道文学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但他感觉这也不会像格朗说的这么简单，再说了，要是编辑都在办公室里的话，他们也不应该是戴着帽子的。但事实上，凡事都不准，所以里厄宁愿闭口不说。他也无心听格朗说话，却竖起耳朵听着瘟神发出的神秘的呼啸声。两人走到了格朗所住的街区，因为这边的地势有点变高了，一阵微风吹过，使他们感到神清气爽，同时也赶走了城市里所有的噪音。这时格朗还在一个劲地说着，而里厄几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只明白到一点就是这部还不清楚的作品已经写了很多页，但是它的作者呢，还在为怎么使它变得更加完美而痛苦不堪。“我是整夜、整星期地思考一个单词……有时候甚至只是个简单的连词。”这时，格朗停了下来，原来是他的大衣纽扣勾住了医生。那些字词磕磕碰碰地从他那张漏风的嘴里跑出来。

“医生，您得理解，严格说来，在‘但是’和‘并且’之间选择一个还算容易，但要在‘并且’和‘然后’之间做选择就难了。‘然后’和‘随后’就更难了。不过，最难的莫过于要确定是应该加一个‘并且’呢，还是不应该加。”

里厄应道：“是，是，我能理解。”

里厄说着就又上路了。另外一个这时显得有点尴尬，马上跟上去。

他含糊不清地说：“请原谅，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里厄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他很想帮他，他对他的故事很感兴趣。格朗这才恢复了平静，来到了他家的门前，犹豫了一会，他提议给医生展示一下他的手稿。里厄同意了。

来到饭厅，格朗邀请医生坐在一张桌子前。这张桌子上放满了稿子，上面是涂改过的密密麻麻的笔迹。

“是的，这些就是。”格朗告诉正用目光打量着他的里厄，“您需要喝点什么吗？我这还有点酒。”

里厄说不用。他盯着一页页稿纸看起来。

“先不要看，”格朗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句子。它真让我头疼，很头疼。”

格朗自己也盯着这些稿子，他的手好像被放在那盏没有灯罩的电灯下的稿纸当中的某一张强烈地吸引住了。那页纸在他的手中摇晃。里厄注意到公务员的额头上微微渗出了汗水。

“坐下吧，”里厄说，“给我读一下吧。”

另一个人看着他，露出了一种感激的笑容。

“行，”他说，“我想我非常乐意。”

他停顿了一会，一直盯着那张纸，然后坐下了。里厄同时听到城里传来一阵模糊的轰隆隆的响声，好像回应着瘟神发出的呼啸声。就是在这刻，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声音念到：“五月份里的一个美好的清晨，一位优雅的女骑士骑着一匹富丽的栗色马，跑过布洛涅树林里一条花开的小径。”格朗念完这一句，两个人都没发言，这时他们听到了这座苦难的城市发出的模糊地嘈杂声。格朗放下那张纸，继续凝视着它。片刻之后，他抬起头。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回答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但是对方却兴奋地说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他用整个手掌拍打在稿纸上。

“这里只说了个大概。如果我能将我幻想中的画面完美地呈现出来，如果我让我的句子带上了一种和马儿小跑一样的节拍——一、二、三，一、二、三，那么其余部分就简单多了，尤其是要有这样的想象力，这样他们一读到开头，就会说：‘脱帽致敬！’”

但要做到这一点，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绝不会同意就这样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也令他满意，但他又考虑到它仍没有完全达到他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倒像一种陈腔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窗户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站了起来。

“您就等着看我的成果吧。”格朗说着，转向窗户的方向，他补充了一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窗外急促的脚步声又响起来。里厄已经下楼了。他来到马路上时两个人正好从他面前跑过。显然，他们是奔向城门的。一部分市民在炎热和鼠疫中失去了理智，已经打算硬闯了，想试试能不能蒙过哨兵的警卫逃到城外去。

13

还有另外一些像朗贝尔一样的人，也想逃离这个新生的恐慌的环境，而且他们更加顽固和更讲究技巧，但也并不见他们更得手。朗贝尔先是不断寻求官方途径。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也要求他善于找办法。他先后拜访了一大批据说是能力非凡的官员和大人物。但是因为这是特殊情况，这些人的能力毫无用处。大多数时候，这些人在所有有关银行，出口，柑橘，还有酒生意等方面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在诉讼和保险问题上有毋庸置疑的知识，还不说他们拿着一些过硬的文凭，他们显然也乐于助人。而且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正是乐于助人。但关于鼠疫，他们的知识几乎为零。

然而在这些人的面前，只要一有机会，朗贝尔就要为自己申诉。他陈述完一套理由，最后总要说自己在城里只是个异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情况下，记者申诉的对象也往往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通常又会说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样特殊。对此朗贝尔的回答是，这并不影响他已经说明的理由。但他们回应他说，这会在行政上带来一些困难，所以他们不愿给予特殊照顾，怕的是人们会带着厌恶的表情说：算是开了个先例。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建议的分类方法，这些爱狡辩的人都可以归到形式主义者这一类。他们当中，还能找到几个能说会道的人，他们向质询他的人保证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并且在别人让他做决断时会毫不吝啬的提供建议，他们安慰朗贝尔的话是——这只

是一时的烦恼。其中有些有权利的人，会叫拜访者写下他们的大概情况，并且答应将就这种情况的裁定结果通知他们；那些无聊的人向他推荐合适的住所或者经济的膳宿公寓的地址；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一张表，然后分类归档了事；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则挥挥手臂；嫌麻烦的人就索性背过脸去，更多得多的是一些老办事员，他们叫朗贝尔找另一个办事处或者先完成一个新的手续。

到处的走访使得记者筋疲力尽。他现在对市政府和省府算是了如指掌了——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椅上坐等，面对着一一些邀请认购免税国债券和招募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布告，又由于经常出入政府机关，里面有哪几张面孔，哪几份文件夹，哪几个装档案袋的柜子，他不用看就知道。正如朗贝尔带着一丝苦味对里厄说的那样，这么一弄，他对真实情况倒一无所知了。他也确实忙得忘记了鼠疫的发展。不考虑飞逝的日子和整个城市现在所处的情势，我们明白，只要还没有死，每个逝去的日子都会把每个人向他接受考验的终点推进。里厄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但它同时还说明了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

某段时间，朗贝尔又有了希望。他收到来自省府的，要求他详细填写空白处的信息表。表格涉及到了他本人的身份，家庭、收入、先后任职等情况以及他的所谓的履历。他觉得这是一份调查，目的在于统计需要被遣送回原籍的可能人员。他还得知，一家机构收集了一些杂乱的信息，这更证实了他的想法。但是通过几个必要的程序，他终于找到那家寄送表格的服务机构，里面的人告诉他，收集这些信息是为了“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防什么？”朗贝尔询问到。

他们跟他解释，这是为他万一得了疫病死去的情况做准备的，这样他们就能够，一方面通知他的家人，另一方面决定是否应由市政府承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的家属来付清账单。明显地，这证明了他们和等待他们的亲人还没有完全被隔离开来，社会还在关心着他们。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可以藉以安慰的好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朗贝尔也注意到了这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刻，一家机构才能够继续开展它的服务工作，然后在另一个时间重新开张。他们这么做也往往不是受到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指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

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熬的。这是一段麻木期。他已经走访了所有的机关，办了所有的手续，这个方向的出口现在都被堵住了。于是，他开始在一家家的咖啡馆之间游荡。早上他坐到咖啡座上，面前摆上一杯温啤酒，翻开一份报纸，期望在上面找到一些能说明疫病快要结束的迹象。他注视着街道上行人的脸，又因为厌恶他们忧愁的神情而转过身来。在读过了一百次对面商店的招牌和已经弃用的大型鸡尾酒会的宣传海报之后，他起身离开，盲目地走在城市土黄色的街道上。从人行道走到咖啡厅，又从咖啡馆走到餐馆，这样他就熬到了晚上。里厄看到了他时，恰巧是一天的傍晚时分，记者正站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那，犹豫着是否进去。他好像下定决心了，走进去坐到了房间的尽头。这个时间的咖啡馆还没有开上灯，因为上面通知，要求尽量推迟提供照明的时间。暮色如一股灰色的水流侵入房间，玫瑰色的挂着夕阳的天空倒映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微微地闪着反光。在没有其他客人的大厅中，朗贝尔好像一个失去了肉体的幽灵。里厄想，现在正是朗贝尔感到被遗弃的时刻。不过，这也是这个城市里所有的被囚禁的人感到被遗弃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救。于是里厄转身离开了。

朗贝尔有时候还会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时间。站台是禁止进入的，但候车大厅仍然开放，可以从外面进入。天气热时，因为车站里面又阴又凉，乞丐们都跑到这来。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来的列车时刻表，严禁吐痰的告示牌和车站警务室的规章条例。然后他坐到一个角落里。大厅很暗，在以前浇水留下来的八字形的水印中间，几个月来废弃不用的锅炉冷冰冰的。墙上是一些推荐到邦多尔或戛纳度过一个美好自由的假期的宣传画。朗贝尔从画上体会到了让处于绝境中的人们感到可怕的自由。那时他看到的最难忍受的画面——至少他是这么对里厄说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鸽子，北火车站，先贤祠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还有另一些他过去不知道自己如此欣赏的去处。朗贝尔脑海里回忆着这些画面，使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里厄觉得这不过是因为那些画面使他联想到了他的爱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里厄他喜欢在早晨四点醒来，然后开始思念他自己的城市，医生不难从他本

人的经验理解他那时是在思念他留在外面的女人。因为这是个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时刻。早晨四点，人们通常什么也不做，都在熟睡，即使度过了一个背叛了爱情的夜晚。是的，这个时候人们还在睡觉，这个时候的思念是使人安心的，因为一颗不安的心渴望着永远占有他所爱的人，而在他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幻想着他的爱人会永远沉浸在无梦的酣睡中，直到他们重逢的那一天才醒过来。

布道之后不久，时间已至六月末。炎热向城市袭来。那场姗姗来迟的大雨见证了周日的布道大会，第二天，酷暑一下子出现在整个天空和屋顶上。先是热风吹了一天，把墙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光和热形成的阵阵波浪吞没了整座城市。除了公寓和拱廊马路之外，城市里没有哪个地方不受到刺目的烈日的炙烤。太阳到处追着人们的脚步，人只要一停下来，它就用阳光炙烤他们。与这股刚开始的炎热同时出现的，还有死亡人数的急剧攀升，每周达到了近七百人之多，一种沮丧的情绪笼罩了全城。郊区平坦的马路和层层密布的房屋之间，喧嚣逐渐平息，在这个街区里，人们往常都习惯在门口活动，而现在这里的房屋门窗紧闭，不知人们这样做是为了防范鼠疫还是躲避烈日。然而有几间房屋里传出呻吟声，先前要是碰到这种情况，有些好奇的人会站到马路上来听。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警告的信号之后，每个人似乎都变得铁石心肠了，行人继续赶路，邻居则继续生活在哀怨的旁边，好像这些声音就是人类的自然语言。

城门附近经常发生冲突，宪兵不得不动用武力，这在城里引发了不为人知的骚动。事件中肯定有人受伤，城里还流传有人死亡，反正在炎热和恐怖的影响下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的情绪的确在不断积压，当局已经做出最坏的打算，严密地计划了需要采取的措施，以防出现民众受灾难的驱使发生动乱的情况。报纸公布法令，重申出城的禁令，并威胁说违反的人将受到牢狱之苦。巡逻队绕着

全城活动。往往是在寂静无人和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街道上，先听到一阵踏在石铺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人们看到骑马的卫兵从一排排紧闭的窗户前经过向前行进。巡逻队走远了，沉重得令人生疑的寂静重新落到这个危险重重的城市。远处，特殊行动队那传出“砰砰”的枪声，他们接受了一个最近的命令，负责枪杀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些干裂的枪声越发增加了这个城市里的危险气氛。

天气的炎热加上环境的寂静，对于已是惊弓之鸟的市民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更有意义了。天空的色彩和泥土的气息预示着季节的变换，这还是第一次被所有人感受到。每个人尽管恐惧，但心里明白炎热将助长疫病的蔓延，而现在，夏天来临了。傍晚时分，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叫声显得更加清越。六月的暮色延伸了城市的地平线，雨燕的叫声已与这样的景色不太协调。集市上运来的花也不再是含苞待放的样子，它们都已经盛开，早市过后，花瓣散落在满是尘土的人行道上。人们明显地看到了春意的阑珊。曾几何时，春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的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所有市民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弥漫着尘土，因烦闷而变得暗淡的街道，和城里以每天百人的速度增加的死亡人数一样意味着危险。烈日当头，正是睡觉和度假的好时光，但它已不能像从前那样引诱人们去享受海水或恣情纵欲。相反，在这样一种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带给人只能是无尽的空虚之感。过去的美好时光已消失殆尽。瘟神的烈日抹杀了一切色彩，赶走了往日的欢愉。

这正是疫病带来的一大改变。通常，我们的市民总是以快乐的姿态迎接夏天的到来。城市向大海敞开大门，把它的青春挥霍在海滩上。然而这个夏天，近海被划为禁区，身体再也不能享受肉体的欢愉。此时能做什么？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做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记录的是鼠疫总的发展情况，仅仅注意到疫病出现了一个新的拐点：电台不再每周播报一星期内几百的死亡人数，而是换成了每天播报每日的死亡人数，从九十二人到一百零七人，再到一百二十人。“报纸和政府对于有关鼠疫的消息越来越谨慎了。他们想的是尽量减轻事情的严重程度，因为一百三十要比一个大数字如九百一十看起来似乎轻松得多。”塔鲁也提到了一些疫病中值得同情或者耸人听闻的场景。比如，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街区，有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了

一扇紧闭的窗户，就在他的头顶上，发出了两声大叫，然后又把百叶窗重新合上，躲进昏暗的房间。另外他还注意到，药店里的薄荷糖已经脱销了，原来是因为很多人把糖买来含在嘴里，以为这样可以预防疫病的感染。

他还在继续观察他所感兴趣的人。其中我们了解到那个向猫吐口水的小老头也生活在悲剧之中。一天早上，那些火把又在啪啪作响——塔鲁这样写道——射出的铅弹，像吐唾沫一样打死了路上的大部分的猫，惊跑了其他几只。当天小老头按照往常的那个时间，从家里出来到了阳台上，带着几分惊奇，他探出身子，打量了一下路的两头，见没有猫出现，只好无奈的等着。他的手轻轻地敲着阳台的栏杆。他又边等边撕了会小纸屑，然后就走回去，接着又重新走出来，在那又呆了一会后，突然消失在屋里，气冲冲地背身甩上他家的门窗。接下来的一天，同样的情景又再次上演，但是我们能从他的行为读出小老头越来越明显的忧郁和不安。一个星期之后，塔鲁再也没有等到他每日的出现，他家的窗户也紧闭着，我们足可以理解他此时的忧愁了。“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吐口水”，塔鲁在日记本里这样总结道。

另一方面，每天傍晚塔鲁回酒店的时候，他必定会在大堂里碰到那个沉着脸，来回踱步的守夜人。这个人不断地跟所有进来的人说他曾今预见了现在发生的事。塔鲁承认说听他预测过什么灾难，但是他记得他当时说的是要发生地震，这个老门卫则回答塔鲁：“啊！要是场地震倒好了！地震一完，人们就不会多嘴了……点一下死了多少，还活着多少，事情就完了。但这该死的瘟疫！现在弄的连没得病的人也是提心吊胆的。”

酒店经理的压力也不小。刚开始，游客被阻止了，出不了城，封城之后他们就滞留在酒店里。但是慢慢的，疫病不见停止，很多人就选择住到了城里的亲戚朋友家。这个使酒店满员的原因，从那时开始又让酒店变得空空如也，因为不再有新的游客入城。塔鲁就是少数留下来的房客之一。经理从没放过任何一次向他强调的机会，指出要不是想照顾好他们这些最后留下的客人，他早就可以把酒店关掉了。他经常要求塔鲁估计鼠疫大概还要持续的时间。塔鲁说：“听说寒冷能阻止这类病。”经理听了就更慌了：“可是我们这从来也没真的变冷过啊。不管怎么样，看来疫病还得持续几个月。”另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游客也不会来了。这场鼠

疫会毁了这里的旅游业的。

缺席了一阵，我们又在餐厅里看到了奥登先生，那个“猫头鹰人”，但是这次他后面只跟着两只“机灵狗”。据了解，那个女人照顾过他自己得病的母亲，并且参加了她的葬礼，现在她本人正在接受检疫隔离。

“我可不赞成这种做法，”经理对塔鲁说，“隔离也好，不隔离也罢，她总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人也可能是。”

塔鲁向他指出，要这么说来，所有人就都是可疑的了。但是经理斩钉截铁，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我和您就不可疑。他们才是。”

但是奥登先生没有为此做出任何变化，这次的鼠疫对他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他仍旧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先他的孩子们一步入座，还是一直用高雅的而又带恶意的语言跟他们讲话。只是那个小男孩变了模样，和他的姐姐一样穿着黑色的衣服，身子更加缩成一团，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那个守夜人不太喜欢奥登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日记本也谈到了帕纳卢神甫的布道，但附加了如下的评论：“我能理解这种使人产生好感的热情。从灾难的开始到结束，人们总要说一些漂亮的话。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因为这种习惯还没有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这种习惯已经又回来了。只有处在不幸之中时，人们才会习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保持沉默。而这就是等待的状态。”

最后塔鲁记录了他和里厄之间的一次长时间的对话。他仅仅说这次对话谈得很投机，还说起了里厄母亲清澈的棕色眼睛。他还奇怪地断言，包含善意的眼神总比鼠疫要有力量得多。最后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了里厄照顾的老哮喘病人。

在他们的那次见面之后，他和医生一起去看过他。那个老头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靠着枕头躺在床上，两锅鹰嘴豆摆在他的面前。他看到塔鲁时说，“啊！又来一个。这是个颠倒的世界啊，医生比病人还多。人死的太快了吧，

嗯？神甫说得对，这是罪有应得啊。”第二天，塔鲁没有通知就又来了。

据塔鲁的记事本里记录，老哮喘病人说多亏了他的好身板，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在五十岁的时候被批准退休。从那时起他就躺下了，再也没有起来过，尽管他的哮喘在他站着的时候倒好些。一份微薄的年金能让他快快乐乐地活到七十五岁。他的视力已经不允许他看表了，他家里也确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弄一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只是估计时间，首先是吃饭的时间，这也是唯一关系到他的。工具就是那两口锅，其中一口在他醒来的时候就装满了鹰嘴豆。他一颗豆一颗豆地把另一口锅装满，动作专心且速度均匀。他就这样通过一口锅找到了他一天的时间安排。他说“装满十五锅，就得吃饭。这很简单。”另外，据他妻子所说，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显示了一些他将来命运的征兆。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产生过兴趣，包括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和散步。他从没有走出过这座城市，除了有一次因为家族事务不得不回去阿尔及尔，但火车出发后他在离奥兰最近的那个车站就下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走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这种禁闭的生活显露出吃惊的表情，他给出的大概解释是，在宗教上，一个人生命的前一半是上坡路，另一半则是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他的日子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带走，而他自己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再说，因为他后来告诉塔鲁，上帝肯定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的话，神甫就没有用了。接着又经过一会的沉思，塔鲁理解了这种哲学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有紧密联系。但是最后完整地勾勒出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是一个深埋在他心底的愿望，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提起这个愿望：他希望自己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一位圣人么？”塔鲁自问道。他的回答是：“是的，如果圣德是全部习惯的综合。”

但同时，塔鲁又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在这个鼠疫肆虐的城市里的一天，这样使我们对这个夏天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然后他开始了他的描述：“清晨，微风拂过无人的城市。这个时候正处在鼠疫带来死亡的夜晚和病人垂死的白天之

间，鼠疫好像暂停歇息，喘了一口气。所有的商店的门都关着，但其中有几家店挂出了“因鼠疫暂停营业”的告示牌，这说明它们一会儿不会同其他店一起开门。昏昏欲睡的卖报纸的小贩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的消息，但是他们背靠着街角，梦游似的把他们的货物摆在路灯下。再过一会儿，他们会被第一班电车吵醒，然后扬起的手臂举着报纸，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会有鼠疫横行的秋天么？……教授乙的回答，不会，”“鼠疫第九十四天疫情报告，死亡病例一百二十四人。”

尽管纸张供应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几家期刊被迫减少了他们的版面，但还是创办了一份新的报刊：《疫病通讯》，它的任务在于“在保证严格的客观性的前提下，向市民报导疫病的发展或减退；向市民提供对于疫病未来情况的最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为一切决心与鼠疫作斗争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提供支持；鼓舞民众的斗志，转发政府的命令，总之团结全部有良好意愿的人向袭击我们的病害发起有效的斗争。”事实上这份报纸很快变成了专用于刊登那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所有的报纸开始出售给早在开门前一小时就驻扎在商店门口的一排排的长队，然后电车到了，从里面跳出郊区来的工人。电车现在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它们艰难前行，它们的踏板和扶手因为过于受重几乎要断裂开来。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这么挤，但所有乘客都尽可能背过身来为了躲避可能的感染。一停车，一车厢的男人和女人就从电车里涌出来，他们急匆匆地走远，各自独处。乘客之间经常仅仅因为一点点不快便发生争吵，这已成了一种慢性病。

第一辆电车过后，城市才慢慢醒来，首先是一些啤酒店开门了，在柜台上摆着告示牌：“咖啡加量”，“提供薄荷糖”，等等……然后商店也开张了，街道也热闹起来。同时，光线亮起来，热气一点点地给七月的天空上了一层青灰色。这也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来大街上碰运气的时间。大多数人好像是想通过炫耀他们的富有来完成驱赶鼠疫的任务。每天临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城市的主干道成了年轻男女的天堂，那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巨大的不幸之中滋长起来的对待生活的激情。如果鼠疫平息，道德也变得开放了。那时我们又会再次看到米兰人在坟墓边的纵情狂欢。

“中午，餐厅一眨眼的功夫就都坐满了。很快，一些没抢到座位的一小撮人就直接在门口围成一圈。由于酷热，天空开始失去了颜色。太阳几乎把马路晒裂开来，在大遮阳伞下的阴影里，人们排队等候着分发的食物。餐馆里人满为患，这是因为它大大地减少了人们获得食物供应的麻烦。但是他们也带来可能受到感染的担忧。客人往往要花好几分钟时间来擦拭他们的餐具。没过多久，一些餐馆就挂出了这样的招牌：“本店餐具一律用沸水消毒。”但是，渐渐地，他们又放弃了所有这类的广告，因为客人不得不来。况且客人也不在乎花费大小。点最高级红酒喝或者可以设想到的类似东西，吃最贵的配菜，人们开始无节制地消费。一家餐馆甚至出现了慌乱失控的场面，那是因为有一个身体感到不适的客人，脸色发白，起身踉跄地冲出了门口。

“到了下午两点，城市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寂静，尘土，阳光和鼠疫在街道上会集的时间。沿着一排排灰色的大房子的整条大街，热浪不断地涌来。这是一段漫长的囚禁时间，直到火热的夜晚压上这座喧闹的城市才告结束。天气刚变热的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夜里就四下无人。但是现在，第一阵凉意带来了放松之感，尽管不是希望之感。所有人都来到了街道上，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一对一对情侣走到喧嚣的城市里，投入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每晚在林阴道上都会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万能的上帝，拯救他吧”，其他人却恰恰相反，都热衷于某样他们不熟悉的或者他们认为比上帝还要紧要的东西。刚开始，当他们认为这场疫病只是一种普通的病时，宗教在人们心里还占据着它的位置。但是，当他们认识到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时，他们想到的就只是寻欢作乐了。白天在脸上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烦闷这时都消解在浓烈的暮色和飞扬的尘土之中，现在变成了一种惊恐中的生出的兴奋之感和愚蠢的自由之感，使所有人头脑发热起来。

“并且我也是，我同他们一样。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什么。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做的理由。”

15

在笔记本里谈到的那次见面，是塔鲁向里厄提出的。那天傍晚里厄还在等待他的到来。医生仔细地着他的母亲，她正平静地坐在饭厅的一角的椅子上。当她忙完所有的家务活后，就在那里渡过她的一天。她把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确定母亲是不是在等他。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母亲的脸上显露了某种变化。一切由于艰难的生活而变得沉闷的事物这时仿佛变得生动起来。然后，她又恢复到沉默的状态。那天傍晚，她靠着窗，注视着当时已经空无一人的街道。城市里夜间照明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时，远处一盏微弱的灯在黑暗的城市里投射出几束光线。

“鼠疫期间城市的照明还要减少么？”里厄夫人说。

“大概是。”

“希望不要持续到冬天。那就愁死人了。”

“是的。”里厄说。

他看到母亲的目光落在自己的额头上。他明白，由于最近几天的担忧和过度劳累，他的脸上消瘦了许多。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夫人问。

“哦！和平时一样。”

和平时一样！这就是说从巴黎运过来的新的血清，看来比第一批效果还差，并且死亡病例仍在增加。血清数量也足够感染病人的家属接种使用，其他人一直得不

到有效的预防。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才行。大多数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好像进入了硬化期，都没有溃破的迹象，病人受着它们的折磨。从前天开始，城里出现了两种新的疫病变种。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同一天，在一次集体会议中，坐在不知所措的省长面前的是一帮筋疲力尽的医生，他们要求和询问新的防疫措施，避免肺鼠疫出现口对口的传染。和平时一样，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看着他的母亲。从她栗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美好的眼神使他回想起自己多年以来所感受到的温情。

“您害怕么，母亲？”

“我这把年纪，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白天这么长，我又一直不在你的身边。”

“只要我知道你会回来，我等着你也是一样的。你出去时，我会想着你在做什么。有你妻子的消息么？”

“是的，她上次发来的电报说她一切都好。可我明白她这么说也是为了让我不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对他母亲笑了笑，然后过去开门。在阴暗的楼梯口，塔鲁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只穿着衣服的灰熊。里厄让这位访客坐在办公桌前。他自己则站在他的扶手椅后面。他们之间只隔着一盏放在办公桌上的台灯，这是房间里唯一的光亮。

“我觉得，”塔鲁没开场白，“我可以直接跟您讲。”

里厄没说话，表示默许。

“在今后的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内，您在这里根本无能为力，因为事件的发展会使您无法应付。”

“的确。”里厄说。

“卫生组织组织得不好。你们缺的是人手和时间。”

里厄再次承认这些都是事实。

“我得到消息说省里正在筹划一个群众服务组织，要求所有身体强壮的人一律参加救助工作。”

“您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可是现在大家的不满情绪已经很强烈了，省长还在

犹豫。”

“为什么不招募志愿者呢？”

“他们已经试过了，但是结果不很理想。”

“他们做的是通过官方途径的，而且也缺乏信心。他们所缺乏的是一点想象力。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过处在灾难之中的人民。他们认为的解药可能只不过是用来治疗伤风感冒的。如果我们让他们这样搞下去，他们都会没命的，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遭殃。”

“这是可能的，”里厄说，“我想该告诉你，他们同时还想过要启用囚犯，这些人被我称作‘庞大的劳动力’。”

“我宁愿是一些普通人。”

“我也觉得。但是可否简单说一下原因？”

“因为我害怕判决死刑。”

里厄看着塔鲁说：“那么您打算？”

“我的打算是组织一支志愿救护队。要由我负责并且没有政府插足。剩下的，就容易办了。我在好几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先组成一支核心力量。当然，我肯定会参加。”

“这当然好。”里厄说，“您猜到我一定会欣然接受的。我们需要帮助，尤其是干我们这行。那我就负责说服省长，接受这个建议。再说他们也没别的选择了。但是……”

里厄犹豫着。

“但是你们要十分清楚，这项工作是有生命危险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事先警告你们。你们已经想清楚了么？”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里厄。

“关于帕纳卢神甫的布道，医生，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这种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知道，基督徒有时就是这么说的，但他们从来也不真的这么想。但他们的实际为人要

比他们给人的印象好得多。”

“那么您也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它打开世人的眼睛，迫使他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头表示反对。

“鼠疫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能使某些人“成长”。然而，看到鼠疫所带来的不幸与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他的嗓门，塔鲁就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是叫他平静一下。他笑了笑。

“好的。”里厄耸了耸肩，“可您还没有回答我呢，您是怎么考虑的？”

塔鲁在扶手椅上坐正，把他的头探到灯光中来。

“医生，您相信上帝么？”

这个问题依然问的如此自然。但是这次里厄回答得有点犹豫。

“不相信，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我处在黑夜之中，我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长久以来我已经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与帕纳卢的不同之处么？”

“我不这么认为。帕纳卢是一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以正义的名义说话。但是比如一位乡村里地位卑微的牧师，只为他教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他能听到垂死的人的呼吸，那么他就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在想到展示美好的事物之前，他会先注意到受苦的人。”

里厄这时抬起头，他的脸还在阴暗处。

“先不谈这些，”里厄说，“既然您不想回答。”

塔鲁笑着，坐在扶手椅上没有动。

“我可以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么？”

现在轮到医生笑了。

“您喜欢搞神秘啊，”他说，“问吧。”

“我的问题就是，”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上帝，那您自己为什么做出如此

大的牺牲？您的答案也许可以帮我回答。”

仍旧站在阴影里的医生说他已经回答过了，要是真的存在全能的上帝，他就不需要医治病人了，由上帝照顾他们就好了。可是世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甚至包括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在内，既然没人死心塌地地委身于上帝，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在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原来，”塔鲁说：“这就是您选择了做医生的原因？”

“差不多。”医生边说着，便走到了光亮处。

塔鲁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医生注视着他。

“是的，”他说，“您肯定认为这未免太自大了，但是请相信我，我一点也不自大。我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一切之后会发生什么。我现在面对的是需要医治的病人。然后，再让他们思考问题，我也要考虑。但是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医治他们。我尽我所能来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外，寻找着远处的海与阴暗的天空在地平线处相接的地方。他只是感到有些疲惫，同时还抵抗着一种心里突然生出的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想法——想跟对面这个古怪而又让他感到有着兄弟般情谊的人袒露更多的心里话。

“塔鲁，我完全不知道。我可以跟您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选择这份工作的時候，我考虑更多的是抽象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为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同其他人一样，这是一个年轻人都向往的职业。还有可能是因为成为一个医生对于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显得尤其困难。然后，这份工作的要求就是要面对死亡。您见过有人就是不肯死么？您曾经听到过一个临死的女人喊着：‘我不要死’么？这些我都经历过。那时我也意识到我习惯不了这些事。我那时还很年轻，我甚至厌恶这种自然规律。从那时起，我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理由只不过是我一直都没有习惯去面对死亡。其他我就一无所知了。但是毕竟……”

里厄停顿了一下，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觉得口干舌燥。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道。

“毕竟，”医生注视着塔鲁，有些犹豫地接着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能理解

这样的感受，不是么？既然自然规律规定人总是要死的，那么上帝也许宁愿人们不要去相信他，宁可让我们自己尽力来和死亡作斗争，而不必抬头看着听不到上帝声音的苍天。”

“对，”塔鲁表示同意，“我能理解。但是说到底，您的胜利总是暂时的。”

里厄看上去有些失落。

“我知道这总是暂时的。但这不是停止战斗的借口。”

“不，这不算是借口。不过，我在想，这次的鼠疫对您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里厄说，“这是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凝视了医生一会，然后起身向门口走去。里厄也跟了上去。他走近塔鲁时，塔鲁好像注视着他的脚，一面对他说：“医生，是谁教会了您这些？”

医生立刻做出了回答：“是贫困。”

里厄打开书房的门，来到走廊上时，他对塔鲁说他也要去，他要去看一位住在郊区的病人。塔鲁提议说可以陪他一起去，医生同意了。在走廊的尽头，他们碰见了里厄的母亲，里厄向母亲介绍了塔鲁。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

“哦，”里厄的母亲说，“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里厄试着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是灯不亮，楼道里还是一片漆黑。医生寻思这是不是又出了一项新的限电措施，但具体也没人知道。一段时间以来，各家各户和整个城市的一切都乱了套。这可能只是看门人们或一般市民对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再去细想，因为这时塔鲁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医生，我还有一句话，即使在您看来会有点可笑。我觉得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自嘲般地耸了耸肩。

“我对此真的一无所知。但是，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哦，我啊，”对方不慌不忙地说，“我没什么好说的。”

医生突然停了下来，塔鲁的脚踩到他脚后跟，一个趔趄。塔鲁赶上去，手搭在里厄的肩上。

“您认为生活的一切您都弄懂了么？”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仍是那个平静的声音。

“是的。”

当他们来到外面的街道上时，才知道天色已经很晚了，大概有十一点了。城市显得很安静，只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远处传来一阵救护车的鸣叫声。他们坐上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里厄说：“明天您要来医院打预防疫苗。最后一句话，在您介入这件事之前，您要清楚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估计没什么意义，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夺走了波斯的一座城里的所有居民，但最后的幸存者，只有一个，恰恰就是那个从没有停止工作的洗死尸的人。”

“这只能说明，他得到了那三分之一的机会。”里厄用一种更加低沉的语气说，“但一切关于这个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他们现在进了郊区。他们的说话声回响在空荡荡的马路上。他们停了下来。站在车前，里厄问塔鲁愿不愿意一起进去，对方表示同意。天空中的一道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颊。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

“您就说说吧，塔鲁，是什么促使您想干这件事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的道德吧。”

“什么道德？”

“一种领悟。”

塔鲁转身朝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那个老哮喘病人的屋子为止，里厄再也没有看塔鲁的脸。

16

第二天一早，塔鲁就开始了组织工作，他召集了头一批人，后来又有很多其他人加入进来。

叙述者并不希望在这里强调这次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如果作为一个叙述者，许多市民今天也确实倾向于夸大他们在这次鼠疫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叙述者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当人们过分夸大高尚的行为的意义时，最后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意和冷漠才是在人类行为中最常出现的动机。这是叙述者所不能同意的。世上的罪恶几乎总是由人类的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良好意愿和恶意一样会造成同样多的伤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问题所在。人们的无知程度有高低差别，这就是区分了所谓的美德和邪恶，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愚昧无知，自以为什么都知道，而认为有权杀人。杀人犯的灵魂是盲目的，他没有任何远见，也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爱。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由塔鲁组织起来的这支卫生防疫队做出客观的评价。这也是为什么叙述者没有对这种意愿和英雄主义做过多的宣扬，而只是给予它们适当的重视。然而，叙述者仍然要继续担负起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记录下当时鼠疫对所有市民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和压迫。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也称不上伟大，事实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当

时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事，也不可能不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次卫生防疫组织的成立促使我们的市民进一步接近鼠疫，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认识到，既然疫病已经发生，那就应该做必要的斗争。由于抗击鼠疫成为了某些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显现出来了，就是说，它是大家的事。

这是件好事。但是一个小学教师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他教授了二加二等于四，我们称赞的可能是他选择了这份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人选择了去证明二加二等于四是正确的，而不是相反，这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我们也要说，就这种良好的意愿来说，他们和教师是一样的，和所有和教师具有一样善良心灵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至少叙述者坚信这一点。另外他还意识到了别人会对他提出的反对，说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但是要知道历史上总有一段时间里，那些说出了二加二等于四的人会被处死。教师很清楚这一点。所以问题并不是要去弄清楚等待着他的这种证明的是奖赏还是惩罚。真正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二加二是不是等于四。对于当时市民中冒着生命危险的那批人来说，他们需要确定的是：他们是不是已被卷入鼠疫，以及该不该同鼠疫作斗争。

当时城里也有很多新伦理学家出面说一切都无济于事，只能投降。而塔鲁，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给出的答案可能会不太一致，但他们的结论总是他们都已经知道的：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展开斗争，而不是屈服。一切问题都集中在阻止更多的人死去，以及清楚地认识到隔离的必然性上面。这是现在唯一能控制鼠疫的方法。这个事实并不使他人喜欢，但是它却是最最重要的。

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老卡斯特尔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利用应急设备制作血清的工作中去。里厄和他都希望通过培养感染这座城市的病菌研制出一种血清，它能够比外面运来的血清更加有效，因为这种病菌与传统定义的鼠疫杆菌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卡斯特尔期望尽快制作出他的第一批血清。

这也自然而然地解释了为什么格朗，这样一个并非英雄人物的人，如今答应做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塔鲁组织的队伍中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已经投入了工作，在那些人满为患的街区里帮助实施防疫措施：向人们介绍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提醒人们注意做好平常未涉及的谷仓和地窖的消毒工作。另一部分人则陪同医生到病人家

中出诊，保证鼠疫患者的顺利转移，然后接下来在缺少专业人员的情况下，驾驶装有病人或死者的汽车。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统计和记录，而这正是格朗愿意干的。

从这点看来，叙述者认为格朗比里厄和塔鲁都更具有代表性，他默默无闻的工作的美德，推动了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出于他自身的良好意愿，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份工作。他提出的仅有的要求是在适当的时候回家完成他的工作。他年纪太大了以至于无法胜任剩下的工作。从十八点到二十点，他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当里厄热情地感谢他时，他表现得很惊奇：“这并不是最困难的。鼠疫来了当然要保护自己。这是显而易见的。啊！要是所有事情都这么简单就好了。”接着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他的句子上去了。有时候，傍晚完成了登记卡片的工作之后，里厄会和格朗聊聊天。不久塔鲁也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来了。格朗也越来越乐意跟他的两个同伴吐露心声了。他们两个人也对格朗在鼠疫之中坚持着的耐心的工作很感兴趣。最终，他们也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放松的方式。

“那位女骑士怎么样？”塔鲁经常会问。而格朗的回答始终是：“她骑着马跑，她骑着马跑。”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一天傍晚，格朗说他已经完全放弃把“优雅”这个形容词用在他的女骑士身上了，不久他又把她形容成“苗条的”。“这更加确切。”他补充说。另外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朗读了修改过的他小说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五月一个美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骑上了一匹富丽的枣骝马，奔跑在波罗涅树林里的一条花开的小径上。”

“不是么？”格朗说，“这看起来好多了，我再重复一遍，‘五月的清晨’，因为‘五月份’三个字比马跑步的节奏要长一点。”

接着他又对“富丽”这个形容词忧心忡忡。按他的说法，这个词没有讲到重点上，他寻找的词要能一下子把他想象中的那匹豪华的马形象地表现出来。“肥壮”也不行，这样写是比较具体，但是这又带有一点贬义。“油光发亮”，他也考虑过一会，但是这个词音韵不太和谐。一天傍晚，他得意洋洋地宣布他已经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马。”黑色暗示了优雅和高贵，他总是这么说。

“这行不通。”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不是马的种类的名称，而是指马的颜色。”

“什么颜色？”

“嗯……总之是一种不是黑色的颜色。”

格朗显得无言以对。

“非常感谢。”他说，“幸亏您提醒了我这点。但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有多难。”

“您觉得‘华丽’怎么样？”塔鲁说。格朗转过来盯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对，对。”他说道。

他的脸上也渐渐露出了笑容。

又有一段时间，他承认“花开”这个词让他很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别的地方都没见过，所以他有时候会问他的朋友们，一条树林里的小径花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确切地说，里厄和塔鲁还真没注意过这些小径上有什么花，但公务员的坚信不疑的态度让他们有些动摇。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吃惊。“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有一次医生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开的”换成了“开满了鲜花的”。他摩挲着手掌。“终于，我们看到了，我们闻到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得意洋洋地读着这个句子：“五月一个美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骑上了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奔跑在波罗涅树林里的开满了鲜花的小径上。”但是在他高声朗读的时候，句末连续的三个助词——两个“的”和一个“了”，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结结巴巴地才念完，坐了下来，神情沮丧。然后他跟医生告别，他需要再考虑考虑。

人们随后了解到，在这段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显得心不在焉，尤其是在市政府正面临繁重的任务，而又缺少人手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使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办公室主任严厉地批评了他，提醒他说，他拿工资就要做事，而他恰恰没有完成工作。主任说：“听说您在您的工作之外还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做义务劳动，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要管的是您在这里的工作。在现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一份力量，首先就要做好的是您的本职工作，否则，其他的工作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是的，他说的对。”医生表示同意。

“但我集中不了精神，我还不知道怎么结束我的那个句子。”

他认为“波罗涅”是可以删掉的，因为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句子就显得偏重于“鲜花”，而事实上它应该侧重于“小径”。他也考虑过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写：“开满了鲜花的树林里的小径。”但是“树林”这个词摆在一个名词和它的修饰语之间，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专横地把它们隔开。有几个晚上，他确实比里厄看起来还要疲惫。

的确，这样的推敲耗费了他的全部精力，使他疲惫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表都还要求他继续工作。每天晚上，他都耐心地在表格上打标记、划曲线，仔仔细细地将情况说明得尽可能清楚。他也经常要到医院找里厄，要求他在办公室或者诊所里帮他安排一张桌子。他把文件都摆到那，就像坐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一样工作起来，也不管空气中弥漫的浓烈的消毒水味和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他还摇晃着纸张，好让墨水快点干掉。他老实地试着不再去考虑他的女骑士，而是专心做他该做的工作。

的确，如果有人实在坚持要塑造一些被之称为英雄的榜样和典型，并且在这个故事中也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英雄的话，那么叙述者一定会推荐这位平凡而又谦逊的英雄，在他的身上只有一点善良和一个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原貌，使二加二等于四，使个人英雄主义让位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处于次要位置，而绝不是之前。这也将使这个故事具有自己的特征，和一种美好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也不是戏剧中矫揉造作的抒情。

这至少是里厄医生读到报纸上或听到收音机里来自外面的世界对这个感染瘟疫的城市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他们通过航空或者陆地运来了救援物资。同时，每个夜晚还通过电波或者报纸发出表示同情或者赞扬的评论，这些都一齐涌向这座孤城。每次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者用词高雅的讲话，医生就会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些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但是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只会是那些人们用来表达他们充满人道主义的套话。这样的言语不适合于描述例如格朗每天付出的一小点努力，它也不能说明格朗在鼠疫之中所体现的价值。

到了深夜，无人的城市一片寂静，医生才躺回床上休息片刻，有时他会旋开

收音机的按钮。从千里之外世界尽头传来陌生而又友好的声音，它们笨拙地试图表达他们患难与共的感情，而事实上，这样的声音同时也说明了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们所看不见的痛苦，他们的无能为力是可怕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地越过大海传到这边，里厄徒然地专心地听着。不一会高谈阔论开始了，而这也更加扩大了格朗和演说家这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奥兰！奥兰！哦，别再喊了，”里厄心里想着，“要么爱在一起，要么死在一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离得太远了。”

鼠疫正集中威力，准备扑向这座城市，彻底地占领它。在疫情到达最严重的时刻之前，余下还需讲述的就是像朗贝尔这样的最后几个人，他们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幸福做着努力。他们不断失望又不断重复地做着，试图从鼠疫的魔爪中救出他们极力保护、免受伤害的自己这部分。这就是他们拒绝威胁着他们的鼠疫奴役的方式。虽然表面上看这种方式并不比其他人的有效，但是在叙述者看来，它也有它自身的意义，而且，尽管带着虚荣心，甚至有点自相矛盾，它也证实了当时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某种自豪感。

朗贝尔为逃出鼠疫的包围做着反抗。在他还没有确认自己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出城的事实之前，他告诉里厄说，他已经下定决心采取其他办法。记者先是从咖啡馆服务员这里下手，因为他们往往消息灵通。但刚开始问的几个都只知道对这类举动的惩罚非常严厉。有一次他甚至差点被当成煽动出城的人。最后还是他在里厄那碰到的科塔尔给了他一点帮助。那天，里厄和他还在讨论记者在政府那边做的无果的尝试。几天之后，科塔尔在路上碰到了朗贝尔，用他最近在社交场合中采用的八面玲珑的态度迎接朗贝尔。

“还是没有进展么？”他说。

“一点也没有。”

“别指望那些机关单位。跟他们就是讲不通。”

“这倒是真的。我还想试试其他法子。但这很困难。”

“啊，我懂。”科塔尔说。

他知道一整套法子，这让朗贝尔感到很是吃惊。他跟朗贝尔解释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经常出入奥兰城里的咖啡馆，他有一帮朋友，他们告诉了他有一个组织专门做这种买卖。原来最近科塔尔花费很大，入不敷出，就入伙做了一些走私定量供应的物资的生意。他正在贩卖香烟和一些劣质酒，这些商品价格飞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你有把握吗？”朗贝尔问道。

“有，这是他们跟我介绍的。”

“那么为什么您自己没弄呢？”

“不要多想。”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弄是因为我还不想离开。我有我的理由。”

沉默了一会他又补充道。

“您怎么不问我的理由是什么？”

朗贝尔说：“这与我无关。”

“从某些方面看，这确实与您无关。但是事实上从另一方面看……好吧，老实说我现在心里清楚的唯一一件事是，鼠疫在我们这出现以来，我感觉自己越过越好了。”

另一个人听着他讲话。

“怎么联系这伙人？”

“啊，”科塔尔说，“这不太容易，跟我来。”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在阴沉的天空下，城市渐渐闷热起来。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门帘。马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拱廊路上，两个人很长时间都一言不发。这个时刻正是鼠疫消失的时间之一。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无精打采，在灾难中出现的场景也同样有可能在酷暑中出现。人们不知道空气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威胁而阴沉还是因为尘土和炎热。要想回想起鼠疫还需要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因为只有一些反面的迹象才说明了它的存在。比如，这位与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

对朗贝尔说，城里的狗都不见了，往常它们都侧卧在走廊出口，喘着气，想找点凉快又找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朝海军营地走下去。在他们的左手边，有一家外墙漆成绿色的咖啡馆，躲在一块斜面撑起的巨大的黄色遮阳布下面。进去的时候，科塔尔和朗贝尔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们挑了两把花园折椅，坐在一张绿色的钢制的桌子前。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几只苍蝇在空中嗡嗡作响。在好像快要垮掉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一只羽毛凌乱的鹦鹉缩在鸟架子上。挂在墙上的是一些描写军队场景的旧画板，已经被灰尘和厚厚的蜘蛛网覆盖。所有的钢板桌面上，朗贝尔面前的也是一样，都粘着风干了的鸡屎。本来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直到一阵嘈杂声之后，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蹦出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

这时，热气好像又上升了一点。科塔尔拿起杯子在桌面上碰了一下。一个小个子，围着一条长围裙，从屋子尽头走出来。他一看见科塔尔，就远远地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迎上来，猛地踢了公鸡一脚，把它赶跑了，在公鸡咯咯咯的叫声中，他问客人要来点什么。科塔尔要了一点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那个矮人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咖啡馆了。

“您觉得他今天晚上会来么？”

“这个，”另一个说，“我又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虫。您知道他的时间安排么？”

“是的，但这不要紧。我只是要给他介绍个朋友。”

那个家伙在他身前的围裙上擦了擦潮湿的手。

“啊！难道先生也是做买卖的？”

“对。”科塔尔说。

那个矮子吸了吸鼻气。

“那好，你们晚上来吧。我派个小孩去叫他。”

走出来时，朗贝尔问他们说的是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在城门那把商品运进城来，然后高价卖出。”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那他有同党么？”

“肯定啊。”

到了晚上，店门又掀起来了，那只鹦鹉在笼子里乱叫，钢制的桌子旁都围了一些挽着衬衫袖口的男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后脑勺上戴着顶草帽，一件白衬衫敞开着，露出太阳烤成土色的胸膛，科塔尔走进的时候，他就站了起来。一张匀称的棕褐色的脸，黑色的小眼睛，手指上戴了两三个戒指，他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

“您好，”他说，“我们到柜台那边喝。”

喝了三杯酒，还没有人说话。

“有人要出城么？”这时加西亚问。

他们走到门口，加西亚问他们需要他做什么。科塔尔跟他说，他给他介绍朗贝尔准确的说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找一个所谓的“出路”。加西亚走在他的正前方抽着烟。他继续提问，说到朗贝尔的时候就用“他”来代替，就好像他没看见朗贝尔的存在一样。

“他为什么要出去？”他说。

“他的女人在法国。”

“原来如此。”

停顿了片刻之后。

“他是做什么的？”

“记者。”

“这可是份要多说话的工作。”

朗贝尔还是一言不发。

“他是一位朋友。”科塔尔说。

他们继续沉默地向前走着。最后他们来到了岸边，这里已经被栅栏围了起来，禁止进入。但是他们又走进了一家出售油炸沙丁鱼的小酒馆，他们闻到了里面飘出的香味。

“不管怎么说，”加西亚总结道，“这个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还要去把他找出来。这也不大容易。”

“是么？”科塔尔兴奋地问道，“他藏起来了？”加西亚回答说不。在那个酒馆旁边，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转过身来对着朗贝尔。

“后天十一点，在城里那块高地上的，海关营房的角落上。”

他看起来好像要走的样子，但又转过来对着这两个人。

“这是要花钱的。”他说。

他这是想确认一下。

“当然。”朗贝尔答应道。

过了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表示感谢。

“哦，不不不，”另外一个愉快地说，“我很高兴能帮上您的忙。再说了，您是记者，总有一天会还给我这个人情的。”

到了后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爬上一条通往城市高地的光秃秃的大马路。海关营房有一部分被改造成了诊所。在营房的大门前站了很多，他们过来是希望进去探望一下病人的，但这是不被允许的。也有的是过来打听消息，但这些消息过个把小时就过期了。这群人这里来来往往，我们也不难猜到加西亚和朗贝尔把约会地点定在这的原因。

“这太奇怪了，”里厄说，“您如此坚持要离开这。不管怎么说，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很有趣的。”

“对我可不是。”朗贝尔回答。

“哦，当然，我们总要冒点风险。就是在鼠疫之前，通过一条繁忙的十字路口不也经常冒这样的风险么。”

这时，里厄的汽车靠在他们附近停了下来。是塔鲁开的车，里厄好像还有点半睡半醒。他醒过来为大家作介绍。

“我们认识。”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酒店。”

里厄又问朗贝尔要不要开他的车进城。

“不用了，我们在这里约了个人。”

里厄看了看朗贝尔说：“好的。”

“啊，”科塔尔感到很惊奇，“医生也知道了么？”

“预审法官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提醒道。

科塔尔马上换了副神色。奥登先生确实正从马路走下来，迈着矫健而又平稳的

步伐朝他们走过来。经过他们的时候拿下了他头上的帽子。

“您好，法官先生。”塔鲁说。

法官先向坐在车上的两个人问了好，然后看了看站在另一边的朗贝尔和科塔尔，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则向法官介绍了这位靠年金生活的人和那位记者。法官朝天空看了一眼，说这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时期。

“塔鲁先生，我听说您在负责防疫措施的实施工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称赞您。医生，您认为疫病还会继续蔓延么？”

里厄说他也只能期望它不会。法官重复地说总是要留点期望，老天爷的安排是难以揣测的。塔鲁询问他疫病有没有增加他的工作量。

“正好相反，我们要通过普通法上诉的事情反而少了。我干的只是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还从没像现在这样遵守老的法律。”

塔鲁说：“这是因为相比起来，老的法律还是非常好的。”

法官走出原先一直朝天上看好像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冷漠地端详着塔鲁。

“这有什么关系？”他说，“这不是由法律决定的，而是判决。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那个人，”当法官刚走开时科塔尔说，“就是头号敌人。”

汽车发动了。

又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和科塔尔看到加西亚来了。他径直向他们走来也没做个手势，也没打招呼，就说：“还要等等。”

围着他们的是一群人，主要是女人，都默不作声地等在那。差不多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篮子，她们妄想着把这些东西拿给里面生病的亲人，甚至还想着他们能够享用他们的食物。门口有武装的哨兵守卫着。时不时的有一声奇怪的尖叫穿过那个把营房和大门隔开的院子，这时在场的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往诊所的方向望去。

当一声低沉而清晰的“大家好”在他们背后响起时，三个人正注视着这个场景，他们转过身去。虽然天气很热，拉乌尔还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手里拿着一件深色的斜纹礼服和一顶翻边的毡帽。他的脸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紧闭着嘴巴，拉乌尔说话快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他说，“加西亚，你可以走了。”

加西亚点了支烟，就留下他们自个走远了。他们走得很快，努力与拉乌尔的节奏保持一致，因为他正好走在中间。

“加西亚跟我说过。”他说，“这件事行得通。但需要花一万法郎。”

朗贝尔回答说接受这个条件。

“明天，过来和我一起吃饭，在海军区的西班牙餐馆里。”

朗贝尔答应了，拉乌尔也握了握他的手，还是头一次露出微笑。在他离开之后，科塔尔请他原谅他明天因为有事来不了，再说朗贝尔这会也不需要他了。

第二天朗贝尔走进约定的西班牙餐馆时，里面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这家小酒馆，位于一条被太阳烤干了的小路的斜坡上，来的也只有男的，看起来大多数都像西班牙的人。一看到坐在房间尽头处的拉乌尔向记者打了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过去，那些看着他的人脸上好奇的表情也好像消失了，转回脸去吃饭。拉乌尔的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个胡子拉杂的瘦高个，肩膀异常的宽，长着一张马脸，头发稀疏，他撩起的衬衣里露出两条细长的手臂，上面长着黑毛。当别人向他介绍朗贝尔时，他点了三次头。他的名字还不知道，拉乌尔只是称他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有能力帮您。他会给您……”

拉乌尔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的菜单。

“他会给您联系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介绍您认识几个我们合伙的哨兵。这还不够。还要等到那些哨兵来决定有机可乘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您在他们其中之一的家里住上几夜，他就住在城门附近。但事先必须要我们的朋友给您做些必要的联系。当一切都办妥了，就由他跟您清算所有的费用。”

“那就是说还要两天时间喽。”朗贝尔强调说。

“要知道这并不容易，”拉乌尔说，“需要找人办。”

那张马脸又点了一下头，朗贝尔无奈只好同意。剩下的午餐时间他们一直在寻找话题。直到朗贝尔得知那张马脸原来是足球运动员时，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也经常参加这项运动。于是他们开始谈起法国的冠军杯，英国职业队的水平以及W型战术的好坏等。午餐结束时，那张马脸已经完全活跃起来了，他改用“你”

称呼朗贝尔，还说服他球队中的最佳位置是中卫。“你知道，”他说，“中卫是控制全场的人。而能控制全局，这才是足球。”朗贝尔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经常踢的还是中锋。他们的讨论最后被收音机打断了，在一段抒情轻缓的乐曲之后，广播里宣布昨晚，有一百三十七个人在鼠疫中牺牲。在场的人没有什么反应。那个长着马脸的男人耸了耸肩，起身离开。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离开的时候，这位中卫有力地握了握朗贝尔的手。

“我叫冈萨雷斯。”他说。

这两天对朗贝尔来说简直是没完没了的。他去了里厄那里，跟他说了具体的计划。然后陪医生去了一个病人家里出诊。来到那个等待着里厄的，一户疑似病例的病人的家门口时，朗贝尔向医生道别。只是走廊上传来一阵跑步声和说话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别耽搁了。”里厄自言自语道。

他看起来很疲惫。

“疫病发展得太快了？”朗贝尔问。

里厄说不是因为这个，这几天的统计曲线图显示上升速度甚至还变慢了。现在的问题是抗击鼠疫的方法还不够多。

“我们还缺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里，一般都是人力被用来弥补物力的不足。可现在我们连人力都不够。”

“不是从外地调来了一些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个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按照目前的疫情，还勉强能够应付。可是如果疫病蔓延开来就会不够。”

里厄仔细听了听屋里传来的响动，然后对朗贝尔笑了笑。

“确实，”他说，“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脸上划过一道阴影。

“您知道的，”他用低沉的语气说，“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选择离开。”

里厄回答说 he 知道的，但是朗贝尔接着说：

“我认为自己还不算软弱，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我也经历过这方面的考

验。只是，有些想法使我无法承受。”

医生面对面地看着他。

“您会和她见面的。”他说。

“也许吧，可是我无法承受的想法是这场灾难将会持续下去，而在此期间，我的女人也将老去。三十岁的时候，人们开始衰老，这时就应该及时行乐。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里厄低声说他觉得理解了。这时塔鲁到了，显得很高兴。

“我刚刚要求帕纳卢介绍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

“是么？”医生问道。

“他考虑了一会，就答应了。”

“我很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要比他的布道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只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对里厄眨了眨眼睛。

“给别人创造机会，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定的星期四来到了大教堂的门廊下，这时离八点钟还差五分。空气还相当清新。天空中漂浮着即将被生的热气一下子吞没的一朵朵浑圆的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但还能闻到一股模糊的从下面升上来的湿气。躲在东边楼房后面的太阳只晒着了装饰着广场的全身镀金的圣女贞德像的头盔。摆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空旷无人的门廊下踱了几步。这时里面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赞美诗唱词，伴随着一阵地下室陈旧的气息和蜡香。突然，歌唱声停了下来。十几个矮小黑色人影从教堂里出来，朝城里小跑过去。朗贝尔开始感到有点不耐烦。另外一些黑色人影则登上宽敞的楼梯朝门廊顶走去。他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又意识到这个地方可能不允许抽烟。

八点一刻时，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响起。朗贝尔走进了阴暗的穹顶之下。过了一会，他才看到，在教堂的中殿里是那群刚刚经过他面前的黑色人影。她们聚集在一个角落里，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祭坛前面，祭坛上放着一个城里作坊匆忙赶制

出来的圣罗克像，她们就在那跪着，在一片阴暗里缩成一团，好像一些凝固住的影子，这一堆那一堆，一个个都像飘在烟雾之中。在她们上方，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冈萨雷斯已经从楼梯上走下来朝城里走去。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他对记者说，“这是常有的事。”

他解释说他要到不远处等他的朋友，因为他们八点差十分的时候还有个约会。但是，他在这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干我们这行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于是他提出明天还是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再见一次面。朗贝尔呼了一口气，把他的毡帽扣到脑后。

“没关系的。”冈萨雷斯笑着说，“你要想想足球场上需要的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和传球，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才能射进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是一场比赛也不过一个半小时。”

奥兰的阵亡将士纪念碑坐落在城里唯一一个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散步的地方，紧挨俯瞰着港口的悬崖。第二天，朗贝尔第一个来到约会地点，仔细地把烈士名单读了一遍。几分钟之后，两个男人往这边靠近，冷冷地盯了他一眼，然后手肘支在散步场的栏杆上，看起来好像完全沉浸在对空无一人的港口的凝视当中。他们两个的身高差不多，都穿着蓝色长裤和短袖的海军针织衫。记者走远了一点坐到一张长椅上，悠闲地看着他们。他觉得他们两个看起来可能还不到二十岁。这时，他看到冈萨雷斯一边抱歉一边朝他走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说着，把朗贝尔带到两个年轻人旁边，并向他介绍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另一个叫路易。他们从脸上看起来很像，朗贝尔觉得他们是一对兄弟。

“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你们也互相认识了。剩下就要把事情安排好。”

马塞尔或者是路易说他们的轮岗在两天之后，这将持续一个星期，而且他们要找出最合适的那一天。他们总共会有四个人一起在东城门站岗，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他们可以想办法弄点事把他们支走。但是他们不确定的是这要增加点费用。但

是有几个晚上那两个军人回到一个他们熟悉的酒吧后厅打发晚上的一段时间。马塞尔或是路易于是向朗贝尔建议住到他们在城门附近的家里去，并等着他们来找他。到了那时过城门就是轻而易举了。但是要抓紧时间，因为有人说不久城里就要加设双倍的岗哨。

朗贝尔表示同意，把口袋里最后的几支烟递给他们。他们当中还没说话的那个这时问冈萨雷斯费用的问题谈好没有，还有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收款。

“不行，”冈萨雷斯说，“这不要紧，这是位朋友。只要一出去，费用自然就弄好了。”

他们约定再碰一次面。冈萨雷斯建议后天到西班牙餐馆一起吃晚饭。那时，他们就可以直接回哨兵的家里。

“第一个晚上，”他对朗贝尔说，“我会和你呆在一起。”

第二天，朗贝尔正走向房间，在酒店楼梯上碰见了塔鲁。

“我要去见里厄。”塔鲁说：“您想过去么？”

“我一直不敢确定会不会打扰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会。

“我想不会的，他经常谈到您。”

记者思索着。

“请您听着。”他说，“如果你们晚饭后有时间，或者更晚也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一起来酒店的酒吧一趟？”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尽管已经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大概有三十个左右的人挤在里面，高声说着话。刚从瘟疫之城的寂静中走出来，两个来客停下来，有点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他们就知道了里面的人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一端，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围了上去，塔鲁不动声色地把一个旁边吵闹的客人推得远些。

“你们不是害怕酒精么？”

“不，”塔鲁说，“刚好相反。”

里厄闻了闻他的酒杯里散发出来的苦艾气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很难说话，

可是朗贝尔好像是忙着喝酒。医生无法断定他是不是喝醉了。这个狭小的房间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就放着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位海军军官，两只手臂都搂着一个女人，对着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胖子，讲发生在开罗的一场斑疹伤寒的情况：“这是集中营啊，”他说，“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准备的，搭起的帐篷里住着病人，在它们周围，站着一排哨兵，如果病人的家属偷送药方进去给病人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可是毫不留情的，但做得对。”另外一张桌子上围着一群装束入时的年轻人，谈话的内容听不懂，他们的声音淹没在从搁置在高处的一架点唱机里播放出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事情办得怎么样？”里厄提高嗓门说。

“就在最近，”朗贝尔说，“可能是下个星期。”

“真遗憾。”塔鲁喊道。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哦，”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您呆在这里对我们会有帮助。但至于我，我非常理解您想离开这的急切心情。”

塔鲁又给他来了一杯。朗贝尔从他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对着塔鲁。

“我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手里的酒杯，“您可以去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

朗贝尔又露出了他一贯的犹豫不决的态度，重新爬上高凳。

“难道在您看来这个卫生防疫组织没有用处么？”刚喝了一杯的塔鲁说，眼睛盯着朗贝尔。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又喝了一杯。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他现在可以肯定朗贝尔确实喝醉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的时候，他从一小撮人群中穿过，他们正在往入口处搬凳子，想领略一下热气刚刚退去，绿树成荫，晚霞金黄的傍晚景色。他们抽的烟叶散发出呛人的气味。而餐馆里面却寥寥几人。朗贝尔坐到

房间尽头的他第一次碰见冈萨雷斯的那张桌子。他告诉服务员他在等人。现在已经十九点三十分了。渐渐地，门口的那群人也陆续回到房间里坐下吃饭。服务员开始忙着招待他们。低矮的屋顶下是一片餐具碰撞发出的噪音和低沉的说话声。到了二十点，朗贝尔还等在那里。房间里的灯打开了，几个新进来的客人坐到了他的那张桌子。他点了晚餐。二十点三十分，他还是没有看见冈萨雷斯，也没见那两个年轻人。他抽起烟来。房间里的人也慢慢走光了。外面的夜幕很快降临了。温热的海风轻轻地吹动落地窗的帘子。到了二十一点时，朗贝尔看到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服务员也惊奇地盯着他看。他结账离开了。餐馆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开着门。于是朗贝尔坐到咖啡馆的柜台那，观察着餐馆的入口。二十一点三十分，他起身回酒店，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怎么找到冈萨雷斯，他又不知道他的地址，一想到一切步骤都要重头再来时，他就感到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他看到呼啸而过的救护车穿过黑夜，想到——正如他跟里厄医生说的那样——这段时间里因为专心于寻找打开把他们隔开的那堵墙的门路，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忘了他的女人。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压抑在他心底的所有声音，又重新回响在他的渴望之中，伴随着一阵突然爆发出来的悲伤。为了逃离这种难以忍受的但又挥之不去的，吞噬着他的时间的灼痛，他开始向酒店跑去。

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去找了里厄，想向他打听怎么找到科塔尔。

“余下我要做的一切，就是重新开始这一系列的步骤。”

“明天晚上来吧，”里厄说，“塔鲁要我把科塔尔也邀请进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明天十点会过来。您十点半的时候过来就行。”

第二天当科塔尔到达里厄诊所的时候，塔鲁和里厄正在谈论一个里厄照顾的病人中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治愈病例。

“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塔鲁说。

“要我说，”科塔尔说，“他得的根本就不是鼠疫。”

他们向他保证里厄检查到的病人得的就是这种病。

“他被治愈是不可能的。你们应该比我还清楚这一点，鼠疫不会放过任何人。”

“一般来说是没有，”里厄说，“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惊喜的。”

科塔尔笑了起来。

“看来没有。你们听到今天晚上的统计数字了么？”

塔鲁一边带着亲切的眼光看着这位享受年金的人，一边说他已经知道数字了，疫情仍然很危急，但是这能说明什么？这说明还要采取更加特殊的措施。

“啊，你们不是已经在做了么？”

“不错，但这要求每个人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

科塔尔不理解似地看着塔鲁。塔鲁说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行动起来，因为疫病是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要负起他的责任。志愿者组织向所有人开放。

“这个想法不错。”科塔尔说，“但是一点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语调说：“这个我们试过了才会知道。”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抄写卡片。塔鲁一直盯着这个坐在椅子上焦躁不安的领年金的人。

“科塔尔先生，为什么您不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呢？”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把他的圆礼帽拿在手里：

“这可不是我干的活。”

然后他又用一种顶撞的口气说：

“另外，我发觉我自己在鼠疫中过得挺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插手去阻止它。”

塔鲁敲着自己的额头，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

“啊，原来是我忘了，要是没有鼠疫，您就会被拘捕。”

科塔尔惊了一下，用手抓住椅子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里厄停下了笔，带着一种既严肃又有趣的表情看着他。

“谁告诉您的？”这位年金享受者叫起来。

塔鲁露出惊奇的神色说到：

“不是您自己么！至少医生和我都是这么理解的。”

这时因为处于了狂怒之中，科塔尔说话也含糊不清了，很难听懂。

“请不要激动。”塔鲁接着说：“我和医生都不会去揭发您的。您的事与我们无关。再说了，我们也都不喜欢招惹警察。好了，请坐吧。”

这位享受年金的人看了看椅子，犹豫一会还是坐下了。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他承认道，“而他们偏要重提。我以为人们都已经忘了这件事。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告诉我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要随叫随到。我知道最后他们肯定会把我抓起来的。”

“这件事严重么？”塔鲁问。

“这要看您想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谋杀案。”

“监禁或劳役？”

科塔尔看起来非常沮丧。

“监禁，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

但是过了一会，他有激动地说。

“这是个错误。所有人都会犯错。但是一想到我要因为这件事而被带走，离开我的屋子，我的习惯，和我熟悉的一切，我真的受不了。”

“原来是这样。”塔鲁问道，“这就是为什么您要自寻短见的原因么？”

“是的，当然这是件蠢事。”

里厄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他告诉科塔尔他理解他心中的不安，但是也许凡事都能解决。

“是的。现在，我就知道我没什么好怕的了。”

“我看得出来。”塔鲁说，“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

另一个人，转着手中的帽子，抬起头，用一种恍惚的眼神望着塔鲁：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会。但至少不要故意使病菌蔓延开来。”塔鲁笑着说。

科塔尔反抗说他也不希望鼠疫发生，但它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如果现在它达到这种程度这也不是他的错。当朗贝尔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这个享受年金的人提高了声音接着说：

“另外，我觉得你们是在白费力气。”

朗贝尔得知了科塔尔也不知道冈萨雷斯的地址，只知道他们会回那家小咖啡

馆。他们可以定在明天再见面。因为里厄也说很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朗贝尔就邀请他和塔鲁一起在周末不管哪个时间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去了那家小咖啡馆，留了口信给冈萨雷斯说晚上见面，或者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改在明天。晚上，他们等他没来。第二天，冈萨雷斯才出现。他一言不发地听完朗贝尔的事。他说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他得到消息说为了住宅搜查，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禁止进入整个街区。所以大概是因为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年轻人没有通过关卡。所有事情都要等通知了拉乌尔再说。当然这要等到后天才行。

“我知道，”朗贝尔说，“要重头开始。”

后天拉乌尔肯定了冈萨雷斯的假设。下街区确实被封锁了。需要重新联系冈萨雷斯。两天之后，朗贝尔和这个足球运动员一起吃午饭。

“太蠢了，”他说，“我们应该约定一个重新见面的方式。”

这也是朗贝尔的想法。

“明天早上，我们就去那两个小子家里，我们尽量把所有事都安排好。”

第二天，那两个小子没在家里。他们留口信要求他们明天中午到中学的操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来时碰见了塔鲁，他的表情让塔鲁很吃惊。

“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么？”塔鲁问他。

“又要重新开始。”朗贝尔说。

然后他又邀请了他们：“晚上你们过来吧。”

到了晚上，当他们两个人走进朗贝尔房间的时候，他还躺在床上。他起来，倒了几杯他已经准备好的酒。里厄拿着自己的酒杯，问他事情是不是顺利。记者说他已经全部重新开始了，现在已经到了同前面一样的那个步骤，不久他们要见最后一次面。他喝了一杯接着说：

“自然，他们还是没有来。”

“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定什么规矩。”塔鲁说。

“您还没有明白。”朗贝尔说着，同时耸了耸肩。

“因为什么？”

“鼠疫。”

“原来。”里厄说。

“不，你们不明白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朗贝尔走到房间的一角，打开一台小型的留声机。

“这是哪张唱片？”塔鲁问，“我好像听过。”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唱片听到中间的时候，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两下火枪声。

“打了一只狗，或是有人逃跑。”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唱完了，一辆救护车的呼啸声也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经过酒店房间的窗前，然后声音又渐渐变小，直到最后消失。

“这张唱片不算奇怪，”朗贝尔，“今天我已经听了十几遍了。”

“您这么喜欢它么？”

“不，但我只有这么一张唱片。”

停顿了一会儿，朗贝尔才接着说：

“我告诉你们重新开始要怎么做。”

他询问里厄防疫组织是怎么工作的。组织里有五支分队在工作。我们希望再组织更多的分队。记者坐到了床沿，低头看着指甲。里厄端详着他矮小但强壮的身躯，走道他的床边。他发现朗贝尔也看了他一眼。

“医生，您了解，”他说，“我考虑过加入你们的组织。但现在我没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我有我的原因。另外，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站在哪一边？”塔鲁问。

“战败者的一边。但从那以后，我思考过。”

“思考什么？”塔鲁问。

“关于勇气。现在我知道一个人能够有大作为。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一种高尚的情感的话，我就不会对此感兴趣。”

“人们都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塔鲁说。

“并不是这样。他们无法承受长期的痛苦，或者感受长期的幸福。所以他们不能作任何有价值的事。”

他看着另外两个，接着说：

“塔鲁，我们可以看一下，您能为爱而死么？”

“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好像不会。”

“问题就在这。您可以为理想而死，这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而我，我见过很多人为了理想而死。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英雄主义，我明白这很容易办到，我认识到这也是致命的。而我所感兴趣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所爱而活着，而死去。”

里厄仔细地听着记者的话。他亲切的说到，眼睛没有离开他的身上：

“朗贝尔，人不是一种概念。”

另外一个人从床上跳起来，脸上燃起了激情。

“人就是一种概念，一旦背叛了爱情，人就成了一种极短的概念。恰恰是现在，我们不再能够有爱了。医生，接受吧。等待未来，如果真有可能，等待全体的解救，而不要去逞英雄。我，我是不会更近一步了。”

里厄站起身来，带着一种突然的疲倦的神情。

“您说得很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情的意图，在我看来您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要对您说明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可能这种想法显得可笑，但是抵抗鼠疫的唯一方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露出严肃的表情说道。

“我也不清楚它的普遍意义是什么。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是它支持着我的工作。”

“是么，”朗贝尔愤怒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我的爱情，也许我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两个，我猜你们所做的一切并不会让你们失去什么。所以你们更容易站在好的一边。”

里厄喝完了杯子里的酒。

“走，”他说，“我们还有事要做。”

他出去了。

塔鲁跟着他，但出去的时候好像又改变了主意，转过身来对记者说道：

“难道您不知道里厄妻子住在几千里之外的疗养院里么？”

朗贝尔做出了一个吃惊的动作，但是这时塔鲁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第一时间，朗贝尔给医生打了电话。

“在我找到方法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您能同意我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然后说：

“好的，朗贝尔，我很感谢您。”

鼠疫 第三部

鼠疫中囚禁的人们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都在痛苦的挣扎中度过。他们中的几个像朗贝尔一样的人，甚至还幻想着——正如我们所见——他们还拥有自由，他们能够做出选择。但是其实此刻我们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鼠疫已经遮盖了一切。此时不再有个人命运，只有鼠疫这一个集体事件，每个人都承受着它所带来的感情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隔离和流放之感，其中也包含了恐惧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叙述者认为，在炎热和鼠疫的最盛时期，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例说明，城市里生者的暴力行动，死者的埋葬过程以及恋人们分隔两地的相思之苦。

正是年中的时候开始刮风，在疫城上空吹了几天。奥兰的居民向来害怕刮风。城市坐落在高原之上，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风可以长驱直入，横扫街道。几个月来没有下过一滴雨水，炎热干燥的城市到处覆盖着一层灰土，在风的作用下一块块地剥落下来。风扬起漫天的尘土和废纸，落在日渐稀少的行人腿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赶路的身影：向前弓着身子，用手帕或手捂着嘴。过去到了傍晚，人们会聚集到一起，尽量把白日拖得越长越好，因为他们觉得每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而现在则不然，人们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相拥回家或者走进咖啡馆。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是风还在不断地悲戚。从翻腾的城里闻不到大海吹上来藻类和海盐的气味。这座空城，覆盖着白灰，弥漫着海洋的气味，到处响着风的呼啸声，就像一座不幸的孤岛，发出痛苦的呻吟。

直到现在，人口更密集，环境更差的郊区中死于鼠疫的人数要比中心城区多得多。但是疫神好像突然逼近了，降落到了商业街区。居民抱怨是外面的风把鼠疫的种子带到了这里。“它把事情都搞复杂了。”酒店经理说。但是不管是不是风的缘故，当他们夜晚听到窗外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呼啸而过的铃声，冷酷无情的鼠疫发出低沉的召唤时，中心城区的人们知道现在轮到他们的头上了。

甚至在城里，人们也想过把一些疫情严重的街区隔离出来，只允许有紧急事务的人出入。而那些生活在这些街区里的人不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为难他们的。不管怎么样，对比之下，其他街区的人倒成了更自由的人。而其他街区的人，尽管处在他们的艰难时刻，想到有人比他们还要不自由，反而也寻找到了某种心理安慰。“总算有比我受到的监禁更严厉的人”——这句话总结了当时人们唯一还抱有的希望。

大约在这段时期里，城里的火灾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城东的娱乐中心那边。据消息称，这是由于一些刚隔离回来的人，因为经受了如此不幸和失去亲人的打击，变得神志不清，把他们的房子点上了火，以为这样可以烧死疫神。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阻止他们的这种举动，但因为这种事不断发生，还有狂风助威，所以整个街区都经常处于危险当中。政府出面说明对房子进行的消毒工作足够消除感染鼠疫的危险，但是依然无效，他们又不得不颁布法令，对无知的纵火犯采取严厉的刑罚。也许，不是监禁的处罚吓退了这些不幸的人，而是所有居民都确信监禁的刑罚就相当于给他们判了死刑，因为在政府监狱里他们必死无疑。当然，这种坚定的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显而易见的是，鼠疫似乎首先会对习惯于集体生活的人下手，比如士兵，信徒或者囚犯。因为，尽管一些囚犯是被分开关押的，但是一所监狱就是一个集体，事实也证明了在市政府的监狱中，有同样多数量的守卫或者囚犯在鼠疫中丧生。在疫神高傲的眼里，监狱里的所有人，上至典狱长下至囚犯都是被判了刑的，也许这还是头一次，监狱里实现了完全平等的统治。

面对这种阶级平等化的现状，为了给他们划分出等级，政府想出了给在执勤期间死亡的监狱看守授勋的办法，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由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种角度看，监狱看守可以算作是被动入伍的人员，这样就可以给他们追授军功章了。然而，犯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而军界则表示了对此事的不满，因为这样做

会在公众中产生认识上的困惑。人们提出了请求，他们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颁发鼠疫勋章。但是这样一来对于以前已经颁发的军功章又无法收回，军界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鼠疫勋章也有它自身的缺点，它不能像军功章一样产生精神上的作用，因为疫病期间获得这样的勋章很容易获得。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又不能像修道院，更不能像军队。事实上，城里唯一的两个修道院的僧侣已经分开来暂住到一些虔诚的信徒家里了。同样，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些小的连队也拆除了营房，驻扎到学校或公共建筑中。这样，疫病表面上迫使居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的团结状态，同时又破坏了传统的团体，使其中的成员重新回到了孤立的状态。这就产生了混乱。

所有的这些情况，再加上狂风大作，必然在某些人心头也燃起熊熊大火。晚上城门又反复遭到了数次攻击，而且这次是一些装备武器的小团伙。互相交火，有人受伤，也有逃跑的。各城门都加强了警卫，这些人也就很快偃旗息鼓了。然而这次的攻击足以在城里引发暴动的情绪，产生暴力事件。房子着火，或者因为卫生问题而封闭的房子遭到抢劫。老实说，很难猜出这些行为是不是早有预谋。大多数时候，突发的情况使得那些平日里受人尊敬的人做出了可耻的行为，而其他人也立时效仿。经常能看到一个个发疯一样的人，当着悲痛到目瞪口呆的房子主人的面，冲进还在着火的房子。看到主人无动于衷，一大群看客也学着前面的榜样，于是在黑暗的马路上，在火的微光中，我们看到一群变形了的黑影穿过渐渐熄灭的大火逃出房子，肩上扛着各样的物件或者家具。正是由于频发的火灾促使政府不得不在鼠疫状态下发布了戒严令，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他们处死了两个小偷，但是这样的死亡在其他人眼里算不上什么，因为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两个被处死的人他们根本注意不到：这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事实上趁火打劫的事不断重复出现，政府的态度也是视而不见。而唯一还能影响到所有居民的措施是采取了宵禁。从晚上十一点开始，一整个长夜，城市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之下，城市里浅白色的砖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树木斑驳的阴影，听不到行人脚步和狗吠。偌大的城市寂静无声，死气沉沉，这时只是

众多方形建筑的聚合。在它们中间竖立着默默无言的人像，那些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者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已经被封闭在青铜之中，只有石头或金属制作的他们的假面还在试图使人们回忆起他们以前的为人，但形象也渐渐模糊。在黑压压的天空下，在毫无生气的十字路口，这些平庸的偶像，面无表情的雕塑，高坐在他们的座位之上，相当形象地指示了一个我们已经进入的冥界，至少冥王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在这块城市墓地中，无情的疫神，冰冷的石头和死寂的夜晚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夜晚同时降临到人们的心中，市民们听到有关埋葬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心里就更加恐惧了。既然不得不谈到埋葬的情况，那么叙述者也只好说声对不起了。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可能要责怪他，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在整段时期内埋葬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个方面来看，叙述者和所有市民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这件事。尽管如此，并不是说他对此类仪式产生了什么兴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生者的世界，比如说海滨浴场。然而海滨浴场被封锁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生者的世界整天充斥着恐惧，恐怕不得不让位于死者的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当然，人们也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它，蒙上双眼，拒不承认，但是事实却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最终将带走一切。到了那一天，当您的亲人需要埋葬的时候，您能拒绝他们入土么？

那么，一开始葬礼就有个特点，那就是快速！形式一律简化，殓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去时亲人不在身边，守灵又被禁止，因此在晚上死去的人只能孤独地离去，白天死去的人则立即埋葬。当然他们的家属会接到通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病人的身边呆过，则现在正在接受检疫隔离。如果家属不和死者一起住，那他们也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的时间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路上，这时尸体已经被清洗干净，放入棺材中了。

我们设想一下这个仪式就发生在由里厄管理的那个辅助医院里。学校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朝着过道的一大块地上堆放着棺材。在那条过道上，家属找到了一个单放的且已经密封了的棺材。这时马上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家属代表在文件上签字。接着把尸体装上一辆汽车，有时是直接用货车，有时是一辆改装过的大救护车。亲人们坐上一辆还被允许运行的出租车，这列车队就沿着外环路开到墓地。在城门口，守卫要拦住车子，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这个印

章，就不能进入市民所谓“最后归宿”的墓地——然后车子就开到一边，停到一块四四方方的墓地里，里面是一个个等待填埋的土坑。一位神父已经等在那里迎接尸体了，因为教堂里的殡殓仪式都被取消了。一边祷告，一边抬出棺材，捆上绳子，拖到坑旁，滑下去，就撞上了坑底，神父开始摇晃他的圣水刷，这时第一层土已经蹦到棺材盖上。救护车已经提前离开，接受洒水消毒，在铁铲越来越低沉的响声中，家属们冲进了出租车。一刻钟之后，他们就回到家里了。

这样，一切确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并把风险降到最小。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显然伤害到了家属们的人之常情。但是在鼠疫时期，这正是无法一一考虑到的问题：为了保证效率，就得牺牲一切。另外，刚开始，这种办法使人们的精神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为把葬礼办的体体面面的想法也是很普遍的，幸亏不久食物供给的问题变得严重起来，这马上就变成了居民们最需关心的问题。排队，办手续，填表格，如果他们想吃饭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人们也就无暇顾及他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死的，以及他们将来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本来物质上的困难是件坏事，后来倒也有点好处。况且，正如前面看到的，如果鼠疫已经停止蔓延，一切本应好转。

因为这时候棺材数量趋于紧张，包裹尸体用的布料以及墓地的墓穴也不够，这就必须再想想办法了。最简单的方法总是拿效率说事，人们开始一组一组地进行埋葬仪式，必要时还可增加医院与墓地之间的运输队伍。就拿里厄的工作来说，他所在的医院里此时只有五口棺材。一旦全部装满，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墓地，再清空棺材，把铁青色的尸体转移到担架上，停放到特设的停尸棚里。而棺材浇过消毒液后，又运回医院，这样的操作只要需要就可以重复进行。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比起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提到的由黑人用手推车运尸体的情况，这个要好多了。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做了登记卡。这种进步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当局取得了这点成就，民众还是对这一系列程序感到不满，这样使得省府不得禁止亲人参加宗教仪式，只允许他们送到墓地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批准的。

因为他们在仪式的最后一步中，采取了一些改变。在墓地的尽头，有一块覆盖着黄连木的空地，他们在那里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坑用来埋男人，另一个坑用来埋女人。从这点看当局还是尊重礼节的，但是到后来，由于死者的不断增加，他们就把尸体乱七八糟地埋进去，连这点最后的体面也不顾了，一个叠着一个，男人和女人一起，也不讲什么廉耻之心。幸好这种彻底混乱的现象只出现在灾难的最后时刻。现在这个时期里，男女还是分坑的，省府也很坚持这一点。在两个坑的底部，铺了厚厚一层生石灰，腾腾地冒着烟。在坑的边缘石灰堆成的小丘在空气中不断地冒着气泡。当救护车运达尸体时，人们整齐地抬着担架，把尸体一具挨着一具慢慢地滑下坑去，裸露的尸体弯弯扭扭，这时就在上面再盖一层生石灰，然后是泥土，但只填到一定的高度，这是为了给下面一批“来客”预留位置。第二天，死者的亲人会被请来在登记簿上签字。这就是人和猫狗之类的不同之处了：人总有记录可查。

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人手，可是人手又随时不够。这些护士和掘墓人开始是政府的雇员，然后是临时招募的，其中许多人都死于鼠疫。无论他们多么小心，总有一天会受到感染。但是仔细想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鼠疫期间，还从没出现过缺人的情况。危机的时刻出现在鼠疫达到顶峰的不久之前，里厄那时也是担心不已。因为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他称为干苦力的，人手都是不够了。但是自从鼠疫真正占领整个城市的那刻开始，鼠疫的肆虐甚至还带来了方便，因为鼠疫破坏了所有的经济生活，这样就造成了数量众多的失业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些人当中招不到管理人员，但是要找干粗活的人手却是很方便。从那时起，贫困比起恐惧来更加强烈，这是因为工作报酬和风险系数是成正比的。卫生机构手里有一张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旦职位出现空缺，就可以通知名单上最靠前的人，除非他们在等待时间里自己也成了缺额，否则肯定会来报到。很长时间以来，省长也曾考虑过起用有期或无期的囚犯来做这类工作，这样一来就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因此只要一直有失业人员来应聘，他就同意继续采取这种方法，其他的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底，我们的市民总算能够凑合着被送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尽管不算体面，但至少没有乱套，当局也因为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份开始鼠

疫就一直维持在一根水平线上，越来越多的牺牲者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城内这块小墓地的容纳量。墓地的围墙也被拆掉了，让这些死者蔓延到周围的土地上，但这也无济于事，还需要寻找其他的方法。首先他们决定改在晚上进行埋葬，这样可以一下子省去很多规矩仪式，救护车里的尸体也越堆越多。有些违反规定的夜行者（或者是因为工作关系）在宵禁之后还在外围街区停留，有时就会看到一排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驰在马路上，暗淡无光只有铃声回荡在夜空中。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扔到坑里，还在摇摇晃晃的时候，一铲铲的石灰就砸到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埋，他们就连同姓名一起被埋葬了。墓地里的坑也越挖越深。

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不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土地，加大原先墓地的宽度。省里发布命令征用了永久转让的墓地，把所有挖出来的尸体都送往焚尸炉进行火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火化了事。但是这需要使用放置到城市东面，城门之外的旧焚尸炉。于是他们又把哨岗往外挪了点。一个市政厅里的公务员提供了意见，他建议使用已经弃用了的，过去沿着海边悬崖旁的电车来运尸。这样一来大大简便了政府的工作。于是他们便改装了电车内部的电动机，拆掉拖车的座位，并把线路改道直接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的终点站。

整个夏末直至秋雨绵绵的时节，每到深夜，人们都能够看到没有乘客的电车摇摇晃晃地沿着大海边的峭壁驶过。最后居民还是知道了这是什么。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靠近悬崖，但是一群群的人还是成功地钻进了悬在海浪之上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到拖车车厢中去。这时我们就能在夏夜里听到电车颠簸前进的声音，上面载着尸体与鲜花。

开始几天，黎明时分，一股发出恶臭的浓烟笼罩在东城的街区的上空。所有医生都认为尽管这种气体不太好闻，但是不会损害人体。但是几个街区里的居民立刻就惊慌地逃跑了，确信疫神是在高空之上击打他们，这样一来当局不得不在焚尸炉上安装一套复杂的导气管道以改变浓烟的方向，居民这才安心。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从东边飘来一阵难闻的气味时，人们才会想起他们周围的环境已经与往常不同了，每天晚上疫神都在用炙热的火焰吞食着献给他的贡品。

这已经是鼠疫带来的最极端的后果。但幸运的是鼠疫没有继续蔓延，因此我们

可以认为机构的明智，省府的防疫措施，甚至于焚尸炉的火化量都有可能被超越。里厄明白那时他们还会提出极端的解决方法，比如把死尸扔到大海里，他能够在脑海中清楚地想象出在蓝色的海水中溅起的巨大的水花。他更加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任何机构——无论它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也抵抗不了鼠疫的袭击，那时，人们将成堆地死去，尸体在街道上腐烂。不管是在省里还是在市里，在公共的广场上能看到那些垂死的人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紧紧地抓住活人。

总之，正是这样明显的事实或者恐惧的心理造成了市民心中的隔离和流放之感。关于这方面，叙述者深表遗憾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事可以报道，比如一些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我们在旧小说里经常读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巨大的灾难，由于持续很长时间，往往是单调的。回想起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不幸，处于鼠疫中的可怕的日子并不是水深火热或者冷酷无情，而更像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践踏，一切都被压得粉碎。

不，鼠疫与疫病开始时萦绕在里厄医生脑海中的令人激动的形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开始，它是通过一套小心翼翼，运行良好，无可指责的行政措施体现出来的。另外要说明的是，为了不背叛事实，首先为了不背叛自己，叙述者努力保持了叙述的客观性。他几乎没想过要用艺术手段修饰这个事件，除了不得已为了叙事的连贯性而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性本身的要求，他现在才说，如果人们在这段时期里忍受的巨大痛苦中，最普遍也最深刻的痛苦是分离，如果必须实事求是地对鼠疫的这一阶段做出一个新的描述的话，那最真实的事实就是，此时这种痛苦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我们的市民，至少那些忍受着最深的相思之苦的人，他们能习惯这种处境么？答案不一定是肯定的。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时忍受着消瘦的痛苦。鼠疫一开始，他们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他们失去的那个人，苦苦相思。尽管他们能够清楚地想起曾经爱过的那张脸庞，对方的笑容以及他们因为感受了某个幸福的时刻而相识的那一天，但是他却很难设想在他想念对方的时刻，身在远处的对方在做什么。总之，在他还具有记忆的那刻，他的想象力是缺乏的。到了鼠疫的

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开始模糊。并不是说他忘记了那张脸，而是说他同时失去了他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的内部不再感到对方的存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抱怨的是他们只能记起他们恋人的影子，接下来感觉这个影子愈来愈没有血肉，最后连记忆中的颜色也褪去了。长期分离的结果是，他们再也无法想象过去属于他们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点看来，他们已经接受了鼠疫统治，因为越平庸的人就越容易受到它的影响。在我们这，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所有人只有同样单调的感情。

“是时候结束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是因为，在灾难期内，期待共同的苦难早点结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他们确实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初期的抱怨和冲动已经没有了，只有脑袋还可以清楚做这样的几个推理，但也虚弱无力。开始几个星期的粗暴的冲动已经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被称作逆来顺受当然不合适，但又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暂时的妥协。

市民们重新开始生活，适应了目前的境况，正如人们所说，因为别无他法。他们自然还会感到不幸与痛苦，但是这种感觉也不再那么强烈了。但是里厄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对于绝望的习惯比绝望本身更加糟糕。以前，被分开的人不是现实中的不幸，在他们的苦难中还有一丝光明，但刚刚已经熄灭了。现在，我们看到市民们坐在街角，咖啡馆或者朋友家里，心情平静，带着一种不安的眼神，显得心不在焉。以至于整个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人们干起工作来也同鼠疫的姿态一样：小心翼翼又不露声色。所有人都变得谦卑。被分离的人谈到不在身边的亲人时，还是第一次没有厌恶之感，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用同看待疫病数字一样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分离。在这以前，他们从不觉得他们的苦恼和全城共同的不幸是一回事。现在他们也接受了它们掺在一起的事实。没有对过去的记忆，也没有对未来的希望，他们置身于现在。事实上，对于他们，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需要说明的是，鼠疫也带走了他们的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要有有点未来的含义，而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此时此刻，其他一无所有。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说所有分离的人都会进入这种

状态，那么还需补充的是他们不可能同时进入这样的状态，并且，一旦他们产生了这种新的态度，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突然的清醒为这些忍受相思之苦的人带来更加敏感的，更加痛苦的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为了排遣，会计划一下鼠疫停止之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还会触景生情，出乎意外的被莫名的嫉妒中伤。另外一些人在一星期里的某几天里，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比如是星期日和星期六下午，因为这两天是他们过去与他们的亲人固定做某些事情的日子。或者在某些傍晚时分，某种忧郁占据了他们的心头，向他们预示——但不总是确定——往事又要在脑海里出现。晚上的这个时间，对于信徒来说是反省的时间，而对于囚犯或者流放者来说，这个时间是难熬的，因为他们反省时只看到内心的空虚。那时他们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他们又回到了精神麻痹的状态，重新回到鼠疫的禁闭之中。

人们明白，不需放弃关于个人的私事。这与鼠疫刚开始的时候不同：那时，他们还为一大堆个人琐事担心不已，而对别人的生死则漠不关心，他们只有私人生活的经验；而现在，恰恰相反，他们也开始急人所急，他们也和别人有了同样的想法，甚至他们的爱情也成了一个最抽象的概念。他们这时完全屈服于鼠疫了，他们也不再期望什么，只有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才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这些腹股沟淋巴结肿块赶快消失吧。”但事实上他们都在睡觉，整整一段时期不过是一个漫长的睡梦。城中都是些做着这种白日梦的人。只有在深夜里，他们表面已经愈合的伤口重又突然裂开。他们被疼痛惊醒时，他们才算清醒一下。他们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痛又痒的伤口边缘，重新体会到伤口上的疼痛，突然又变得如此清晰，随之而来的是恋人模糊的面容。到了早上，他们又回到了灾难之中，也就是那些机械地生活。

但是人们会问，这些分别的人脸上会有怎样的表情？其实这很好回答，他们是面无表情。或者换种更好的说法，他们带着所有人的表情，一种极其普遍的表情。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比如说，他们当中一些最聪明的人也学着和别人一样看报纸听广播，在上面寻找鼠疫就快结束的可信理由，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读着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哈欠的记者碰巧写的一篇评论，就为找不

到任何依据而害怕不已。其他的人，他们不是喝酒就是照顾病人，不是无精打采就是筋疲力尽，不是在分类卡片就是在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也不再挑三拣四了。鼠疫消除了他们对事物价值大小的判断。这点很容易看出来：没人在买衣服和食物的时候再去看它的好坏质量，人们一概收下。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分离的人不再拥有他们一开始保有的奇怪特权了。他们失去了爱情的自私心理，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好处。至少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灾难关系到每一个人。城门传来的阵阵爆炸声，一个个戳子有节奏地敲出我们的生或者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周围恐怖的气氛，登记在册的屈辱死亡所需要的礼节，可怕的浓烟，平静的救护车铃声：我们所有人啃着流放犯的面包，一无所知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重逢和共同安宁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成了一种负担，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没有结果。爱情只是没有尽头的忍耐和固执地等待。从这点看来，市民中某些人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城市四处的粮食店前排着的长队。那些排队的人也带着同样的顺从和隐忍，同时又是遥遥无期，没有幻想。所以只要把这种心情再放大到一千倍就符合分离的人所受的相思之苦了，而这是另一种饥渴，它将吞噬一切。

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对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所具有的精神状态有个清楚的概念，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满天余晖，遍地尘土的永远不变夜晚，当夜幕降临到这个没有树木的城市时，男人和女人们涌上所有的街道。因为奇怪的是，在这片仍有光照的土地上没有任何机器和汽车的喧闹，而往常这些都是城市固有的语言，现在只能听到巨大的沉闷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那是阴沉的天空下，疫神发出的呼啸声，为上千上万的人痛苦挪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无休无止，沉闷难忍的践踏声最后逐渐充满了整座城市，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这种声音无比低沉无比忠实地催生了一种盲目的固执情绪，最后终于取代了人们心中的爱情。

鼠疫 第四部

19

九、十月间，鼠疫守着这座孤城。疫神从没有停止它前进的脚步，成千上万的人只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原地顿足。云雾，烈日和暴雨相继向天空袭来。从南面来的棕鸟和斑鸠的队伍，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开城市，好像帕纳卢所描述的疫神在屋顶上挥舞着那根奇特的木棍，发出呼呼的声音，吓得它们不敢靠近。十月一开始，大暴雨把街道洗刷的一干二净。这段时间里，只有疫神的践踏还在继续，破坏了一切。

这时里厄和他的朋友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组织里的人已经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疲惫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点，是在他观察到身边的朋友和他自己身上增长了一种漠不关心的奇怪心理。这些人在以前一直对有关鼠疫的消息表现出极大兴趣，现在却不再关心任何事情了。朗贝尔临时被分配去管理一间隔离病房，那个病房不久前才设在他们的酒店里，他对那里的隔离观察的人数都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这套制度的细节都十分清楚：一旦发现疫情，就马上转移病人。那些关于血清在隔离病人身上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数据也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但是他也说不出每周在鼠疫中的具体的死亡人数，他其实不清楚疫情是进还是退。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仍然希望尽快能够出城。

至于其他人，由于日日夜夜地埋头于他们的工作，根本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要是有人跟他宣布某个结果，那时他们才会显出一副感兴趣的神情，但其实他们只是

抱着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这使人们联想到那些战时因为建筑工事而筋疲力尽的士兵，只专心于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不出现差错，对决战和停战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格朗，他还在继续着针对鼠疫的必需的统计工作，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和塔鲁，朗贝尔以及里厄不同的是，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然而，他却同时要兼做几份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夜间的工作。这样就使他一直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只有两三个坚定的想法还在支撑着他，比如鼠疫之后就会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假期，他就可以轻松地进行他正在做的令人“脱帽致敬”的工作了。而且他还很容易产生突然的感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主动向里厄谈起让娜，想念那时她可能在哪里，她读到报纸上的消息会不会想起他。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跟他说起自己的妻子，这让里厄自己也很吃惊，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他的妻子发来的电报总说她很好，让他安心，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发电报给他妻子所在疗养院的主治医生询问情况，医生回复他说他妻子病情加重了，医院保证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病情的恶化。他一直把这个消息压在心里，他也无法解释为何会向格朗提起，可能是疲劳的缘故。公务员先是跟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里厄才作了回答。“您知道的，”格朗说，“现在这种病很快就能治好。”里厄点点头，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有点长了，他也许可以帮助他的妻子战胜疾病，但是如今，她一定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说不下去了，只是含糊地回答着格朗的提问。

其他人也是相同的情况。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但是他的记事本说明他依然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但是这种好奇心失去了它的广度。在这段时间里，他看来只关心科塔尔。自从酒店改做隔离病房后，晚上他就住到了里厄家里。他几乎不太注意听格朗或者里厄谈论抗击鼠疫的情况，没听几句，他就马上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上。

关于卡斯特尔，那天他来通知里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之后他们决定在受到细菌感染奥登先生家的小男孩身上进行第一次试验，这个小男孩刚被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当里厄正要把最新的疫病统计数据告诉老朋友的时候，

他发现对方已经陷进扶手椅里沉沉地睡去了。以往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温文尔雅而又有点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而此刻他看到的是一张已无生气的脸，微张的嘴角边挂着一丝唾液，显示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这张脸，里厄感到自己喉咙哽咽了一下。

这是里厄在疲惫时感到了自身的软弱。他渐渐失去了同情心。他的心大多数时候是打了结的，变得冷酷无情，然后一点点地被打碎，陷入某些感情而无法自拔。他唯一的自我防卫的方式是躲避在这个冷酷的外表之下，拉紧在心里形成的心结。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能让自己继续工作的好方法。此外，他没有太多的空想，身体的疲惫剥夺了他的这项权利。因为他明白，在这个看不到结尾的时期中，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他的职责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断定病人患了可怕的病症，这些就是他的任务。那些家属拉着他的袖口，嘶喊着：“医生，救他一命吧。”但是他去那里不是为了救人性命，他去那里是为了下达隔离的命令的。那时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的怨恨代表着什么？“您没有心肝。”有一天有人这样对他说。不，他有一颗心啊。这颗心支撑着他每天持续二十小时的工作，眼睁睁地看着本该活着的人一个个死去。这颗心促使他日复一日地重新开始这项工作。他的心只够使他做这些事。这样的一颗心，怎么足以去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救助，而是消息。当然，这不能称为一种人事。但是说到底，在这个惊恐万分，不断有人死去的人群中，究竟谁还有闲心去执行人事呢？这时疲惫还真有点好处。要是里厄头脑更加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弥漫的死人的气息一定会让他触景生情。但是对于一个只睡了四个小时的人来说，他是不会多愁善感的。他们只看到事物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他们看待事物就是以正义为标准，那种丑陋的和嘲笑人的公正。而对于其他的人，就是那些被诊断得了绝症的人，他们也体会到了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之前，他们把他看作是救世主。他仅用两三粒药丸和一针注射剂就能处理好一切，他们紧握着他的手臂，顺着走廊一路送出来。这个举动讨人喜欢，但是危险。而现在，相反的，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士兵，为了让某户人家开门还要用枪托砸他们家的门。就好像他们要把他的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要把全人类同他的家人一起送上死亡的道路。啊！人类确实不能离了同类，他

也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需要别人的怜悯。这种怜悯之心，在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深切。

在这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至少这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其中还夹杂着他对分离状态的思考。在他的朋友们的脸上也同样有所反映。所有抵抗鼠疫的人都开始有点支持不住了，这种疲惫所带来的最大的危险，不是他们对死亡的冷漠和对病人的无情，而是他们的漫不经心，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这时他们都有一种倾向：省略一切看来不是绝对必要的手续，总是高估自己的力量。这些人越来越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条例，忘记他们应该在自己身上实施的消毒程序，有时没做防疫措施就急忙赶到感染肺鼠疫的病人的家里，因为他们往往是被临时通知去病人家里的，他们已无精力去某些规定的地方注射必要的点滴。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因为同鼠疫斗争本身就使他们最容易受到鼠疫的感染。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但是运气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

然而在城里还有一个人，看起来既不疲倦也不沮丧，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这个人就是科塔尔。他继续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塔鲁一有空，科塔尔就会去看他。一方面这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够了解，另一方面，还因为塔鲁总是以一种永远不变的真诚态度欢迎这位享受年金的小矮个儿。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奇迹：不管他做了多么繁重的活，塔鲁总是和蔼可亲。甚至有几个晚上疲惫已使他不堪重负，第二天他又能精神抖擞。科塔尔对朗贝尔说过，“我同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有人情味。总能体谅别人。”

所以这段时期里塔鲁的笔记就逐渐集中到了科塔尔这个人物上。塔鲁试着给出了一篇记录了科塔尔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的文章，有些是科塔尔亲口对塔鲁袒露的，或者是他自己做出的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科塔尔同鼠疫的关系”，占据了日记本的好几页纸，叙述者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摘要。塔鲁对这位矮个的领年金的人总的看法总结在这句评价中：“这是一个形象渐渐高大起来的人物。”另外从外表上看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有时在塔鲁面前，他会用这样的句子吐露他心底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但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说，“他同别人一样受到威胁，但是他仅仅是同别人在一起。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受到鼠疫的感染。他的神情表明了他有这样的想法，换个角度看这个想法倒也不蠢。当一个人遭到严重的疫病或者深深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者烦恼。‘您是否注意到，’他对我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得所有病？假设您自己得了重病或是不治之症，比如癌症晚期或者要命的结核，那么您就绝不会得鼠疫或者伤寒。而且，‘这方面的效果要比上面的例子大得多，因为我们绝见不到一个癌症患者会死于车祸。’先不管真假，这种想法让科塔尔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与别人分开。比起被单独一个人监禁起来，他宁愿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鼠疫一来，什么秘密的调查，档案，登记卡，密令以及围捕等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确切地说，这里不再有警局，不再有新的或者旧的犯罪，不再有罪犯，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最专制的疫神的恩赦，而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警察。”这样一来——还是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你们尽管说吧，反正这种事我早就经历过了。”

“我跟他讲，唯一不与别人分开的方法说到底就是要凭良心做事，但根本是白说。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依照您说的，人和人就绝不可能呆在一起了。’他接着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不过我要跟您说的是，唯一使人在一起的方法就是把鼠疫降临到他们头上。您看看周围的人和事就知道了。’事实上，我完全明白他想说什么，我也知道现在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的安逸。旁人的反应跟他相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每个人都企图让所有人和他呆在一起；在开始为别人指路时我们热情有加，但再次看到他们时就不耐烦了；人们对高级餐厅的趋之若鹜，待在里面时得意洋洋，不想出来；每天出现在电影院门口的排着队的闹哄哄的人群，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来势汹汹的潮水一样涌向公共场所；人们都害怕与人交往，但是人类火热的欲望，又驱使男男女女互相靠近，摩肩擦肘。显然，科塔尔早就经历过这些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的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

克制了。

“总之，鼠疫在他这取得了胜利。它把这个不甘孤独的人变成了他的同谋。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同谋，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他赞同他所看到的一切。人们寄托于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敏感的处于戒备状态的神经；他们尽量避免谈到鼠疫却又不断提起鼠疫的怪癖；自从他们知道了疫病是先从头部开始发病后，一点点头疼也能把他们吓得面色苍白，惊慌失措；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情绪，使他们把别人的遗忘也看作是一种冒犯，甚至会为丢失了一颗裤子上的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晚上一起出去。他接着在他的笔记本中记叙了他们如何走到这群在黑夜或者暮色中忧郁的人群中去，淹没在摩肩接踵的黑白的人影之中，因为每隔一段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光的路灯，他们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冷酷无情。几个月前科塔尔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找的正是这种奢侈丰富的生活，这正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满足的纵欲狂欢的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鹜。一面物价不断上涨，另一面人们却挥金如土；一面大多数人连生活必需品都很缺乏，另一面人们却大量消费奢侈品。我们看到供游手好闲的人消费的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会花很长时间跟踪一对情侣，以前，情侣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掩人耳目，而现在却紧紧相依着对方，毫无顾忌地走在大街上，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置之度外。科塔尔羡慕地喊道：“啊！伟大的爱情。”面对这种集体的狂热，看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听着在他周围人们大把大把地丢出的小费发出的响声，他兴高采烈，高声喊叫。

然而，塔鲁觉得科塔尔的这种态度并没有什么恶意。他说的那句“我早就经历了”的话显示了他的不幸遭遇要远多于得意的心情。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认为他开始喜欢在天空和城市的高墙之间的这群受到监禁的人们。比如，他会主动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他曾跟我断言说，‘您来听听他们说的这些话，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而现在他们不愿安安心心过日子，却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这种事对他们有利的一面。而我这样的人，难道还能说，在我被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逮捕就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这回鼠疫来了……您想听听我的想法么？他们是悲哀的，因为他们不能顺

其自然。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确实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塔鲁在这段话的后面补充道，“他恰如其分地讲出奥兰居民的这种矛盾。他们感到迫切地希望互相接近的热情，却因为心存戒心而又彼此疏远。人们深知不能轻信自己的邻人，因为对方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你对他的信任，把鼠疫传染给你。如果有人，和科塔尔一样，花时间从他身边的同伴中找出一些可能会告发他的人，我们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同情下面提到的这种人：他整天担心着鼠疫随时会把它的魔手伸到自己的肩膀上，可能就在他庆幸安然无恙的时候突然降临。尽管有这种可能，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还是轻松自如，这是因为科塔尔早就经历过了，所以我相信他完全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之，和我们这里所有还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自由和性命是朝夕不保的。可是既然他已经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觉得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也是正常的。更确切地说，在他看来，大家共同分担的恐惧，比他一个人承受它的时候轻多了。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理解。但是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本日记本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它说明了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具有的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也大致表现了这段时期里的难以忍受的气氛，这就是为什么叙述者要重点提到它。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去市歌剧院观看歌剧《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①》。这支剧团是在鼠疫发生的那个春天来到我们的城市的，因为疫病被困在了城中。在同我们这儿的歌剧院协商之后，他们被迫每周一次地重演他们的歌剧。就这样，几个月以来，每到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回荡着俄耳甫斯曲调优美的哀怨唱腔以及欧律狄刻无力的呼喊声。然而，这出剧目继续受到公众的欢迎，总是座无虚席。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上，周围坐着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迟到的人极力让人

①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竖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带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甫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们注意到他们的入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还在轻声调音时，现场只有一些黑影从一排座位小心翼翼地钻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位上的人鞠躬致意。人们斯文地小声交谈着，又恢复了不久前他们在城市黑暗的街道上行走时失去的镇定情绪。他们的礼服赶走了鼠疫。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甫斯引吭高歌，如泣如诉。几个穿着长裙的女子优雅地评论着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歌颂着他的爱情。全场报以适度的热情。人们几乎没有发觉在第二幕中俄耳甫斯的唱腔中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颤抖，接着他在用眼泪向阴间的神灵恳求怜悯时，哀婉的音调也显得稍微有些过分。他出现了几个不连贯的动作，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类失误看成了歌唱家的别具风格，认为这给他的表演增加了光彩。

在第三幕中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要有一个二重唱（即在欧律狄刻和他的恋人诀别时），这时剧场里响起了一声惊叫。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种的反应似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好像来自正厅前排的这声惊叫暗合了他此刻的内心的感情，他选择在这一刻用一种古怪的方式——穿着古装，手脚张开——走到前台的脚灯处，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声牧歌从来就不合时宜，但是，在观众的眼中它还是第一次变得真正的不合时宜，而且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因为，就在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排的观众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剧场，起先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在弥撒结束的时候走出教堂，或者又好像参加完葬礼走出殡仪馆，女人们收起她们的长裙，低着头离开，男人挽着女伴的手肘指引她们离开，避免她们撞到折椅。但是，渐渐地，人流的移动开始匆忙起来，原先的低语音变成了惊呼，人群开始朝出口涌动，挤作一团，互相冲撞，一边叫喊着。科塔尔和塔鲁，只是先站了起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的一幅形象的画面：舞台上的鼠疫由一个蹩脚的二流演员扮演，这时在剧场中一切奢华都是无用的，比如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的扶手椅上拖到地上的凌乱的花边。

20

九月的最初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认真地在里厄身边工作。期间他只请了一天的假，因为那天他要去和冈萨雷斯以及两个年轻人在一所中学会面。

那天中午，在约定的地点冈萨雷斯和记者等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正笑着往这边走过来。他们说上次失去了机会，他们还要等待机会。不管怎样，现在已经不是他们值班的星期了。必须耐心地等到下个星期。那样就需要重新开始。朗贝尔说要一言为定。于是冈萨雷斯建议下个星期一再见面。但是，这次要把朗贝尔带到马尔塞斯和路易的家里去。“我们见一次面，就我和你。要是我没出现，你就直接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会跟你说他们的住址。”但是马尔塞斯，或者可能是路易，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现在就把他的朋友带过去。如果不嫌弃的话，那里有够他们四个人吃的食物。他考虑了一下这个建议。冈萨雷斯说这个主意很好，于是他们朝着港口走下去。

马尔塞斯和路易住在海军营地的头儿上，靠近朝悬崖开放的那个城门。这是一间低矮的西班牙民居，墙打得很厚，油漆的木板窗，隔出了几个阴暗的空溜溜的房间。给他们做米饭的是年轻人的母亲，这是一个满脸皱纹，面带微笑的西班牙老太太。冈萨雷斯感到吃惊，因为现在城里已经缺米了。“在城门那里能搞到。”马尔塞斯说。朗贝尔吃饱喝足了，冈萨雷斯说他是好家伙，而此时记者心里只想着他要度过的这个星期。

事实上，他还要等两个星期，因为要再过半个月才轮到那两兄弟值班，那时的

警卫队人数才会减少。在这半个月中，朗贝尔从没有间断地，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眼睛只眯一会儿。到了深夜，他躺下后就能沉沉地睡去。由空闲突然转到使人精疲力尽的繁重工作的过程使他连做梦的力气也没了。他很少谈起他不久的逃跑计划。唯一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在一个周末，他第一次向医生讲出了实情，前一天晚上他喝醉了。他从酒吧里走出来时，突然感到腹股沟有些肿，手臂活动也有些不太灵活。他觉得这可能就是鼠疫了。那时他仅有的反应——这是他告诉里厄的——有点不可思议：他朝着城内高地跑去，在那的一个小广场上，看不见大海，但是可以望到更宽阔的天空，在城市的高墙之上，他大声地喊出他的女人的名字。之后他回到住处，却没有发现身上有任何感染的迹象，他对这次突然的发作有点担心。里厄表示他能理解人此时做出这样的反应，他说：“不管怎样，你想着它，它就真的来了。”

“奥登先生今天早上跟我谈到了您，”在朗贝尔刚要离开的时候，里厄突然补了一句，“他问我是不是认识您，他跟我说，‘您跟他提个醒，叫他不要和那些流氓来往。有人已经看上他了。’”

“这又说明什么？”

“这是叫你要赶快行动了。”

“谢谢，”朗贝尔一边握着医生的手，一边说。

出门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里厄注意到自从鼠疫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笑。

“那么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您应该有办法。”

里厄用往常一样的动作晃着脑袋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他选择了幸福，而他，里厄没理由去反对他。他觉得他没能力去判断这件事的对错。

“为什么叫我快点？”

里厄也笑了笑。

“可能是我也希望吧，我自己也想为追求幸福做点事。”

第二天，除了工作他们什么也没有谈。到了第二个星期，朗贝尔已经住到那间西班牙式的小房子里了。他们在共同的房间里安了一张床。由于两兄弟不回家吃午

饭，而且他们叫他尽量不要出去，所以大多数时候，他就一个人呆着，或者和他们的老母亲聊聊天。她人很干瘦，但精力充沛，穿着黑衣服，在她干净的白发下有一张布满皱纹的黄褐色的脸，当她看着朗贝尔时，沉默不言，只是眯着眼睛笑。

有一次，她问朗贝尔是否担心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说他认为这是一次出去的机会，虽然机会很小，但是如果待在城里，他们就可能永远分离。

“她人好么？”老妇人笑着说。

“非常好。”

“漂亮么？”

“我觉得很漂亮。”

“啊！肯定是因为这个。”她说。

朗贝尔想了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因为这个。

“您不相信上帝么？”老妇人说着握起手掌做祷告。

朗贝尔承认说他不相信，老妇人又说这也是原因之一。

“必须要见到她。您是对的。否则，您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剩下的时间里，朗贝尔绕着涂墙转了一圈，抚摸着钉在隔墙板上折扇，或者数着桌布穗子上的羊毛球数量。傍晚，两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也不怎么说话，只是说还没等到合适的时间。晚饭后，马尔塞斯弹了一会儿吉他，他们还喝了点茴香甜酒。朗贝尔一直若有所思的样子。

到了星期三，马尔塞斯回来的时候说：“就是明天晚上了。你做点准备。”两个人看守城门的人中，有一个得了鼠疫，另外一个由于和他住在同住，所以要接受观察。因此，这两三天内，马尔塞斯和路易就单独看守。今天晚上，他们就安排最后的细节。第二天，就可以走了。朗贝尔感谢了他们。“您高兴么？”老妇人问他。他是当然，但是他在想别的事。

第二天，阴沉的天空下，潮湿的热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关于鼠疫的坏消息不断。然而那位西班牙老妇人还是心平气和的。她说：“世上的人作了孽，所以，这是注定的。”朗贝尔同马尔塞斯和路易一样地赤着上身。尽管这样，汗水还是从他的肩膀上淌下来，流到胸膛上。百叶窗关着，屋子里只有一半的空间有亮光，他们

的皮肤呈现出一种带着光泽的褐色。朗贝尔一声不响地来回走着。到了下午四点钟，他突然穿上衣服，说要出去。

“小心点，”马尔塞斯说，“一切都就位了。半夜就可以走。”

朗贝尔去了医生家里。里厄母亲告诉他里厄在城内高地的那家医院里。来到医院的大门前，他看到依然围着一大群人。“走开！”一位士官瞪着眼睛喊道。那群人走开了，但还是围成一圈。“这里没什么好等的。”士官喊了一句，汗水渗透了他的上衣。那群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仍然不顾要命的酷热，停留在那里。朗贝尔把他的通行证给士官看，士官便跟他指了指塔鲁的办公室的位置。办公室的门开在过道这边。他和刚从里面出来的帕纳卢神甫擦肩而过。

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弥漫着药品和湿被单的气味，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旁，卷起的袖子里塞了一块手帕，汗水从他手臂的肘弯淌下来。

“还在啊？”他说。

“嗯。我想跟里厄谈谈。”

“他在办公室里。但是要是这事没他也能处理，就最好不要去找他。”

“为什么？”

“他太劳累了，我尽我所能帮他挡着。”

朗贝尔打量着塔鲁。他变瘦了。疲惫使他的眼神模糊，脸的轮廓也不清晰了。原本宽阔的肩膀现在蜷缩成一团。有人敲门，一个带着白色面罩的护士走了进来。他把一包卡片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并用一种好像被衬衣卡住喉咙的声音，挤出两个字：“六个”，然后就出去了。

塔鲁看了看记者，像打开扇子一样把那些卡片展示给他看。

“这些卡片做得不错，不是么？好吧，不，这些是登记死人的。晚上的死人。”

他的额头陷下去。他把装卡片的包重新包好。

“留给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计数。”

塔鲁站起来，用手撑着桌面。

“您就要离开了？”

“今天半夜。”

塔鲁说他为此感到高兴，希望朗贝尔照顾好自己。

“您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吗？”

塔鲁耸了耸肩。

“我这个年纪，只有真诚。说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您谅解。”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去吧。”

“不是这样的。”朗贝尔为难地说。他讲不下去了。

塔鲁盯着他，一下子朝他笑了笑。

他们沿着一条墙壁漆成亮绿色的过道走着，一路上闪烁着像水族馆里一样的光线。在一扇双层玻璃门的正前方，通过玻璃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古怪的移动，塔鲁把朗贝尔带进旁边一间装满壁橱的很小的房间。他打开其中一个壁橱，从里面拿出一套消毒设备：两个吸水纱布做的面罩。塔鲁把其中一个递给朗贝尔并叫他戴上去。记者问这是否有用，塔鲁回答说没有，但是可以让其他人相信。

他们推开玻璃门。这是一个很宽敞的房间，尽管在这样的季节，窗户还是紧闭着。装在墙的高处的机器轰隆隆的换着气，在兩排灰色的病床上空，机器的螺旋桨搅着雾状的热气。两边传来或低沉或尖锐的呻吟声，这只能是单调的诉苦。在从位于高处的装着横杠的窗口洒进来的强光中，一些穿着白衣服的人缓慢地挪动着。朗贝尔由于房间里可怕的热气，感到一阵不适，他几乎无法认出那个俯在一个呻吟着的影子身上的里厄。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而两个立在病床两边的护士却不知道做什么好。当医生直起身子时，他手里的工具掉到一个助手为他端着的盘子上，他在那里停了一会没有动，看着已经在接受包扎的那个人。

“有什么新消息？”他向走近他的塔鲁问道。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很多了。还要组建第三支没有朗贝尔的搜查队。”

里厄点头表示同意。

“卡斯特尔完成了他的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他建议做一个试验。”

“啊，”里厄说，“这太好了。”

“还有，朗贝尔也在这。”

里厄转过身。在面罩的上面，他眯着眼睛瞥见了记者。

“您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您应该呆在其他地方。”

塔鲁说因为他今晚半夜就走，而朗贝尔补充说：“计划是这样。”

他们每次说话的时候，纱布口罩都一鼓一鼓的，嘴巴对着的位置也弄湿了。这样的谈话有点不太真实，好像是几尊雕像之间的对话。

“我想跟您谈谈。”朗贝尔说。

“要是您确实想谈谈，那我们一起去吧。在塔鲁的办公室等一下我。”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里厄坐在了医生的车后座。塔鲁负责开车。

“已经要没汽油了，”开车的塔鲁说，“明天，我们走路过去。”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离开了，我想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

塔鲁没发话，继续开着车。里厄好像没能摆脱疲惫。

“那么她呢？”他低声说。

朗贝尔说他已经考虑过了，他仍然相信他以前相信的，但是如果他离开，他会感到羞耻。这会束缚他去爱他留下的那个她。但里厄挺直了身子，用一种坚定的声音说，这样做很不明智，追求幸福并不可耻。

“对，”朗贝尔说，“但是要是只有他一个人快乐，他就会感到羞耻。”

一直没有说话的塔鲁，这时没有转过头来，就强调说如果朗贝尔希望分担所有人的不幸，那么他就绝不可能有时间去享受幸福。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现在不一样了。”朗贝尔说，“我一直以为我不属于这座城市，你们的事也与我无关。但是现在我看到了眼前的东西，我明白我是属于这儿的，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

“何况你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否则你们也不会呆在医院里？你们是不是选择了放弃幸福？”

不管是塔鲁还是里厄都没有回答。沉默持续了很久，直到他们靠近医生的家。这时，只有里厄转过身来对着他。里厄费力地挺了挺身子。

“请原谅我，朗贝尔，”他说，“但是我不知道会怎样。既然您愿意您就留下来。”

车子突然地颠簸打断了他的话。他面对着他接着说：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背叛我们所爱的人。然而我背叛了她，我也是，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又倒在座位的垫子上。

“这就是事实，包含了一切。”他疲倦地说，“记住它，然后从中得出结论。”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道。

“啊，”里厄说，“在救人的同时，我们还不能知道结果。那么就让我们尽快救人，这是最要紧的。”

到了半夜，塔鲁和里厄给朗贝尔看他需要搜查的街区的地图，这时塔鲁看了看他的手表，抬起头的时候正好碰到朗贝尔的目光。

“您通知他们了么？”

记者移开了视线。

“我来你们之前，跟他们留了话。”他有力地说。

21

在十月的最后几天里，卡斯特尔的血清开始进行试验。实际上这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这次试验失败，医生确信城市将听任疫病的摆布，要么瘟疫继续肆虐，要么她毫无理由的自己停止。

卡斯特尔来看里厄的前一天晚上，奥登先生的儿子发病了，所有的家人不得不接受检疫隔离。而那位不久前刚出来的母亲因此第二次过上了隔离生活。遵照已有的规定，法官一发现他的孩子身上的疫病迹象，他就派人请来了里厄。里厄赶到时，看见父亲和母亲站在床头。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带走了。男孩正处于虚弱期，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叫喊。医生抬起头时，他碰到了法官的目光，在他后面是脸色苍白的母亲，她用手帕捂着嘴，张大眼睛看着医生的每个动作。

“是那个东西么？”法官冷冷地说。

“是的，”里厄回答，重新看了一眼男孩。

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是还是一直没说话。法官也停了下来。过了一会才低声说：

“那好，医生，我们就照规定的来办。”

里厄避开母亲的视线，她一直用手帕捂着嘴。

他犹豫地说：“如果我打个电话的话，事情很快就可以办。”

奥登先生说他会带他过去。而医生转过身来对那个女人说：

“我很难过。要知道，您该做些准备。”

奥登太太似乎呆住了，她看着地面。

“好的。”她抬起头说，“我会做的。”

在离开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真的没什么要求。女人一直沉默地盯着他。但是这次法官移开了眼睛。

“不用了。”他说，然后咽了一口口水，“但是请您救救我的孩子。”

一开始的检疫隔离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已，在里厄和朗贝尔接管后，他们执行了非常严格的措施。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也要分开隔离。因为如果一个家庭里的某个成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就不应该再增加得病的机会。里厄把这些理由解释给法官，法官对此表示赞同。然而，他的妻子和他互相之间的眼神让里厄感到这种分离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感到了不安。奥登太太和她的小女儿能够住进由朗贝尔管理的那家作为检疫隔离病房的酒店。但是由于那里已经没有床位了，预审法官会被分配到由省府组织的隔离营地里，营地就在市体育场上，搭着路政局提供的帐篷。里厄表示歉意，但是奥登先生说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规定，他应该遵守。

那个男孩被运到了辅助医院，被安置在有十张床的旧教室里。二十几个小时之后，里厄诊断小男孩的病情已经没有希望了。小小的身躯被感染细菌吞噬着，完全没有反应。所有小块的腹股沟淋巴结肿，疼痛但还几乎没有成形，堵住了他已经僵硬的四肢关节。他提前被制服了。这也是为什么里厄想到要在他身上试验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当天晚上，晚饭之后，他们实施了很长时间的接种手术，但是孩子身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反应。到了第二天黎明，小孩身上的各种表现无一例外判定了这个决定性的结果。

孩子现在恢复了一点知觉，在被单里痉挛性地打着滚。从早上四点钟起，医生，卡斯特尔和塔鲁就一直守在小孩的身边，一步步地观察着疫病的发展或者暂停。塔鲁站在床头，他粗壮的身躯有点驼着。里厄则站在床脚边，卡斯特尔坐在他的旁边，显出一副平静的外表，读着一本旧书。渐渐地，随着旧教室里的日光变亮，其他人也到了。首先是帕纳卢，他站在床的另一边，对着塔鲁，背靠在墙上。

在他脸上可以看到一种悲伤的表情，而这几天来的劳累也在他原本发光的额头上增添了几道皱纹。在他之后，格朗也到了。这时已经七点了，公务员抱歉说他有点气喘吁吁。他只能呆一会儿，因为他们也许马上就能知道准确的试验结果。里厄也没说话，把小孩指给他看：变了形的脸上眼睛紧闭着，用尽全力咬紧牙关，一动不动的身子，只有躺在长枕上的头不断地从左边转到右边，又转回来。当日光足够亮的时候，在房间尽头的还在原位的黑板上，他们终于能够分辨出上面画着的旧式方程的标记符号，这时朗贝尔来了。他背靠在床脚，掏出一盒烟来，但是看了一眼小孩之后，又把烟盒放回了口袋。

一直坐着的卡斯特尔，低下眼镜盯着里厄说道：

“您有他的父亲的消息么？”

“没有，”里厄说，“他在隔离营地。”

医生用力地握紧了床的栏杆，小孩呻吟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病人，突然男孩僵直了身体，重新咬紧牙关，身体的表面有点凹了下去，同时慢慢地张开四肢。男孩小小的身躯，在军用被下赤裸着，升上来一股羊毛和汗酸混杂的气味。小孩渐渐松弛下来，手和脚又缩回床中央，但是仍然闭着眼睛不出声，看起来呼吸更加急促了。里厄碰见了塔鲁的目光，但塔鲁马上移开了视线。

几个月来他们已经看过一些孩子的死亡了，因为可怕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一秒地亲眼目睹这样的悲痛过程。显然，这些无辜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一直不断让他们看到它真实的一面，就是一种愤怒。但是至少直到今天，他们只是感到某种抽象意义上的愤怒，因为他们从没有如此长时间地亲眼目睹一个无辜的人死去的过程。

孩子的胃就好像被咬了一口，整个身体又弯曲了，发出一阵尖锐的呻吟声。在几秒钟内他的身体就这样蜷缩着，打着寒战不停地抽搐，就好像他脆弱的骨架被鼠疫这股狂风吹弯了，又在高热重复的呼气中断裂开来。狂风过去了，他稍稍松弛一点，高烧好像褪去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不断发出恶臭的海滩上，气喘吁吁。当高烧第三次向他袭来时，好像要把他整个抬起来，孩子蜷缩着退到床尾，对点燃他的火焰惊恐万分，疯狂地摇着头，扔开身上的被子。大滴的泪水从他发炎的

眼皮里涌出来，脸色变得铁青，在一阵发作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瘦削的大腿和手臂抽搐着，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里面的肉已经溶化了，在凌乱的床铺上，孩子摆出了一个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一样的古怪姿势。

塔鲁俯下身，用他厚实的手擦去小脸蛋上夹杂的泪水和汗水。从一会前开始，卡斯特尔已经合上了书，看着病人。他开始讲话，但又不得不以一声咳嗽来结束他的句子，因为他的声音是突然爆发出来的。

“整个早上都没有缓解的迹象，是不是，里厄？”

里厄说是的，但是从孩子出现异常开始，他坚持了很长时间。帕纳卢，好像陷进了一堵墙里，这时他低沉地说：

“要是他会死，他就要遭更多的罪。”

里厄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张开嘴巴像要说话，但是又咽了下去，明显地努力控制住自己，把眼睛转向孩子。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阳光从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发出声音。格朗离开时说他还回来，但是里面的人好像都没听见。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紧闭双眼的孩子，看起来平静了些。他的两只手变得跟爪子似地，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他又举起来，扒开了盖在大腿上的被单。突然，孩子蜷缩起大腿，直到大腿靠在腹部上，才变得一动不动。这时他第一次睁开了眼睛，盯着站在他面前的里厄。他脸上凹进去的地方现在僵住了，成了土灰色，嘴巴也张开了，几乎同时从里面发出一阵拖长了的叫声，几乎不受呼吸的影响，在这个房间里突然充斥着一种单调的不和谐的抗议声，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不是人类发出的，但却同时传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里厄咬紧了牙关，塔鲁掉转过头。朗贝尔走近卡斯特尔身旁的那张床，而卡斯特尔的膝盖上还放着合上的书。帕纳卢看着孩子因病而布满污垢的小嘴，从它里面发出了一种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所有人自然而然地听着他用一种令人窒息的声音开始说话，这声音在还未停止的没有变化的呻吟声中显得清晰可辨：“我的上帝，救救这个孩子吧。”

但是孩子继续喊叫着，在他周围的病人也开始骚动起来。惊叫声还没有停止，而在房间的另一端，小男孩的呻吟变得更加急促，直到他自己又发出了一声真正的

叫喊，同时其他病人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大。顿时在房间里翻腾起一阵声浪，没过了帕纳卢的祷告，而紧紧抓着床栏的里厄，闭上了眼睛，感到极度的疲劳和厌恶。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站到了他的身边。

但是突然，其他病人都静了下来。这时医生辨别出孩子的叫声变弱了，越来越低，直到完全停止。在孩子的周围，其他呻吟又低沉地响起，好像是对刚刚结束的这场反抗的远处的回音。孩子的呻吟已经停止了，于是卡斯特尔走到床的另一边说已经结束了。孩子的嘴巴张开着，但没有任何声音，他蜷缩在凌乱的被子中，突然一下子缩成一团，他的脸上淌着眼泪。

帕纳卢走到床边，做出祈祷的手势。然后他提起长袍，从中间的通道走出去了。

“还要重新开始一切么？”塔鲁问卡斯特尔。

老医生摇了摇头。

“也许，”他强挤出一个微笑，“毕竟，他坚持了很长时间。”

但里厄已经走出了房间，他走得那样匆忙，神色那样冲动，以至于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拉住了他的手臂。

“我们一起走吧，医生。”他说。

动作依然匆忙的医生转过头，狠狠地丢出一句话：

“啊！那个孩子，他至少是无辜的，您很清楚这点。”

然后他背过身，在帕纳卢之前穿过房间的门，他来到了学校操场的尽头，坐在一条长椅上，周围是布满灰尘的石头，他擦了擦流到他的眼睛上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叫喊，来解开纠缠在他心里的死结。从榕树树枝间透过来的日光慢慢落下去了。早晨蓝色的天空很快被一片浅白色的云翳遮盖住了，周围的空气更加闷热了。里厄躺在他坐着的长椅上。他看看长椅，天空，慢慢地恢复了呼吸，渐渐地忍住疲惫。

“为什么如此生气地对我说话？”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到：“我也是一样啊，无法忍受这样的场景。”

里厄转过身对着帕纳卢。

“是的，”他说，“请您原谅。但是疲劳让我有点发疯。有时候我在这个城市里只感到我的愤怒。”

“我理解，”帕纳卢嘟哝着说，“这是令人愤慨的，因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习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挺直身子。他用他所有的力气和感情盯着帕纳卢，摇着头。

“不，神甫，”他说，“我对我所爱有另外的想法。我到死都不会去爱这个连孩子都要遭受折磨的世界。”

在帕纳卢的脸上，划过一道不安的阴影。

“啊，医生，”他温柔地说道：“我刚刚弄懂了什么叫上帝的恩惠。”

但是里厄又重新靠回长椅上。疲惫又回到身上，他最后用更加缓慢的声音说到：

“这是我所没有的，我明白这一点。不过我不想和您谈论这个。现在我们一起为某项事业工作，它使我们超越渎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

帕纳卢在里厄的身边坐了下来。他神情激动。

“对，”他说，“你们是在为拯救人类而工作。”

里厄勉强地微笑了一下。

“拯救人类，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太大了。我还没这么厉害。我只是关心他们的健康，这是首要的。”

帕纳卢犹豫了一下。

“医生。”他说。

但又停了下来。他的额头上也开始渗出汗水。他低声说：“再见。”然后在他起身的时候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离开时，还在思考的里厄，也起身，跨了一步。

“我还是请求您的原谅。”他说，“今后我不会发火了。”

帕纳卢伸出他的手，温柔地说：

“但是我还是没有说服您。”

“说服我什么？”里厄说，“我所厌恶的是死亡和罪恶，这您很清楚。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会在一起忍受它们并战胜它们。”

里厄握着帕纳卢的手，一边移开视线，一边说：

“您瞧，现在上帝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22

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遭受鼠疫感染的地方。他将自己置身于救护人员的行列中，置身于他认为自己应该属于的行列中，也就是参加第一线的救护工作。死亡的场景他也见多了。尽管原则上他有血清疫苗的保护，但是他对自身的生命也不是毫不在意。表面上他总是保持着冷静。但是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目睹了一个小孩死亡之后，他看起来好像变了。他消瘦的脸颊表明了他日渐增加的压力。那天他笑着告诉里厄，他正在撰写一篇短论，题目是：《一位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当时在医生的印象中，帕纳卢正在写一篇题材更加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讲明。由于医生表示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于是帕纳卢对他说，他将会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做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我希望那时您能够来，医生，您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神甫进行了他的第二次布道。老实说，参加者的队伍比上一次布道的时候人少多了。这是因为对市民来说这种表演已经不再具有新鲜感产生的吸引力了。在城市正在经历的艰难时刻里，连“新鲜感”这个词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当他们还未完全放弃了参加宗教仪式，或者说，他们还不能一边去参加宗教仪式，一边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人生活，这时，他们选择用缺乏根据的迷信代替日常的宗教仪式。他们宁愿戴上神灵的圣牌或者圣罗克的护身符，而不去

望弥撒。

比如，我们的市民迷信预言就是个例子。春天时，大家就已经在期待疫病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向别人打听，鼠疫到底要持续多久，因为所有人都深信这场瘟疫很快就会结束。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人们开始担心这场不幸真的会没完没了，与此同时，人们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到了瘟疫的停止上。于是人们之间就开始流传那些出自占星家或者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的预言。城里的印刷商很快看到了他们能够从这股风气中获得的好处，于是发行了大量此类的流行文章。当他们发觉公众的好奇心仍无法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请人到市图书馆去收集野史轶闻，找出一切关于此类预言的证据，然后印出来在全城推销。当这些故事本身不足以做出这种预言的时候，他们请记者来在上面添油加醋，至少在这点上，他们展现了同过去几个世纪的前辈相当的能力。

某些这类的预言甚至开始在报纸上连载，读者对此的热切程度丝毫不亚于平日他们对上面的言情小说所表现出的喜好。其中的一些预言是借助于某些古怪的演算编造出来的，他们的根据有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人数以及在鼠疫状态下已经度过的月份数等。另外一些则把现在的情况同史上的大鼠疫做了比较，从中发现某些相似点（预言里称之为常数），还有通过一些同样古怪的算法，期望从中发现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那些用一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在城市里应验，其复杂程度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解释。于是，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而所有这些预言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最终使人感到安心。只有鼠疫不是这样。

于是市民用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帕纳卢的第二次布道时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坐着人。布道的那天傍晚，当里厄赶到的时候，大风从入口处剧烈摇

①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③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晃着的大门门缝里一丝丝地灌进来，在听众之间自由地穿梭。在一个寂静寒冷的教堂里，里厄在一堆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众中间坐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了讲台。神甫说话的语气比第一次更加温柔，更加谨慎，在场的人多次注意到在他说话时还带着某些犹豫。还要奇怪的事是，他说话时没有用“你们”，而是称“我们”。

然而，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场时提醒大家说：几个月以来，鼠疫降临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旁或者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徘徊在我们身边，在工作的地方等待我们的到来，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加清楚了，因此现在我们也更加能接受它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可能没有认真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上次在同一个地方的布道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对此坚信。但是，还有可能，由于他当时想的和说的都缺乏慈悲之心，他现在感到后悔了。不过有一点是始终正确的，任何事物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有价值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种恩惠。而且准确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督徒所要寻找的，正是它的恩惠，还有思考这种恩惠是什么以及找到它的方法。

这时，在里厄周围的人们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椅的扶手之间，并且尽力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入口处一扇装了垫料的门轻轻地摇晃着。某个人离开座位，将它固定住了。由于被这个举动分了心，里厄几乎没有听见帕纳卢接下来的布道。他大致说，不应该企图解释鼠疫的景象，但是要试着去学习我们能从中学习到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解释。他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因为这时帕纳卢有力地说，在上帝的眼中，有一些东西我们能够解释，但有些东西解释不了。世上的事物当然有善恶之分，总的来讲，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讲到恶的本质，困难就开始了。比如说，有表面上必要的恶，也有表面上不必要的恶。有被投入地狱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小孩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之徒要被闪电劈死的话，那么孩子为什么也要受这样的痛苦。然而，事实上，世上没有任何事比这更重要：一个小孩的痛苦，这种痛苦带来的恐惧以及需要

①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为其寻找的原因。除此之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现在在这里，刚好相反，他将我们置于墙角。我们就是这样被困于鼠疫的高墙之下，也正是它那致死的阴影要求我们寻找我们的好处。帕纳卢甚至拒绝接受这种能帮助他翻过高墙的便利。他本可以自然地说等待着小孩长久的快乐将补偿他所受的痛苦，但是事实上，他什么都不知道。谁会真的确认永久的快乐就能够补偿人类一时的痛苦？如果有，那他不算基督徒，不，神甫留在了墙角，因为他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酷刑，面对着一个小孩受苦。他毫不惧怕地对那天听他布道的人说：“弟兄们，这样的时刻已经来到。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相信信仰中的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然而在你们当中有谁敢否定一切呢？”

里厄几乎还没来得及想到神甫讲的接近于异端思想的边缘，而对方已经接着有力地說道，确定地发出命令：这种无条件的限制就是基督徒所能获得的好处。这也是他的道德。神甫知道这种他将要肯定的极端的道德将会触犯到很多灵魂，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加宽容也更加传统的道德。然而鼠疫时期的宗教不可以是一直以来的宗教，并且，要是上帝允许——甚至是期望——在幸福时期里灵魂可以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不幸的时期中，他就更希望如此。上帝今天给予他的造物以恩惠，把他们置于不幸之中，是为了要求他们重新找回和承担起最大的道德，要么相信一切，要么否定一切。

几个世纪以来，一位不信教的作者打算通过证明不存在炼狱，来揭露教會的秘密。他暗示不存在权宜之计，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我们的选择，世人不是得救就是下地狱。照帕纳卢的说法，这是一种异端，因为只有一个放荡的灵魂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炼狱是存在的。但是也许，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人们无法被人理解。一切的罪恶都是必死的自己卖给自己看的，一切的麻木都是有罪的。这就是要么相信一切，要么否定一切。

帕纳卢中断了讲话，里厄这时更加清楚地从门缝下听到，外面的风的诉苦声好像加倍了。就在同时，神甫接着说，全盘接受他刚才所说的道德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人们通常赋予它们的意义，它不意味着对平庸的顺从，更不是对困难的卑躬屈膝，但这是一种耻辱，而这种耻辱是被允许的。显然，一个孩子受的苦是让灵魂和

内心都感到耻辱的。但这也是为什么要走进它的原因。但这是为什么，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相信他将要说出的东西并不容易说，但必须说，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因此，只有基督徒不宽恕任何东西，所有密封的出口都通向本质选择的底部。他选择了相信一切，因而就不会再否定一切。就是现在，那些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恶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人们会说：“上帝啊，让他涨淋巴结吧”，基督徒知道委身于上帝的意志，甚至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说：“那个我理解；但是这个我不能接受”，必须在内心里跳过这种别人提供的难以接受的东西，只是为了做我们自己的选择。孩子的痛苦就是我们的苦面包，但是没有这个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死于精神上的饥渴。

帕纳卢神甫每次停顿时，会场里都会出现了一阵小声的骚动，声音渐渐传到神甫的耳朵里，这时这位布道者突然高声接着说，并做了一个表情，要求坐在座位上的听众务必保持安静。他预料到人们会说出关于宿命论的可怕的字词。但是他不会在这些字眼面前退缩，如果人们只允许他在它上面加一个形容词“积极的”。当然，再一次，他不应该仿效他讲到过的阿比西尼的基督徒。他甚至也不想像患鼠疫的波斯人一样，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在基督教的卫生木桩上，并高声向上天祈求，恳求他将鼠疫降临到那些妄想反抗上帝的命令的不信教的人。但是反过来，更不应该仿效在史上的瘟疫中的开罗僧侣那样，用小夹子拿着圣餐饼来分发圣餐就为了避免接触信徒温热潮湿的嘴唇，因为上面可能寄生着瘟疫病菌的。患鼠疫的波斯人和那些僧侣都同样是犯罪的，因为，对于前者，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受苦，而后者则相反，人类对于痛苦的恐惧已经蔓延所有的事物。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被规避了。所有人对上帝的声音充耳不闻。但是帕纳卢想回忆的是另一个例子。根据马赛大鼠疫的记录者的叙述，在梅尔茨修道院的八十一名修士中，只有四人在瘟疫中幸存下来。而这四人当中又有三人逃走了。记录者们只说了这么多，而且他们的工作也不能提供更多的事实。但是帕纳卢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个独自留下的人身上，尽管他面对着六十七具死尸，尤其是尽管他看到了他的三位弟兄做出的榜样。这时，神甫用拳头敲响了讲道台的边缘，叫了起来：“弟兄们，必须做那个留下来的人。”

这不是说要拒绝防疫措施和生活的秩序，只是不要让一个社会处于灾难的混乱之中。不要听信那些道家说的应该跪倒在地，放弃一切。唯一应该做的是在这片黑暗中，一点点试过去，试着做些善事。而其余的事，就是要留下来，接受对上帝的信仰，甚至为了死去的孩子，不要寻求个人的救助。

说到这，帕纳卢提到了贝尔恩斯主教在马赛大鼠疫时的伟大形象。他回忆说。在瘟疫快要结束时，主教做了所有他应该做的，当认识到他已经无药可医的时候，就带上食物把自己关进了用围墙隔开的房子里。视他为偶像的居民，由于情感上的突变，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迁怒于他，用死尸围住他的房子来使他感染，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就为了致他于死地。这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主教确信自己要离开这个死人的世界了，而从天而降的死人砸到他的头上。如果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够说服我们的那个人不会出现在鼠疫包围的孤岛上。不，没有间隔。要承认这次的丑闻，因为我们有权选择讨厌上帝或者皈依上帝。而谁又敢怨恨上帝呢？

“弟兄们，”帕纳卢最后说道，宣布了他的结论，“上帝之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必须以抛弃自己和蔑视他本人为前提。然而，只有它能够消除痛苦和孩子的死亡，只有它在任何情况下使其成为必然，因为它无法理解，只能期望。这就是我想和你们分享的困难的忠告。这就是信仰，在人的眼里这是残酷的，而在神的眼中这是决定性的，这时我们应该靠近他。在这个可怕的场景中，必须使人人平等。在最艰难的时刻，一切都模糊了，进而获得平等，真理从表面的不公正中显现。正是这样，在许多法国南部的教堂里，几个世纪以来，鼠疫患者在教堂祭坛的石板下安息，神甫则在他们的墓地上面讲话，他们传播的神灵从这堆骨灰中钻出来，而其中就有一些是孩子。

当里厄出去的时候，一阵狂风从半开的门缝中涌进来，打在忠实的信徒的脸上。它给教堂带来一股雨的气息，潮湿的人行道的气味使他们猜测他们走出去之前城市的景象。医生的前面走着的一个老神甫和一个年轻的执事这时难以保持他们的发型了。年长的那个人一刻不停地对这次布道大加评论。他很赞赏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神甫所表达的如此大胆的想法儿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展示的不是力

量，更多的是不安，而在帕纳卢这样的年纪，他的布道没有权利变得担忧，那个年轻的执事，低头顶着风，承认说他经常接触帕纳卢神甫，他很了解这件事的进展，他的论文还可以更加大胆，但这无疑得不到教会的出版许可。

“他的想法是什么？”老神甫说。

他们来到了教堂前的广场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风呼啸着，盖过了他们的说话声。当他们彼此听得见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

“如果一个神甫请医生看病，就会有矛盾。”

里厄向塔鲁复述了帕纳卢的讲话，塔鲁说他认识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了信仰的神甫，因为他看到了一张双眼裂开的年轻人的脸。

“帕纳卢说得对，”塔鲁说：“当一个无辜的人的双眼裂开，一位基督徒要么失去信仰，或者接受眼睛裂开的事实。帕纳卢不想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

塔鲁的评论是否可以使接下来在周围的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帕纳卢身上发生的不幸的事件变得清楚一点呢？人们将作出判断。

布道结束几天之后，帕纳卢忙着搬家。由于疫病的发展，这个时间城里搬家都很频繁。就好像塔鲁被要求离开酒店，而住到了里厄家，神甫也不得不离开他服务的医疗队所住的公寓，住到了一位老妇人家里，这位老妇人经常来教堂，还未感染鼠疫。在搬家的期间，神甫感到身上的疲惫感和焦虑正在增加。他也因此得罪了房东。因为在老妇人热情地赞扬他关于圣欧迪亚的预言的功劳时，神甫也许是由于疲倦，对她表现得有点不耐烦。之后他为得到这位老妇人至少是简单的欢迎多了一些努力，但是无济于事。他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每天晚上要回到他那个堆满钩针花边的房间时，他不得不看见那个女房东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他不禁想起她头也不回，冷冷地对自己说一声“晚上好，神甫”。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他睡下时，感到由于几天来潜伏的高热病，手腕上和太阳穴上的涌动一下子爆发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由他的女房东的叙述而得知的。早上，和往常一样她很早就起床了。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看到神甫从房间出来而感到惊奇，于是她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去敲门。她发现一夜未睡的神甫还躺在床上。他感到气闷得难受，

脸色看起来比以往更加红肿了。根据她的叙述，她是出于关心才建议神甫叫医生过来，但是她的建议被激烈地拒绝了，她为此感到遗憾，但只好回房间了。过了一会，神甫叫起来，请她过去。他对自己的情绪波动表示道歉，并向她表明自己的病不可能是鼠疫，而且他没有任何相关的症状，只是暂时的疲劳所致。老妇人严肃的回答他，她提出刚才的建议，并非出于对此的担心，她并没有联想到自己的安危，因为上帝掌握着它，她只是担心神甫的健康，因为她对此也负有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神甫没有再说什么，女房东——照她的话说——很着急，已经尽到她的责任了，她继续建议他请个医生。神甫又再一次拒绝了，并做了让老妇人感到很模糊不解的解释。她只是认为自己理解了，而神甫因为她不同意他的信念而拒绝了她的建议，仅仅是这个在她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她从中总结说，高热病扰乱了她的房客的想法。最后她能做的只是给他拿了一些汤药。

因为坚决要切实完成目前的状况给她所造成的责任，她每两个小时就会定时去看看病人。最让她感到震惊的是神甫整个白天里持续的烦躁。他把床单扔出去，又把它们收起来，不断用手摩擦着他湿润的额头，经常挺着身子想咳嗽又咳不出来，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喉咙又哑又湿，痛苦得像断了心肠一样。

这时他好像根本无法拿出卡在他的喉咙底部的，让他窒息的棉塞。在这些发作之后，带着所有筋疲力尽的迹象，他朝后倒了下去。结果，在弯下一半身子的時候，他还支撑了一下，看着他的前方，比之前的躁动时更加强烈的凝视。可是老妇人还踌躇着没有叫医生，以免使这位病人不快。从这些反常的迹象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高热病发作。

然而到了下午，她试着跟神甫说话，但只听到他几段模糊的言语。她又提出她的建议。但是这时神甫又起身，半坐着感到喘不过气来，直接回答她说他不需要任何医生。这一刻，女房东决定她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要是神甫仍不见好转的话，她就打那个朗斯多克情报局每天在广播上不断重复十几次的电话号码。由于专注于她的职责，她想到晚上的时候再去看他的房客，并且守在他身边。但是到了晚上，在把凉药汤送过去后，她又想稍微躺一会，然后第二天早上早点醒来再过来。于是她就溜回自己的房间了。

神甫一动不动地直躺着。吓得面红耳赤的老妇人又恢复了青灰色的面容，因为看到神甫的脸的轮廓还是饱满的。神甫目不转睛地盯着悬挂在床上方的由五彩的珠子串成的小吊灯。当老妇人进来的时候，他转过头朝向她。据老妇人所谈，那时他看起来经受了整个晚上的折磨，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再动了。她问他的身体状况。她注意到他用了一种格外冷漠的声音对她说他感觉很糟糕，但他不需要医生，只要有人把他运到医院里，一切按规定处理就行了。老妇人惊恐地跑向电话。

里厄是中午的时候到的。对于老妇人的叙述，他回答时只说帕纳卢做得对，但是太晚了。神甫迎接他时也是一副冷漠的表情。里厄检查他的身体，但是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除了气管堵塞和肺部的压迫感外，他没有在神甫身上发现任何腺鼠疫或者肺鼠疫的主要病征。尽管如此，他的脉搏非常的虚弱，身体的状况十分危险，几乎没有希望了：

“您身上没有任何疫病的主要症状，”他对帕纳卢说，“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可疑性，您需要接受隔离。”

神甫似乎是出于礼貌，露出了古怪的微笑，但是没有说话。里厄出去打了个电话，又返回来。他注视着神甫。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他对他温柔地说。

对方看起来好像恢复了精力，向医生投来了一种似乎重新回来的热情的目光，然后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出下面的话，但看不出他此时是否悲伤。

“谢谢您，”他说，“可是修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都依靠在上帝身上。”

他要求把他挂在床头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拿给他，当他拿到十字架时，就转过去盯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一言不发。他对别人给他提供的治疗一概予以拒绝，但他再也没有松开过手中的十字架。可是，神甫的病例依旧没有被弄清楚。这个疑问不断纠缠着里厄的神经。这个病到底是不是鼠疫。另外，一段时间以来，疫神好像热衷于混淆诊断方向。但是对于帕纳卢的病例，接下来的事表明这种不确定根本无关紧要。

高热加重了。咳嗽越来越刺耳，整整一个白天都折磨着病人。到了晚上，帕

纳卢神甫咳出了这团使他窒息的棉絮，已经被染红了。在高热病的头晕目眩中，帕纳卢依旧带着冷漠的眼神。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半个人倒躺在床外边，他的眼神没有任何内容。人们在他的登记卡上写着：“疑似病例。”

23

今年的亡人节^①与往常不同。诚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它已突然出现了变化，凉风一下子赶走了剩下的炎热。同往年一样，不断有冷风过境。大块的云朵从天际的这一边飘到另一边，它们的影子投射在房子上，等云朵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照到那片屋顶上。雨衣开始出现在街头。但是人们注意到，油光发亮的，贴胶布做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因为有报纸报道，在两百多年前的那场南方大鼠疫中，医生们通过油布来预防自己感染疫病。于是商店就趁机推销了一批过时的衣服的库存，因为人人都期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但是，所有这个季节的景色，没有使人想起墓地的荒芜。往年这个时候，电车上弥漫着菊花的淡淡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们来到她们的亲人安葬的地方，在他们的坟墓上献上鲜花。这个日子里，人们希望能够呆在死者的身边，以补偿几个月之内他们所忍受的分离与被遗忘。然而今年，不再有人想起死者了。人们确实已经想得够多的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一丝遗憾和无限伤感的心情回去拜祭死者了。他们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来到他们的身边表示歉意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人们尽力想忘记的打搅他们生活的死者。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亡人节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忽略掉。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认为他说话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了——现在每天都

①天主教把十一月二日定为亡人节，以追思去世之人。按照法国风俗习惯，是提前一天扫墓。扫墓时，置菊花束于亡者墓前。

是亡人节。

说实话，焚尸炉里疫神的火越烧越欢了。一天天过去，死亡人数确实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本质上来讲，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鼠疫的进度表经过持续的上升期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水平横线。比如在里夏尔医生看来，这真的是鼓舞人心的。“这个图表做得很好，好极了。”他说。他估计疫病已经到达了他所谓的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逐步缓和下来。他把这归功于卡斯特尔研制的新血清，因为这些血清刚刚获得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并没有否认，不过他认为实际上人们对鼠疫无法做出预计，因为在疫病史里能够找到出现出人意料反弹迹象的先例。而省府很久以来都期望能安抚一下民众的心灵，但因为疫情严重，他们一直没有这样做，现在省府打算把医生们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做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就在这时，里夏尔医生自己也被鼠疫夺去生命，而且这正好发生在疫病的稳定阶段。

在这样一个无疑是使人印象深刻，但又证明不了什么的例子面前，省府重又回到了悲观的情绪，与他们开始表现出来的乐观的欢迎态度大相径庭。卡斯特尔竭尽全力地专心于研制他的血清。不管怎样，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不被改造成医院或者检疫病房。如果还要人们尊重省府，就必须保留一些可以让人们集会的场所。但是，一般来说，由于这段时期鼠疫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里厄建立的防疫组织还勉强足够应付局面。已经筋疲力尽的医生和助手们，没必要去设想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的情况。他们只须继续干好这份有规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超人的工作。现在在城市四处，感染肺鼠疫的人数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加，就好像是风吹燃了他们肺里的火灾，并使它越烧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类型的疫病的出现，现在疫病的传染性有变得更大危险的可能性。老实说，那些专家的意见在这点上总是互相矛盾的。然而为了确保更加安全，救护人员继续戴着消过毒的纱布面罩说话。不管怎样，乍看来疫病似乎是增加了的，但是由于腺鼠疫的病例的减少，鼠疫的数量变化也就平衡了。

由于粮食供应问题与日俱增，人们又有了其他需要担心的问题。投机分子趁

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缺少的主食品。这样一来，穷人家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而富人们却什么也不缺。而鼠疫在它的内阁中引进了有效的公正态度，本可以强化市民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好相反，由于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这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的就是人们在死亡面前的绝对平等，但是这种平等谁也不愿意享受。那些忍受着饥饿的穷人更加怀念临近的城市或乡村，那里的生活更自由，而且面包也更便宜。因为人们自己都喂不饱自己，他们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合理的想法，他们早就该被放出去。最后他们又出不去，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空气”，有时可以在城墙上看到它，有时，可以在省长经过的时候听到它。这句带有讽刺性的口号成了标语，引发了几次游行示威活动，尽管这些游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的严重性每个人都看到了。

当然，报纸对上面的指示是言听计从，大肆地宣扬乐观主义。在它们上面读到的对于目前形势的描述，都是民众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的，令人感动的典范”。但是在一个自我封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保密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是全城人民做出的“典范”。要想对存在疑问的沉着冷静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只要走进一间检疫隔离病房或者由政府组织的隔离营地就可以看到了。那里有叙述者不认识的，被他称为其他人的沉着冷静的人。所以他现在只能摘引一点塔鲁的笔记来加以说明。

塔鲁在他的记事本中记录了一件事：他和朗贝尔一起去了市体育馆里的隔离营地。体育馆坐落在城门附近，一边靠着有电车经过的道路，另一边则是一块荒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地带。四周围绕着水泥高墙，只要在四个入口设置哨兵，里面的人就很难逃出去了。同样的，这些高墙也可以防止外面好奇的人看到里面检疫隔离病房里发生的不幸。相反，里面的人则整日听到看不见的电车驶过，在向他们靠近的越来越大的嘈杂声中，猜测着他们离开这回家的时间。于是他们明白了把他们排除在外的生活仍旧在距自己几米之外的地方继续着，而这堵水泥高墙隔开的两个世界比他们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塔鲁和朗贝尔选择前往体育馆的那天是个星期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那个足球运动员冈萨雷斯，是朗贝尔去找的他，并且说服了他来轮班负责看守这座体育馆。

朗贝尔把他介绍给营地的主管人。冈萨雷斯告诉他们两个人，他们找到他的那个时间，正好是在鼠疫之前他开始准备比赛的时间。可是现在体育馆被征用，比赛是不可能了，他自己也感到好像以后都要无所事事了。这也是他同意负责看守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只要允许他只在周末时过来。天是阴的，翘着鼻子的冈萨雷斯带着遗憾的指出，这样既没有雨又没有热气的天气，是最适合进行一场比赛的了。他提到了他在更衣室里擦香水，人山人海的观众，在黄褐色球场上的色彩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者像成千上万根冰针一样刺激着干燥的喉咙的汽水。塔鲁另外还记录了一些事：在整个过去的路程中，在经过郊区的坑坑洼洼的马路时，运动员不断地踢着脚上碰到的石子。他试着把它们踢进右边那个下水道的管口，当他命中时，他就会说：“一比零”。当他抽完一根烟时，就会把烟头吐向前方，然后在下落的过程中，用脚接住它。到了体育场附近，一群正在游戏的孩子把一只球踢到了走过他们的这群人，冈萨雷斯精准地把球回传给了小孩。

他们走进了体育馆。看台上都是人。但是场地已经被上百个红色帐篷给覆盖了，远远地在帐篷里面能够看到铺盖和包裹。人们保留了看台是为了让那些被关在这里面的人能够躲避太阳或大雨。不过太阳下山以后他们还是要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人们安装了淋浴设备，而以前的更衣室则被改造成了办公室和医务室。大多数的被关押者占满了整个看台。另一些在场地边游荡。有一些人跪在他们住的帐篷的口子上，茫然的眼睛扫过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在看台上，许多人躺着，似乎在等待什么。

“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做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没什么事。”

差不多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晃着手臂，两手空空。这么一大群人却出奇的安静。

“头几天，大家在这里相处得不好，”朗贝尔说，“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也渐渐开始说话了。”

根据他的笔记，塔鲁很理解他们，一开始看到他们在帐篷里蜷缩着，不是听着苍蝇的嗡嗡声，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当他们找到一个乐于倾听的耳朵时，他们就大声倾诉他们心里的愤怒或者恐惧。但是当营地里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超员的

时候，乐于倾听的耳朵也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闭上嘴巴，开始互相猜疑。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互相猜疑的气氛，它从灰暗，然而透亮的天空中掉下来，落到这片红色的营地上。

确实，他们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猜疑的神色。既然人们把他们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就不会没有原因，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是他们在寻找身边的人的原因，而他们自己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原因。塔鲁看到他们当中的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茫然的，所有人的表情都表明他们普遍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由于他们不可能整天想着死亡，所以他们就什么也不想。他们仿佛是在度假。“不过最糟糕的是，”塔鲁写道，“他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而且他们清楚自己的这种境况。认识他们的熟人遗忘了他们，因为熟人忙着考虑其他的事情，这还算能够理解。而爱着他们的爱人也遗忘了他们，因为爱人们为把他们弄出去而在做打算，到处奔走，已经筋疲力尽了。这也属正常。而这一切的最后，人们发觉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想着一个人，这才是不幸中的最不幸。因为真正的想念某个人，就是说要分分秒秒地想着他，不被任何事分心，既不需要照料家务，也没有苍蝇的嗡嗡声，既不需吃饭也不用挠痒。然而，总会有苍蝇，总要去挠痒。这就是生活的难处。而里面的人则对此一清二楚。”

隔离营地的主管人，又来到他们这边，跟他们说有一位奥登先生要求见他们一面。他先把冈萨雷斯领到他的办公室里，然后把塔鲁他们两个带到看台的一个角落，已经远远的坐在那的奥登先生起身迎接他们。他还穿着原来的那身衣服，竖着同一个硬领。塔鲁仅仅注意到他太阳穴上那簇头发已经翘起来了，他的其中一根鞋带也解开了。法官看起来很疲惫，甚至没有看他面前的说话者一眼。他说见到他们很高兴，他请他们代他向里厄医生为他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另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但愿，”法官停顿了片刻之后说道，“菲利普没有受太多的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法官说出他儿子的名字，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上，在两片云彩之间透出的阳光洒在看台的两侧，照亮了他们三个的脸。

“不会的，”塔鲁说，“没有，他真的没受多少苦。”

当他们俩转身回去的时候，法官继续朝太阳照过来的方向眺望。

他们去跟冈萨雷斯道别。他正在研究一张看守值班表。运动员一边微笑着，一边同他们握手道别。

“我还在更衣室旁边，”他说，“总是如此。”

没过多久，营地主管人又领塔鲁和朗贝尔出去，这时，从看台上传来一声巨大的噼啪声。然后那只在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者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发出了带着鼻音的声音：“被关押的人需要回到他们的帐篷里，现在开始分发晚饭。”男人们离开看台，拖着脚步回到帐篷。当他们全都就位之后，开进来两辆和车站里一样的那种小电动车，运着两口大锅，穿梭在帐篷之间。男人们伸着他们的手臂，两只勺子先伸到两只锅里，然后又拿出来，落到两只军用饭盒里。完了后汽车又开始前进。一切又在下一个帐篷重演。

“这很科学啊。”塔鲁对主管人说。

“是的，”对方一边得意的说着，一边分别握了他们俩的手，“这确实很科学。”

暮色降临，天空变得晴朗。营地浸泡在一道柔和而凉爽的光线中。在夜晚的宁静之中，各处响着勺子和盘子碰撞出来的声音。一些蝙蝠在帐篷的上空飞过，突然又消失了。墙的另一边，一辆电车发出切切的声音。

“可怜的法官，”塔鲁小声说着，穿过大门，“必须为他做点事情，不过怎么才能帮到法官呢？”

24

像这样的营地在城里还有几个，但是出于顾虑和缺少直接的资料，叙述者只能讲这么点了。然而，他要说的就是这些营地确实存在着的，里面男人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在暮色中高音喇叭发出的巨大的响声，神秘的高墙以及人们对被上帝遗弃的害怕，这些都使市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反而增加了混乱的局面和个人苦恼。同主管人之间的冲突也有所增加。

不过，到了十一月底，早上变得异常的冷。滂沱的大雨汇聚成的雨水冲刷了路面，洗净了天空，纯白色的云朵倒映在光亮的路面上。每个早晨，一轮无力的太阳把闪亮晶莹的光线洒向城市。到了傍晚，正好相反，空气又变得温热起来。塔鲁选择在这样的时刻向里厄医生谈心。

一天将近十点钟，在过完了漫长而又累人的白天之后，塔鲁陪着里厄去那个老哮喘病人家里出诊。老街区上的天空闪着微光。一阵轻风无声地拂过阴暗的十字路口。走过安静的马路，两个人来到了老人家里。老人又开始对他们喋喋不休起来。他告诉他们，城里有人对当局不满，因为他们总把那些流油的肥差留给自己人，而那些老是冒这种险的人总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说着他就洋洋得意地搓起手来，他们肯定要大吵一架。医生给他治疗时他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评论着时局。

这时他们听到房子上面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老人的妻子注意到了塔鲁有趣的表情，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有邻居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知道了原来从高处的

平台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而且他们房子的平台之间通常有一边是连通的，这也方便了街区里的女人们不离开家就能互相串门。

“是的，”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上面的空气很好。”

他们登上去时发现平台空着，放了三张椅子。在一边的目光所及之处，他们看到了一排的平台，尽头处靠在阴暗的石头丛中，他们认出那是第一座山丘。在另一边，越过几条马路和那看不见的港口，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海天相接的模糊的地平线上。他们知道那边是悬崖，再远一点，有一束微光有规律的一闪一闪，但是他们不知道它是从哪发出的，这是航道上的灯塔灯光，从这年春天开始，它就一直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舶发出信号。天空一片晴朗，微风和畅，明亮的星光和远处灯塔的微光融合在一起，时不时的，有灰尘飘过。微风吹来了香草和石头的气味。周围一片寂静。

“这天气很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下来，“就好像鼠疫从未到过这里。”

塔鲁背对着他，望着大海。

“是啊，”过了一会他说，“天气很舒服。”

他也坐到了医生旁边，仔细地看他。在天空中那束微光闪了三次。一阵刺耳的餐具碰撞的声音从马路深处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房子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里厄，”塔鲁用一种自然的语调说到，“您从没有试着了解我是谁吗？您把我当朋友吗？”

“当然，”里厄回答说，“我当然把您当朋友。但是我们没什么时间来互相了解。”

“那好，这样我就安心了。那您觉得现在就是做朋友的时间么？”

每次回答的时候，里厄就对他微笑。

“嗯，那么……”

在隔了几条马路远的地方，一辆汽车好像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它开远了，之后，从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喊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寂静。然后在天空和星星的重压之下，它又落回到两个男人身上。塔鲁站起来，坐到了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总是蜷缩地陷在椅子上的里厄。以天空作为背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身躯。他说

了很长时间，下面是对他的讲话大概的复述。

“里厄，简单说来，在熟悉这座城市和遇到这场瘟疫之前，我已经充分经历过鼠疫的苦痛了。可以说我同所有人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人并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安于这种状态，而另一些知道，而且他们想离开这里。而我，我一直想离开。”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天真无邪，就是说我那时根本没什么想法。我不是那种有什么苦恼的人，一开始我就顺其自然，我过的一帆风顺。我的机灵使我在女人中间如鱼得水，要是我有什么担心的，她们就会主动离开就像她们主动地来一样。有一天，我开始思考。现在……”

“需要跟您说的是我没有经历过和您那样的贫穷的生活。我的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位。然而他没什么官架子，天生是个老好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朴实谦逊的人，我一直深爱着她，但我总是不愿多谈起她。父亲无微不至地关爱我，我也相信他一直想方设法地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但是我远没有达到为此生气的程度。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合乎尺度，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个自我的人，现在他已经去世，我认为虽然他在世时没有像圣人一样的活着，但他更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引起人们对他适当的爱戴，而且可以持续下去。”

“不过他有一个特别之处，《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这不是因为他经常要旅行，他只会假期的时候去布列塔尼，在那里他有一小间地产。但是他可以立刻告诉您从巴黎到柏林的列车出发和到达的准确时间，或者从里昂到华沙需要转换车的时间表以及两个您任意挑选的首都之间的准确公里数。您能够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该怎么走吗？连车站站长都要搞晕的问题，可我父亲却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练习以便丰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量，他对此也感到相当的自豪。我也乐意跟他玩这个游戏，我经常向他提问，然后在《谢克斯旅行指南》上核对他准确无误的答案，并为此兴奋不已。这个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因为我是他的一个听众，他对我的好意也是很受用。至于我，我发现他的这种在铁路行车方面的才能毫不亚于他的其他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多了，对这位正直的人可能评价太高了，因为，说到底，

他也只不过对我的决心产生过一种间接影响。最多只是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罢了。当我十七岁时，事实上我的父亲叫我去听过他的庭审。这好像是一起重大的案件，在审判法庭上，他肯定觉得这是他看起来最风光的日子。我觉得他是想通过这个仪式，这个能激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他的事业。我答应了，因为这能让父亲高兴，还因为我很好奇想看一看，听一听这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所扮演的另一个生活中的角色。我再没有多想。法庭上发生的事，在我看来应该就像七月十四日的阅兵式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总是既自然又是必然的。我对这些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一点也没有困扰到我。”

“但是对于那天唯一给我留下了印象就是那个罪犯。我觉得他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是什么罪，这并不紧要。但是这个长着稀疏的红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差不多三十岁左右，他看上去好像下定了决心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的所作所为和他将要受到的惩罚是那样地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就只盯着他看。他像一只被刺眼的光线惊吓到的猫头鹰。他的领带结歪在领口的一边。他啃着一只手的指甲，那是一只右手……总之，我不必多讲了，您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在这之前，我只是把他看做“被告”这类简单的概念。我不能说当时我忘了父亲在场，但是我感到内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罪犯身上。我几乎没听到什么，我只是感到人们想处死这个活生生的人，一种强烈的本能就像潮水一样盲目而固执地把我推向他一边。直到父亲宣读公诉状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清醒过来。”

“父亲穿上他的红色长袍，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再是老好人也不是受人爱戴的人，他的口中挤满了大量的句子，这些句子像一条条毒蛇一般从里面不断地爬出来。我听明白了，他请求以社会的名义处死这个男人，甚至请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他仅仅说了一句——这是真的——‘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的区别差别不大，但结果一样，因为最终他要人头落地，只是那时不是他自己来完成这项工作罢了。而我则一直听着这个案件直到结束，除了我为这个不幸的人产生了一种令人眩晕的亲近感，而这是我父亲从来也不会有。不过根据习惯，在最后时刻——这是文雅的说法，而这实质上应该被称为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

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刻开始，我就对《谢克斯旅行指南》产生了可怕的厌恶感，不再看它。从那刻起，我对司法，死刑和处决都感到了害怕。后来，我震惊地发现，父亲已经多次参加这种谋杀时刻了，也正是他起得特别早的那几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上好他的闹钟。我不敢把这些告诉我的母亲，但是那时我对她做了更加仔细地观察，我明白了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感情，她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也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再后来，我知道，对与她我也无所谓原谅，因为直到结婚前她一直都过着贫穷的生活，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也许期待着我马上要跟您谈到我的离家出走。不，我还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差不多有一年。但是我那时心里一直很痛苦。一天晚上，父亲又在找他的闹钟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我那天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他回家时，我已经离开了。听人说我父亲马上就叫人找了我，于是我回去看他，但没有做任何解释，我平静地对他说如果他逼我回去，我就自杀。他最后同意了，因为他可以说是天生性格温和，并且跟我说了一大串大道理，说过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很愚蠢的（这是他对我的行为做出的解释，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是忍着涌上来的真诚的泪水对我百般嘱咐。随后，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回去看望我的母亲，我那时也会碰到他，但也只是心里会有点悲伤。当他去世时，我把母亲接过来和我一起住，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和我住在一起。”

“我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很详细，因为这就是一切的起点。我现在要讲得快一点了。十八岁时我离开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生活我干过成千上万的工作。一切还算顺利。但是我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想为那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账。因此正如他们所说的，我搞过政治。我不想成为鼠疫患者，这就是我的全部目的。我相信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在同鼠疫抗争的同时，我也在与谋杀作抗争。我曾经这么坚信着，其他人也曾今这样说过，说到底，这种观点也基本正确。于是我同其他我所爱的人，而且一直爱着的人站在一起。我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个国家发生这类斗争，我都参加过。好吧，我们不谈这个了。”

“当然，我知道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偶尔判决死刑。但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些死刑是必要的，这是为了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更多的死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然而，毕竟，也许是我自己忍受不了这样的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在犹豫。可是我想到的是那只猫头鹰，而这些还将继续。直到有一天我亲眼见到了执行死刑（这是在匈牙利），在我年轻的时候抓住我的晕眩又一次模糊了我属于人类的眼睛。”

“您从没有看见过枪决一个人吗？当然不会有，一般来说这要得到邀请，而且会提前从公众中选出来。结果您只有铜版画上和书本上的看来的印象。一块用来蒙眼的布条，一根柱子以及远处有几个士兵。好吧，不是这样的！您知道么，执行枪决时，一排狙击手站在犯人对面一米五远的地方？您知道么，要是犯人向前两步，他的胸膛就会碰到枪口？您知道么，在这么近的距离上，狙击手把枪口对准所有犯人的心脏位置，一粒豆大的子弹，就能在上面打出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不，您不会知道这些，因为从没有人讲过这些细节。人们的沉睡比鼠疫患者的生活更可怕。人们不应该阻止一个善良的人的沉睡。这会产生一种苦涩的味道，而这种味道使人放弃，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可是我，从那次以后，我就没有安睡过。这种苦涩的味道一直停留在我的嘴里，我不断地坚持着，也就是说我不断想到它。”

“我知道了，在自己满心以为理直气壮地同鼠疫做着斗争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一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是这样。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成了上千人的死亡，我甚至引发了这种死亡，因为我赞成了导致这种必然的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其他人好像并不受到这种想法的折磨，或者至少说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到过这些。而我一想到这些就会喉咙哽咽。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是孤独的。当我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告诉我应该考虑一些当前的问题，他们还经常向我灌输一些感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无法接受的东西。但是我回答他们，穿着红衣的大鼠疫患者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理由十足，如果我接受了小鼠疫患者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苦苦哀求的理由，那么我就必须接受大鼠疫患者提出的同样的理由。他们向我指出，依附穿红色法衣的人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拥有判决的专权。但那时我说，如果我们做了一次让步，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了。看来历史已经向我们

证明了这点，今天他们不是在争先恐后地杀人么？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而且他们也只能这么做。”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所关心的事并不是去和别人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猫头鹰，是法庭上的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锁在镣铐里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办理好一切死亡之前的手续，事实上，在整夜整夜的垂死的恐怖中他期待着眼睁睁地被谋杀。我所关心的事，是那个胸膛上的窟窿。我告诉我自己在把问题弄清楚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坚决拒绝，绝不赞成——您听到了么——绝不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屠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之前，我选择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改变过我的想法。很长时间以来我感到愧疚，为我曾经是一个杀人凶手感到愧疚，即使这是间接的，即使是出于良好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无奈地意识到，甚至是比其他人更善良的人，如今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放任杀人的行为，因为这就是他们生活的逻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导致一些人死亡的危险。是的，我不断地感到愧疚，我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鼠疫之中，我已经失去了内心的平静。我直到今天仍在寻找，设法来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仇人。我只知道为了不再成为鼠疫患者就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使我们期望着内心的平静，或者安心地死去。这是能使人得到安慰，如果说不能救活他们的话，但至少可以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痛苦，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点好事。因此，我决心拒绝使人死亡或者为致人死亡的人辩护，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不管是出于有理还是无理。”

“因此，瘟疫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要不它就是教会了我和你们站在一边与之抗争。我知道某些学问（是的，里厄，我对生活了解得很透彻，您应该能看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其中安然无恙。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身上，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病菌是自然产生的，而其余的，如健康，正直，纯洁，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应停止的意志。正直的人他几乎不传染任何人，这是一个尽可能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分心的人。他不需要意志和压力，而能保持

永远不分心！是的，里厄，成为一个鼠疫患者确实很累人。但是要不成鼠疫患者其实还要累人。这就是所有人都看起来疲惫不堪的原因，即使如今，所有人都差不多是个鼠疫患者了。不过因为这个原因，有几个不愿成为鼠疫患者的人，要经历一种极端的疲乏，而且除了死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从中解脱出来。”

“从此刻起，我明白自己对这个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其他人则去创造历史。我也明白自己无法从表面上判断其他人。要成为一个合理的杀手，我还缺少一种才能。当然这不是一个优点。但是现在我承认了自己，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灾祸和受害者，而且必须尽可能的拒绝站在灾难的一边。这对您来说可能很容易，我不知道这是否容易，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情况都是事实。我听到过如此多的争辩，它们差点儿就把我搞晕了，而且它们已经搞晕其他人而让他们赞成谋杀，我知道一切罪恶都来自那些没有清楚的言语的人。我这时候明确地表明了立场和行动，而使我走上正道。因此，我说灾祸和受害者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其他的了。要是我这样说着，我就变成了灾难本身的话，至少我是不会赞同的。我只是想成为一个天真无邪的杀手。您瞧，这并不是什么雄心壮志。”

“当然，肯定存在着第三种境界，那是属于真正的医生的，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碰到的不多，而且这也很困难。这就是我同受害者站在一边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尽量减少受害者。在他们中间，我至少能够找到达到这三种境界的方法，也就是说内心的平静。”

结束这段话时，塔鲁摇晃着他的腿，轻轻地用脚敲击着地面。在一阵沉默之后，医生略微抬起了头，问塔鲁他是否对达到内心的平静所要经过的道路有一个概念。

“是的，那就是同情。”

远处传来两辆救护车的铃声。惊叫声立即混杂在一起，汇集到城市的边缘，靠近岩石丛生的山岗。同时他们听到某种像爆炸一样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寂静。里厄数了两下灯塔的闪光。微风似乎吹得更有力了，同一刻，一阵海风带来了一股盐水的味道。现在他们可以清晰地听到海浪沉闷地拍打着峭壁的声音。

“总而言之，”塔鲁简洁地说，“我所关心的是，人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但是您不相信上帝。”

“确实是这样，但是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没有上帝的圣人，这是今天我唯一听到的具体的问题。”

突然，在传出喊叫声的地方冒出一阵巨大的火光，伴随着升起的风浪，一阵叫嚷声传到两个男人的耳朵里。那个火光马上暗下去了，远处，在平台的边上，只剩下一点点红色的反光。风停止的时候，他们能清晰地听到男人的叫喊声，然后是一阵射击和人群的叫嚷混杂的噪音。塔鲁站起来，仔细听着。但是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城门处又发生战斗了。”

“现在结束了。”里厄说。

塔鲁低声抱怨说这永远也不会结束，而且还会有受害者，因为这是命令。

“也许吧，”医生回答说，“但是您知道的，跟战败者在一起比跟圣人在一起我感到更团结。我认为，对于英雄主义或者神圣，我并没有什么喜好。我所关心的，是成为一个人。”

“是的，我们追寻的是同样的东西，不过，我的雄心比你小。”

里厄以为塔鲁是在开玩笑，就盯着他看。到那时在天空映照下的模糊地微光中，他看到了一张悲伤而庄重的脸。又起风了，里厄感到风吹在皮肤上还有点温热。塔鲁打起精神：

“您知道么，”他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友谊做些什么？”

“随便您。”里厄说。

“到海里洗个澡。甚至对于一个未来的圣人，这也是高尚的乐趣。”

里厄笑了起来。

“带着我们的通行证，我们可以去防波堤那边，只为鼠疫活着就太蠢了。当然，一个男人就应该为受害者而战斗。但是换种说法，要是他停止热爱任何东西的话，他又为了什么而战斗呢？”

“对，”里厄说，“走吧。”

过了一会，汽车停在了城门的栅栏处。月亮也升起来了。乳白色的夜空向四处投下了暗淡的影子。在他们身后是层层叠起的城市，从里面吹来的病态的热风把他

们推向大海。他们把他们的文件拿给守卫看，他们检查了很长时间。通过城门，再通过堆满木桶的、弥漫着酒香和鱼腥味的土堤，他们朝着防波堤的方向走去。还没靠近，碘盐和海藻的气味已经向他们介绍了大海。然后他们又听见了它的声音。

海水轻轻拍打着防波堤底下的大石块，他们爬下去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海水就像天鹅绒一样厚实，又像动物的皮毛一样柔软光滑。他们爬到了一块朝向外海的礁石上。海水咆哮着，又渐渐退下去。海水平静的呼吸产生了油亮的反光，之后又使它消失了。在他们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夜晚。里厄的手指感受着岩石冰冷的表面，他满心欢喜。转向塔鲁，他猜测在他朋友那张凝重而又平静的脸上，即使有同样的喜悦，但是他没有忘记任何东西，甚至谋杀。

他们脱去衣服。里厄最先跳了下去。首先感到一阵寒冷，当他浮起来的时候就变得温热了。在做了几下蛙泳之后，他知道今天晚上的海水是温热的，因为秋天的温热的水保存了陆地漫长的月份里的热量。他有规律地游了起来。他的脚在他身后在水面上击打出一阵阵翻腾的水花，海水沿着他的手臂流出，贴在他的两条腿上。一声沉重的击水声告诉他塔鲁已经下水了。里厄翻过身来，一动不动地仰躺在海面上，面对着倒扣下来的夜空，挂着月亮和满天的星星。他长长地呼着气。然后他听到一阵越来越清晰的击水声，在夜晚的寂静和孤独中显得格外的清晰。塔鲁靠了过来，不久就听到了他的呼吸声。里厄调转方向，和他的朋友齐头，以相同的节奏游着。塔鲁加大力气超过了他，他不得不加快他的动作。在几分钟里，他们齐头并进，感受着同样的孤独，远离原来的世界，摆脱了城市和鼠疫。里厄先停了下来，慢慢地游回去，直到他碰到了一股寒流。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加快了他们的动作，好像受到了这股突袭而来的海水的催促。

他们重新穿好衣服，离开时两个人都一言不发。但是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个夜晚的回忆对他们来说是美妙的。当他们远远地看到鼠疫的岗哨时，里厄知道现在塔鲁和他都在心里说着同样的话：瘟疫刚刚遗忘了他们，这很不错，不过现在又该重新开始了。

25

确实，又该重新开始了，鼠疫不会长时间地放过任何人。十二月份，它又在市民的胸口燃烧，火焰照亮了炉子，它又使隔离营的两手空空、无所事事的人影增加了，总之，它没有停止过它耐心而断断续续的步伐，一直在前进。当局期望着寒冷的天气能够阻止瘟疫的继续前进，然而它看起来没有停止的意思，越过了初冬的严寒。必须等待！但人们由于等得太久，已经不能再等了，整个城市的居民生活在对未来的绝望之中。

至于医生，那天晚上给他带来友谊和内心的宁静的短暂的时刻是一去不复返了。城里又开设了一家医院，里厄只能整天对着病人。不过他注意到，在这个阶段的疫情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肺鼠疫，患者可以说是帮助了医生。他们不再像以前一开始那样自暴自弃，心情沮丧或者精神错乱，现在他们看起来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要求获得一些对他们最有利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要求喝水，每个人都想保暖。不管医生也如同他们一样的疲惫，然而在这些情况下，他现在感到自己不那么孤单了。

快到十二月底时，里厄收到一封由还在隔离营地里的预审法官奥登先生寄来的信件，上面说他的检疫隔离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当局查不到他进入隔离营地的日期，于是为了保险起见，误把他继续关押在隔离营地里面。他不久前刚出来的妻子已经向省府反映情况，但是她受到了冷遇，别人只告诉她绝不会有错。里厄请了

朗贝尔来调查此事，几天之后，他见到了奥登先生。当局确实出现了差错，里厄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消瘦的奥登先生抬起虚弱的手，一边想着一边说，所有人都会犯错的。医生这才感到在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您将要做什么，法官先生？您的案件正等着您呢。”里厄说。

“嗯，不，”法官说，“我想请个假。”

“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不是因为这个，我是想回到隔离营地去。”

里厄吃了一惊：

“但是您刚刚出来啊。”

“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别人告诉我在隔离营地里有了一支政府组织的志愿者队伍。”

法官转动着滚圆的眼珠子，压了压他的一簇头发……

“您明白的，我想尽一份力。可能这个想法有点愚蠢，但这样会使我感到和我的小孩亲近一点。”

里厄看着他。在奥登先生那双坚毅而毫无表情的眼睛里不可能突然冒出一股温情。不过它们变得比较混浊了，失去了原本的纯粹。

“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愿意去，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医生帮他办完了这件事，事实上，疫城里的生活还在继续，直到这一年的圣诞节。塔鲁也一如既往，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各个地方。朗贝尔向医生透露，多亏了两个看守的帮助，他建立了一条通信的秘密系统。他时不时地会收到一封信。他向里厄提供了这个系统的使用权，里厄接受了。里厄艰难地写了几个月以来的第一封信。他失去了某种语言的表达能力。信寄出去了，但迟迟不见回信。在另一边，科塔尔幸运地活了下来，他的倒卖活动使他变得富有。至于格朗，他没有挺过节日的这段时间。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耶稣的节日，倒不如说是地狱的节日。商店灯光暗淡，空空如也。摆在玻璃橱窗里的是仿制的巧克力或者只是一个空盒，电车上是一个个阴郁的身影，完全没有以往圣诞节的情景。往年的圣诞节，无论富人还是穷

人，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而现在只有那些享有特权的人，躲在满是灰尘的商店里间，享受着他们用大价钱换来的远离人群，见不得人的庆祝活动。教堂里充满的不是谢主恩的声音，而是人们的哀怨。在阴冷的城市里，只有几个小孩还在奔跑，因为他们还不懂鼠疫正威胁着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向他们提起过去的背着礼物的圣诞老人，虽然他和人类的痛苦一样古老，但是和年轻人的希望一样富于生气。所有人的心中只剩下一个非常苍老而又非常暗淡的希望，正是它使人不至于自暴自弃，坚持着活下去。

昨夜，格朗错过了他的约会。里厄为此感到担心，于是一大清早就到了他的家，但没有找到他。所有人都警觉起来。临近十一点，朗贝尔来到医院通知医生他远远地看到过格朗在大街上游荡，身形憔悴。然后他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于是医生和塔鲁就开车出去找他。

中午，天气非常寒冷。里厄下了车，看到远处的格朗几乎是贴在一个放着粗制的木雕玩具的玻璃橱窗上。在苍老的公务员的脸上，眼泪不断地淌下来。这些眼泪使里厄感到惊慌，因为他知道流淌的眼泪意味着什么，他的喉咙也哽咽了一下。他想起格朗这个不幸者的婚约：那天也是圣诞节，他们站在商店外面，让娜依偎着他，仰头对她说她很高兴。让娜清脆的声音穿过遥远的岁月回响在格朗这颗疯狂的心里，这是肯定的。里厄明白此刻这个流着泪的老人在想着什么，他同他的想法一样，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就像一个死去的世界，总是会在某个时间，我们感到厌倦了监禁，工作和勇气，而去找回某个人的身影和柔情。

但是，对方在镜子里看到了他。他没有停止流泪，而是转过身，背靠在玻璃橱窗上注视着他走过来。

“啊，是你啊，医生。”他叫道。

里厄只是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里厄也有与他同样的苦恼，他这时心里已是怒火中烧，因为无论是谁，见到别人的悲伤，也会在心里生出这样的感情。

“是我，格朗。”里厄说。

“我希望有时间给您写信。为了让她知道……为了让她不带着内疚地幸福生活下去。”

稍微用了一点劲，里厄才把格朗拖着往前走。另一个就这样一直让他拖着，结结巴巴地说不成话来。

“这场瘟疫已经持续很久了。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有什么办法呢？啊！医生！我就跟现在一样的平静。但是我需要尽很大的力才能保持仅有的常态。而且现在，我实在受不了了。”

他停住了，四肢发颤，眼神发狂。里厄抓起他的一只手，发现手烫得厉害。

“该回去了。”

但是格朗挣脱了他，跑了几步，然后又停下来，张开手臂，前后摆动起来。他原地转了过来，倒在冰冷的人行道上，脸上淌满了不断流下的泪水。行人远远看着，突然停下来，不敢再往前走。里厄不得不抓起老人的双臂。

现在格朗躺到了床上，呼吸困难，肺部受到了感染。里厄思索着：这位公务员没有家人。何必送他进传染病房呢？他只要和塔鲁一起来照料他……

格朗的头陷在枕头里，皮肤发青，眼睛黯淡无光。他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塔鲁用纸箱碎片在壁炉里点起的微弱的火光。“我感觉很糟。”他说。随着他说话的过程，从他燃烧的肺部传出一种奇怪的噼啪声，里厄要求他不要讲话，说自己一会就回来。病人奇怪地微笑着，脸上显露出一种温情，尽力地眯起眼睛。“如果我走了，请脱帽致敬，医生！”但没过一会儿，他又重回到沮丧的情绪当中。

几个小时之后，里厄和塔鲁重新找到了病人，发现他只穿了很少的衣服躺在床上，里厄惊恐地发现他脸上显露出的折磨着他的疾病发展的迹象。不过他好像清醒了一点，一见到他们，就用一种格外低沉的声音请求他们将他放在抽屉里的手稿拿给他。塔鲁把稿子拿给他，但他只握紧了背面，也没有看，随后就把它递给医生，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希望他读一读这些手稿。这沓简短的手稿差不多有五十页左右。医生翻了翻发现所有的稿纸上都写着一个相同的句子，不断的重抄，修改，丰富或者精简。五月，女骑士和树林小径这几个字不断地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成句子。作品中还包含了一些解释，有时又显得过分详细，变幻莫测。但是在最后一页的底部，只写了一个书法工整的句子，而且墨水还未干：“我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了……”在这句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那个句子的最后版本。“请您读一

下，”格朗说。于是里厄读了出来。

“在一个五月的美好清晨里，一位苗条的女骑士骑上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奔跑在一条树林小径的花丛中间。”

“这句怎么样？”老人用狂热地声音说道。

里厄没有抬起眼睛看他。

“啊！”对方激动起来，“我就知道。美好，美好，就是这个词不正确。”

里厄抓起他放在毯子上的手。

“算了吧，医生，我已经没时间了……”

他的胸膛痛苦地鼓起来，他突然一下子叫出来：

“烧了它！”

医生犹豫着，但是格朗用一种可怕的口音重复了他的命令，如此痛苦以至于里厄不得不把这些稿纸扔到了差不多已经熄灭的炉火了。房间马上亮了起来，一股短暂的热气给屋子增添了暖意。当医生回到病人身边时，他已经转过身去，眼几乎贴在墙上。塔鲁看着窗外，好像对这个场景无动于衷。在注射了血清之后，里厄告诉他的朋友格朗撑不过今晚，塔鲁说自己要留下来。医生答应了。

整整一夜，格朗快要死去的想法纠缠着他。但是第二天早上，里厄看到格朗坐在他的床上，和塔鲁说着话。他身上的高热消失了，只是全身无力的症状。

“啊！医生，”公务员说，“我犯了个错。不过我要重新开始。我想起了一切，您看着吧。”

“等等。”里厄对塔鲁说。

但是到了中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晚上时，格朗被认为是得救了。里厄对这种死而复生一点也不明白。

然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里厄接收了一位他认为已经没有希望的女病人，一进医院她就受到了隔离。这个年轻的女孩满口说着胡话，身上出现了所有肺鼠疫的症状。但是，第二天早上，高热就退下去了。医生还认识到，在格朗的病例中，早晨暂时的病情缓解使他习惯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然而到了中午，高热也没有升高。晚上也只是升高了十分之几，又过了一天的早上，高热已经消失了。小女孩尽管

身体很虚弱，但已经可以在病床上自由地呼吸了。里厄说她已经克服了所有规律，奇迹般地恢复了。在这个星期里，四个类似的病例出现在医生的治疗当中。

在周末的时候，老哮喘病人看到医生和塔鲁时激动不已，

“这下好了，”他说，“他们又跑出来了。”

“什么东西？”

“嗯！老鼠啊！”

自从四月份开始，人们还没发现过任何一只死老鼠。

“还会重新开始么？”塔鲁问医生。

老人摩擦着手掌。

“瞧瞧它们乱窜的样子。看了真叫人高兴。”

他在他家靠近马路的那条门边，看见了两只活老鼠。一些邻居告诉他，他们家里也是，这些畜生又重新出现了。在一些棚子里，人们又听到了几个月来已经忘记了的吱吱地叫嚷声。里厄期待着每周开始时公布的总的统计数字。数据显示疫情减退了。

鼠疫 第五部

26

尽管瘟疫出乎意外地突然减缓，但我们的市民还是不敢过于高兴。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一切事都在不断增加他们对解脱的渴望，使他们变得小心翼翼，习惯了越来越不对瘟疫的结束抱什么期望。然而这个新的事实已经口口相传，在他们的心底也激起了还不敢明说的强烈的希望。其他的一切都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统计数字下降了，这是件出人意料的事，相比之下，那些鼠疫中的牺牲者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人们没有公开的期盼那即将到来的“健康时代”，但人们已经开始默默地等待。从此刻起，尽管还带着冷漠的表情，但人们已经开始讨论鼠疫结束后他们如何重新安排生活。

大家一致认为要一下子恢复鼠疫发生前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破坏起来很容易，重建就难了。人们仅仅认为只要食品供应能够有所改善，那样大家就可以先摆脱这个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在市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谈话中，他们也会同时透露出一些愚蠢的想法，慌忙肯定地说不管怎么样，鼠疫还不会马上结束。

确实，鼠疫不会马上结束。但是，从表面上看，疫情的减缓速度超过了一般合乎情理的想象。一月份的开头几天，严寒罕见地持续了几天，整个城市上空好像都凝结着冷空气。但是天空却是从来没有这样湛蓝。几天来长时间的没有暖意的阳光整天笼罩着城市。在这片纯净的空气中，在三周里鼠疫死亡率连续下降，看起来

是劳累了，被它夺走的尸体也越来越少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它好像失去了它花几个月时间积累起来的差不多全部的力量。像格朗和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姑娘一样，他们本来已经被选中为鼠疫的牺牲者，但他们又成功地逃脱了；在一些街区它还猖獗了几夭，而它在其他街区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星期一它夺走更多的生命，而到了星期三，又把全部病人都放过了。看到疫情时而喘息不前，时而迅猛前进，人们就会说它是因为烦躁和厌倦而垮了下来，它同时失去了以前的所向披靡的威力和百发百中的打击能力。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一下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医生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以前也是毫无结果，但现在都有了效果。好像鼠疫也遭到了围攻，人们以前用来抵抗它的迟钝的武器现在突然变得锐利起来。只是时不时地，疫病还会顽强地抵抗，在一种盲目的爆发当中，夺走三四个本来有希望治愈的病人。他们则成了这场瘟疫中的倒霉鬼，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他们却成了鼠疫的牺牲品。奥登法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时人们不得不把他撤离隔离营地，塔鲁说他实际上运气欠佳，然而人们也不知道到这是指法官的死，还是指后者活着的时候运气不佳。

但是总体看来，疫病的传染情况在各个地区都在减退，省府的公告开始的时候还只是隐约流露出一一点希望，最后才向公众证实了一种信心，即胜利的大局已定，瘟疫将放弃它的阵地。事实上，很难确认这是否一定会成功。人们只是被迫承认疫病似乎要离开了，就像它来的时候一样。人们反抗疫病的策略没有改变，以前是无效的，如今却看来很合适。人们只是感到疫病自己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或者可能是它在袭击了所有的目标后主动撤退了。从某种角度看，是它的使命完成了。

尽管如此，人们说城里一点也没有改变。白日里依旧寂静，到了晚上，街道还是挤满了同样一群人，大多数人都穿着大衣围着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还是照常营业。但是，走进细看的话，人们会注意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更加放松了，有时候还挂着微笑。这时候人们才发觉直到现在，街道上已经很久没听见任何人的笑声了。事实上几个月来那张把全城围得密不透风的帷幕出现了一道口子，在广播里的消息的作用下，那道口子越变越大，最后才允许人们喘口气。人们还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还不敢直接地表达出来。但要是火车离站或者轮船到港，一如从前的话，

人们将不会再有任何怀疑，或者是汽车被允许重新上路，在一月中旬颁布的这些事件的公告反而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惊奇。因为这差不多是不容置疑的了。但是这里面微笑的差别表明了我们的市民在充满希望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另外也可以说从微小的期望对人民来说成为可能的那刻起，鼠疫的有效统治就被终止了。

整个一月份市民的反应都是矛盾的。准确地说，他们出于一种兴奋与消沉的交替状态。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重新生起了逃跑的企图，甚至在统计数字最有力的时候。这引起了当局和城门守卫他们很大的惊奇，因为大多数的逃跑都成功了。不过实际上，这时候逃跑的人也是受到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的支配。对鼠疫的怀疑态度扎根在他们心里，使他们无法摆脱。他们不再相信希望。所以即使到了鼠疫已经消失的时候，他们还会按照他们的此时的准则继续生活，他们对形势的适应总是落后于人。而另一些人，正好相反，这部分人主要是长期忍受着与亲人分离之苦的人，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隔离和长期的沮丧情绪之后，这股希望之风反而吹得他们失去了耐心，使他们激动地无法控制自己。一种恐慌的情绪占据了他们，使他们担心起在这个临近尾声的时刻，他们也许会死去，以至于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们所爱恋的人儿，而这段时间来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也不会得到回报。几个月期间，他们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固执的心态，尽管经受着监禁和流放之感，他们也坚持等待着，一开始的希望已经足以摧毁害怕与失望都无法动摇的东西。他们像疯子一样急匆匆地想赶超鼠疫的脚步，而无法跟随它的脚步直到最后一刻。

不过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自然的乐观迹象。比如说人们发现物价已经显著地降低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各种困难依旧存在，城门处保持着隔离检疫的程序，食物供给也远没有得到改善。因此，这种现象完全是由人们的心理因素造成的，好像鼠疫的撤退在各处都引起了反应。同时，那些过去集体生活的，但因为鼠疫而不得不分开的人也变得乐观起来。城里的两个修道院重新开办，因此集体生活也得以恢复。军队里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被重新召回到空着的营房中，恢复了正常的部队生活。这些小事都说明了问题。

直到一月二十五日之前，民众一直生活在这种暗藏的兴奋当中。那个星期，统计数字降到很低，所以在咨询了医委会的意见之后，省府宣布瘟疫可以说是被控

制住了。公告中还指出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对城门的封锁仍要持续两周，防疫措施还将持续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以防险情再次发生，“一切照旧，各项措施仍将继续存在”。然而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补充只是些形式条款，到了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城市里开始狂欢。为了配合公众的欢庆时刻，省府决定恢复健康时期的照明。在明亮的街道上，在寒冷而纯净的天空下，我们的市民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笑颜逐开。

当然，许多屋子仍然紧闭着百叶窗，在这一天的夜晚，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然而，对这些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们来说，他们也感到了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们不用担心家人的死去，自己的生命也不再受到威胁。但是对这普遍的喜悦最疏远的，毫无疑问是那些此刻家中正有一位鼠疫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家庭，他们的家人不是在隔离病房中就是在自己家里，等待着灾难最终真正地结束，想像他此刻离开其他人一样。当然，这些人也抱有希望，只是他们把这后果希望深埋在心底，在没有真正把握之前，他们还不敢轻易的表现出来。处于垂死和欢乐之间的等待，在这个寂静无声的夜里，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对他们显得更加的残酷。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到其他人的喜悦。也许鼠疫还没有结束，它会有所证明。但是，在所有人的心中，已经提前几个星期，似乎电车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轨上鸣笛飞驰，轮船在闪闪发光的海面上破浪前进。第二天，他们的精神又会恢复平静，可能又会产生怀疑。但是此刻，全城仿佛都开动了起来，离开这个它曾打下石基的地点，离开这个封闭的，阴暗的和僵化的地方，最后带着在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离开。这天晚上，塔鲁，里厄，朗贝尔也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行进在这群人当中，他们自己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在离开林荫大道很久之后，甚至当他们来到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时候，塔鲁和里厄还能听到这阵喜悦围绕着他，他们沿着紧闭的窗户行走。由于他们的疲惫，所以他们无法区分出在这些百叶窗后面仍在折磨着人的痛苦和在不远处充满整个街道的欢乐。解放的时刻临近了，但它却带着一张混杂着欢笑和泪水的脸庞。

在这阵吵闹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欢快的时候，塔鲁突然停下了脚步。在阴暗的路面上，一个黑影轻盈地跑过。这是一只猫，从春天以来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猫。它在人行道的中间停留了一会儿，踌躇着，舔了舔它的爪子，又迅速挠了挠它的右耳，重新又开始了悄悄地奔跑起来，消失在夜色当中。塔鲁笑了。那个小老头也准会高兴的。

27

但是在鼠疫似乎渐渐远离城市，回到那个它曾悄悄爬出来的，未知的洞穴中去时刻，在城里至少有个人为它的离开陷入了沮丧的情绪之中。这个人就是科塔尔，如果我们相信塔鲁的日记本里的记叙。

老实说，在统计数字开始下降的那刻起，这些笔记就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上面的笔迹变得很难辨认，而且经常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另外，笔记本中的记叙第一次失去了原来的客观态度，开始让位于个人评论。我们还发现，其中有相当长的篇幅涉及到了对科塔尔的描述，还有一小部分对那个逗猫的小老头的记叙。据塔鲁所说，鼠疫期间他对这个小老头始终是很尊敬的，不管是鼠疫发生之前，还是鼠疫结束之后，他一直引起他的兴趣。至于后来他再不能对他产生兴趣了，这当然是件遗憾的事。但这也不能怪塔鲁，因为他曾试图去找过他。在一月二十五日那晚之后，过了几天，他曾守在那条小路的角落里希望能看到老头。猫儿出现在那里，在太阳照射下的水坑里取暖，就像是在赴约。但是在那个习惯的时间里，百叶窗还是紧闭着。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塔鲁就再也没有看见它们被打开过。于是，塔鲁奇怪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是被气恼了或者已经死了。如果他是被气恼了，那么老头的想法是对的，只是因为鼠疫误导了他；但是如果他已经死了，那就要考虑一下他自己的情况了，就像考虑那个老哮喘病人，想一想他是不是一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圣人，但是他承认在老人的情况给人一种“启

示”。塔鲁在笔记中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种接近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撒旦了。”

夹杂在对科塔尔的描写当中，人们总能在笔记中找到大量的，通常是散落的备注。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格朗的叙述：他现在正处于康复期，但他已经开始他的工作，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另一部分则提到了里厄医生的母亲。他们住在一起时，塔鲁和他的母亲的几次谈话，这位老母亲的态度，她的微笑，她对鼠疫的评论都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里面。塔鲁首先强调的是里厄老太太的谦让，她说话时所采用的简洁的表达方式；她显示出的对某一扇朝向安静的街道的窗户的特殊喜好。她每晚都会一个人坐在窗前，稍稍挺直着身子，手安静地放着，露出专注的目光，直到暮色侵入房间，在渐渐变暗的灰色光线中她变成了一个黑影，最后她一动不动的侧影消失在黑暗中；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轻盈步态；她从未在塔鲁面前明显流露的善良品格，但他从她所有的一言一行中能够体会到这种品格散发出的光辉；最后，塔鲁认为，老太太具有一种不需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默，谦让，但她在任何“光芒”中，即使是在疫神的“光芒”中，也能始终保持与之同样的高度。在塔鲁余下的笔记中，他笔迹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后面的几行字变得难以辨认，他最后的几句话也是他第一次讲到他个人的事情，这也再次证明了他歪歪扭扭的笔迹：“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人，她也是同样的谦让，我喜欢她的这一品格，我总是想着和她在一起。八年来，我不敢承认她的去世。她只是比平时更加谦让一点罢了，而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不在那儿了。”

不过现在要讲讲科塔尔了。自统计数字下降以来，这个人已经借着各种不同的理由，多次来找过里厄了。事实上，他每次来都是为了问里厄对疫病发展的预测。

“您相信鼠疫能就这样一下子，毫无预兆地停止吗？”他对这个观点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或者说，至少这是他所表达的。但是他不断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似乎也说明他对自己的想法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的时候，里厄曾以相当积极地态度回答他。而且每次这样的回答，不仅没让科塔尔变得高兴，反而使他产生了各种反应，这种反应随时间变化，一会儿脾气暴躁，一会儿心情沮丧。之后，医生不得不对他

说，尽管统计数字表现出有利的迹象，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相信胜利。

“也就是说，”科塔尔评价说，“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它有可能在某天回来？”

“是的，正如康复过程也可能加速一样。”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使所有人都感到不安，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同街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向他们宣扬里厄的观点。说真的，他也不难使他们相信他的话。因为在对开始的胜利产生的狂热消退之后，尽管省里的公告也使振奋人心，但很多人心中又生起了疑虑。科塔尔看到这种令人担心的局面，却感到放心。但是有时候他也感到泄气。他对塔鲁说：“是的，最后城门总是会被打开。到那时，您瞧吧，他们就都会撤下我。”

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都认为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设法讨好街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是突然在整整几天时间里，他都和他们闹翻了。从表面上看，至少他这时是退出了社交圈。一夜之间，过起了孤僻的生活。人们再也没看到他出现在餐馆，剧院或者他喜欢去的咖啡馆里。然而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回到了鼠疫发生前的有节制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公寓里，让邻近的一家餐馆每天把饭菜送上来。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偷偷地出去买点必需品，而一出店门，他就又钻入僻静的街道里。要是塔鲁碰见了，只能从他口中听到几个单音节词。没过多久，没有任何过渡的，人们发现他又出来交际了，对鼠疫高谈阔论，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个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入于人浪之中。

省里公告发布的那天，科塔尔就消失不见了。两天之后，塔鲁碰见他在街上游荡。科塔尔要求他陪他到郊区去。由于这天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的疲惫，他有点犹豫。但是对方一再坚持。当时科塔尔看起来很激动，胡乱地挥舞着手臂，话说的很快，嗓门也很大。他问塔鲁是不是真的认为省里的一张公告就能使瘟疫结束。塔鲁当然认为一张政府的公告本身还不够阻止一场灾难，但是它能使人们合理地想到，不出意外的话，瘟疫就快要结束了。

“是啊，”科塔尔说，“不出意外。但总会有意外。”

塔鲁向他指出，另外，省里也考虑了几种意外情况，所以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周。

“他们做得很好啊，”科塔尔说，神色还是那样的忧郁和不安，“因为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很可能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承认这有可能，但他认为最好还是做好准备迎接城门的开放，恢复正常的生活。

“行啊，”科塔尔对他说，“行啊，不过您说恢复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就是影院里有新的电影可看。”塔鲁微笑着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是否可以认为鼠疫不会在城里引起任何改变，一切都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塔鲁说鼠疫会改变城市，又不会改变城市。当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市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一样的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不会改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又不可能忘记一切，甚至有必要的意志也忘不掉。鼠疫将会留下痕迹，至少在人们的内心里。这个靠年金为生的小个子直截了当地说他根本不关心内心，内心的问题他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是，他想知道那些行政组织本身会不会转变，所有的职能机构是否像以前那样运转。但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对此一无所知。据他所知，必须设想所有在瘟疫中受到干扰的职能机构重新运转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期间会出现大量的问题致使他们必须，至少是重新组织旧的职能机构。

“啊，”科塔尔说，“这是可能的，事实上，大家都应该重新开始。”

两个散步者走到了科塔尔家的附近。科塔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竭力保持乐观。他设想着整个城市开始新的生活，抹去他的过去，重新从零出发。

“好了。”塔鲁说，“毕竟，您的事情也许也可以顺利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要开始的生活是崭新的。”

“您说得对。”科塔尔说着变得越来越激动，“从零开始，这会是件好事。”

但这时，两个男人突然出现从阴暗的走廊里出来。塔鲁刚听他的同伴问他那两个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对面的两个穿戴讲究，一副公务员模样的家伙就问这个矮个是不是叫科塔尔，这时科塔尔发出一阵低沉的惊叫，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做出反应，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夜色中。他们作出一副谨慎而礼貌的样子说他们来是

为了询问一些情况，然后就沉着地朝科塔尔逃走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记录了这个场景，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疲倦（他的字迹足够证明这一点）。他补充说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这不是作为自己没有准备好的理由，于是他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最后他做了回答，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最后写道：“在白天和黑夜之间总有某个时刻人会很感到怯懦，他并不害怕这样的时刻。”

28

第三天，离城门开放还有几天时间，医生里厄中午时回到家里，想着他能不能收到他期待着的电报。尽管这几天他感到如同鼠疫最盛时期一样的疲惫不堪，对于最终解放的日子的期待驱散了他身上的所有疲惫。他现在充满希望，并为此感到心情愉快。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绷紧他的神经，不可能总是用力支撑着，为了与鼠疫作斗争而积蓄起来的这股力量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可以稍稍松弛一下，抒发一下感情，也是件幸福的事。如果期待的电报有好消息，那么里厄也会重新开始。而且他认为所有人也都可重新开始。

他经过门房那。新来的看门人贴着玻璃窗对他微笑。在上楼梯的时候，里厄的脑子里还停留着他那张因为疲倦和贫苦而发白的脸。

是的，当这种抽象概念结束时，他将重新开始，如果运气不坏的话……但是他打开门的一瞬间，他的母亲就跑来告诉他，塔鲁先生身体不适。他早上起来过，但不能出门，又躺了回去。里厄老太太很担心。

“这大概没什么大碍。”他的儿子说。

塔鲁伸直了平躺着，他那个沉重的脑袋陷在枕头里，有力的胸肌在被子下显出一个轮廓。他发高烧了，头疼得厉害。他告诉里厄这些模糊的症状很可能就是鼠疫。

“不，还没有什么确定的症状。”里厄检查过他的身体后说道。

但是塔鲁渴得要命。在走廊上，医生告诉他的母亲这可能是鼠疫开始的症状。

“天啊！”她说，“这不可能，不可能是现在！”

但她马上接着说：

“我们要留住他，贝尔纳。”

里厄思考着：

“我没有这个权利，”他说，“但是城门就要开放了。要是你不在这的话，我想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为我自己争取权利。”

“贝尔纳，”她说：“把我们两个都留下。你知道我刚刚打过疫苗。”

医生说塔鲁也打过疫苗，但也许是因为疲劳，他大概忘了注射最后一支血清和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里厄已经去了一趟诊所。当他回到房间的时候，塔鲁看到他拿着几支装着血清的大安瓿。

“啊，这是那个东西。”他说。

“不，这只是预防措施。”

塔鲁伸出的手臂回答了一切，他忍受着没完没了的注射，而他自己也曾其他人身实施过。

“到今天晚上我们再看看，”里厄看着面前的塔鲁说道。

“然后就是隔离，是不是，里厄？”

“还根本没有确定您得的就是鼠疫。”

塔鲁勉强地笑了笑。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注射血清的同时没有隔离的命令。”

里厄转过身去。

“我的母亲和我，我们会照看您。您在这里更好。”

塔鲁沉默了，医生正在整理那些安瓿，他想等塔鲁说话了再转过去。最后，他朝床边走去。病人注视着他，脸上显得疲惫不堪，但是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透着冷静的目光。里厄对他笑了笑。

“要是能睡着就多睡会。我一会就回来。”

来到门口的时候，他听到塔鲁叫他的声音。他转过去对着他。

但是塔鲁好像在犹豫该怎么说话，最后他还是开口了。

“里厄，我希望您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答应您。”

对方扭过他那张大脸，勉强地笑了笑。

“谢谢。我不想死去，我要战斗。但是如果这一场我输了，我想有个好的结局。”

里厄俯下身子，抱紧了他的肩膀。

“不会的，”他说，“要想成为圣人，就要活下去。战斗吧。”

这天的天气开始很冷，后来渐渐地变得暖和一些，但是到了下午，天气又发生了变化，下了几场大雨和冰雹。黄昏的时候，天空才变得晴朗一些，寒气也变得更加刺骨。晚上里厄回到家里。他来不及脱外套就走进了他朋友的房间。他的母亲在里面打毛线。塔鲁好像没动过位置，但是他的嘴唇因为高热而变得发白，说起他正坚持着的这场战斗。

“怎么样？”医生说。

塔鲁稍稍抬起了一点，他宽大的肩膀露出了床沿。

“好吧，”他说，“我输掉了这一场。”

医生俯在他的身上，发现在他滚烫的皮肤下面凸出一串串的淋巴结，病人的胸口发出一阵阵杂音，使人联想到地下炼钢厂里发出的噪音。塔鲁奇怪地介绍了这两个症状。里厄直起身子时说血清还没有到产生效果的时间。但是在他喉咙积聚的热浪吞没了塔鲁竭力想发出的声音。

晚饭之后，里厄和他的母亲坐到了病人身旁。对他来说战斗的夜晚开始了，里厄明白这场同疫神的艰苦战斗将持续到黎明。这场战斗中最精良的武器不是塔鲁的结实的肩膀和宽阔的胸膛，而是里厄刚刚在注射时看到的，沿着针头从塔鲁的胳膊流动出来的那股血液，更确切地说，是存在于这股血液中的比灵魂还要难以捉摸的东西，这种东西任何科学也解释不了。而他只能看着他的朋友进行战斗。他要做的只是替他消肿，给他打补针，但是几个月来的不断的失败使他学会了怎么看待这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唯一的任务是为这些措施的偶然生效创造条件，而这种偶然性只有靠人去促成的。他想着，一定要促成这种偶然性。因为他在疫神的面前感到了

迷茫。它又一次卷土重来，力图破坏人们对它采取的战略措施，它看起来非但没有在人们期望的地方消失，反而又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又一次力图使人们大吃一惊。塔鲁仍在战斗，身体一动也不动。在这个夜晚里，他没有对病魔的袭击做出任何一点反应，只是用他整个粗壮的身躯和自始至终的平静来进行对抗。他更没有说一句话，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说明他在与病魔作斗争，而不能有任何的分心。里厄只能从他朋友的眼睛里读到他们战斗的话语：塔鲁的两只眼睛一会张开又一会儿闭上，眼皮有时紧紧地闭上包裹着眼球，有时又相反，松弛开来，眼神定定地看着一个物体或者集中到医生和他的母亲身上。每次医生碰到这样的眼神时，塔鲁就竭力地露出微笑。

有一个时刻，街上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人们似乎是听到了远处渐渐临近的轰隆隆的雷声在匆忙的奔跑，雷声最后变成了汇集到街道上的漫流：又开始下雨了，不久，夹杂着冰雹，噼噼啪啪地打在人行道上。巨大的帷幔在窗户前面飘动。在阴暗的房间里，里厄注意了一会窗外的大雨，又重新凝视着在一盏床头灯照射下的塔鲁。他的母亲织着毛衣，不时抬头关心地看看床上的病人。医生现在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大雨过后，寂静又充满了整个屋子，只能听到一场无形的战斗发出的听不见的搏斗声。失眠折磨着医生，他仿佛在寂静中听到了一阵轻轻的而有节奏的呼啸声，这种怪声在整个疫病期间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他向他的母亲做了一个手势，劝她去睡觉。她摇头表示拒绝，她的眼睛放出光来，然后仔细地用编结针的针头检查针眼，生怕织错了。里厄起身给病人喂了一口水，又重新坐了回去。

一些行人趁着雨停的间隙，快步跑上人行道，他们的脚步声开始很响，后来渐渐远去。医生还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充满夜行人的脚步声，没有救护车的铃声的夜晚，很像从前的夜晚。这是一个从鼠疫中解脱出来的夜晚。疫病仿佛被寒冷，灯光以及人群驱赶着逃出了城市的某个黑暗的深处，躲进了这间温暖的房间，向塔鲁毫无生气的躯体发出了最后的攻击。瘟神不再搅乱城市的天空。但是它在屋子里凝重的空气中轻声呼啸。这就是他在几小时之前听到的那个怪声。只要等到这个怪声停止的那刻，疫神也就表自己被打败了。

快到黎明时，里厄俯身对他母亲说。

“你应该躺会儿，八点的时候来替我。睡觉之前，先滴注一点药水。”

里厄老太太站起来，放好针线，朝病人的床铺走去。一段时间以来，塔鲁的眼睛一直闭着。在他坚硬的额头上汗水卷曲了他的头发。里厄老太太叹了一口气，病人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一张温柔的脸正俯视着他，在高热的滚滚热浪中，他又露出了一个坚强的微笑。但是眼睛马上又闭了回去。现在只剩下里厄一个人了，他坐到了母亲刚刚坐过的扶手椅上。街道上此时没有什么声音，一片寂静。早晨的寒冷开始侵入到屋子里。

医生感到有点朦朦胧胧，但是黎明的第一辆汽车发出的声音把他从瞌睡中拉了出来。他打了个寒战，看了看塔鲁，他明白现在是战斗中的一个短暂的休息，病人也在睡觉。马车的铁和木头制成的车轮滚动在远处。窗外天还没有亮。当医生朝着床边走的时候，塔鲁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好像他还没有从瞌睡中清醒。

“您睡着了，不是吗？”里厄问。“是的。”

“您的呼吸好点了吗？”

“好一点了。这能说明什么？”

里厄停顿了一下，过了一会才接着说：

“不，塔鲁，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您和我一样明白这只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

塔鲁点点头。

他说：“谢谢您一直准确地回答我的问题。”

里厄坐到了床尾。他感到身旁病人的腿像死人的四肢一样僵直。塔鲁呼吸越来越重。

“热度又升回来了，是不是，里厄？”他喘着气说。

“是的，不过要到中午我们才能确定。”

塔鲁闭上眼睛，好像在养精蓄锐。从他的表现可以看出疲倦的迹象。他等待着已经又在他身体的某处折磨着他的高热回来。当他睁开眼睛时，他的眼神失去了光泽。这在他注意到里厄俯身靠近他的时候才放出一点光来。

“您喝点水。”里厄说。

对方喝了一点，头又倒下去了。

“时间真长啊。”他说。

里厄用手臂扶着她，但是塔鲁露出冷静的眼神，不再有什么反应。突然，体温明显地升高了，直到他的额头也开始发烫，好像是他身体内部的某个堤坝决了口。当塔鲁的视线再次落到医生身上时，医生把脸凑过去鼓励他。塔鲁还想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但这时他咬紧的牙关和被白色的唾沫封住的嘴唇使他无法做出这个动作，然而，在他僵硬的面孔上，那双眼睛还炯炯有神，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七点时，里厄老太太走进了房间。医生返回办公室打电话给医院，安排别人替他的班。他还决定推迟出诊的时间，想在屋子里的长沙发上躺会儿，但是他一躺下就又起来了，回到塔鲁的房间。塔鲁把头转向里厄老太太，看着在他身边的她小小的影子，她坐在椅子上，手握紧了放在腿上。她看见他如此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于是她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嘴唇上示意，然后起身熄灭了床头灯。在窗帘后面，日光很快透射了进来，没过一会儿，病人脸部的轮廓就在黑暗中浮现出来，里厄老太太看到他一直注视着她。她俯身替他抚直了枕头，又抬起来，把她的手在他潮湿而弯曲的头发上放了一会。她这时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跟她说谢谢，现在一切都好多了。当她重新坐回去的时候，塔鲁已经闭上了眼睛，在他疲惫不堪的脸庞上，尽管嘴唇紧闭，但好像又出现了一丝微笑。

中午的时候，高热升到了它的顶点。一种从内脏发出来的咳嗽使病人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他开始吐出血来。淋巴结已经停止了肿胀。它们一直在那里，就像一根拧进关节里的螺丝一样，里厄认为根本无法把它们拔出来。在高热和咳嗽中断的间隙，塔鲁时不时地看一看他的朋友们。但是，不久，他的眼睛睁开的频率越来越低，而且每次他睁开眼睛时，他那张饱受折磨的脸庞在日光下，变得越来越苍白。高热就像一场暴风雨，使他的身体不时地惊跳，抽搐，他的眼睛中的亮光也变得越来越少，塔鲁慢慢地在这场暴风雨中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从那时起，里厄在面前看到的只是一张呆滞得像面具一样的脸，上面没有一丝笑容。这个曾经使他感到如此亲近的躯体，现在被一个长矛刺中，忍受着一种非人的病痛的折磨，被从天而降的，仇恨的风暴吹得出现了扭曲。他眼看着塔鲁淹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里，却对这

个海难无能为力。他只得待在海岸上，张开双手，心如刀割。他再一次感到了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支援来对付这个灾难。最后无力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双眼，使他没有看见塔鲁突然转了个身，面朝着墙壁，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断了气，就好像在他身体的某处，有一根关键的绳索折断了一样。

接下来的这个夜晚不是战斗的夜晚，而是宁静的夜晚。在这个脱离世界的房间里，在这具现在穿戴好的躯体之上，里厄感到笼罩着一种令人惊奇的平静的气氛，在之前的几个晚上，在超越了鼠疫的高度的平台上，在城门处的袭击之后，曾出现过这种气氛。在这段鼠疫时期里，当他亲眼看着人们在病床上死去时，他已经感受过这种从病床上起起的平静气氛。这种暂停，这种庄严的间隔，这种总是出现在战斗之后的平静，到处都一样，这是战败后的平静。但是现在这股包围着他的朋友的平静气氛，它是如此的紧密，与街道的平静和从鼠疫中解脱出来的城市的平静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里厄真的觉得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使和平本身变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苦痛。医生不知道最后塔鲁是否找到了他的安宁，但至少在这个时刻，医生知道对于他自己，他再也无法享受安宁；对于失去儿子的母亲或者埋葬自己朋友的人，他们也无法再接受停战。

外面，黑夜依然寒冷，明朗而冷寂的天空中挂着寂寥的星星。在那间或明或暗的房间里，人们感到玻璃窗外的寒气逼人，听到寒冷的夜晚的大风呼啸着。在病人的床旁边，里厄老太太仍然以她习惯的姿势坐着，右边被床头灯照亮了。屋子的中间，远离光线的地方，里厄坐在扶手椅里等待。他妻子的面容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每次都不要去想她。

夜晚一到，行人的脚步声就在寒冷的黑夜里清脆地响起。

“你照料好一切了吗？”里厄老太太问道。

“是的，我已经打电话了。”

这时他们又陷入了昨晚的沉默之中。里厄老太太时不时地看一看他的儿子。当他碰到她的目光时，他就对她露出微笑。夜晚熟悉的噪音又相继在街道上出现。尽管当局还未批准，但是汽车已经重新上路了。它们快速地摩擦着路面，消失了，接着重又出现。讲话声、呼唤声此起彼落，接着是一片寂静，然后又传来马蹄声、两

辆电车转弯时在轨道上的磨擦声、隐约的嘈杂声，随后又听到了夜晚的风声。

“贝尔纳？”

“什么？”

“你累不累？”

“不累。”

他知道他的母亲现在想着什么，她在心疼他。但是他也知道心疼一个人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因此，他的母亲和他总是喜欢保持沉默。但是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他们却没有机会进一步地向对方倾诉温情。同样，里厄和塔鲁在一起生活过，而塔鲁就在昨天晚上死了，然而他们也没有时间再体会他们的友情。就像塔鲁自己说过的那样，他输了。但他，里厄，难道他赢了吗？他仅仅赢得了对鼠疫的认识和对它的回忆，仅仅赢得对友谊的认识，和对他朋友的回忆。人类在鼠疫和生活的游戏中所能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可能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赢”的含义吧！

有一辆汽车开过，里厄老太太在椅子上摇晃了一下。里厄对她笑了笑。她对他说她不累，又马上接着说：

“你应该到山区去休息休息。”

“当然，妈妈。”

是的，他将要到那里去休息。为什么不呢？这也是一个去哪儿回忆一下的借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赢”就意味着必须仅仅带着我们所懂得的和我们所拥有的回忆，而没有我们所期望的东西，艰难地生活下去。也许塔鲁就曾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意识到没有幻想的生活是空虚的。没有希望，就不可能得到内心的安宁，塔鲁拒绝对任何人进行判决死刑，他也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克制自己去审判别人，甚至那些受害者本身有时也是刽子手，塔鲁就曾生活在这种分裂和矛盾的痛苦之中，他从来也没在希望中生活过。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想要做一个圣人，才想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寻找安宁的吗？老实说，里厄对此也一无所知，这也无关紧要。他留下的塔鲁的唯一的形象是两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现在平躺着的一动不动的魁梧的躯体。一个是充满热情的生命，一个

是死亡的形象，这就是所谓的知识。

这也许可以解释，早晨里厄医生收到他的妻子去世的消息时所表现出来的平静。那时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的母亲几乎是跑着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接着就出去给送信人付小费。当她回来时，他的儿子手里拿着那份打开的电报。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在港口上升起的一个绚丽的早晨。

“贝尔纳。”里厄老太太说。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电报上说什么？”她问道。

“就是那件事，”医生回答道，“是在八天前。”

里厄老太太把头转向了窗外。医生默默无言。然后他劝母亲不要哭，他已经预料到了，当然这是很难接受的事。只是他知道，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痛苦来的不是那么突然。几个月来，特别是这两天来，同样的痛苦一直没有停止过。

29

二月的一个美好的早晨，黎明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民众，报纸，广播，政府的公告一片欢呼。那么叙述者剩下的任务就是要讲讲城门开放之后的欢乐时刻，尽管他和有些人一样，当时没能加入到这些狂欢的队伍中去。

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白天和黑夜之间不断地举行。同时，车站的火车开始喷出了蒸汽，来自远洋的轮船朝城市的海港开来，这些景象表明：这一天，所有因长期分离而忍受着痛苦的人们，等到了大团圆的日子。

人们很容易设想此刻那些长期忍受着分离之苦的市民会产生怎样的感情变化。白日里，到达我们城市和从这里出发的火车都满载着乘客。每个人都已经为这一天预订了车票，在暂缓撤销令的两个星期里，生怕最后一刻省里会取消原先的决定。另外，一些来到城市里的旅客还没有完全打消他们的恐惧心理，因为即使他们普遍都知道他们亲人的遭遇，但是他们对其他人和城市本身却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的奥兰城将会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不过上面讲的也只适用于那些在这段分离时期里没有经受过爱情煎熬的人。

热恋中的人事实上仍沉浸在他们原来的幻想中。对他们来说唯一一件改变了的事是：在这些流放的日子里，他们拼命想着加快时间的脚步，恨不得越快越好；但是，当他们已经看到城市的时候，他们却反而又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当火车开始刹车准备进站时，他们甚至希望时间停止。他们有一种既模糊而又强烈的心情，认

为这几个月里他们失去了恋人而遭受了损失，因此他们糊里糊涂地觉得应该得到某种方式的补偿：让欢乐的时间比他们等待的时间减慢二分之一。那些在屋子里或者站台上等待着他们的人——像朗贝尔一样，他的女人已经得到了通知，几个星期之前就做好了动身前来的准备——他们也是同样的迫不及待，心烦意乱。因为他们的爱情或者柔情在鼠疫的几个月里已经幻化成了抽象概念，朗贝尔惶惶不安地等待着把这个曾经支撑着他的真实的血肉之躯同脑中的概念重合在一起。

他想重新变回鼠疫开始时的那个自己，那时的他一心想着逃出城市，飞奔到他所爱的人身边。但他知道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变了，鼠疫使他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努力地驱赶它，然而它却像一阵隐隐约约的烦闷不断纠缠着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感觉鼠疫结束得太快了，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幸福扑面而来，事件比他所期待的发展得要快。朗贝尔知道一切都会一下子回来，欢乐变成了一种他所不愿品尝的苦痛。

此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跟朗贝尔一样的心情，也许叙述者应该讲讲所有人的情况。在车站的站台上他们开始了个人生活，在他们互相交换的眼神和微笑中他们还能感到他们共同的命运。但是一旦他们看到火车的蒸汽冒起，他们的流放之感就被一阵杂乱的使人头晕的欢乐的狂风给吹走了。火车停下来时，在同一个站台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了这种长期的分离，在这一秒里，在他们兴奋地相拥在一起，接触到他们开始生疏了的身体的这一刻，一切苦痛都结束了。朗贝尔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向他奔过来的这个人形，她就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朗贝尔张开手臂搂着她，她的头紧紧地依偎着他，他只能看到了一头熟悉的头发，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不知道这是因为此刻的幸福而流淌下的热泪，还是他长期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但他至少知道，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清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好相反，是另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虑要等以后他才能弄清楚。而此刻，他想表现的和周围的人一样，相信鼠疫可以来，也可以走，但人是不会变心的。

他们都一对一对地相拥着回家，暂时忘记了他们之外的世界；看似战胜了鼠疫，忘却了曾经的所有悲痛，忘却了那些从同一辆火车上下来，却没有找到亲人的

人。这些人正打算回家去证实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亲人的消息已经使他们产生了可怕的猜测。对于这些没有陪伴的，又感受了新的痛苦的人，对于那些此时正在怀念失去的亲人的人，他们的心情又是完全不同的：分离之苦达到了顶点。对于那些母亲，丈夫或者妻子，情人来说，他们的亲人现在被埋进了无名的土坑或者化为了一堆灰烬，他们已经心灰意冷，对他们来说，鼠疫仍然存在。

但谁又会想到这些孤独的人呢？到了中午，太阳驱散了从早上就一直在与它较量的寒气，阳光一直普照着城市。时间仿佛停下来了。山岗上的炮台射出猛烈的炮火，不断地在宁静的天空中轰鸣。整个城市的人都跑了出来，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标志着痛苦的时间已经结束，遗忘的时间还未开始。

每个广场上人们跳起庆祝的舞蹈。一夜之间，车流大量地增加，汽车变得越来越多，把拥挤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整个下午，城市里钟声齐鸣，铿锵之音在蔚蓝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阳光下回荡。在教堂里，人们朗诵着对主的赞美诗。然而与此同时，那些娱乐场所都快要被挤爆了，咖啡馆也不管接下来的营业，把最后剩下的酒都卖给顾客。在他们的柜台前，挤满了一群群同样激动的人。在他们中间，一对对情侣在众目睽睽之下搂抱在一起。所有人都在叫喊，都在欢笑。这几个担惊受怕的月份里，他们储存起来的对于生活的热情，在这一天，在他们得以幸存的日子里，都被宣泄出来。明天才是小心翼翼地开始生活的日子，而现在，不同出身的人们把酒言欢，称兄道弟。死神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解放的欢乐却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至少在几个小时里。

但是这种通常的纵情狂欢说明不了一切，在黄昏到来之时，那些跟朗贝尔走在一起，挤满街道的人，经常带着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掩饰着更加微妙的幸福感。不管是情侣还是家庭，事实上，他们都只是一些安详的散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这个左右他们的痛苦之地进行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向刚回来的人展示或明显或隐蔽的鼠疫的痕迹，这段历史的见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甘愿担任起向导，作为鼠疫的见证者，炫耀着他们的见多识广，然而人们谈论危险的时候却从不提及他们的恐惧。这类乐趣也并无害处。但是某些情况下，情侣们会选择一条更加震动人心的线路，一位情人会满怀回忆中的淡淡苦痛，告诉他的伴侣：“那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我想起了你，但是你不在。”这些热情奔放的游客那时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因为在这片嘈杂声中他们在旁若无人地窃窃私语，自信满满。他们比十字路口的管弦乐队更能表达出这种解放的心情。因为这些紧紧依偎着的快乐的情侣，说话不多，却得意洋洋，在这片嘈杂声中显出一副非常幸福的样子，以他们的方式确认了鼠疫的结束，恐怖也已经过期。他们无视明显的事实，平静地否认他们一直生活的这个荒诞的世界，在这里杀死一个人就如同碾死一只苍蝇，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否认这种准确无误的野蛮行为，这种预谋的疯狂举动，这种置一切原有的社会道德于不顾的囚禁生活，这种使所有还未被其杀死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否认我们曾被疫神吓得魂不附体，那时我们当中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被投入火炉的口里，化为一股浓烟，而另一部分人背负着怯懦和恐惧的枷锁，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总之，这就是里厄医生见到的场景。当时已是黄昏时分，他正独自往郊区的方向行走，周围传来钟声，炮声，音乐声和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他的工作还要继续，病人可没有请假的时间。在照耀着城市的一束美妙柔和的光线之中，升起一股烤肉和茴香酒的熟悉味道。在他周围的一些快活的面容却头顶着天。男男女女紧紧拉住彼此，脸上激动地泛着红光，不时发出充满情意的叫声。是的，鼠疫结束了，恐怖时期过去了。这些紧紧相拥的臂膀确实实地说明鼠疫正是流放和分离的根源。

在几个月里，里厄发现每个行人的脸上都带着亲如一家的表情，到今天他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里面的缘由。现在他只要看看他周围的人就懂得了。人们终于盼来了鼠疫的结束，但是由于艰难拮据，人们最后穿上了他们长久以来扮演的角色所穿的衣服——那是流放者的衣服，原来可以从他们的脸上茫然若失、远离故乡的表情看出来他们是流放者，而现在他们的衣着就说明了一切。自从因为鼠疫开始封城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只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失去了能抚慰一切痛苦的人间温暖。在不同程度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那些男男女女都曾渴望着团聚，当然，这种团聚不是对于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对于所有人都同样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竭尽全力地呼唤着他们的亲人，热情的躯体，柔情或者习惯。有些人忍受着被置于人类友情之外的痛苦，不再能够通过普

通的维持友谊的方式比如说写信，火车和轮船来与他们的朋友重逢，而他们却不自知。另外一些少数人，也许像塔鲁一样渴望同某种难以定义的，但对他来说唯一值得期待的东西重逢。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他们有时把它叫做“安宁”。

里厄一直走着。随着他前进的步伐，他周围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大，嘈杂声也越来越大，在他看来他的目的地——郊区好像在倒退。渐渐地，他渐渐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嘈杂的人群当中，他越来越明白叫喊声意味着什么，至少其中也有一部分代表了自己的心声。是的，所有人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上都一起承受着同样多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难以忍受的分离，无法挽回的流放和无法满足的饥渴。在这堆积如山的死人中间，在一阵阵救护车的铃声中，在这些所谓的命运发出的警告声中，在这挥之不去的恐怖气氛和人们心中强烈的反抗中，一种巨大的嘈杂声毫不停歇地警告着这群受到惊吓的人们，告诫他们要去寻找他们真正的故乡。对于他们当中的所有人，真正的故乡是在这座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高墙之外，在山岗上的散发着香味的灌木丛中，在大海里，在自由的国度，在爱情之中。他们希望回到真正的故乡，恢复幸福的生活，而对于其余的一切，他们将厌恶地转过头去。

至于这种流放和这种对于重逢的渴望究竟有什么意义，里厄就不得而知了。他继续往前走，人们推挤着他，向他吆喝。就这样，他渐渐走进了不太拥挤的街道，他认为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其实也没什么重要，只须看到有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

从现在起他就对这一点有所了解，在空无一人的郊区街道上他更加明白了这一点。有些仅仅关心自己的，一心只想回到自己的爱情家园的人，他们也许能够得到满足。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失去了他们所等待的人，继续在街上孤独地走着。另外一些人还算幸运，他们没有遭受两次分离的痛苦，一些人在鼠疫之前没能一下子建立起他们的爱情，之后又在几年的时间里盲目地追求勉强的结合，最后从情人变成了冤家对头。这些还算幸运的人，他们和里厄一样，曾经相信时间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他们被永远地分开了。但是另一些人，例如朗贝尔（医生在早晨离开他时对他：“勇敢些，现在该是您得胜的时候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找回了自己原以为已经失去的亲人。至少在某个时刻，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现在知道，要

是说人们一直渴望着一样东西，而且有时能够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

相反，对于那些超脱人类的人，他们追求一种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东西，但是这是没有结果的。塔鲁似乎已经达到了这种他曾说过的“安宁”的状态，但是是在他死去的时候，才找到了它，此时它对他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在夕阳的余晖下，里厄看到另外一些人在家门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情地注视着对方，要是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这是因为他们要求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在转向格朗和科塔尔居住的那条街道时，里厄想到至少对于那些只满足于得到人和他们可怜而又伟大的爱情的人，确实应该，至少是时不时地使他们得到欢乐的奖励。

30

故事也快要收尾了。是时候让贝尔纳·里厄医生承认他就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了。不过在描述最后的事件之前，他想说明一下自己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希望人们了解，他坚持着以一个客观见证人的语气来做记录。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工作使他有幸看到大多数市民的行为以及了解他们的心情。因此他完全有资格来报告他的所见所闻。但是他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保持着合乎要求的谨慎态度。总体来说，他竭力避免讲述他没有亲眼见到过的事物，竭力避免把无中生有的想法强加于他在鼠疫时期的同伴身上，他只是把那些通过偶然的会或者由于发生不幸的事件而落到他手中的文字材料作为依据。

他有机会被传讯来为一种罪行作证，所以他像一个善良的证人一样，保持着某种谨慎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出于一颗正直的心所坚持的原则，他坚决站在受害者的一边，站在人类和市民的一边，他唯一确信的事是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一起经历爱情，苦难和流放。因此他分担了市民的一切忧虑，他们的境遇就是他自己的境遇。

作为一个忠实的见证人，他必须最先要记录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文献以及相关传闻。但是对于他个人需要讲述的事，比如他的期待，他所经受的不幸，他都闭口不谈。要是他提到了一些，那也只是为了解他们或者为了使别人理解他们，以及为了把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隐约感觉到的东西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来。说实在的，这些服从理智的努力并没有使他为难。当他情不自禁地想直接把自己内心的

思想和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声掺杂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的痛苦中没有一件不是他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与别人毫不相干，而此时人们却能同病相怜，这本身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此他也就不谈个人的事了。显然，他应该为所有人发言。

不过市民中至少有一个人，里厄是不能替他讲话的。事实上这也是塔鲁有一天告诉里厄的：“他唯一的真正罪行，就是他在内心里认同这种杀死孩子和成人的东西。其他的事，我还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我是被迫才原谅他的。”这个故事的结尾正是要讲讲这颗麻木不仁的心，这颗孤独的心。

当里厄从喧闹的大街上走出来，拐进格朗和科塔尔居住的街道的时候，他实际上被一条警戒线拦住了去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些。远处节日的欢呼声衬得这个街区更加的安静，他觉得这里荒无人烟，寂静无声。他拿出自己的证件。

“不行，医生，”一个警察说，“有个疯子在朝人群开枪。请您留在这儿，您可以帮上忙。”

这时候，里厄看到格朗来到他的身边。格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不让他过去，他看到有一股股火苗从他的屋子里窜出来。远远地，他们看见了屋子的正面，被夕阳的余晖染成了金黄色。在大楼的周围，有一块很大的空地，一直连接着对面的人行道。在马路中间，他们清楚地看见一顶帽子和一块脏布。里厄和格朗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在马路的另一边，还有一根和他们这边相似的警戒线，在它后面几个街区里的居民快速地的来来往往。仔细看了一会，他们还发现了手握着手枪的警察，潜伏在那间屋子对面的建筑物的门后。那间屋子的百叶窗都紧闭着。在一秒钟之内，其中有一扇百叶窗似乎半挂在窗框上。马路上十分安静。人们只能听到从市中心从来的乐曲声。

这时，从屋子对面的一幢楼房发出“砰砰”两下枪声，那扇悬挂着百叶窗震动几下就裂开了。之后，有时一片安静。里厄经过一天的吵闹，从远处看来，这一切看起来有一点不真实的感觉。

“那是科塔尔家的窗户。”格朗突然激动地冒出一句话，“可是科塔尔已经消失了啊。”

“你们为什么开枪？”里厄询问警察。

“我们正在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们在等着运送必要装备的车过来，因为他朝所有试图进入楼房大门的人开枪。已经有一个警察中弹了。

“他为什么要开枪？”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人们都在大街上游玩。第一次枪声想起的时候，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第二枪的时候，他们惊叫起来，有一个人受伤了，所有人就都跑开了。肯定是个疯子，还能是什么！”

在周围恢复平静的时候，时间似乎被一分一秒地拉长了。突然，在马路的另一边，他们看见窜出一条狗来——长久以来里厄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一只很脏的西班牙猎犬，他的主人肯定是一直把它藏在那里，这只狗沿着墙壁走着。到了那扇大门旁边，它犹豫不前，一屁股坐了下来，蜷缩起身子吃着身上的跳蚤。警察吹了几声哨子来唤它，它仰起头，然后决定慢慢地穿过马路，去嗅那顶帽子。这时，枪声第二次响起，那只狗像一块布一样翻了个面，剧烈地抖动着他的爪子，最后侧身倒下了，晃动着身体作出一阵长时间地抽搐。周围又恢复了平静。太阳又移动了一段距离，阴影开始接近科塔尔家的窗户。在医生身后的马路上响起一阵轻声的刹车声。

“车来了。”警察说。

一些警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手里拿着一些绳索，一架梯子和两个用油布包起来的长方形的东西。他们走到一条围绕着一排房子的街道上，在格朗的屋子的对面。过了一会儿，人们看到，他们也差不多已经猜到，那些房子的门口出现了一阵骚动。然后人们等着。那只狗已经不动了，它现在倒在一片暗红色的血泊之中。

突然，从那些被警察控制的房子里传出一阵冲锋枪的扫射。在整个扫射过程中，人们仍然能看到的百叶窗已经完全掉落下来，上面只剩一个黑洞洞的口子，从里厄和格朗所站的这个位置，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当扫射停止时，从屋子另一边的更远的一所房子里，第二队冲锋枪打响了。子弹可能打在了窗户的方框上，因为有一粒子弹打下了一些砖块的碎片。在同一秒内，三个警察跑过马路，冲进口处的大门。紧接着，又有三个警察冲了进去，这时冲锋枪也停止了扫射。人们还在等待。远处两声巨响回荡在房子里。然后嘈杂声越来越大，人们看见一个穿着衬衫的

矮个子男人，不断地喊叫着，差不多被拖着走出了屋子。街道上所有百叶窗奇迹一般地全都打开了，窗户上挤满了好奇的人们，同时一大群人从周围的房子里涌出来，在警戒线后面互相推挤着。这时，人们看清了这个走到马路中间的矮个子，双脚着地，手臂被警察拧到后面。他在哭喊。一个警察走到他旁边，又稳又狠地揍了他两拳。

“那是科塔尔。”格朗结结巴巴地说：“他疯了。”

科塔尔被打倒在地。那些警察又踹了几脚倒在地上缩成一团的科塔尔。然后一群乱哄哄的人骚动起来，朝里厄和他的朋友这边走来。

“散开。”警察喊道。

当那群人经过的时候，里厄背过头去。

在夕阳西下时，格朗和医生离开了。仿佛是这次事件惊动了还在沉睡的街区，搅动了他们麻木的神经，在这些偏僻的街道上，又一次充满了欢乐的人群发出的嘈杂声。在屋子底下，格朗和医生道别。他要去工作了。但是在刚要上楼的时候，他对里厄说他给让娜写了信，现在他感到很满足。然后他又提到了他的句子。

他说：“我把句子里面所有的形容词都去掉了。”

带着一个狡黠的微笑，他拿起他的帽子，做了一个毕恭毕敬的问候的动作。但是里厄仍想着科塔尔，在去老哮喘病人的屋子的路上，那些拳头打在科塔尔脸上的沉闷的响声一直回响在他的耳旁。也许思考一个有罪的人比思考死人来得更加沉重。

当里厄走进病人家中时，夜色已经吞噬了整个天空。在屋子里，我们还能听到远处解放的欢呼声，那个老人还是带着相同的表情，继续捡着锅里的鹰嘴豆。

“高兴高兴，他们做得对。”他说，“有苦也有乐，这才成了一个世界。您的同事呢，医生，他怎么样？”

这时传来一阵爆炸声，但只是和平的声音，一些小孩点燃了鞭炮。

“他去世了，”医生一边说着，一边给老头呼呼作响的胸口做听诊。

“啊呀！”老人惊叹了一声。

“是得了鼠疫。”里厄补充说。

“是么。”老人过了一会才重复道，“好人都走了。这就是生活。不过他是个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您为什么这么讲？”医生整理好听诊器后问道。

“没什么意思。他这个人说话不会信口开河。总之，我挺喜欢这个人的。就是这样。别人说‘这是鼠疫，我们经历的可是鼠疫啊。’他们差点儿就要要求给他们颁发勋章。但鼠疫又怎么样？说到底，这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您要有规律的做烟熏疗法。”

“哦！请您放心。我还要活很长时间，我要看着所有人死去。我知道该怎么活。”欢乐的叫喊声远远地应和着他。医生走到屋子中间时停了下来。

“我上去阳台看看会打搅到您么？”

“不会。您想站得高一点看看这群人，是不是？请便。不过他们也总是一样的。”里厄朝楼梯走去。

“医生，他们是不是真的要为鼠疫中的死者建一座纪念碑？”

“报纸是这么说的。竖一座石碑或者造一块纪念章。”

“我敢肯定他们会造的。他们还会发表演讲。”

老人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在这都能听到他们的讲话，‘我们已故的……’，他们演讲完就去吃喝了。”

里厄已经登上了楼梯。冷寂的天空一望无垠，星星在屋顶上闪闪发光。在山岗附近，星星看上去像火石一样坚硬。这个夜晚就如同那个他同塔鲁一起走上平台，暂时忘却了鼠疫的夜晚。不过今天，在悬崖脚下的海水比那时更加的明亮。空气凝滞而轻盈，少了温热的秋风带来的盐水的气味。然而，城市里的喧闹声犹如一阵阵波涛冲击着平台的墙脚。今夜是解放的夜晚，而不是反抗的夜晚。远处，可以看到黑暗中的一片红光，那是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和广场。在这个现在已经解放的夜晚里，任何东西也阻止不了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愿望，传到了里厄的耳边的声音正是这些心愿汇聚成的轰鸣声。

官方庆祝活动的第一批礼花在阴暗的港口上空升起。城市发出一声长时间的低沉的欢呼声。科塔尔，塔鲁，医生的妻子，所有这些里厄爱过的而现在已经离开他的人，死了的或者有罪的，他们都被遗忘了。老人说得对，人们还是和以前一个

样。他们还是那样的精力旺盛，还是那样的天真无知。在这个超脱了一切痛苦的平台上，里厄感到自己同他们汇聚在了一起。一阵阵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的欢呼声不断地传到平台的墙脚下，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五彩光束，里厄医生这时决定编写这篇在此刻即将结束的故事。他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做一个同情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回忆他们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从这场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在人身上，值得赞扬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能作为一份证词，叙述当时人们不得不做了什么，以及当疫神带着他的无情的屠刀再次降临时，那些既成不了圣人，又不甘心屈服于灾难，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一心想成为医生的人，又该做些什么。

听着在城市上空回响的欢呼声，里厄思考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处在欢乐之中的人们看不见的东西，他却一清二楚。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上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绝不会死去，也绝不会消失，它们能够在家具或者衣物里潜伏十年之久，在房间里，在地窖中，在行李箱里，在手帕上或者在废纸堆里，它们耐心地等待着，也许将来有一天，为了制造灾祸或是教训人类，疫神会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在某个幸福的城市里倒地死去。